# 我的勢力与反者

梁漱溟

湖北出版社

名人传记● 名人传记● 名人传记● 名人传记●

001530

# 我的努力与反省

梁漱溟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 我的努力与反省

梁漱溟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16.25 插页4 字数 255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600 册

ISBN 7—5407—0071—8/I·53
统一书号：10256·258 定价：3.05 元
（国内发行）

# 序　言

我出生于中日甲午之战前一年（1893），又经历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和第二次中日战争（“七七”事变）等列强对我国的欺凌与侵略。从清王朝的覆亡和辛亥革命的成功、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和新中国的建立，直至“十年浩劫”，其间的政治纷争、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我亲身经历不少，耳闻目睹者更多。我既从事过文化学术工作，又曾投身于社会运动；既曾出入于农村基层，又曾参与过一些上层政治活动。如果将这种种加以记述，把自己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作一番回顾，是有意义的。可是如今已届暮年，精力头脑均不济，只得退而求其次，于是将过去所写的有关记述个人经历的文稿，加以汇集，编成此书。

我的成长与众多师友的培育、帮助和鞭策不可分。在他们当中应首推两位老前辈，一位是蔡元培先生，一位是梁启超先生，他们都长我二十岁以上。四十年代初我曾发表过纪念他们两位的文章，



F703/96

现将其收入本书，以表达对自己恩师的一点感激与怀念之情。

关于我个人家庭生活，在本书的记述中没有反映。由于我忙于自己认定应当尽心尽力的事，奔波于各地，常居无定所，妻子又早故，只得将二子托付于亲友。正值他们需要照管的年纪，却难得生活在一起，于是只有借书信联系。现在且将目前幸得留存下来的给两儿的两封信编入此书，做为对缺少这方面记述的一点弥补。

编者曾表示希望收入一些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的个人活动的记述。在本书这原是一个“空白”。三十多年来，我主要从事著述，撰成了自早年即酝酿的《人心与人生》一书，还写了《东方学术概观》等文稿，其他值得一提的事就没有什么了。为填补这块“空白”，只得借助于他人手笔，为此将报刊上发表过的《梁漱溟先生访问记》（任华）和《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汪东林）也辑入本书，附于书后。

收入本书的文稿有发表过的，也有不曾发表过的。对事实的记述繁简不一，彼此有的有重复，也有疏漏之处，但一生的重大活动大体上多已涉及，也可粗略地反映一生所走过的道路。

这些文字由于写于不同时期，加之有的是自己的手笔，有的是他人代为整理，不仅文体不尽相同，用辞和称谓等也往往各异，现在均不加改动。

收入本书的几篇较长的文字，还须作以下说明：

《我的自学小史》原是1942年住在桂林东郊七星岩广西省立教育研究所内，应当时在桂林出版的《自学》月刊之约而写的。原列出内容目次，共十八节，但同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亦在属草，难于兼顾，故只写出前十一节，供发表。三十二年之后，1974年3月抽暇就原列节目所缺第十二至十五节，简略填补之。最末三节为1974年以后补写，亦不及其详。

《自述》是据1934年1月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讲演记录整理而成，曾收入当年出版的《乡村建设论文集》（第一集）。

《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写于香港，曾以长篇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当时由我主持的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上。

《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写于1952年，已收存三十余年，这是首次发表。其中主要谈的是抗日战争中和抗日胜利后的活动，以及对于自己思想的初步反省。

今将检出的这些文稿交由漓江出版社编辑出版，以做为留给家乡的一点纪念。

一九八五年　漱　溟　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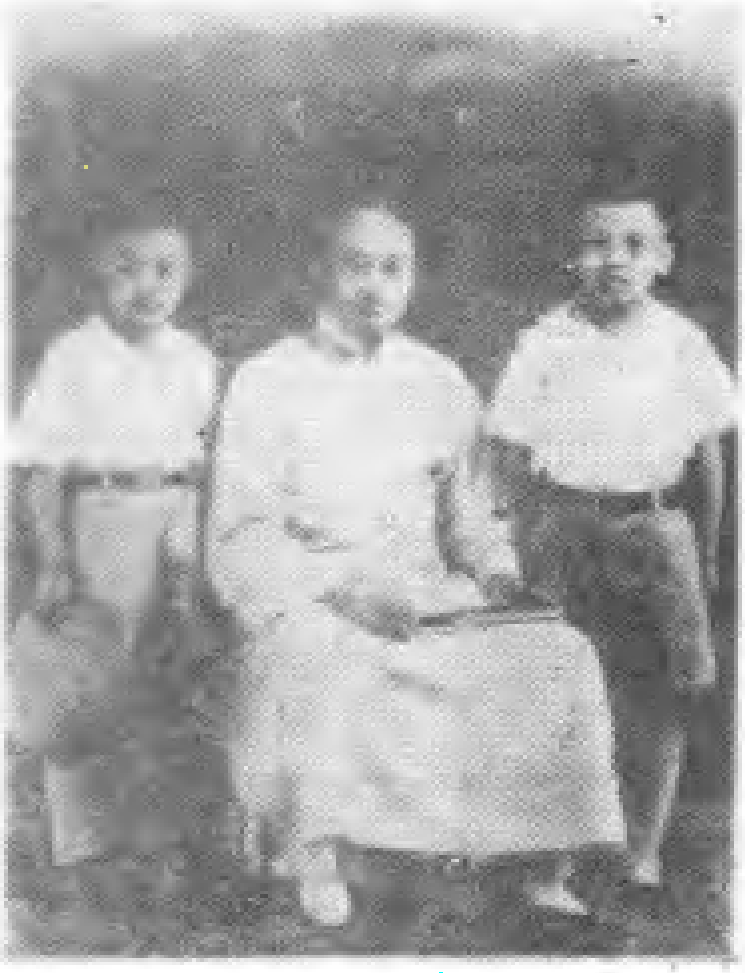
时年九十有二

梁漱溟

一九四二年　桂林

一九〇五年前后　北京

一九一七年　北京



一九三六年　济南

我在北大前後共七年，即自民國十三年至二十年，我思想的轉變，正[illegible]
的基礎，一直到開始寫作時的階段[illegible]，中間曾次第前後民國十年至十一年[redacted]
[illegible]兩次我考取北大，但[illegible]先生然如說[redacted]和當任[illegible]說了。七年之間，從黃
先生和諸同學諸同學以後[illegible]直接的指點之形[redacted]之北京大
學諸[illegible]了我。前年[illegible][redacted]一個學生在上面[illegible]先
生經過書信[illegible]經學林[illegible]我去年翻[illegible]自林晚學後
學蓋在北大之前[illegible][redacted]不自量[redacted]我學先生之指導翻校
[redacted]自林晚學了。
近[redacted]四川，祇有詩教和校考北大書見錄後乃轉而校讀古籍校者非
手寫，從上面所述經過可以看出。亦思我初到北大時，實只廿四歲，與諸同學年
齒[illegible]相若，有的且比我大兩歲，如今日在美校讀的友蘭、顧頡剛、[illegible]本文諸君，都
是昔日相聚的，[illegible]有我[illegible]同學友，[illegible]正在北大求學的，如張
申府（[illegible]）[illegible][redacted][illegible]先、在清華[illegible]

# 目　　录

**我的自学小史**……（1）
序言……（3）
一　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5）
二　我的父亲……（7）
三　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9）
四　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11）
五　从课外读物说到我的一位父执……（14）
六　自学的根本……（20）
七　五年半底中学……（23）
八　中学时期之自学……（26）
九　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29）
十　初入社会……（35）
十一　激进于社会主义……（37）
十二　出世思想……（43）
十三　学佛又学医……（43）
十四　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45）
十五　当年倾慕底几个人物……（47）

十六　思想进步的原理……（50）
十七　东西文化问题……（50）
十八　回到世间来……（51）
**自述**……（53）
**我努力的是什么**……（97）
引言……（99）
一　一九四一年二三月间的一段经过…（101）
二　七七以前的讲演……（119）
三　八一三以前的文章……（123）
四　国防参议会……（126）
五　访问延安……（137）
六　国民参政会……（155）
七　改善兵役运动……（162）
八　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167）
九　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176）
十　统一建国同志会……（200）
十一　一九四〇年四月间的一个提案…（209）
十二　总结全文……（216）
**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221）
**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前后**……（257）
**香港脱险奇宽恕两儿**……（271）
一　离港……（273）
二　到澳门……（274）
三　再度飘海……（276）
四　由都斛到台山城……（278）

五　经过三埠……(280)
六　经开平到肇庆……(282)
七　搭船上梧州……(283)
八　脱险后感想……(285)
九　处险境中我的心理……(287)
**寄两儿的两封信**……(293)
**再访延安**……(305)
**再忆初访延安**……(315)
互不相让的争论……(317)
“走的是改良之路”……(318)
“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319)
**纪念蔡元培先生**……(321)
**纪念梁启超先生**……(335)
一　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337)
二　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340)
三　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342)
**我的努力与反省**……(345)
一　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处理……(347)
二　抗战前的言论和行动……(351)
三　抗战起后的言论和行动……(354)
四　抗战中期到胜利之前的言论和行动……(359)
五　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的言论和行动……(367)

六　说明如此判断和处理的由来……(375)
七　问题在武力缺乏其主体……(379)
八　深感无秩序之苦……(383)
九　武力主体在一九一一年前和在其后
……(387)
十　深刻地认识无秩序……(391)
十一　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395)
十二　始终自以为是……(402)
十三　到底是无秩序还是有秩序……(405)
十四　就为不懂矛盾论所以一无是处…(413)
十五　这才晓得原来我没有革命……(420)
跋语……(430)
**附录：**
**梁漱溟先生访问记**……(433)
**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451)
**梁漱溟先生年谱简编**……(466)

# 我的自学小史

# 序　言

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若将我自幼修学，以至在这某些学问上“无师自通”的经过，叙述出来给青年朋友，未始无益。于是着手来写《我的自学小史》。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俗语有“学来底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不中听底。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底。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象“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象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还有我们所熟识的大学教授，虽受过大学专门教育，而以兴趣转移及机缘凑巧，却不在其所学本行上发挥，偏喜任教其他学科者，多有其人；当然亦都是出于自学。便是大多数始终不离其本学门的学者，亦没有人只守着当初学来那一些，而不是得力于自己进修底。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青年于此，不可不勉。

此外我愿指出底，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底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底一部好史料。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瞭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景。

## 一。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距今五十年前，我生于北京。那是清光绪十九年癸巳，西历一八九三年，亦就是甲午中日大战前一年。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百年史中最大关节，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从那一次中日大战到这一次中日大战。

我家原是桂林城内人。但从祖父离开桂林，父亲和我们一辈便都生长在北京了。母亲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张家则是云南大理人，从外祖父离开云南，没有回去。祖母又是贵州毕节刘家的。在中国说：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论气质上或习俗上都颇有些不同的。因此，由南方人来看我们，则每当成我们是北方人；而在当地北方人看我们，又以为是来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兼有南北两种气息，而富于一种中间性。

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二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不晓得我们是蒙古

族，即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底两种血，似亦具一中间性。

从社会阶级成分上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作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作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人家”或“世宦之家”。但曾祖父作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极。父稍长到十九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倒亲身尝历的。四十岁方入仕途，又总未得意，景况没有舒展过。因此在生活习惯上意识上，并未曾将我们后辈限于某一阶级中。

父母生我们兄妹四人。我有一个大哥，两个妹妹。大哥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两妹亦于清朝最末一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我们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

象这样一个多方面会萃交融底家庭，住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无偏僻固陋之患。又遭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见闻既多，是很便于自学底。

## 二．我的父亲

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底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作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作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象比较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底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付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底。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底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极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

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

> 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
>
> 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
>
> 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
>
> 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

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后面即可叙述到。

## 三．一个瘠弱而又呆笨底孩子

我自幼瘠瘦多病，气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温。亲长皆觉得，此儿怕不会长命底。五六岁

时，每患头晕目眩；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七、八岁后，虽亦跳掷玩耍，总不如人家活泼勇健。在小学里读书，一次盘杠子跌下地来，用药方才复苏。以后更不敢轻试。在中学时，常常看着同学打球踢球，而不能参加。人家打罢踢罢了，我方敢一个人来试一试。又因为爱用思想，神情颜色皆不象一个少年。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小老哥”。——广东人呼小孩原如此的；但北京人说来，则是嘲笑话了。

却不料后来，年纪长大，我倒很少生病。三十以后，愈见坚实；寒暖饥饱，不以为意。素食至今满三十年，亦没有什么营养不足问题。每闻朋友同侪或患遗精，或患痔血，或胃病，或脚气病；在我一切都没有。若以体质精力来相较，翻而为朋辈所不及。久别之友，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不相见者，每都说我现在还同以前一个样子，不见改变。因而人多称赞我有修养。其实，我亦不知道我有什么修养。不过平生嗜欲最淡，一切无所好。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比较旁人多自知注意一点罢了。

小时候，我不但瘠弱，并且很呆笨的。约摸六岁了，自己还不会穿裤子。因裤上有带条，要从背后系引到前面来，打一结扣，而我不会。一次早起，母亲隔屋喊我，为何还不起床。我大声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招引得家里人都笑了。原来天天要妹妹替我打这结扣才行。

十岁前后，在小学里的课业成绩，比一些同学都较差。虽不是极劣，总是中等以下。到十四岁入中学，我的智力乃见发达；课业成绩间有在前三名者。大体说来，我只是平常资质，没有过人之才。在学校时，不算特别勤学；出学校后，亦未用过苦功。只平素心理上，自己总有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不肯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

## 四．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

我于六岁开始读书，是经一位孟老师在家里教的。那时课儿童，入手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取其容易上口成诵。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了。我在《三字经》之后，即读《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地球韵言》一书，现在恐已无处可寻得。内容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大平洋、大西洋之类；作于何人，我亦记不得了。

说起来好似一件奇事，就是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不读四书，而读地球韵言，当然是出于我父亲的意思。他是距今四十五年前，不主张儿童读经的人。这在当时自是一破例的事。为何能如此呢？大约由父亲平素关心国家大局，而中国当那些年间恰是外侮日遥。例如：

清咸丰十年（西历一八六〇年）英法陷天津，清帝避走热河。

清光绪十年（西历一八八四年）中法之战，安南（今越南）被法国占去。

又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缅甸被英国侵占。

又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战，朝鲜被日本占去。

又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日本。

又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德国占胶州湾（今青岛）

又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俄国强索旅顺大连。

在这一串事实之下，父亲心里激动很大。因此他很早倾向变法维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却有一种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日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

到光绪二十四年，就是我开蒙读书这一年，正赶上

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皆他所极端赞成；不必读四书，似基于此。只惜当时北京尚无学校可入。而《地球韵言》则是便于儿童上口成诵，四字一句的韵文，其中略说世界大势，就认为很合用了。

次年我七岁，北京有第一个"洋学堂"（当时市井人都如此称呼）出现，父亲便命我入学。这是一位福建陈先生（铼）创办的，名曰"中西小学堂"。现在看来，这名称似乎好笑。大约当时系因其既念中文，又念英文之故。可惜我从那幼小时便习英文而到现在亦没有学得好。

八岁这一年，英文念不成了。这年闹"义和团"——后来被称为拳匪——专杀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书之人。我们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当时课本）一齐烧毁。后来因激起欧美、日本八国联军入北京，清帝避走陕西，历史上称为"庚子之变"。

庚子变后，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九岁，我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十岁，改入"蒙养学堂"，读到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又改在家里读书，是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奉天刘先生（讷）教的。十三岁下半年到十四岁上半年，又进入"江苏小学堂"；——这是江苏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

因此，我在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

学。这种求学得不到安稳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

## 五。从课外读物说到我的一位父执

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阅读，常是从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底。即如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更不待言。因为我所受学校教育，以上面说的小学及后面说的中学而止；而这些书典都是课程里没有的。同时我又从来不勉强自己去求学问，作学问家；所以非到引起兴趣和注意，我不去读它的。——我之好学是到真"好"才去"学"的。而对某方面学问之兴趣和注意，总是先借杂志报纸引起来。

我的自学作始于小学时代。奇怪的是在那样新文化初初开荒时候，已有人为我准备了很好的课外读物。这是一种《启蒙画报》，和一种《京话日报》。创办人是我的一位父执，而且是对于我关系深切的一位父执。他的事必须说一说。

他是彭翼仲先生（诒孙），苏州人而长大在北京。祖上状元宰相，为苏州世家巨族。他为人豪侠勇敢；其慷爽尤可爱。论体魄，论精神，俱不似苏州人，却能说苏州话。他是我的谱叔；因他与我父亲结

为兄弟之交，而年纪小于我父。他又是我的姻丈，因我大哥是他的女婿，他的长女便是我的长嫂。他又是我的老师，因前说之“启蒙学堂”就是他主办的，我在那里从学于他。

从他的脾气为人（豪侠勇敢），和环境机缘（家住江南、邻近上海得与外面世界相通），就使他必然成为一个爱国志士维新先锋。距今四十年前（一九〇二年），他在当时全国首都—北京—创办了第一家报纸。严格讲，它是第二家；一九〇一年先有《顺天时报》出版。但《顺天时报》完完全全为日本人所办。就中国人自办者说，它是第一家；广东人朱淇所办《北京日报》为第二家。当时草创印刷厂，还是请来日本工人作工头的。蒙养学堂和报馆印刷厂都在一个大门里，内部亦相通。我们小学生常喜欢去看他们印刷排版。

彭公手创报纸，共计三种。我所受益底是《启蒙画报》；影响于北方社会最大底，乃是《京话日报》；使他自身得祸的，则是《中华报》。

《启蒙画报》最先出版。他给十岁上下的儿童阅看的。内容主要是科学常识，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再则如“伊索寓言”一类的东西亦有，却少有今所谓“童话”者。例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格物致知”之省文，当时用为物理化学之总名称）、算学等各门都有。全是白话文，全有图画（木板雕刻无彩色）。而且每每将科学撰成小故事来

说明。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他的父母，父母如何解答来讲。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所见来讲。算学题以一个人作买卖来讲。诸如此类，儿童极其爱看。历史如讲太平天国，讲“平定”新疆等等。就是前二年底庚子变乱，亦作为历史，剖讲甚详。名人轶事如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的事，以至外国如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等等都有。那便是长篇连载的故事了。图画为永清刘炳堂（用烺）所绘。刘先生极有绘画天才，而不是旧日文人所讲究之一派。没有学过西洋画，而他自得西画写实之妙。所画西洋人尤有神肖．无须多笔细描而形相逼真。计出版首尾共有两年之久。我从那里面不但得了许多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我觉得近若干年所出儿童画报，都远不及它。

启蒙画报出版不久，就从日刊改成旬刊（每册约三十多页），而别出一小型日报，就是《京话日报》。内容主要是新闻和论说。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占三分二，还有三分之一是“紧要新闻”，包涵国际国内重大事情。论说多半指摘社会病痛，或鼓吹一种社会运动，甚有推动力量，能发生很大影响，绝无敷衍篇幅之作。它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而不是给“上流社会”看的。因为是白话，所以我们儿童亦能看，只不过不如对《启蒙画报》之爱看。

当时风气未开，社会一般人都没有看报习惯。虽取价低廉，而一般人家总不乐增此一种开支。两报因此销数都不多。而报馆全部开支却不小。自那年（一九〇二年）春天到年尾，从开办设备到经常费用，彭公家产已赔垫干净，并且负了许多债。年关到来，债主催逼，家中妇女怨谪，彭公忧煎之极，几乎上吊自缢。本来创办之初，我父亲实赞助其事，我家财物早已随着赔送在内；此时还只有我父亲援救他。后来从父亲日记和银钱摺据上批注中，见出当时艰难情形和他们作事动机之纯洁伟大。——他们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这是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一九〇〇年）亲见全国上下愚蠢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所激动的。

这事业屡次要倒闭，终经他们坚持下去，最后居然得到亨通。到第三年，报纸便发达起来了。然主要还是由于鼓吹几次运动，报纸乃随运动之扩大而发达。一次有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地界）一个外国兵，欺侮中国穷民，坐人力车不给钱；车夫索钱，反被打伤。《京话日报》一面在新闻栏详记其事，一面连日著论表示某国兵营如何要惩戒要赔偿才行，并且号召所有人力车夫联合起来，事情不了结，遇见某国兵就不给车子乘坐。事为某国军官所闻，派人来报馆查询，要那车夫前去质证。那车夫胆小不敢去；彭公即亲自送他去。某国军官居然

惩戒兵丁而赔偿车夫。此事虽小，而街谈巷议，哄动全城，报纸销数随之陡增。一次美国禁止华工入境，并对在美华工苛刻；《京话日报》就提倡抵制美货运动。我还记得我们小学生亦在通衢闹市散放传单，调查美货等等。此事在当时颇为新颖，人心殊见振奋，运动亦扩延数月之久。还有一次反对英属非洲虐待华工，似在这以前，但没有这次运动热烈。最大一次运动，是国民捐运动。这是由报纸著论，引起读者来函讨论，酝酿颇久而后发动底。大意是为庚子赔款四万万两，分年偿付，为期愈延久，本息累积愈大；迟早总是要国民负担，不如国民自动一次拿出来。以全国四万万人口计算，刚好每人出一两银子，就可以成功。这与后来民国初建时，南京留守黄克强（兴）先生所倡之“爱国捐”，大致相似。此时报纸销路已广，其言论主张已屡得社会拥护。再标出这大题目来，笼罩到每一个人身上，其影响之大真是空前。自车夫小贩、妇女儿童、工商百业以至文武大臣、皇室亲王，无不响应。后因彭公获罪，此事就消沉下去。然至辛亥革命时，在大清银行（今中国银行之前身）尚存有国民捐九十几万银两。计算捐钱的人数，要在几百万以上。

报纸的发达，确是可惊。不看报底北京人，几乎变得家家看报，而且发展到四乡了。北方各省各县，都传播到，象奉天黑龙江（东）、陕西甘肃（西）

那么远。同时亦惊动了清廷。西太后和光绪帝都遣内侍传旨下来，要看这报。其所以这样发达，亦是有缘故的。因这报纸的主义不外一是维新，一是爱国；浅近明白正切合那时需要。社会上有些热心人士，自动帮忙，或多购报纸沿街张贴，或出资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还有被人呼为“醉郭”底一位老者，原以说书卖卜为生。他改行，专门讲报，作义务宣传员。其他类此之事不少。

《中华报》最后出版。这是将《启蒙画报》停了，才出的。在版式上，不是单张的而是成册的。内容以论政为主，文体是文言文。这与《京话日报》以“大众”为对象的，当然不同了。似乎当年彭公原无革命意识，而此报由其妹婿杭辛斋先生（慎修，海宁人）主笔，他却算是革命党人。我当时学力不够看这个报，对它没有兴趣，所以现在不大能记得其言论主张如何。

到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七年），《中华报》出版有一年半以上，《京话日报》则届第五年，清政府逮捕彭杭二公并封闭报馆。其实彭公被捕，此已是第二次；不过在我的自学史内不必叙他太多了。这次罪名，据巡警部（如今之内政部）上奏清廷，是“妄论朝政、附和匪党”。杭公定罪是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彭公是发配新疆，监禁十年。其内幕真情，是为袁世凯在其北洋营务处（如今之军法处）秘密诛杀党人，《中华报》予以揭出之故。

后来革命，民国成立，举行大赦，彭公才得从新疆回来。《京话日报》于是恢复出版。不料袁世凯帝制，彭公不肯附和，又被封闭。袁倒以后再出版。至民国十年，彭公病故，我因重视它的历史还接办一个时期。

## 六。自学的根本

在上面叙述了我的父亲，又叙述了我的一位父执。这是意在叙明我幼年之家庭环境和最切近之社会环境。关于这环境方面，以上只是扼要叙述，未能周详。例如我母亲之温厚明通，赞助我父亲和彭公的维新运动，并提倡女学，自己参加北京初创第一间女学校“女学传习所”担任教员等类事情都未及说到。然读者或亦不难想象得之。就从这环境中，给我种下了自学的根本：一片向上心。

一面是从父亲和彭公他们的人格感召，使幼稚底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生活。更一面是从那维新前进底空气中，自具一种迈越世俗的见识主张，使我意识到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顷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

这种心理，可能有其偏弊；至少不免流露一种

高傲神情。若从好一方面来说，这里面固含蓄得一点正大之气，和一点刚强之气。——我不敢说得多，但至少各有一点点。我自省我终身受用者，似乎在此。

特别是自十三四岁开始，由于这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底责任；不论何事，很少须要人督迫。并且有时某些事，觉得不合我意见，虽旁人要我做，我亦不做。固然十岁时爱看《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几乎成癖，已算是自学，但真底自学，必从这里（向上心）说起。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足以尽自学之事。在整个生命向上自强之中，可以包括了求知识。求知识盖所以濬发我们的智慧识见；它并不是一种目的。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假若求知识以至废寝忘食，身体精神不健全，甚至所知愈多头脑愈昏，就不得善学。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一句话，这观念最正确。这个“学”显然是自学，同时这个“学”显然就是在说一切做人做事而不止于求些知识。

自学最要紧是在生活中有自觉。读书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却是照顾自己身体而如何善用它。——用它来做种种事情，读书则其一种。可惜这个道理，我只在今天乃说得出，当时亦不明白的。所以当时对自己身体照顾不够，例如：爱静中思维，而不注意身体应当活动；饮食、睡眠，工作三种时

间没有好的分配调整；不免有少年斵丧身体之不良习惯（手淫）。所幸者，从向上心稍知自爱，还不是全然不照顾它。更因为有一点正大刚强之气，耳目心思向正面用去，下流毛病自然减少。我以个一孱弱多病的体质，到后来慢慢转强，很少生病，精力且每比旁人略优；其故似不外：

一、我虽讲不到修养，然于身体少斵丧少浪费；虽至今对于身体仍愧照顾不够，但似比普通人略知照顾。

二、胸中恒有一段清刚之气，使外面病邪好象无隙可乘。——反之，偶尔患病，细细想来总是先由自己生命失其清明刚劲、有所疏忽而致。

又如我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自十四岁虽变得好些，亦不怎样聪明。讲学问又无根底。乃后来亦居然滥侧学者之林；终幸未落于庸劣下愚，倒反受到社会的过奖过爱。此其故，要亦不外：

一、由于向上心，自知好学，虽没有用过苦功，亦从不偷惰。

二、环境好，机缘巧，总让我自主自动地去学，从没有被动地读过死书，或死读书。换句话说：无论旧教育（老式之书房教育）或新教育（欧美传来之学校教育）其毒害唯我受的最少。

总之，向上心是自学的根本；而所有今日的我，皆由自学得来。古书《中庸》上有“虽愚必

明，虽柔必强”两句话，恰好借用来说我个人的自学经过（原文第二句不指身体而言，第一句意义亦较专深，故只算借用）。

## 七．五年半底中学

我于十四岁那一年（一九〇六年）的夏天，考入“顺天中学堂”（地址在地安门外兵将局）。此虽不是北京最先成立的一间中学，却是与那最先成立的“五城中学堂”为兄弟者。“五城”指北京的城市；“顺天”指顺天府（京兆）。福建人陈璧，先为五城御史，创五城中学；后为顺天府尹，又设顺天中学。两个学堂的洋文总教习，同由王邵廉先生（天津人，与伍光建同留学英国海军）担任。汉文教习以福建人居多，例如五城以林纾（琴南）为主，我们则以一位跛腿陈先生（忘其名）为主。

当时以初设学校，学科程度无一定标准。许多小学比今日中学程度还高，而那时的中学与大学似亦颇难分别。我的同班同学竟有年纪长我近一倍者；——我十四岁，他二十七岁。有好多同学虽与我们年纪小的同班受课，其实可以为我们的老师而有余。他们诗赋、古文词、四六骈体文，都作得很好；进而讲求到“选学”（昭明文选）。不过因为求出路（贡生、举人、进士）非经过学堂不可；有的机会

凑巧得入大学，有的不巧就入中学了。

今日学术界知名之士，如张申府（崧年）汤用彤（锡予）各位，皆是我的老同学。论年级，他们尚稍后于我；论年龄，则我们三人皆相同。我在我那班级上是年龄最小的。

当时学堂里读书，大半集中于英算两门。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这上边。年长诸同学，很感觉费力；但我于此，亦曾实行过自学。在我那班上有四个人，彼此很要好。一廖福申（慰慈，福建），二王毓芬（梅庄，北京），三姚万里（伯鹏，广东），四就是我。我们四个都是年纪最小的；——廖与王稍长一两岁。在廖大哥领导之下，我们曾结合起来自学。

这一结合，多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知用功，特来勉励我们。以那少年时代的天真，结合之初，颇具热情。我记得经过一阵很起劲的谈话以后，四个人同出去，到酒楼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议彼此相称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气；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字来，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我们一个个命名。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名字，是“暴”；而我的就是“傲”了。真的，这三个字都甚恰当。我是傲，不必说了。那王确亦懦弱有些妇人气；而姚则以赛跑跳高和足球擅长，原是一粗的体育大家。最后，他自名

为“惰”。这却太谦了。他正是最勤学的一个呢！此大约因其所要求于自己的，总感觉不够之故，而从他自谦其惰，正可见出其勤来了。

那时每一班有一专任洋文教习，所有这一班的英文、数学、外国地理都由他以英文原本教授。这些位洋文教习，全是天津水师学堂出身，而王劭廉先生的门徒。我那一班是位吕先生（富永）。他们秉承王先生的规矩，教课认真，作事有军人风格。当然课程进行的并不慢。但我们自学的进度，总还是超过他所教的。如英文读本Carpenters Reader（亚洲之一本），先生教到全书的一半时，廖已读完全书，我亦能读到三分之二。纳氏英文文法，先生教第二册未完，我与廖研究第三册了。代数、几何、三角各书，经先生开一个头，廖即能自学下去，无待于先生教了。我赶不上他那样快，但经他携带，总亦走在先生教的前边。廖对于习题一个个都做；其所做算草非常清楚整齐悦目。我便不行了；本子上很多涂改，行款不齐，字迹潦草。比他显得忙乱，而进度反在他之后。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之所及（注一）。然从当年那些经验上，使我相信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

同时廖还注意国文方面之自学。他在一个学期

---

注一：　廖君后来经清华送出游美学铁路工程，曾任国内各大铁路工程师。

内，将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圈点完毕。因其为洋版书（当时对于木版书外之铜印、铅印、石印各书均作此称）字小，而每天都是在晚饭前划出一点时间来作的，天光不足。所以到圈点完功，眼睛变得近视了。这是他不晓得照顾身体，很可惜的。这里我与他不同。我是不注意国文方面的。国文讲义我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我另有我所用的功夫，如后面所述，而很少看中国旧书。但我国文作文成绩还不错；偶然亦被取为第一名。我总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记得一位七十岁的王老师十分恼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后，严重地批着“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后来一位范先生偏赏识我。他给我的批语，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十九岁那一年（一九一一年）冬天，我们毕业。前后共经五年半之久。本来没有五年半底中学制度，这是因为中间经过一度学制变更，使我们吃亏。

## 八．中学时期之自学

在上面好象已叙述到我在中学时之自学，如自学英文、数学等课，但我所谓自学尚不在此。我曾说了：

由于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什么事很少要人督迫。……真的自学，必从这里说起。

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

所有上节所述只是当年中学里面一些应付课业的情形，还没有当真说到我的自学。

真的自学，是由于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人生问题；二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此两个问题互有关联之处，不能截然分开，但仍以分别言之为方便。从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被人看作是哲学家。从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参加了中国革命，并至今投身社会运动。今届五十之年，总论过去精力，无非用在这两问题上面；今后当亦不出乎此。而说到我对此两问题如何追求，则在中学时期均已开其端。以下略述当年一些事实。

我很早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价值标准，时时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杆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一旦豁然复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

自喜。此时于西洋之“乐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尚无所闻。却是不期而然，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先父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象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诗词做文章的人，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的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意思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不过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见解而止，他对于哲学并没有兴趣。我则自少年时便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有好处”？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确定它。于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又追究到底何谓苦，何谓乐？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深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钥匙，颇为重要。后来所作《究元决疑论》①中，有论苦乐的一段尚可见一斑。而这一段话，却完全是十六七岁在中学时撰写的旧稿。在中学里，

① 《究元决疑论》为廿四岁作，刊于《东方杂志》，后收为东方文库之一单行小册。

时时沉溺在思想中，亦时时纪录其思想所得。这类积稿当时甚多，现在无存。

然在当时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我对中国问题的热心似又远过于爱谈人生问题。这亦为当时在人生思想上，正以事功为尚之故。

当时——光绪末年宣统初年——正亦有当时的国难。当时的学生界，亦曾激于救国热潮而有自请练学生军的事，如“九·一八”后各地学生之所为者。我记得我和同班同学雷国能兄，皆以热心这运动被推为代表，请求学堂监督给我们特聘军事教官，并发给枪技，于正课外加练军操。此是一例；其他象这类的事，当然很多。

为了救国，自然注意政治而要求政治改造。象民主和法治等观念，以及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早在卅五年前成为我的政治理想。后来所作《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②，其中诠释近代政治的话，还不出中学时那点心得。——那时对于政治自以为是大有心得的。

## 九。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

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

② 此文见于《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出版。

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之“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同时他编的《新小说》（杂志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初时（一九〇七年）之事。稍后（一九一〇年后）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主报》（日报），按期收阅。——这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财。

《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近代西洋思想不少。他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发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的，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

《新民丛报》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约占十分之二外，还有其他人如蒋观云先生（智由）等等的许多文章，和国际国内时事纪载等，约居十分之八，亦甚重要。这些能助我系统地了解当日时局大势之过去背景。因其所记壬寅、癸卯、甲辰（一九〇二年——一九〇四年）之事正在我读它时（一九〇七年——一九〇九年）之前也。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很清楚，不象普通一个中学生。

《国风报》上以谈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选举制度、预算制度等文章为多；其他如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亦常谈到。这是因为当时清廷筹备立宪，各省咨议局亦有联合请愿开国会的运动，各省督抚暨驻外使节在政治上亦有许多建议，而梁任公一派人隐然居于指导地位，即以《国风报》为其机关报。我当时对此运动亦颇热心，并且学习了近代国家法制上许多知识。

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宪派的容易得到手。然我终究亦得到一些。有《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册，是将梁任公和胡汉民（展堂）汪精卫等争论中国应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宪的许多文章，蒐集来起合印的；我反复读之甚熟。其他有些宣传品主于煽动排满感情的，我不喜读。

自学条件，书报资料固然重要，而朋友亦是重要的。在当时，我有两个朋友必须说一说。

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晓峰，河北乐亭县人。他年长于我二岁，而班级则次于我。并且他们一班，是学法文底；我们则学英文。因此虽为一校同学，朝夕相见，却无往来。郭君颜貌如好女子，见者无不惊其美艳，而气敛神肃，眉宇间若有沉忧；我则平素自以为是，亦复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三年方始交谈。但经一度交谈之后，竟使我思想上发生极大变化。

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论胸襟气概似极其不凡；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的。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理会到。对于古今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会，并且拒绝理会之。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底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感受《德育鉴》之启发，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却认为“要作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无当浅薄无根底思想，早应当被推翻。无如一般人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思想亦没有。尽他们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却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

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作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纪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我们，号之为“梁贤人、郭圣人”

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底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那同时还有一位同学陈子方，年纪较我们都大，班级亦在前，与郭君为至好。我亦因郭而亲近之。他的思想见解、精神气魄，在当时亦是高于我底，我亦同受其影响。现在两君都不在人世①。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②。他年纪约长一二岁，与我为同班，却是末后插班进来的。本来陈与郭在中国问题上皆倾向革命，但非甚积极。甄君是从（一九一〇年）广州上海来北京的，似先已与革命派有关系。我们彼此同是对时局积极的，不久成了很好朋友。

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革命派。

---

① 陈故去约廿多年，知其人者甚少。郭与李大钊（守常）为乡亲，亦甚友好，因曾在北大图书馆作事。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时，曾一度引为国务院秘书。今故去亦有十年。

② 甄君民国八九年间在广东曾任大元帅府秘书，后来去国到美洲，今似在旧金山办报。

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转而指摘民主国，无论为法国式（内阁制），抑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唱“虚君共和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我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这一面是很有效底，一面又破坏不大，免遭国际干涉。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底；然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我和甄君时常以此作笔战，亦仿佛梁（任公）汪（精卫）之所为；不过他们在海外是公开底，我们则不敢让人知道。

后来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中学毕业期近，而武昌起义；到处人心奋动，我们在学堂里更呆不住。其时北京的和天津的保定的学生界秘密互有联络，而头绪不一。适清廷释放汪精卫。汪一面倡和议，一面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暗中组织京津同盟会。甄君同我即参加其中，是为北方革命团体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凯，和在天津暴动的事，皆出于此一组织。

## 十．初入社会

按常规说，一个青年应当是由“求学”到“就业”；但在近几十年的中国青年，却每每是由“求学”而“革命”。我亦是其中之一个。我由学校出来，第一步踏入广大社会，不是就了某一项职业而是参加革命。

因为青年是社会的未成熟分子，其所以要求学，原是学习着如何参加社会，为社会之一员，以继成熟份子之后。却不料其求了学来革命。革命乃是改造社会。试问参加它尚虞能力不足，又焉得有改造它的能力？他此时缺乏社会经验，对于社会只有虚见（书本上所得）和臆想，尚无认识。试问认识不足，又何从谈到怎样改造呢？这明明是不行的事！无奈中国革命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革命，缺乏如西洋那种第三阶级或第四阶级由历史孕育下来的革命主力。中国革命只是最先感受到世界潮流之新学分子对旧派之争，全靠海外和沿海一带传播进来的世界思潮，以激动起一些热血青年。所以天然就是一种学生革命。幼稚、错识、失败都是天然不可免的事，无可奈何。

以我而说，那年不过刚足十八岁；自己的见识和举动，今日回想是很幼稚的。自己所亲眼见的许

多人许多事，似都亦不免以天下大事为儿戏。不过青年作事比较认真，动机比较纯洁，则为后来这二三十年的人心所不及。——这是后来的感想，事实不具述。

清帝不久退位，暗杀暴动一类的事，略可结束。同人等多半在天津办报，为公开之革命宣传。赵铁桥诸君所办者，名日《民意报》。以甄亮甫为首的我们一班朋友，所办底报则名《民国报》。当时经费很充足，每日出三大张，规模之大为北方首创。总编辑为孙炳文浚明烈士（四川叙府人，民国十六年国民党以清党为借口将其杀害于上海）；我亦充一名编辑，并且还作过外勤记者。今日所用漱溟二字，即是当时一笔名，而且出于孙先生所代拟。

新闻记者，似乎是社会上一项职业了。但其任务在指导社会，实亦非一个初入社会之青年学生所可胜任。现在想来，我还是觉得不妥的。这或者是我自幼志大言大，推演得来之结果吗！报馆原来馆址设在天津，后又迁北京（顺治门外大街西面）。民国二年春间，中国同盟会改组中国国民党成立，《民国报》收为党本部之机关报，以汤漪主其事，我们一些朋友便离去了。

作新闻记者生活约一年馀。连参预革命工作算起来，亦不满两周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

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底，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在此期间，接触最多者当然在政治方面。前此在中学读书时，便梦想议会政治，逢着资政院开会（宣统二年三年两度开会），必辗转恳托介绍旁听。现在是新闻记者，持有长期旁听证，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了。此外若同盟会本部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本部，若国务院等处，亦是我踪迹最密的所在。还有共和建设讨论会（民主党之前身）和民主党（进步党的前身）的地方，我亦常去。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许多政治上人物，他不熟习我，我却熟习他。这些实际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我对中国问题之认识者不少。

## 十一。激进于社会主义

民国元年已有所谓社会党，在中国出现。这是江亢虎（汪精卫之南京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在上海所发起的，同时他亦就自居于党魁地位。那时北

京且有其支部之成立，主持人为陈翼龙（后为袁世凯所杀）。江亦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之一人，与我家夙有来往，我深知其为人底细。他此种举动，完全出于投机心理。虽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附和他，我则不睬。所有他们发表的言论，我都屏斥，不愿入目。我之倾向社会主义，不独与他们无关，而且因为憎恶他们，倒使我对社会主义隔膜了。

论当时风气，政治改造是一般人意识中所有；经济改造则一般人意识中所无。仅仅"社会主义"这名词，偶然可以看到而已（共产主义一词似尚未见），少有人热心研究它。元年（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民生主义之被删除，正为一很好例证。同盟会会章的宗旨一条，原为"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国民党党章则改为"巩固共合，实行平民政治"。这明明是一很大变动，旧日同志所不喜；而总理孙先生之不愿意，更无待言。然而毕竟改了。而且八月廿五日成立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之剧场举行），我亦参加。我亲见孙总理和黄克强先生都出席，为极长极长之讲演，则终于承认此一修改，又无疑问①。这固然见出总理之虚怀，容纳

① 以我个人记忆所及，此次改组，内部争执甚大。即在定议之后，尤复有人蓄意破坏。成立大会，似分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开会，沪会即因此斗争而散；北京方面以孙黄二

众人意见；而经济问题和社会主义之不为当时所理会，亦完全看出了。

我当时对中国问题认识不足，亦以为只要宪政一上轨道，自不难步欧美日本之后尘，为一近代国家。至于经济平等，世界大同，乃以后之事，现在用不到谈它。所见正与流俗一般无二。不过不久我忽然感触到"财产私有"是人群一大问题。

约在民国元年尾二年初，我偶然一天从家里旧书堆中，检得《社会主义之神髓》一本书，是日本人幸得秋水（日本最早之社会主义者，死于狱中）所著，而张溥泉（继）先生翻译的，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出版。此书在当时已嫌陈旧，内容亦无深刻理论。它讲到什么"资本家""劳动者"底许多话，亦不引起我兴味；不过其中有些反对财产私有的话，却印入我心。我即不断地来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

---

公亲临，幸得终局。当时争点，一即删去民生主义，而于别一条文中列有民生政策；又一则同盟会原有女同志，而新党章不收女党员。当场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起而质问，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亦有人鼓噪。唯赖总理临场讲演，以靖秩序。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总理话已讲完，左右频请续讲，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汗流满面。免强散聚选举，比将票收齐，已近天黑。自早晨八时开会，至此盖已一整天矣。在当时主持改组者，盖以为宪政之局已定，只求善于运用，远如欧美之产业发达，近如日本之经济建设，皆不难循序而进。此时只须实行会政社策，足防社会问题于未来，无唱社会主义之必要。而运用宪政则在政党。故改组即在泯除暴力革命秘密结社之本色，而化为宪政国家之普通政党，俾与一般社会相接近，以广结同志，多得选民也。

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地反对，好象忍耐不得。

我发现这是引起人群中间生存竞争之根源。由于生存竞争，所以人们常常受到生活问题的威胁，不免于巧取豪夺。巧取，极端之例便是诈骗；豪夺，极端之例便是强盗。在这两大类型中包含各式各样数不尽底事例，而且是层出不穷。我们出去旅行，处处要提防上当受欺。一不小心，轻则损失财物，大则丧身失命。乃至坐在家里，受至亲至近之人所欺者，耳闻目见亦复不鲜。整个社会没有平安地方，说不定诈骗强盗从那里来。你无钱，便受生活问题底威胁；你有钱，又受这种种威胁。你可能饿死无人管，亦可能四周围的人都在那儿打算你！啊呀！这是什么社会？这是什么人生？——然而这并不新奇。财产私有，生存竞争，自不免演到这一步！

这在被欺被害底人，固属不幸而可悯；即那行骗行暴底人，亦太可怜了！太不象个"人"了！人类不应当这个样子！人间的这一切罪恶社会制度（财产私有制度）实为之，不能全以责备那个人。若根源上不解决，徒以严法峻刑对付个人，囚之杀之，实在是不通的事。我们即从法律之禁不了，已可证明其不通与无用。

人间还有许多罪恶，似为当事双方所同意，亦且为法律所不禁的，如许多为了金钱不复计及人格

的事。其极端之例，便是倡优。社会上大事小事，属此类型，各式各样亦复数之不尽。因为在这社会上，是苦是乐，是死是活，都决定于金钱。钱之为用，乃广大无边，而高于一切；拥有大量钱财之人，即不啻握有莫大权力，可以役使一切了。此时责备有钱底人，不该这样用他的钱；责备无钱人，不该这样出卖自己。高唱道德，以勉励众人。我们亦徒见其迂谬可笑，费尽唇舌，难收效果而已！

此外还有法律之所许可，道德不及纠正，而社会无形予以鼓励底事，那便是经济上一切竞争行为。竞争之结果，总有许多落伍失败的人，陷于悲惨境遇。其极端之例，便是乞丐。有的不出来行乞，而境遇悲惨须人救恤者，同属这一类型。大抵老弱残废孤寡疾病底人，竞争不了，最容易落到这地步。我认为这亦是人间的一种罪恶。不过这种罪恶，更没有那一个负其责，显明是社会制度的罪恶了。此时虽有慈善家来举办慈善事业以为救济，但不从头理清此一问题，支支节节，不能补救得几何？

此时普及教育是不可希望的，公共卫生是不能讲的，纵然以国家力量勉强举办一些，无奈与其社会大趋势相反何？——大趋势使好多人不能从容以受教育，使好多人无法讲求卫生。社会财富可能以自由竞争而增进（亦有限度），但文化水准不见得比例地随以增高，尤其风俗习惯想要日进于美善，是不

可能底。因根本上先失去人心的清明安和，而流于贪吝自私。再加以与普及教育是矛盾底，与公共卫生是矛盾底，那么，将只有使身体方面心理方面日益败坏堕落下去！

人类日趋于下流与衰败，是何等可惊可惧的事！教育家挽救不了；卫生家挽救不了；宗教家、道德家、哲学家都挽救不了。什么政治家，法律家更不用说。拔本塞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间之生存竞争。——这就是社会主义。

我当时对于社会主义所知甚少，却十分热心。其所以热心，便是认定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而不可忍地反对它。理由如上所说亦无深奥，却全是经自己思考而得。是年冬，曾撰成《社会主义粹言》一种（内容分十节，不过万二三千字），自己写于腊纸，油印数十本赠人。今无存稿。唯在《漱溟卅前文录》中，有《槐坛讲演之一段》一篇，是民国十二年春间为曹州中学生所讲，讲到一点从前的思想。

那时思想，仅属人生问题一面之一种社会理想，还没有扣合到中国问题上。换言之，那时只有见于人类生活须要社会主义，却没有见社会主义在中国问题上，有其特殊需要。

## 十二。出世思想

我大约从十岁开始即好用思想。其时深深感受先父思想的影响，若从今日名词言之，可以说在人生哲学上重视实际利害，颇暗合于中国古代墨家思想，或西方近代英国人的功利主义。——以先父似未尝读墨子书，更不知有近代英国哲学，故云暗合。

大约十六七岁时，从利害之分析追问，而转入何谓苦何谓乐之研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之认识，于是遽尔倾向印度出世思想了。十七岁曾拒绝母亲为我议婚，二十岁开始茹素，寻求佛典阅读，怀抱出家为僧之念，直至廿九岁乃始放弃。——放弃之由，将于后文第十八节言之。

按：一九六九年秋间曾写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实为此节最好参考之资料，兹不烦重加述说。又关于苦乐问题之研索，则早年《究元决疑论》一文内有一段述说，可资参看。

## 十三。学佛又学医

我寻求佛典阅读之，盖始于民国初元，而苦力

于民国三年前后。于其同时兼读中西医书。佛典及西医书均求之于当时琉璃厂西门的有正书局。此为上海有正书局分店。据闻在上海主其事者，为狄葆贤，号平子，又号平等阁主，崇信佛法，《佛学丛报》每月一期，似即其主编。金陵刻经处刻出之佛典，以及常州等处印行之佛典，均于此流通，任人觅购。《佛学丛报》中有李证刚（翊灼）先生文章，当时为我喜欢读。但因无人指教，自己于佛法大乘小乘尚不分辨，于各宗派更属茫然，遇有佛典即行购求，亦不问其能懂与否。曾记得"唯识""因明"各典籍最难通晓，暗中摸索，费力甚苦。

所以学佛又学医者，虽心慕金刚经所云"入城乞食"之后制，自度不能行之于今，拟以医术服务人民取得衣食一切所需也。恰好有正书局代售上海医学书局出版之西医书籍，因并购取读之。据闻此局主事者丁福保氏，亦好佛学，曾出版佛学辞典等书。丁氏狄氏既有同好，两局业务遂以相通。其西医各书系由日文翻译过来，有关于药物学、内科学、病理学、诊断学等著作十数种之多，我尽购取闭户研究。

中医古籍则琉璃厂各书店多有之。我所读者据今日回忆似以陈修园四十八种为主，《黄帝内经》以至张仲景《伤寒》《金匮》各书均在其中。我初以为中西医既同以人身疾病为研究对象，当不难沟通，后乃知其不然。中西两方思路根本不同，在某

些末节上虽可互有所取，终不能融合为一。其后既然放弃出家之想，医学遂亦置而不谈。

## 十四．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

此节的最好参考资料是我所为《思亲记》一文（见先公遗书卷首）。吾父对我的教育既经叙述在第二节，今此节不外继续前文。其许多事实则具备于《思亲记》所记之中，兹分别概述如下：

父亲的信任我，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事，平素看轻书本学问而有志事功，爱读梁任公的《新民丛报》、《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写作日记，勉励自己。这既有些像父亲年轻时所为，亦且正和当时父亲的心理相合。每于晚饭后谈论时事，我颇能得父亲的喜欢。又如父亲向来佩服胡林翼慷慨有担当，郭嵩焘识见不同于流俗，而我在读到《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时，正好特别重视这两个人。但这都是我十四五岁以至十九岁时的事情，后来就不同了。

说到父亲对我的放任，正是由于我的思想行动很不合父亲之意，且明示其很不同意于我，但不加干涉，让我自己回心转意。我不改变，仍然听任我所为，这便是放任了。

不合父意的思想行动是那些呢？正如《思亲记》原文说的——

> 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

实则时间上非始自民国元年，而早在辛亥革命时，我参加革命行动，父亲就明示不同意了，却不加禁止。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颇多丑剧，父亲深为不满，而我迷信西方政制，以为势所难免，事事为之辩护。虽然父子好谈时事一如既往，而争论剧烈大伤父心。——此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好读佛典，志在出家为僧，父亲当然大为不悦。但我购读佛书，从来不加禁阻。我中学毕业后，不愿升学，以至我不结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让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不过我当时行事亦自委婉，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离开父亲到达西安时方才实行。所惜我终违父意，父在世时坚不结婚，其后我结婚则父逝既三年矣。

## 十五．当年倾慕的几个人物

吾父放任我之所为，一不加禁，盖相信我是有志向上的人，非趋向下流，听其自己转变为宜。就在此放任之中，我得到机会大走自学之路，没有落于被动地受教育地步。大约从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一阶段，我心目中有几个倾慕钦佩的人物，分述如下：

梁任公先生当然是头一个。我从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三整年的《新民丛报》学到很多很多知识，激发了志气，受影响极大。我曾写有纪念先生一文，可参看。文中亦指出了他的缺点。当年钦仰的人物，后来不满意，盖非独于任公先生为然。

再就是先舅氏张镕西先生耀曾，为我年十四五之时所敬服之人。镕舅于母极孝，俗有“家贫出孝子”之说，确是有理。他母亲是吾父表姐，故尔他于吾父亦称舅父，且奉吾父为师。他在民国初年政治中，不唯在其本党（同盟会、国民党）得到群情推重信服，而且深为异党所爱重。我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写有一文可参看。惜他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未能适应社会主义新潮流。

再就是章太炎先生（炳麟）的文章，曾经极为

我所爱读，且惊服其学问之渊深。我搞的《晚周汉魏文钞》，就是受他文章的影响。那时我正在倾心学佛，亦相信了他的佛学。后来方晓得他于佛法竟是外行。

再就是章行严先生（士钊）在我精神上的影响关系，说起来话很长。我自幼喜看报纸。十四岁入中学后，学校阅览室所备京外报纸颇多，我非止看新闻，亦且细看长篇论文。当时北京有一家《帝国日报》常见有署名"秋桐"的文章，讨论宪政制度，例如国会宜用一院制抑二院制的问题等等。笔者似在欧洲，有时兼写有《欧游通迅》刊出，均为我所爱读。后来上海《民立报》常见署者"行严"的论文，提倡讲逻辑。我从笔调上判断其和"秋桐"是一个人的不同笔名又在梁任公主编的《国风报》（一种期刊、出版于日本东京）上见有署名"民质"的一篇论翻译名词的文章，虽内容与前所见者不相涉，但我又断定必为同一个人。此时始终不知其真实姓名为谁。

后来访知其真姓名为章士钊，我所判断不同笔名实为一个人者果然不差。清廷退位后，孙中山先生以临时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但党（同盟会）内决议定都南京，要袁南下就职，《民立报》原为党的机关报，而章先生主持笔政，却发表其定都北京之主张。党内为之哗然；又因章先生本非同盟会会员，群指目为报社内奸。于是章先生乃不得不退出《民立

报》。自己创办一周刊标名《独立周报》，发抒个人言论。其发刊词表明自己从来独立不倚 independent 的性格，又于篇末附有寄杨怀中先生（昌济）长达一二千字的书信。书信内容说他自己虽同孙（中山）黄（克强）一道奔走革命，却不加入同盟会之事实经过（似是因加入同盟会必誓言忠于孙公并捺手指印模，而他不肯行之）。当时他所兄事的章太炎、张溥泉两位，曾强他参加，至于把他关锁在房间内，如不同意参加便不放出（按此时他年龄似尚不足二十岁），而他终不同意。知此事者不多，怀中先生却知道，可以作证。《独立周报》发刊，我曾订阅，对于行严先生这种性格非常喜欢。彼此精神上，实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

其后，章先生在日本出版《甲寅》杂志，我于阅读之余，开始与他通信，曾得答书不少，皆保存之，可惜今尽失去。其时正当孙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图谋帝制，人心苦闷，《甲寅》论著传诵国内，极负盛名。不久章先生参预西南倒袁之役，担任军务院秘书长。袁倒黎继，因军务院撤销问题，先生来北京接洽结束事务，我们始得见面。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认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颇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时有节概可见，九十高龄犹勤著述（我亲见之）自不可及。

## 十六。思想进步的原理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有而等于没有的，殆居大多数。这就是在他头脑中杂乱无章，人云亦云，对于不同的观点意见，他都点头称是。思想或云一种道理，原是对于问题的解答。他之没有思想正为其没有问题。反之，人之所以有学问，恰为他善能发见问题，任何微细不同的意见观点，他都能觉察出来，认真追求，不忽略过去。问题是根苗，大学问象一棵大树，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而环境见闻（读书在其内），生活实践，则是它的滋养资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统。思想进步的原理，一言总括之，就是如此。

往年曾有《如何成功今天的我》一篇讲演词（见于商务馆出版的《漱溟州后文录》），又旧著《中国文化要义》书前有一篇《自序》均可资参看。

## 十七。东西文化问题

我既从青年时便体认人生唯是苦，觉得佛家出世最合我意，茹素不婚，勤求佛典，有志学佛。不料竟以《究元决疑论》一篇胡说瞎论引起蔡元培先

生注意，受聘担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席。这恰值新思潮（“五四”运动）发动前夕。当时的新思潮是既倡导西欧近代思潮（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又同时引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我自己虽然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环境气氛却对我讲东方古哲学的无形中有很大压力。就是在这压力下产生出来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这书内容主要是把西洋、中国、印度不相同的三大文化体系各予以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适当的位置，解决了东西文化问题。

## 十八。回到世间来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的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我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当初归心佛法，由于认定人生唯是苦（佛说四谛法：苦、集、灭、道。），一旦发见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而乐字却出现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极大注意。在《论语》书中与乐字相对待的是一个忧字。然而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以忘忧”，其充满乐观气氛极其明白；是何为而然？经过细心思考反省，就修正了自己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由来，亦就伏下了自己

放弃出家之念，而有回到世间来的动念。

动念回到世间来，虽说触发于一时，而早有其酝酿在的。这就是被误拉进北京大学讲什么哲学，参入知识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好名好胜之心发乎身体，而身则天然有男女之欲。但我既蓄志出家为僧，不许可婚娶，只有自己抑制遏止其欲念。自己精神上就这样时时在矛盾斗争中。矛盾斗争不会长久相持不决，逢到机会终于触发了放弃一向要出家的决心。

机会是在一九二〇年春初，我应少年中国学会邀请作宗教问题讲演后，在家补写其讲词。此原为一轻易事，乃不料下笔总不如意，写不数行，涂改满纸，思路窘涩，头脑紊乱，自己不禁诧讶，掷笔叹息。即静心一时，随手取《明儒学案》翻阅之。其中泰州王心斋一派素所熟悉，此时于东崖语录中忽看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蓦地心惊：这不是恰在对我说的话吗？这不是恰在指斥现时的我吗？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是年暑假应邀在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题，回京写定付印出版，冬十一月尾结婚。

# 自　述

日昨曾说明本院开办辩讲习会之意义，并非欲在此短时期内传授诸君以知识技能，赶着应用，一如普通之速成班；本院的意旨是因为吾们皆身在问题中，又生于问题最严重之中国，吾们聚合一处，商讨吾们的问题，找出路子，解决烦闷。

今日所讲之内容将先说明我自己，在说明我自己时最可使诸君明白上面“解决烦闷”之意。今日所讲与日昨所讲实相连贯。诸君如已经看过我所发表的文字，其中有两篇皆是说明我自己的。其一即《如何成功今天的我》见《卅后文录》（商务印书馆发行）。此文系民国十七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讲稿，在此文中我曾说明，外间对于个人，往往有许多不同之猜测，以为我为一学问家、哲学家、国学家或其他专家，仿佛看我为学问中人；其实我并无学问。我省思再四，我自己认识我，我实在不是学问中人，我可算是“问题中人”。如果有人问我，我现在何以有一点关于哲学、佛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何以在社会中的有此地位？我的答复，乃是由于问题逼出的来。我当初并无意于某一

方面的学问、或者是哲学，或者是佛学，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而结果则都知道一点，其所以致此者，问题逼之使然也。当初我亦无意于社会中如何做那种事业，成就一种地位，而结果能做点事业，有点地位；其故无他，亦问题逼之使然也（看下文自明）。

最近我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的出版，此书系汇集我在村治月刊各期内所发表之论文而成。其中第一篇《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也是表白我自己，说明我自己所以成为今日的我，所以主编村治月刊的原因，无一非问题逼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诸君如已看过这两篇文字，皆可以了解我；但我在今日讲辞中仍愿为诸君说明我自己。

因为本院招收讲习会会员时，曾嘱诸君先写一篇"自述"，俾本院同人对于诸君有一了解；以故我亦应为诸君叙述我自己，使诸君对于我亦得以了解。我之所谓今日所讲与日昨所讲彼此有关系者，意即在斯。以下且先说明我自己。

我之籍贯系广西桂林，我之祖父生于桂林，先父与我则皆生于北京，先母为云南籍。我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今年四十一岁。我生后身体极弱，较之于寻常儿童皆有不及。六岁时，头目时刻晕眩，有时顿感地动天摇，我自己无力支持；医生曾语先父，此子恐难永年，殊可忧也。

八岁时，入北京中西小学堂，此处系北京最先

设立之小学堂。入中西小学堂后，即读西文ABC……与教科书等；所可惜者，未读四书、五经等等。大约凡与我年相若之友朋，类皆读过四书，而我则始终未之读也。我之所以从小时候即入学堂读教科书，实因先父之思想趋向“维新”，暂不欲我诵读古籍也。

小学未届毕业，即入顺天中学（北京原为顺天府），十九岁时中学毕业。我之受正式教育的时日，即止于此。此后即未能再受正规的教育，入较高的学校求学。因此之故，诸君或可明白我不够讲学问，亦无学问可讲。良以讲学问必须具有相当的条件与工具；讲中国学问，非知道文字学（即小学）经学等不可；讲西洋学问，西文不具备相当之根基，亦实不可能。兹二者我皆未尝下过工夫，我又何能讲中国学问或西洋学问？我当初所受的教育，如此浅薄，讲学问的工具，如此不够用，而一般人视我为学问家，目我为学问中人，宁不可怪？然我对于种种学问又似乎都知道者，实即上文所说，问题逼之使然也。我所知者，实是于不知不觉中摸索得来，当初自己并未能料到，乃是误打误撞而来，自己实未尝想到学问究竟何事也。

某年，应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请，作短期讲课。当时梁任公先生介绍我说“梁先生（指我）家学渊源”；我即刻声明，我实在缺乏学问，更谈不到家学渊源。但从别一方面言之，我之一切，受先父

所影响者，却又很大。所谓渊源，无宁谓之为性情脾气渊源之为愈也。因此之故，在未说明我自己之前，又不得不先说明先父之为人。

先父为人，天资并不算高，只是太认真，太真实。此点由其思想上可以看出。先父有他自己的思想。本来，为人子者，似不该用批评的口吻，议论其父若祖；但欲诸君了解我，与了解先君之为人能清楚计，又不得不尔。征实言之，先父之思想，原是浅薄，但他有思想。所谓有思想，即是肯认真，以为这样是对，那样则是不对。他有主见（即是思想），所以有主见，因为他肯认真。由于天资不高，虽有主见，而所见者甚简单耳。

最可怪者，先父之思想，实与西洋思想相近。他实在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时时持有一个标准，而依此标准评论一切。他所持有之标准，即是“有用处”三字。他批评世间一切事，有用处即是好，无用处乃是不好，此点仿佛与詹姆士James杜威John Dewey等之思想相近——所谓实用主义。他自己虽也曾读书考中举人，但他最看不起读书人，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因为读书人不中用，因为文章亦不中用。因之，读书人要不得，文章亦不必要。他最看不惯人做诗词写文章，他时常叹息痛恨中国国事为文人所误；一个人如果读书中举，便快成无用之人，如再中进士点翰林，则更将变成废物而无用。

先父思想之所以如此者，不外下列数种原因：

其一、由于他的天资不高，所见未免着重事物，稍涉虚渺处即不能知之，于是所见者皆甚单简。其二、由于当时之社会国家情势，予先父以莫大之刺激与影响。彼时正在曾胡用兵之后，开出崇尚“事功”的风气；与在乾隆、嘉庆时，中国的风气，正是讲汉学者不同。迄于光绪中叶，国际侵略日加；甲午一战，关系尤大。在在使先父感伤国势之危殆，问题之严重，不能自已。同时先父又看到西洋各国之强盛，事事有办法、有功效、有用处，而反观中国，则一无办法，事不见功效，人又无用处。先父之倾向于维新者，实即其人感情真挚，关切国事，及其一种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务实不务虚之故。惟其如此，故不令我读经书而使我入学堂也。

以下须转归说明我自己。我自己的性情与脾气，颇多相似于先父之处。先父天资不高，我自己亦甚笨。我越幼小时越笨，此点诸君或不肯置信，而实则我自己反省时确确如此也。在我说明我自己时，仿佛我站在旁边看我的为人、全是客观的态度；用好字样讲自己的好处时并非夸大，用不好的字样亦不是谦虚，此点最盼诸君能加留心。

我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即先父之视我，亦自谓我与他相似；当我十七岁时，先父曾字我曰“肖吾”，于此可见。在今日我自己反省时，我感觉到我的所以如此者，无一不是由于我的性情脾气所造成。诸君能

了然于此后，请进而言事实。

吾人幼小时，心胸中空空洞洞，势不免于先入为主。况加我之性情脾气既同于先父。于是先父的思想，乃成为我的思想。先父为一实用主义者，我亦随之而成为一实用主义者。我入中学时十四岁，国文教师教我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我最不高兴；国文讲义，我向例不看，尤其不喜欢空洞的议论，如苏东坡之万言书。至若庄子上的文字，更叫我头痛痛恨。因为庄子上的文字，富有哲学意味，玄妙极顶；类如“此一是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实在是故示玄妙，完全是骗人误人的东西。所有《庄子》、《老子》一类书，我概不以为然。其他如古文、词章、文选派之六朝文章，我无一不厌恶。我从来没有在国文上，下过功夫。由此种至狭隘之见解中，亦可以看到我之愚笨为何如，我之认真为何如。此种狭隘之见解，二十余岁以后，才渐次解放。我所有的这半生中，变化极多，许多事从前与日后完全不同样，俨若两人。这在我当初实不及料。在今日我反省过去，我却有以下之“四不料”。其第一不料，即当初最反对高玄最嫌厌哲学，却不料以后反而到大学中去讲哲学，致为人目之为哲学家也。

我的至狭隘之见解，几经变化才得逐渐解放。第一次发生变化时，即在顺天中学。同学中有郭仁林君其人者，年长于我两岁，在校中则较我低一

班。此君天资极高，彼时不过十八九岁，专看佛经、《易经》、《老子》、《庄子》等书，因我们不同班，不多往来。某日，在校内假山上遇见，乃相攀谈。我述我的思想，我说我愿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慷慨陈词，自命不凡。郭君笑而不以为然。彼所以语我者，认为我即是想做事业，自己必须先身心的修养。我语之，我亦看《理学宗传》、《阳明语录》等书。彼又语我，吾人必先将世间之得失成败利害等等，看来无动于中，由此方可有大无畏之精神，不因稍感挫折而遽尔心灰意懒；如果以我如此之拘谨、狭隘、呆板，专讲有用之学，实不能成大事。必须先明白了很高之学问，日后才有辦法。郭君一席谈话，打动了我的心肝，因为这些话无一不是就我当时的思想而加诱导的。自此之后，我不时与他亲近，不时相与往还。他最爱讲谭嗣同之《仁学》。郭君每为我讲时，我即记录其说话；我不敢认他为同学，乃尊之为郭师。每日课后即前往就教，他讲我听，且一一记之。在记录之薄本上题名为“郭师语录”。由此亦不难看出我之认真与愚笨。但好处即在于愚笨与认真。因为愚笨，思想的过程，不能超过他人先走一步，必须走一步后，碰着钉子，乃又反省、转移、变化；“每一步皆是踏实不空，以后又继续追求，向前走去，追求时碰着钉子，乃又反省、转移、变化”。以故我此生时时在变化中。因为有变化，先前狭隘之见解

乃得渐次解放，不敢谓佛老为绝无道理矣。以上可说是第一次的解放。

第二次的变化，亦即是第二次之解放，乃是从人生问题烦闷中发生厌世出世之思想而转变了我之为人。关于我的所以发生厌世思想种种，说来话长，非在此短时期内所可言之无遗。《卅前文录》（商务印书馆发行）有《究元决疑论》一文可以参看。此篇文字系一出世主义之哲学，今日不必在此再赘言之。原其所以然，盖由三层原放：一、感情真挚易多感伤感触，佛家所谓烦恼重。二、事功派的夸大心理易反动而趋消极。三、用思太过，不知自休，以致神经衰弱而神经过敏。但在主观上则自有一套理论，持之甚坚且确。因为发生厌世思想，则根本否认人生，更不再讲实利。于是以前之狭隘实利主义乃大解放矣。

我的看佛学书，是自己已经先有了与佛家相近之思想而后才去看佛学书。我看任何书都是如此，必是如此，必是自己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后再参考别人的意见。从未为读书而读书。看西洋哲学书亦复如此。友人张松年（申府）先生以我之思想与叔本华之思想相近，于是乃将叔本华之著作与相关之别人著作介绍给我。这是我看西洋哲学的起缘。总之，我自己必先有问题与思想然后才去看书。如此辗转，如此过渡，如此变化，乃成为今日的我，乃有今日的思想。

讲到这里，可以结束我今日的说话。关于我的人生思想之转变或是哲学的变化，可分为三期。第一时期为实用主义时期，从十四五岁起至十九岁止，以受先父之影响为多。第二时期即为上文所讲之出世思想归入佛家，从二十岁起至二十八九岁止。在此时期中一心想出家做和尚。第三时期由佛家思想转入于儒家思想，从二十八九以后，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际。在此三个时期中，令人感觉奇巧者，即是第一个时期可谓为西洋的思想，第二个时期可谓为印度的思想，第三个时期可谓为中国的思想。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脑海中巡回了一次。

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不单是有哲学，因为我不是为哲学而哲学。在我的出世思想必要出家做和尚而后已，当初我的思想是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结果必回归于实在的行动中去。譬之佛家的实在处所，即在不吃荤、不结婚出家做和尚，我当时即要如此做去。我二十余年茹素习惯即由彼时养成。我中学毕业之后原须升学、求学问，但当时的我，一心想做和尚则又何用升学为？

我之所以能如此者，先父之成就我极大。因先父从来不干涉我、勉强我；从未要我准备功课督促我升学，此实常人所难及也。先父甚不喜欢佛

学，但他不禁止我看佛经；先父希望我升学，但他未尝明白语我要升学；先父希望我结婚，但他从未一言及我应当早日结婚。而在我自己，亦未尝不明了先父之意旨，希望我升学，希望我不要研究佛学，希望我结婚。当民国七年，先父以感伤国家的多故，痛心社会的坠落，早怀自杀之念。废历十月初十日，系其生辰，在他六十岁生辰前三日，从容留下许多信件，即行自尽。此中种种，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桂林梁先生遗书》可以参看。普通人一值晚年，类皆希望有后代，能见到后代，先父当亦如此。在他怀下自杀之念时，家兄结婚已十年，未尝有子，此在旁人必督促我结婚，而先父则始终未肯言之。我每念及此，未尝不眷眷于先父不强逼我，其玉成我之重大也。

在我过去之半生中，从最初迄于今日，我皆有我的意志，由我已去碰钉子，发生转变，自己摸出路子来；如果有人稍加干涉，则步骤必乱。先父不强逼我升学、结婚，一任其自然，实所以成就我；给我以绝对的自由，让我上前追求、转移，用自己的力。否则今日的我，必非如此。我又推究先父对待我所以如此者，盖其心目中以为此子现在要这样，又要那样，事虽荒谬，而动机则为向上心的驱使，处处是要好，并非自甘沦入下流；所行所为心中经过揣量审决，并非一味乱来。现在虽不能“对”，他总会有改转“对”的一日。如果我是趋于

下流，则亦必加以干涉与督责了。实则彼时先父如果干涉我，我亦不受，要我听他的说话，我亦是不听；因我意志太强。但我推究先父的心理，他确是了解我，而信任我。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讲）

今日将继续日昨讲词仍说明我自己的为人。日昨曾提及我二十岁起，倾向出世主义，意志非常坚决，而先父不干涉我，一任我之自然；虽然他心目中不愿我如此。先父在世，未能目见我之转变，且亦未知我日后果有转变。在先父辞世后一二年间我即转变，由佛家思想转变到儒家思想。关于转变种种，前因后果，在此有限之时间内，实无法详细言之。语其时期，则在民国九年至十年春间。此次转变之深刻，前后绝不相同。我编完先父遗书（即《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曾有《思亲记》一文之作；在此文中有下列一段说话。

> 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

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屡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

由上列一段说话中，亦可看出我转变之概略。先父辞世三年，我即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发表，以阐明中国文化之深微。不知我者恒以为我之喜欢讲中国文化，系受先父之影响，实则先父在日，我最不留心中国文化，此在“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数言中，以及上文所讲种种，不难知之也。

我转变之后，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此书最后所下之结论，我认为人类的最近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书中赞扬孔子阐明儒家思想之处极多。诸君听我讲话到此际时，至须注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所以产生，实系问题逼出来也。

民国六年，我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之邀入北大教书，其时校内文科教授有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诸先生。陈先生任文科学长。兹数先生即彼时所谓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

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我对于儒家思想之了解系先前之事，而思想转变由佛家而儒家则在此时之后也）。我应聘之前，即与蔡陈两先生说明，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出气二字或不甚妥当）。其时文科教授中诸先生有讲程朱老庄之学者，更有其他教员亦是讲中国的学问。《新青年》杂志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锋利，在他们不感觉到痛苦；仿佛认为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干；仿佛自己被敌人打伤一枪，犹视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在我未肯定我的答案以前我一时可以缄默不言；但必是时时去找路子，探求答案，不稍甘一如他人之漠不关心也。

民国九年蔡校长出国赴欧洲考察，北大同人为之饯行。席间讲话，多半认为蔡先生此行，于东西洋文化之沟通关系颇大；蔡先生可以将中国文化中之优越者介绍给西方去，将西方文化之优越者带回到中国来。在各人讲话完了之后，我即提出质问。我说：诸先生今日的说话，似颇耐听；但不知东方文化中有什么可以介绍给西方去？诸先生如不能确实言之，则今日一席话，实有类似于普通饯行之客套语，甚少意义与价值。

由上所言，可见我凡是成为问题的，在我心目

中从来不肯忽略过去。推究其故，还是不外我肯认真，不能不认真，不能不用心思，不能不加以考究，决不容许我自己欺瞒自己。如果我们说不出某一个问题中的道理，即是我们没有道理，我们看到别人家是好或是对，则别人家即是好或是对，这点不能有迟疑的。我往常恒以旁人之忽略对方的意见，对方的见地之可怪。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见地，即便为荒谬的见地或意见，亦必有其来源。我们须认真了解对方（即是与我不同者）的见地，明白对方的意见，是一件极重要之事，而普通人往往不能注意及此，宁不可怪？诸君中如曾注意阅读我业经发表之文字，可以看出我写文章的方法，多半为辩论体裁，先设身处地将别人的意见，叙述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而后再转折说出我的意见。我已往凡是批评西洋的民主政治以及批评俄国现行的制度，无一不是先把人家的意见，研究过透澈，说得明明白白；然后再转折到我的批评，批评其不通，批评其不行，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对于西洋文化的优点先阐明无遗，东方的不行处说个淋漓痛快；然后归折到东方文化胜过西洋文化之处。我原来并不曾想到著书立说、谈学问，只是心目中有问题，在各个问题中都有用过心思，无妨将用过的心思说给大家听；因为我的问题，实即是大家的问题，我自己实实在在，无心著书立说，谈学问也。过去所以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原因是

如此，现在所以讲“乡村建设理论”的原因仍复如此。

我讲话至此，愿附带为诸君言者，即是我心目中愿写出以下四本书：第一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已有讲稿出版。第二为《人心与人生》，此书内容于十六年春曾为北京学术讲演会进过三月，约得书之半，全稿则未暇着笔。第三为《孔学绎旨》。第四为《中国民族之前途》（亦名《乡村建设理论》），即此次为诸君所讲者，拟将记录稿加以修正再行付梓。所以想写“人心与人生”的原因，乃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发表之后，我自己又发觉了自己的错误。在此书中赞扬孔子与阐明儒家学说之处，不幸有两大不妥。我在此书第八版“自序”中曾有下列一段说话：

> 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所以其中关于儒家的说明自属重要；而后来别有新悟自悔前差的亦都是在此一方面为多。总说起来，大概不外两个根本点：一是当时所根据以解释儒家思想的心理学见解错误；一是当时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或云方法错误。大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理想家都必有所据为基础的一种心理学。所有他伦理学上的思想主张无非从他对于人类心理抱如是见解而来。至我在此书中谈到儒家思想，尤其喜用心理学的话为之解

释。自今看去，却大半都错了。盖当时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实未曾认得清，便杂取滥引现在一般心理学作依据。而不以为非；殊不知其适为根本不相容的两样东西。至于所引各派心理学，彼此脉路各异，亦殊不可并为一谈；则又错误中的错误了。

《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内容，即在于纠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此种错误。至若《孔学绎旨》一书之所以必须写出，亦复根由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因为在此书中我引证古书、解释古书时又缺乏方法，与从前的人犯了同样病症，随随便便的说来，漫无准则，有意地或无意地附会牵和，委曲失真。从前的人解释古书时往往如此，譬如大学上所讲之"格物致知"，各人即有各人的解释，朱子（熹）有朱子的解释，王阳明有王阳明的解释，其门下人又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统计过，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古今有六百余种之多。如果我们解释古书有一种方法，而此种方法又为人所公认，则路子相同，结果亦必相同也。《孔学绎旨》一书之内容，即愿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能说明孔子学说以及解释中国古书的方法来，同时亦即是纠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错误。总之《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两书之导源、皆系来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一书之产生，实由于我对于人生问题的烦闷；因为对于人生问题的烦闷，乃由实利主义的思想转变为出世的思想，又由出世的思想——即佛家思想，转变为儒家的思想。这都是沿着人生问题而发生的变迁而产生的答案。日昨曾讲及最近我省思我的过去，竟不知曾有“四不料”。以下乃可以结束上文，讲到第二个不料。我小时候未尝读四书五经，而后来乃变为一个拥护儒家思想赞扬孔子的人。普通人以为我赞扬孔子，阐明儒家的思想，必是曾经熟读过古书；殊不知我对于中国重要古籍，不过仅如看闲书、看普通杂志般的浏览过。我须引征古书时，必须翻检原文，而且常常不能寻找得到。拥护儒家阐发孔子思想乃偏偏出于我这样一个人，实所不料也。

我的问题虽多，但归纳言之，不外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两类。以上所讲皆涉及人生问题。以下请进而为诸君讲我的中国社会问题。此处所谓中国社会问题是以中国政治问题为中心。我今日所提倡并实地从事之乡村运动，即是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种烦闷而得来之最后答案或结论。至若我之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对于我的刺激究竟如何，此有待于按步说明下去。

日昨我曾为诸君讲及：我肄业顺天中学时，我即很想做一个有用之人，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有所建树；于此亦可看出我之关切大局，热心爱

国。我记取彼时因为发生国际问题的原故（究为何事已不复记起），全校同学，莫不慷慷激昂，痛心疾首，自愿受严格之军事训练，作御敌之准备，一若“九一八”事件发生各地学生之行动。其时我与同学雷国能君被举为军事训练队队长，要求学堂监督（校长）聘请军官到校授课，此一事也。日昨又曾为诸君讲及我对于国文一科从来未曾下过工夫；可是我一向爱看爱写。其时最爱看之杂志，即是《新民丛报》《国风报》（此系新民丛报之后身）两种；又极爱看普通之日报，每日不看报，则无异于未曾吃饭饮水。这也是留心时事与关切社会问题的表现。当时国内政见有两大极不相同之派别，其一为立宪派，即梁任公先生所领导者；又其一为革命派，即孙中山先生所领导者。革命派的文字，因其时北京尚在皇室统治之下，不易多得；但胡汉民、汪精卫诸先生之见解，亦有若干小册子，由日本转寄得之，可以看到。至若立宪派之文字则取阅较易。当时我最爱看《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书，因书中系搜集双方不同意见文字而成。我写此书，几于无时或离，日间则携之而走，夜间则枕之睡。又因其时年岁尚小，无法参加立宪派与革命派之大战，乃参加小战；因彼时校中有同学甄尧甫者（曾入同盟会，后来担任中山先生秘书，现在在美国）系一赞成革命派之人，而我则赞成立宪派之意见，于是乃互相辩论，以书信体之文字发表，给与

同学互相传观，此又一事也。在此种事实中，无在不是表示着我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切或兴味。

革命论、立宪论，皆是当时改革政治的主张，因为大家看出清廷无诚意实行君主立宪，所以许多人由立宪论者转入为革命论者，辛亥革命随之而发生。其时我亦已由立宪论者而转入为革命论者，并参加秘密工作。民国元年我乃与甄先生办报纸，做新闻记者。在此时期（即二十岁）曾有一短期间，非常热心于社会主义。当时中国本有所谓“社会党”，虽有声势，但内容颇空虚，颇不健全（按即江亢虎所领导者），我并未与之发生关系。其时我偶然从故纸堆中检得一本张溥泉（继）先生翻译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之神髓》一书；阅后，心乃为之大动，且深深地反对私有财产制度，认为世间一切罪恶，皆渊于私有财产制度。私有财产制度一日不废除，任凭世间有很严的法律，如军队、警察、司法官维持着不许大家轶出范围，结果都属劳而无功。当时曾有“社会主义粹言”一书之写作，自己向人借来钢板钢笔，自己缮写，自己印刷数十份，分送友好。此点在《卅后文录》一书内《槐坛讲演之一段》一稿中曾经提到。槐坛者山东曹州第六中学唐槐下之讲坛也。但此时期（即热心社会主义之时期）颇短促无多日，由此时期乃一变而入于佛家思想、出世思想。此种变化，乃在热心社会主义思想之后，换言之，即是否认了

社会主义理想之后，乃确定了我出世思想，转入于佛家一途。这应归并于人生问题中言之，而无用在此论列也。

我二十岁至二十四岁期间，即不欲升学，谢绝一切，闭门不出，一心归向佛家，终日看佛书。在此时期内自己仍然关心中国问题，不肯放松，不肯不用心想。此点在《思亲记》一文中亦曾言及：

> 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长又出国游；两妹则女儿稚弱；健言者惟漱溟。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顾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忤，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亦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持。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即寝矣，或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呜乎！痛已！儿子之罪不可赎已！

在彼时我父子两人，即非党员，又非议员，自己皆不在漩涡中，原可闭户安居，而仍如此争辩者，亦无非我父子二人对于社会问题之不肯放松，一种呆气耳（在《卅前文录》中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亦系此时所作；当时关切时局战祸的心情与对政治问题的见地，文中颇可见）。

先父六十岁生辰将届之前数日，家人原拟邀约亲友，举行祝贺。因屋宇须加修葺，乃请于先父，先父认可，即去北京城北隅一亲戚家小住；该处有湖名净业湖，其后即投水自尽。先父离家时系在早晨，在他心意中早怀下自尽之念，惟家人不知耳。临行前偶从报上一段国际新闻引起闲谈，尚忆及他最后问我“世界会好吗”？我答复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从此再没见到先父。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拚命到底不可。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讲）

日昨已叙述到从前对于社会问题之关切情形，但尚未说明我如何从对于社会问题之关切而转变到“乡村建设”的主张。今日将为诸君讲述此中种

种，亦即是我对于社会问题之所以有此项答案之缘由也。

此中种种，即从头至尾，转变之历程，似可分为若干段落说明。其最初一段即是上文，业已说过者：我从前是非常之信佩西洋近代政治制度，认为西洋政治制度是非常合理的，其作用是非常巧妙的。我彼时总是梦想着如何而可以使西洋政治制度到中国来实现，从十五岁起一直到二十余岁都是如此，所谓“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者是也。在此际亦正是与先父的思想相背道而驰的时候。诸君如果需要明白我彼时对于西洋政治制度之了解与思想，可参看《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第四篇《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此文前半篇皆是阐明西洋近代政治制度之优良巧妙也。

日昨又曾为诸君讲及我在清末时为一立宪论者，其后又转变而为革命论者。当我所以赞成立宪论时，实鉴于美国、法国的制度不若英国的制度。当时我对于中国问题之见解，以为最关紧要的是政治改造问题而不是对满洲人报仇问题。如果认作是报仇问题，则推翻满人，赶回满人到关外去固当也。因为认作是改造问题，而西洋政治制度安排最妥善者莫如英国，则趋向英国，乃自然之理。迨至清廷对于立宪无诚意时，大势所迫，不得不转而革命；但我之视辛亥革命仍是认作一种政治改造运动。民国成

立之后，我以为政治改造之要求已属达到，或可说已有希望，而事实上乃大不如此。反至一年远似一年，一年不如一年，开始时还似有希望，而日后则越来越绝望。当此时也，一般人类多责难彼时三数强有力者之破坏政治制度，如袁世凯之破坏约法以及其他军阀之攫夺竞争；而在我则始终认为这不是某几个人所能破坏的，我们仅责难少数人，实已蹈于错误之境地。即今日之国民党，党内种种不健全和失败，亦决不是某一个人的过失，或是某某等几个人的过失。我常喜欢对人如此说：我们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点，须看四周围，看背景、看环境；不能只看近处，还须看远处；不能只看浅处，还须看深处；不能只看一时，还须得看过去所以如此的成因与由来。所以在当时一般人都责难袁世凯和其他军阀有力者，而我则不然。我由此而转变到第二段思想中去。

我深悟到制度与习惯间关系之重大，我深悟到制度是依靠于习惯。西洋政治制度虽好，而在中国则因为有许多条件不够，无法建立起来。许多不够的条件中最有力量者即习惯问题。或关系其他条件而可以包括许多其他条件者即为缺乏习惯这一极重要条件。因为中国社会、中国人（一切的人）缺乏此种习惯，则此种制度便建立不起来。

我常如此说：我之看一个人，就是一团习惯；一个社会（不论是中国社会，意大利的社会乃至于

其他的社会）什么都没有，亦不过是一团习惯而已。中国社会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社会，即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吾人须知道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受后天影响极多，极大，而其他动物则不然，以先天所形成者为多。人类之生长，即习惯之生长，此在稍稍了解教育学、心理学者，类皆能知之也。吾人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有其习惯；所谓“习惯”，换言之即是“路子”。譬如我写字，我有我的习惯，有我的路子，一提笔即是如此。推而至于说话，亦复如此：两唇一张，即“那么来”。中国人一向就是“那么来”，有他那种习惯，有那样路子；而他的路子与西洋人本不相同。夫然，西洋政治制度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何足怪异？

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即或是其他的新法令、新制度，如国会议员选举法等），在彼时虽然订成，虽然实行；但是这一件东西，只不过投入吾们大社会中一个很小之因子而已，只不过投入很有历史很有旧习惯之社会中一个新的因子而已。这小因子（如上文所说国会选举法）投入社会之后，虽然因着激刺也可以发生反应的事实（即是大家选举国会议员）；但是吾人应该明瞭，任何事实之构成，因子至多，决不是单纯而简单的，新投入之小因子，不过很多因子中之一极少极小部分，其比例必不及九与一，即新因子不治旧因子之什一也。以故所得之结果有十分之九不是新的。此种结果，当

然不是初所预期之结果也。徵实言之，在公布临时约法时，其希望超过事实上所可能做到者。约法之破坏，在一般人视为出乎意料之外，而在我则视为并非意外之事，应该认那最初草订临时约法者自己错误了。因为他们看着社会如白纸一般，看社会中人软面条无异，可以任凭染色，任凭改变；欲红则红；欲绿则绿；欲长则长，欲短则短。而不知事实上所诏示于吾人者，乃大谬不然。我们虽然给予刺激，虽然看到反应，但不过动一动而已。其结果决非若吾人当初所预期者也。总之，小的因子，决不能有把握要社会到怎么一种地步去。

所谓因子多，即是条件多；所谓旧势力大，即是旧习惯深。民国初年之后，国事日非，当时我并不责难某一个人或是少数人，我惟有深深叹息，叹息着中国人习惯与西洋政治制度之不适合。此时我已不再去热心某一种政治制度表面之建立，而完全注意习惯之养成。惟其如是，又从而引入了以下之转变。

当我注意到养成新政治习惯时，即已想到“乡村自治”问题。此中过程颇明显，因为我心目中所谓新政治习惯，即团体生活之习惯，国家为一个团体，国家的生活即团体的生活。要培养团体生活，须从小范围着手，即从乡村小范围地方团体的自治入手，亦即是由近处小处短距离处做起。我心目中所谓新政治习惯可分两方面言之：其一即团体中之

分子，对于本团体或公共事务之注意力须培养起来；又其一即为培养其活动力。因为既经有了注意力即有“要如何”之方向，发生是非利害赞成反对等意思并奔走活动。希望活动力大，非团体中人对于此种活动发生与兴趣不可；活动力不大，则团体无生气、无进步。我们要培养新的政治制度习惯，即是要培养分子的注意力活动力或是团体力。因为我有这些觉悟，所以特别注意乡村自治。今日从事于乡村建设运动实萌芽于彼时。简要言之，即是从政治问题看到习惯问题，从习惯问题看到团体力之培养，从团体力之培养问题看到由小范围做起，于是有乡村自治之主张也。

关于上文所述种种，即是我的思想在此一阶段中转变的历程。忆民国十七年在广州政治分会曾有《开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之提出，此稿现在尚可看到。其中即从养成新政治习惯立论也。又有“乡治十讲”之笔记稿一束，即在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为各职员所讲述者；惟未暇校正，时下亦未印行耳。

我彼时注意政治习惯问题很自然的转变到乡村自治（即今日之乡村建设）的主张，实在说来，尚不能算是深刻。因为彼时我虽然觉悟到中国如果要实现西洋式的政治制度，非先从培养此种制度之基础即养成新习惯入手不为功。而未悟此种制度原不能实现于中国。日后我乃觉悟到决无法使中国人养

成西洋式的政治基础（即是新习惯），决不能培养成此种新习惯；因为其中有梗阻处，有养不成处。而其梗阻则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成的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洋人而来。我所谓民族精神系包含以下两层：其一是渐渐凝固的传统习惯；其二是从中国文化而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这两层皆为养成西洋式政治制度或政治习惯的梗阻。关于第一层之所以成为梗阻者，还容易看到；因为中国人，类多消极怕事，不敢出头，忍辱吃苦；退缩安分。此项阻梗或可矫正，不过比较费事耳。但在第二层则成为真的不可能，而又为一般人所不易看出者，因为西洋的政治制度或是习惯，较之于中国民族文化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为粗浅，为低下，在已经开发出较高的精神，实无法使之再降低，使之再回转过来。关于第一层乃是吾们中国人的短处；但在第二层则为中国人之优越处，而此优越所在，即是西洋近代政治制度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根本窒碍，无可设法解决的困难。中国人将不能不别求其政治的途径。至若什么是中国文化较高之精神，中国文化较高之精神为什么回不过来，我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最前四篇论文已分析言之矣。其中尤以第三篇《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之后半节说得透切。诸君可参看原文，兹不申论。

我们回想最近二三十年来的经过，是不是政治

改造运动失败史？较远之辛亥革命运动，以及十五年国民党北伐后厉行之党治，乃至于其间各次的政治改革，那一次不是失败？有那一次未曾失败得到家？我们回想其间的原因，固然由大多数人不习惯不明白为障碍；更有一种积极的力量，即是那些从事于政治改造运动者，他们不自觉的反对他，否认他，取消他自己的政治改造运动，此乃真正失败原因之所在也。从他们意识方面面言之，可以说他们是向西走或向南走，走向西洋制度的路子上去；而一究其实则是向东走，或向北走，不向西洋政治制度的路子上走去，不自觉的背道而驰，或者是一足向东一足向西。而所以使他们如此者，实由于他们本身有不好的习惯，而同时又有较高之精神，要他们否认自己所要的路子，要他们自己拒绝自己的要求；这却是一般人所未能见到之处。

吾人今日所处之地位为最苦闷，即是因为政治上旧的新的道路都没有了。旧的道路再不能走回去，因为我们在意识上明白的积极的否认了他。在此情势之下，实无异乎吾人的当前筑起一面高墙，阻着道路，想回去亦无方法通过去。从别一方面言之，新的道路又未能建立起来，不特未能建立起来而且又在无意中，不知不觉中挡住了自己的前进，否认了自己所认为的新的道路。以故新轨之不得安立，实与旧辙之不能返归，同其困难，此亦为世人所不之知者。

这种觉悟（即是上文所述各节），比较稍迟；国民十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犹未之知也。彼时一方面固然觉悟到中国文化开发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但在同时仍信服西洋政治制度为必由的途径；如果中国能建立西洋政治制度，则经济、工业等等皆可有辦法。洎乎民国十一年至民国十六年间，才切切实实认识了，决定了西洋政治制度与中国不能相连。中国虽然可以有政治制度，但决不是近代西洋的政治制度。经过此番觉悟之后，即坚决而肯定了我的主张，从乡村起培养新政治习惯（与先前所主张者，表面上虽相同，而实在则有别也；其大别不在答案之形式，而在有此答案之由来），培养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而不是西洋式的。培养之方，惟有从乡村起为最适宜。舍此以外，别无方法。并且我相信中国今日之地方自治，都市的成功一定是在乡村自治成功之后。从表面上看来，似乎都市中的自治容易办，因为都市方面物质较富，人民有知识，可以开会，会选举，仿佛具备着相当的条件。而其实都市自治，要想办成，虽圣人亦不能也。当初的我，是从小范围的观点上注意到乡村；这时的我却是从新习惯之必为中国的而更加注意到乡村。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讲）

明日当开始讲述乡村建设理论，今日将结束我的自述。日昨曾讲起我觉悟到中国人不能用西洋制度，于是吾人遂觉悟到一切政治制度于我们皆用不上。换句话，要吃现成饭是不行的，必须自己创造。我希望大家明瞭此一项确定的重要；因为我们即经明白了中国之旧有制度以及欧洲近代之政治制度乃至于俄国式的政治制度，皆无法拿来应用，则我们非从头上来不可。前者所云，必须培养新习惯，从小范围、从乡村做起，这虽也是从头上来之觉悟；但此种觉悟，尚未到家。待至此时恍然知无可假借，非从根芽处新生新长不行，这才是到家的觉悟。我有这样的意思，在心头盘旋往还，在上文内业已讲及开始于民国十一年；但心头上老是不能决定，老是迟疑，因为还希望眼前能有一个对付的办法可以使国家略好。盖此心颇不忍国家命运之日濒危境。直到民国十六年之际，我方始明确断定，在政治上，当前实在没有办法。虽然在民国十五年国民党北伐时，胸怀中曾也满储着希望，以为这或许是一个转机，或许是一个办法；而且在彼时即有种种事实，不由得不使我怀着这种观望。迨至民国十五年底十六年初，我先前从朋友中分出的人由南方回北平之后，为我报告此行所得印象与感想等等，其时虽在国民党气势极盛之际，我即已明白了这条路子还是走不通，还是非失败不可；因为中国人都不会走西洋路，一切现成的制度，都无法拿来应用。

民国十六年五月间，我因南方诸友好之殷切邀约，乃偕友人南行抵广州，晤会李任潮（济深）先生（时李先生以总参谋长代总司令留守后方）。此中经过情形，我于《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中第三节曾有所叙述；现在不妨把原文引徵于下：

自民国九年底，任潮先生离北京回粤，我们已六七年不见。我一见面，就问他，从他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任潮先生原是"厚重少文"的一位朋友，向不多说话。他很迟重地回答我："那最要紧是统一，建立得一有力政府"。他又慢慢地申说，从前广东是如何碎裂复杂，南路邓本殷，东江陈炯明，又是滇军杨希闵，又是桂军刘振寰，以及湘军豫军等等；人民痛苦，一切事无办法。待将他们分别打平消灭，广东统一起来，而后军令军制这才亦统一了，财政民政亦逐渐收回到省里了；内部得整理有个样子，乃有力出师北伐。所以就这段经历而论，统一是最要紧的。现在的广东，实际上还有不十分统一之处，假使广东的统一更进步些，那我更可作些事。一省如此，全国亦复如此。我问他，怎样才得统一呢？他说："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责就要军人都拥护政府"。他更补说一句："这所谓政府

自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我冷然的说道：“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他当下默然许久不作声；神情间，似是不想请问所以然的样子。——我们的正经谈话就此终止。

当时李先生的说话真是根据事实而来的。他即不再说话，我亦不愿多说。因为其时他负有坐镇后方之责，我何敢扰乱他的心思。我乃离开广州城回到乡间（即新造细墟）去住。其后任潮先生似乎有点回味我那初见他时所说的怪话，我才和他在一起共事，替他帮忙（担任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建设委员会代理主席——代李先生）。关于民国十六年以后，十七，十八两年政治大局种种，将来或另行为诸君讲述。总之，在此时我觉悟到一切现成的政治制度都无法拿来应用于中国。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实际上将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每个小局面都还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将无法统一；即使统一，亦不过表面形式而已。换言之，将成为一个军阀割据的局面；所以不能避免此种局面的症结之所在，仍是由于中国无现在之政治制度可由轨循也。任何政治制度决不能在此短时期内建立起来。

在此际，我的用思，有一发展，我迅速的从政治制度问题而旁及于经济问题，从政治上之无路可走而看出于经济上之无路可走。原来经济进步，产

业开发不外两途，其一即是欧洲人走的而为日本人所模仿的路子，即是近代国家制度能确立，社会有秩序，法律有效力，各个人可以本营利之目的以自由竞争成功资本主义的经济；其二即是俄国的制度，由政府去统制经济，若工业之收归国有，农业亦徐徐因国家经营农场之故而改变其私有的局面等等。这两条路，不论是自由竞争或是统制经济，都须有其政治条件或其政治环境。如前者之须有安宁的社会秩序，后者之须有强有力的政府，而此两大前提，在中国则全不具备；夫然又何能走向欧洲或俄国的路子上去？但在另一方面看，舍此而外，又别无第三条路可走，委实令人苦闷、傍徨，没办法（在民国十八年时，我准备写《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时，曾列有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第二个不通的路，我们经济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第二个不通的路四章）。

我又很迅速的开悟出中国经济的路子须与先前所觉悟到的政治制度或习惯，同时从乡村培养萌芽起，二者可算是一物之两面。政治习惯之养成有赖于经济问题之解决，经济问题之解决又有赖于政治习惯之养成。所谓政治习惯，在上文内曾一再申说即是团体生活的习惯；而团体生活之培养，不从生计问题不亲切踏实；同时生计问题要有一解决，又非借结合团体的办法不行也。因此之故，我又看透了中国社会本来所具备的那全套组织构造，在近

数十年内一定全崩溃，一切只有完全从头上起，另行改造。我先前以为政治制度是如此，现在却明白整个的社会，社会的一切，皆是如此，总须从头上起，另行改造。从那里改造起？何从理头绪？何处培苗芽？还是在乡村。

我的思想上开展之处，尚不止此。当我看出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已属崩溃时，便在比较中西社会组织构造之不同中，一方面寻求西洋社会的组织构造，如何从历史之背景演变而来，我们何以不能成那样的社会。依之，过去是那样，现在当然另是一个样子，将来又是一个样子。于是我先前所用之心思，所有的思想，遂随即落实而不是流入于空洞之处，我的主张便更坚决不疑。在这些地方，得益于马克思和共产党各方面之启发不少；我的主张虽不相同于马克思和共产党，正因为不相同而思想上获得许多帮助也。先前喜欢比较的研究东西文化，现在更上下沟通成为一体。如上文所提及之中西社会组织构造以及历史背景等等，其间何以不相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实开发出一副窍门也。我的许多实际而具体的主张，无一不本诸我的理论，而我的理论又根由于我对于社会之观察，以及对于历史之推论分析等等。在观察社会与推论分析历史时又无在不有关于东西文化之分析研究也。徵实言之，我使用心思时，有如下图所表示者——圆圈所表示者为思想范围之扩展，箭头所表示者为过

去未来之纵的通达。因为我是看的通体，是看的整个，不是看的片面，不是看的局部，便不由得向上追寻，向下推究；越向上追寻，越会看清楚下面，越看清楚下面，越会知道上面。在这样看透了通体整个之后，我一方面很快慰的认清过去对于东西文化所研究，一方面更成熟了我今日乡治的主张。此项主张之成立，过去对于东西文化之研究，启发实在很多。

我提出"乡治"的主张是民国十七年的事；而主张之前后贯通，完全成熟，则近三年间事也。此中详细经过，日后必须为诸位讲及。在此际唯有一点须先为提示者，诸君须认清我之用思过程，乃是从眼前实际问题起（如先前因为对于中国政治问题之烦闷以迄于日后归究到培养政治习惯等等，无一非眼前实际问题也），绝非从高处理想起；因为是从眼前实际问题起，最初乃有一种很浅之觉悟或主张（如先前所主张之培养政治习惯须从乡村起），有此主张之后，乃实际去做或继续不断的研究探索，于是辗转而入于深微之处，辗转而入于比较抽象之处，或者说是人生哲学方面去了。可是，关于这一点，我所见到者与罗素则不相同，应该在此附带一声明与叙述。

英儒罗素对于中国文化与精神，颇致佩服与爱赏，他由中国回归英土之后，时常讲到中国的文化。我数曾引徵之。他说：

中国今日所起之问题，可有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区别。三者互有连带关系，不能为单独之讨论。惟余个人，为中国计，为世界计，以文化之问题为最重要；苟此能解决，则凡所以达此目的之政治或经济制度，无论何种，余皆愿承认而不悔。（见罗素《中国之问题》一页）

他又说：

余于本书，屡次说明中国人有较吾人高尚之处，苟在此处，以保存国家独立之故，而降级至吾人之程度，则为彼计，为吾人计，皆非得策。（见前书二四一页）

罗素认为中国文化，决不可有损伤，这是他的成见，而在我心目中本来的却一无所有，空空洞洞，但是从眼前实际问题起向前去追求，凡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者，我皆承受，其损及中国精神与否我是不管的。但追求的结果，乃识得“中国文化”、“民族精神”这两个东西。——虽说像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但从别一方面言之，却又是实在的，可以看出的。他好似一面墙壁，如果不依顺他，则不能通过这墙壁，而达到此面墙时非转弯不可，非

至一定路程时亦不能转弯也。所以我又说他不是空洞的东西，可以拿出来也。

曾有人因为我好标举“民族精神”这名词，乃以什么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那里？两问题相垂询。推测问者的用意，或是以为我讲空话。其实我在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尚未曾用到“民族精神”这名词，——此不难于原书中得其证明也。其后发现了这个东西，遂名之曰“民族精神”。在上文中我曾屡屡说及，我个人是呆笨认真的一个人，你便让我空空洞洞不着实，我都不会。我非把握得实际问题争点，我便不会用思，不会注意，我是步步踏实在的。我非守旧之人，我因呆笨认真之故常常陷于苦想之中，而思想上亦就幸免传统的影响、因袭的势力。“民族精神”这回事，在我脑筋里本来没有的；“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我本是厌听的。我皆以发见实际问题争点，碰到钉子以后，苦思而得之；原初都是不接受的。这点以后当慢慢向诸君道来。（按本节说话系梁先生答张健先生书中的一节，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初版第三二三页）

实在，在罗素先生他本人尽可放心。我们如果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路子的话，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使去找经济的出路，其条件亦必须适合其文化，否则必无法找寻得出，因为这是我的我们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不是旁人的路，所以

我们在先前尽可不必顾虑到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精神；在问题追求有了解决，有了办法时，一定不会离开他。许多人的用思，起于理想要求，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之用心，乃是从眼前实际问题起。罗素悬一个不损及中国文化的标准倒使人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了。

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至若应用这个名词亦有几度修改。十七年我在广州时用“乡治”，彼时在北方若王鸿一先生等则用“村治”，如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设立村治学院等等皆是也。民国十九年河南村治学院停办，诸同人来鲁创办类似于村治学院性质之学术机关。我等来鲁之后，皆以“村治”与“乡治”两名词不甚通俗，于是改为“乡村建设”。这一个名词，含义清楚，又有积极的意味，民国二十年春季即开始应用。但我之主张，则仍继续已往之村治主张，并未有所改变也。还有我们所主张之乡村建设可以包括一般人口中所常说“乡村建设”，但一般人口中所常说的“乡村建设”则不能包括我们所主张者；因为他们的主张，还多是局部的，非若我们之整个也。最近六七年来，我皆是在研究并实际从事于此种乡村建设运

动中。

在上文内，我曾提及，我现在反省我的过去，我发觉到自己有四不料。第一个、第二个不料都已说过。第三个不料也已经说得分明，即是不料我自己生长于北京而且好几代皆生活于北京，完全为一都市中人，未尝过乡村生活，而今日乃从事于乡村工作，倡道乡村建设运动。以一个非乡村人而来干乡村工作，真是当初所不自料的事！现在再继续下去讲第四个不料。

第四个不料即是当初我不自料乡村建设运动民众教育或说是社会教育为一回事。记得十九年率领河南村治学院学生赴北平参观时，现任师范大学校长李云亭(蒸)先生招待同人等于公园内，席间他演讲曾提到，在他心目中看，村治学院亦是民众教育的工作。(李先生为一热心倡导民众教育者，曾先后任江苏教育学院劳农学院——即今日教育学院之前身——教授、实验部主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彼时我心实未敢苟同此意，以为我们所办理的，明明白白的为乡村自治自卫，我们何尝从教育出发？何尝在办教育？但过了数年到此时我已经回味到李先生说的不错，乡村建设也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在事实上无处不表现出这个样儿；我们不妨提出几种略加说明：

去年夏季七月半前后，在邹平举行之乡村建设

讨论会（其后改为乡村工作讨论会），前来参加者，以教育机关为多，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明明为一乡村工作讨论会而乃以教育机关前来参加者为最多。又如去年八月间中国社会教育社举行第二届年会于济南，本院亦前往参加，年会讨论之中心问题且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明明是一个教育团体的年会，而讨论之中心问题亦复是“乡村建设”。本院定名为“乡村建设研究院”，并未标榜其目的在谋中国教育之改造，而中外人士之视本院，则多认为本院乃是从事于教育改造工作的机关，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格等来华考察教育之结果，莫不视本院是一个谋教育改造的机关。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庄泽宣先生于去年赴欧洲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讲及中国之新教育运动时，特于本院在邹平之工作，介绍颇多。各省人士来本院参观之后，多北上又去定县参观；本院与定县双方自身并未自己说我们是相同的工作，而外人之视本院与定县则为同样工作。这些都是事实。

又如二十一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召集之全国第二届内政会议，被邀参加者有本院，有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有无锡教育学院。本来，内政会议讨论地方自治问题而请本院出席，原无足异；但又邀请定县与无锡参加者，可知在内政部方面看，不论

邹平，定县、无锡皆是做的地方自治的工作。又事前曾简派各省地方自治筹备员，山东为我，河北为晏阳初先生，江苏为高阳先生亦可见。再次，二十二年一月间教育部召集之民众教育会议，定县、无锡被邀出席，固极应当；但亦请本院参加，可知教育部的看我们，都是从事于民众教育工作者。当真的我们乡村建设之推行机关所谓乡农学校或乡学村学者，亦就是民众教育机关。因此之故，不待为理论之申明，乡村建设与民众教育已不可分，事实上已合而为一矣。

我们再推究其间的原因，即是这两个地方的所以合流，不难知道这是由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管束，使之不得不然也。因为大家身躯上都有中国社会问题的负担与压迫，在探求方向时，在寻求自家工作或自家事业如何办法才对之时，不期然而殊途同归；办教育者除非不想办真正的教育，如果想如此，非归到乡村建设不可；从事于乡村建设工作者，除非不欲其工作之切实，亦非走教育的路子不为功。乡村工作者在探求方法时只有归之于教育，教育者在寻找方向或目标时也只有归之于乡村建设，这都是中国社会问题逼迫他们如此走。

回想到去年夏季在邹平举行之乡村工作讨论会，我敬聆各方面的报告，得有一个很好的启发，即是今日社会中有心人士从四面八方各不同的方向，无一不趋归一处，即是趋归于乡村建设。这也

是他们在当初所不自料的。譬如我们听华洋义赈会，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华北工业改进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之清河试验区，以及来自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镇平，汲县，遂平各处友好的报告（如由上列每个团体工作进行之经过与转变考究之，亦可得知以下结语），不论他们办事业的最初动机，在救人，在提倡识字，在训练工商业应用人材，在研究学术，在乡村自救（或自卫），而演变结果，皆归到乡村建设来，均认定于此处着手，方始根本有办法。此点实给予我们一最大关切要的启发。我们与其说乡村建设运动是人为的，真不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与其说乡村建设运动倡导于我，不如说是历史的决定。我亦是被历史决定的，所以我亦料不到我自己啊。

关于中国教育的改造，指示其应以社会教育为主，以尽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用，而适应此时之社会问题，我曾有《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一文，诸君可以参看，兹不备论。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讲）

# 我努力的是什么

## ——抗战以来自述

## （一九四一年于香港）

1940年底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为在海外建立民盟的言论机关，1941年作者被推赴香港筹办《光明报》。1941年9月18日报纸创刊，作者被任命为报社社长，主持该报工作。《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即写成于此时，并在《光明报》连载达一个半月之久。文中扼要记述了作者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至1941年离渝赴港之前四年间所参与的种种重要活动。五十年前的这些往事，因时移事易，有些细节已无多大意义，故现在重新刊出时略有删节。至于文章中的多处“天窗”，则系当年被香港当局新闻机构所检扣的部分，因作者无法填补，只得付诸阙如。

编者

# 引　言

我努力的是什么？这原是要读者看了这篇自述之后，从四五年事实经过中认出的。但今亦不妨先指点出来：

一、是国内的团结；

二、是民众的发动。

发动民众为抗战所必需，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这是人人都知道应需努力的事。努力者正多其人，我亦不过追从国人之后之一份。事无新奇，不足称述。不过我四五年间翻来复去，努力不已，不是这件，就是那件，自始至终，一贯不移。述说出来，使国人关心这两大问题者，亦可得其消息之一斑。

我第一个念头原在发动民众，因为意想中全国一致对外不成问题。后来晓得事情不这样简单，还必须先求团结才行。否则彼此猜防之心未泯遽动手发动民众，愈发动即愈冲突，冲突大了，国事便不可为。但如有人问我：定要团结好了，再发动民众。事实是否能许可呢？我回答不出。我总强调"团结第一"就是了。

我是个谨慎人，我□□□□□□□□□□□，象共产党一样，可以去发动民众。我当然要从团结入

手，求取全国有计划的合于理的民众大动员（此事我有主张计划见后）。无奈我的气力薄弱，事情不易成功。至今天还盘旋在团结问题上，没有进展，因此四五年间所努力的，核实了仍只是团结一事而已。试看后文自明。我今天受同人委托，办理本报，仍是为了团结运动。现在自述其四五年来努力经过，藉以求教于当世贤达，亦正是表出本报宗旨的一种工作，倘得各方读者同情指教，使团结运动得些进益，岂非大局之幸乎。祝之祝之！

在本篇的叙述上，拟将最近在重庆我们一些朋友，为团结而奔走的一段经过叙列为开卷第一章，然后翻回头来，再从抗战之前叙起，直叙到最近，使与开端的叙述环扣起来，其顺序约略如下：

（一）一九四一年二三月间的一段经过

（二）七七以前的讲演

（三）八一三以后的文章

（四）国防参议会

（五）访问延安

（六）国民参政会

（七）改善兵役的运动

（八）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

（九）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十）统一建国同志会

（十一）一九四〇年四月间的一个提案

（十二）总结全文

# 一　一九四一年二三月间的一段经过

这一段经过，我看见曾有两个刊物提说到。一是陶百川先生主编的《中央周刊》似用《劝驾记》为题。一是邹韬奋先生写的《抗战以来》第七十五节《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前夜》。不过，都语焉不详。我现在较精确的记述当日事实（其中自然仍省略许多）读者不妨取以与前两文相印证。

这一段经过，是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起，到三月二十七日为止的，其内容便是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对于一月间新四军事件表示抗议，用书面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说：在他们所提善后办法十二条未经政府裁夺前，即不出席参政会。而参政会已定三月一日开会。所以居第三者地位的参政同人，不便坐视，特于二月二十二日集会商谈。当日在座者，计有张君劢罗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钧儒，邹韬奋等各位。黄炎培，冷遹等各位，而前届参政员张伯钧，张申府亦参加，连我自

己共有拾五人。大家商谈结果，推定左罗及我共三人，负责起草几条意见，作为向双方说话的根据。当晚左罗及我三人又作一度交换意见，而委托我来执笔。二十三晚我写好之后，通知各位朋友于二十四日集会。大家看了，我所写好的无甚修改，即依年龄为顺序而签名。第一为张表方（澜）先生，第二为褚辅成先生，余不必细数。除张伯钧张申府两位未签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数。褚先生为国民党老前辈，素不存党派成见，此次亦自愿列名。

我写的共四条，其条文如下：

（一）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

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三）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之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四）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

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 蒋公的表示

十六人签名的一份，又在四条前后加了头尾，作成一封信的方式，准备呈给蒋公。中共方面，则约了周恩来董必武两位来面谈。周谈话甚多，总其要点，不外两层：第一层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他们愿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以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第二层表示，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他们出席，亦即不成问题。这是二十五日的事。二十七日早，蒋公约去见面，除面呈那四条外，又加口头说明。大意着重两点：一点是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方为根本杜绝纷争之道。一点是国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即其一例。我们不多要求旁的东西，只要求兑现。我们要求给我们监督兑现的权。蒋公对此两点，皆表示甚以为然。总结来说：就是接受我们的建议，可以组织那个委员会。至于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则嘱咐我们去劝他，并约第二天再见面。我们当将此意，即刻转告周董两位。除中午一度谈话外，当晚复在油市街四号（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由同人与周董切实商讨，请其撤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书。周董二君讫未同意，仅允电延安请示。第二天

二十八日，同人再见蒋公，即以周君已电延安为告，接续商量组织委员会事，甚为顺畅。临末，蒋公追问中共出席不成问题否？无人敢负责答复。于是蒋公严切表示，明天（三月一日）他们出席，即当按一个党派参加主席团一个主席之原则，推选周恩来为主席团之一。如其不出席，则是他们不惜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他们要负责的。以后即无话谈。请你们去告诉他！

那时只剩半天功夫，非常迫促，所以我同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诸公顾不得吃饭，赶去访问周董两位。既传达领袖的话，亦表示同人的要求，请决定出席，勿负各方面之望。周君等似亦无甚固执之点，仅谓必须候取延安覆电。他们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所以周君对我们说，至迟夜晚必有覆电。收得覆电，马上通知我们。政府诸公关心此事者，都向我们问消息。我们皆作乐观的答复。因当时空气确实不象有问题的。但不料我同黄先生坐候一夜，屡次用电话询问周君；周君亦在山上坐候收电，到底不得复音。天明周董两位亲来见我们，说电台发生障碍，收不到延安电报，不便出席。经再三恳谈，终无法相强。已到开会时间，忽于电话上，蒋公亲语黄先生，嘱我们代表他，敦劝董邓两参政员速即出席（因七参政员中实只有董必武邓颖超在渝）。我们只

得再跑去劝驾。他们自然不肯来，写了一封抱歉的信，声明没有党中央命令，不由自主。我们赶至会场，将此信回复蒋公，大会早在开幕了。

我们将信面呈蒋公，并代为解释，说他们第因电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蒋公当表示可以等待他们一天。于是由黄炎培张君劢等四十二人临时动议，将下午大会停开，所有主席团的选举改在第二天举行。为是等到他们出席后，便可选出周恩来参加主席团。

## 延安提新十二条

到了第二天，三月二日黎明，我同黄先生又用电话询问周君。复言延安电报已到，我们正色然面喜，却不料其又有十二条的提出，要当局接受了，然后出席，十二条件如下：

（被　检）

这是所谓新十二条，比较前次十二条降低甚多（□□□□□□□□□□□□□□□□），但不论条件高低，我们从来不预闻讨价还价之事。我们是以国民立场过问国事，本着我们的主张和信念（见前述四条）而奔走努力。我们并非作和事老，调停的

人。何况这种分家的办法，和我们要求国家统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觉失望，不能赞一词，国民方面的情绪如何，更不必说了。

## 一个委员会问题

中共既不出席，主席团的五位，当日选举出来（有左舜生，张君劢），自无周恩来在内。正午十二时同人聚于一心饭店，商决我们今后动止如何。我提出意见说：中共的十二条我们实不愿加以讨论。况且逐条磋商，必致延过了参政会期；要当局一口答应，又万无此理。可否向他们作如下的商量：

一、原提之十二条，今事成过去，不必再议；

二、原提之十一条，似相当于我们所主张的那个委员会，请按照我们的四条主张继续进行商量；

三、自第一至第十各条都暂不讨论，候那委员会成立时，交委员会裁决之。

此即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而委员会如何组织，则请周恩来先生和张岳军（群）先生直接见面，较易解决，更加上君劢舜生共四人商洽起草。

得出草案，即刻请领袖核定。一经核准，即可一面成立委员会，而一面中共出席参政会。若能在此届大会内终得圆满出席，尚足以安慰国内人心，及国际友邦之望。

## 个人接洽

同人都很消极，我的意见未被采纳。结论是：我个人可以单独进行，不与大家相关。黄先生对我说：你如果要进行，我劝你先问得张岳军同意，然后再见周恩来。君劢先生对我说：你欲晤张岳军，我可替你向他约个时间。张表方先生亦鼓励我。我接受了几位先生的美意自愿试一试看。

三月四日乘张岳军先生过访，相谈甚畅。他还提到二十八（一九三九）年秋间，我从华北回来，力主军队应属于国家之说，当时不过一空想，而今则居然得到两党的承认，何等可喜。又说：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立国之道更无余义矣！但我提议请他们与周君恩来直接商谈委员会事，他却说且待请示最高当局再说。于是我再三叮咛，请其于请示好之后，告我。

次日（五日）清早，我访君劢先生，恰又与岳军先生相遇。他说：今晚蒋公在嘉陵宾馆招待全体参政员，他亦被邀陪坐；届时定可答复我。而在

他走了之后，君劢极力劝我不必等待他，尽可先访周恩来。我想亦无碍，就去访周，未谈眼前具体之事，而从根本大端上有所讨论，如军队统一于国家等问题。其详容另记。到晚上，嘉陵宾馆席散后，岳军招我于另一旁，问我曾否进行，若未进行，过了明天再说。我转问何故。他答：蒋公定于明天（六日）亲自代表国民政府，向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并希望参政会对此问题有所表示。所以我们看了明天的形势再进行。言罢，匆匆分手。

## 周恩来的意见

我闻言，急觅君劢商量。我说：不知蒋公将作何宣布，又不知要参政会作何表示？假若双方洽商好，而以领袖之宣布，参政会之表示，作一转圆文章，最妙。否则，多一次宣布表示，即加重一层痕迹，更难转圆，我愿尽今夜作一度努力，请你代约岳军明早等候我。希望在明天下午蒋公出席参政会之前，能洽商一结果。君劢允为照办。我即刻访周倾谈，当夜宿于周家。

我对周君诚恳地爽直地说出下列两层要紧意思：

一、当局决定明日作一宣布。但我嘱托张岳军候我消息。我们都是爱护大局的，必不可

使大局更僵。所以我来请教你，要赶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结果，俾大局从此转圜。

二、最好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来商量。商量时最好请你与张岳军直接谈，而第三者参加讨论。委员会事确定了，大小事都交付委员会解决，请先出席参政会，以慰各方之望。

**周先生答复我的话，总结有下列几层：**

一、由于王秘书长（世杰）何部长（应钦）连日在大会上的两次宣布，我们出席参政会问题，可说已成过去，不必再谈。我们固不知蒋先生明日如何宣布，但想其影响大局者，好亦好不到哪里，坏亦坏不到哪里。——自然是若能不再作何宣布最好。

二、撇开参政会出席问题，我们不拒绝任何的商谈。象是各方合组委员会的问题，尤所愿谈。委员会如成立，一定参加。

三、同张岳军先生直接谈，无所不可，梁先生问得张先生同意，我马上去见他。

四、前于三月二日有一件签呈，系以周恩来名字，作为下属长官（不作为党派关系）口气，列举几件小事，然而是很痛苦的事，例如某处扣车，某处扣人，几个月不发下护照等等，请求委员长批交各该机关制止或纠正者，请

转恳张岳军先生向委员长促请早为批下。——能批一“查明办理”的字样都好。

我只得照他的话，第二天据实转告张先生，张表示且待过了下午再商。

这天（六日）下午蒋公代表国民政府对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词义严重，并且话很长。报纸曾有披露，此可不述。接着参政同人临时动议，表示盼望中共参政员出席之意。其决议文，和中共参政员的答文，均经揭载于报纸，此亦不叙。彼此一往一复文章愈多，彼此间的距离愈远。我适有自己事待办，亦就离渝回乡了（我居住四川壁山县乡间）。

## 参政同人继续努力

听说我离渝期间，大会上有某参政员（陕西籍，忘其名）又提出一案，关涉到陕北边区和十八集团军，亦经议决通过，此事后来亦生影响。

十日我自乡赶回重庆，大会已行闭幕式，因闻张岳军先生将于翌日返成都，特于夜雨中偕张表方先生访之。我对他说，那个委员会就是最好的办法，一切问题可在委员会上有清楚明白的解决；并且马上解决，不予拖延；解决时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讨论，自必有正义公道，万一某方违背诺言，自由行动，

则舆论亦必然援助政府的制裁。所以我希望当局不要以为那委员会是只利于共产党和第三者的。蒋先生为中共问题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筹划，我们都盼望你能帮助他。岳军先生似颇以为然。他说他十天后将再来重庆，希望我亦继续努力。

参政会开罢过去，中共问题原无时限之督迫，而同人仍思尽力。十三日午由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四位出名在一心饭店请客。被请的都是参政同人，而以中共参政员为主要对象，当由众人公推褚（辅成）黄张左及我五个人共负继续进行之责。

## 蒋公传见周恩来

十四日下午闻讯，蒋公手谕张冲转周恩来，约于十五日下午见面。据说自上年冬以来，周君屡次求见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叶剑英与军令部刘次长接洽。因政府认定系军令军纪问题，叶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在军令部系统之间义须服从，无多少商量。而周君则代表共产党，不见周即不愿落于党对党的问题上也。忽然传见，意必有话商谈。

待到十七日晚间，周董各位回请我们吃饭之时，周君将十五日谒见情形，说给我们。则据云并未谈到要紧处，蒋夫人先面见，甚亲洽，蒋公后出来，亦无不愉快之色。周君即未提出大问题来说，

仅提到三月二日的签呈，请早赐批示，蒋公谓这很容易。又谓你可再写了来，周君自云本日（十七）遵即再度写签呈八件递上。前次系一签呈列举多事，今改为一事一呈，委员长喜欢批哪一件即可批哪一件。

## 委员会组织草案

在我们想，大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那个委员会。适国民参政会王秘书长（世杰）亦向同人表示，委员会事仍可商量进行。遂根据从前我们的四条意见，经他协助，草成一个委员的组织章则。草案原文，我未保存，今不能全记。大致是这样：

一、名称定为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

二、委员定为十五人，设常委三人。委员人选不限于参政员，意在军政实际负责人参加。

三、蒋委员长为主席。因事缺席则指定一常委临时代理。

四、关于推进民主，加强团结，督促军队国家化，监督抗战建国纲领之实行等四项，有权调查提议，决议并促其实行。

五、议决案由主席负责执行。

王秘书长前任法制局长多年，对于起草法规具有专长。其一条一条的文字，都经苦心斟酌，并不象我写的这样拙笨，但大意确是如此。

十九日我们五人先在秘书处与王君洽谈后，约好二十日面呈蒋公核定。廿日中午原系蒋公宴请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廿五人。饭罢留下我们五人细谈。对于草案认为可行，仅将常委改为三人至五人，委员改为十五人至十九人，余无改动。问我们若未曾与中共谈过，可即往商谈。

## 委员会之难产

二十二日我们约了周董两位于君劢家谈话。即以委员会草案给他们看，而征其意见。周君说话虽多，但重要争点则似无几。最重要只有一点：他们反对以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我们说：此委员会必有系属之处，与其系属于政府，不如属于参政会。并且大会已闭幕，我们准备由驻会委员产生出来，（且准备作为主席团的提议）。因为照驻会委员会的新章增加了建议权。周君亦认为不妥。他指出此届大会上一次一次的宣布，一次一次的议决（特别是陕西某参政员的提案），使他们蒋于绝对不利地位，他们无法再出席产生于此参政会，而且隶属于此参政会之委员会。他又指出驻会委员会的建议，照章

程上规定以不背大会议决案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员会不合于大会议决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员会所行者不合于大会所议决，那么，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他坚决地说：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出席委员会时，他亦要坚辞不担任。

我们觉得他的话相当有理，亦不强争。更恐除此点外，尚有其他问题；恐周君意见外，延安尚有意见，故结论请其以草案全文电达延安征问后，再作讨论。周君谓一二日必有复讯，遂约于廿四日再会面。

廿三日午前我们同访张岳军先生。——他已因国民党中央开全会由成都来渝。我们将一切情形都说给他，并表示我们已不考虑这委员会隶属参政会的问题，须另想办法。他觉得其他办法不易想，然或者亦非全无办法。不过，若不属于参政会则委员会的名称即又成问题。因为当然不再称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而亦不能秃头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那就很费思索了。最后我个人声明定期廿五日赴桂林，不能等待完成此事。张君劝我等待有结果再去。

在此期间，蒋公夫妇曾请周恩来夫妇吃饭（是为第二度见面）。其确期，今指不出。据闻仍无重要谈商。

二十四日午后，如约与周君等重行会见。忽有某君贸然来参加，致妨碍谈话。又因周君亦称延安尚无详复，遂改期二十七日再谈。但我原定二十五日

同林隐青(虎)先生赴桂的，竟以此被同人强留，不得成行。又事有可异者，二十五日我国际宣传处收录敌人广播，此委员会乃为东京所宣说出来。

廿七日同人与周君等再相会见。周君报告延安意见共有七点之多。其中大问题有二：一、反对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而认为不必有其所系属；二、主张此委员会定名“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其他尚有各党派委员平均各一人等五点。同人闻讯均有难色。而周君则称他在党内甚难劝说让步的话。因为前将极痛苦的几件小事签请批示查明办理者，至今仍不得批。党内责他，一点小事都办不了，何颜徒劝自己让步。同人互商，认为双方诚意不足，此事殆无成功之望，只好结束，不再进行。除当面向周君声明外，同时向王世杰先生声明：托其代陈于蒋公，于是近四十日来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顿。

廿九日一早我即离开重庆，去桂林了。

## 我努力团结是为了统一

这一段经过的叙述至此为至止。末了，要总结来说几句论断的话。

这结论在我胸中有若干话欲说，但在笔下能写出发表的，却只两点，如后。

一点是：事虽无成，而在全国团结（或统一）运动上却已有了进步。说老实话，我是要求统一的（看以后所述自明）。不过我认定统一要从团结得之。所以我努力团结，是为了统一。国家统一不统一，于何处决定呢？那无疑是以军队的统一不统一为决定。若此一方彼一方各有各的军队，任你如何说国家统一亦是假话，而且内战永不能完。我很早提出要军队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就是为此。许多朋友听见我的主张，都笑我太书生。□□□，□□□□□□□□□□□□□□□□？□□□□□□□□□□□□□□□□□，绝对做不到的事。甲如此说，乙如此说，丙如此说……。几乎没有人赞成我。我自己亦不免摇惑起来，怕是距离事实太远，实现无望。然而武力统一，强迫地将军队收归一处我是早确认其无成的。——不是不能成，是成了旋即失败。倘若和平统一是空想，武力统一又是徒劳，则中国岂非没有统一之日。没有统一，即没有建设与进步。没有建设与进步，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我一定要求军队统一；我相信一定作得到。

这一信念，总算从经过事实中，没有令我失望。我廿八年从华北游击区目睹我军□□□

□□□，回至大后方，倡言军队须统一于国家之时，虽赞成的很少。而到这次参政同人商量向两党提出我们的主张意见时，却被列为最重要之一条。并且得到几方面朋友，十六位先生联署。这给我的鼓励不小。更增我希望的，两党皆慨然同意，并没有碰钉子回来。廿八年切实教我，说我是幻想空想的张岳军先生，亦转过来替我乐观。还间接听到张君劢李幼椿（璜）二位转述何部长应钦陈部长立夫在不同地点对不同的朋友谈话，或以军队脱离党派为莫大之幸，或以军队直属国家为素所主张。不论大家命意用心是否相同，我皆认为是进步。□□□□□□□□□□□。

今事虽未成，这一句话却唱出了。事之不成，我早看到。不要说那委员会没有成，就令委员会成立，亦不免吵闹一场而散。就令不吵不散（廿九年成立之特种委员会即未吵过，其事见后），军队统一亦不易办成，但我以为尽管不成，而原则已昭示天下，□□□□□□□□□□□。□□□□□□□□□□，□□□□□□□□□□。□□□□□□□□□□□□□□，总有一天要交出给国家。所以这原则的承认，实在是统一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

既有进一步，就不白努力，当然我要再努力下去。——这是第一点。

又一点是：看清楚事之所以无成，都为第三者太无力量。在四十日的经过中，□□□□□□□□□□，□□□□□□□；□□□□□□□□□□，□□□□。□□□□□□□□，□□□□□□□。□□□□，□□□□□□□□□，我们没有力量于其间。这是事情不能成功之由来。□□□□□，□□□□□□□□□□□□□□，□□□□。□□□□□□□□□□□□□□□□□□□，□□□□□□？□□□□，□□□□，□□□□□□。□□□□□□□□□□□□□□，□□□□□□□□□□□□□□□□□□□□。

□□□□□□，□□□□□□□□，□□□□，□□□□□□□。□□□□□□□□□□□□□□□□□，却亦有一种和平正义的力量。大局便可不难好转。今后再度努力的方针方法就是如此。——这是第二点。

就以上面两点，为此一段经过的叙述作结束。

## 二　七七以前的讲演

一九四一年二三月间的一段经过叙述后，我们翻转来再从抗战之前叙起。

抗战之前，我本来是在山东作乡村工作，其详情不叙在此篇。现在只叙邁近抗战前夕，我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从这一讲演中，说明了我平时努力的乡村工作和抗战的关系，使读者了解我四五年来努力之前的背景。

在七七卢沟桥炮声未响之前，我们抗敌的情绪已经紧张了。六月十三日我在成都省党部大会场，作了一次“我们如何抗敌”的讲演。事缘四川省政府刘主席（湘）屡次函电邀我入川，我在五月尾经过南京武汉飞到重庆成都两处，曾为一个月之盘桓，作了三十次以上的讲演（有时一天两三次），此为其中之一次。那次，有教育厅长蒋志澄先生陪着去，地点借省党部，性质是公开的任人来听，事后成都各报皆有登载。今撮举大意如下：

**开首**：今讲“我们如何抗敌”一题，是为了有些朋友不明白我们乡村工作和应付当前国际问题的关系，嫌我们缓不济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之理。

**次段**：中国今日要抗敌，应采两原则：一是必须靠无限的兵力，而眼前有限的兵力为不足。中国常备军虽多，但行的募兵制，除了常备军便无其他。此有限兵力，至多不过可用一时而已，万万不足用。非化民为兵，求之于无限不可。又一是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因为我们的国防军备是不足以和敌人为主力之决胜的，只有拖久以待他之内溃。

**三段**：假定上面的话不错，就必得认定两点去下功夫：

一、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

二、加强政府的抗制力量。

从第一点，就是求得无限兵力的法子；从第二点，就有了如何指挥运用此无限兵力的根本。

**四段**：要政府的力量强大，有赖于多数国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统制，有赖于下层机构的健全灵活。但照现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似难；民众都缺乏组

织与训练，要下层机构健全灵活更作不到。

**五段**：所以我们必得要启发出老百姓拥护政府的情绪，并且加以训练及组织才行。然而这一功夫作到了，亦正是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因此，前认定两点作功夫者，核实只一椿事而已。

这一椿事是什么呢？就是要从农业和农民入手作功夫。

**六段**：所谓从农业和农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农业上种种妨害（灾害，匪患，苛捐杂税等等）；更进而积极促兴农业（技术，金融，合作等等）。

二、切近农民日常生活予以组织训练（自卫，自治，合作等等）；更进而为临时对外抗敌的组织训练。

**七段**：为何定须如此作功夫呢？其理由有四点

一、国民之大多数在农民。

二、非政府关切农民生活问题，替他设法，则农民不会爱国，不会拥护政府。

三、非感情相通，则组织训练不会成功。

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组织训练，则临时抗敌的组织训练就无根。

**八段**：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

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加其抗敌能力的。所以我们正是从事抗敌的工作，纵使缓不济急，但似别无更急切有效的办法。

我们主张扩大乡村建设工作以应敌。完了。

抗战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张，是这个。当然，抗战起来了，更将本此方针，要求发动民众。其奔走事实经过见后。

# 三　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我在川时，卢作孚陈筑山两先生适从庐山回川。他们给我讲，政府当局为大局问题将约集在野人士，同到庐山，彼此商讨。给我的一份请帖，由作孚转来，切嘱于七月初间到庐山去。

我于六月廿九日出川，经武汉北上，七月到北平。那时北平谣言多，情势紧张，已有风雨欲来之势。七月四日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胡适之林宰平两先生，他们都应约到庐山谈话会的。我告知他们，我随后亦到。五日在济南下车，折返邹平一视。旋即回济南，准备南下，而卢沟桥炮声发作矣。

从此以后，我即为抗战奔走，东西南北，没有休息。琐事不足记，记我当时的主张。此主张发表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前夕，八月十日至十二日载上海《大公报》。题目是：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今记其内容如次：

**开首**：提出三条大原则——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令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三条原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而况我们欲为持久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即与全国人力物力合为一国之力以应敌。如何合法？则不但要有"节制之师"，更须有节制之民。一切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这就是第一条之意。但要想举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即是使举国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发抒，意识到为他自己而抗战，不是给人家作工具。第二条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者，在此。

**綜**合起来说，要在以第一条的系统化，第二条的民主化，来完成第三条的一切国力化。

**次段**：指出这三点都是理想，距离事现状甚远甚远。例如中国事向来无系统无条理，国家最近才统一，政治民主化三十年未作到等等。

（下略）

**三段**：提出十四条较为具体的主张办法来。（中略）此其内容实包括有：

一、国家行政以讫地方行政的大改革；

二、教育制度的改造；

三、政治的改造。

关于第一项，是为要适应战时动员需要，将中央地方军政一切机关系统化，合理化。（下略）

关于第二项教育制度的改造，是我多年以来的主张。那就是廿二年应教育部之约，写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关于第三项政治的改造，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我当时亦声明将另成专篇讨论之，后来亦是没有写。（下略）

总起来，我是采取两大方针：一方向统治走去，一方向民主走去。

# 四　国防参议会

八一三以前的几天，我在上海，每天与蒋百里先生见面，商讨时局。十一日因听了蒋先生的话，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车开行之前，适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来晤谈。他将敌我两方紧张情形告知我，说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

夜车开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时，忽闻人马声喧。车正停在无锡车站。站台上满是军队，站长传知客人一律下车，奉命火速运军队去沪。当时众人纷纷下车，我亦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传说甚多，而我心里则认为已经开火了。

当日幸得附他车，继续起行。但我已认定开火之故，过南京即未下车，迳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之事。十二日经兖州到济宁，刚下车入门，我们工作同人即谓中央连电促我入京，正转电至上海觅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车回兖州，候南下车入京。

十四日清早抵京，晤张岳军熊天翼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开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将成立国防参议会，要我参加。

关于国防参议会，邹韬奋先生的《抗战以来》第四节《参政会的胚胎》曾加叙述。但其中所述，不无记错之处。即如原书说，国民政府八月底集合全国各党派领袖们组织国防参议会云云；其实八一七就举行第一次会了。那天是夜间集会的，到的人有张伯苓，胡适之，周恩来，蒋百里，李璜，傅斯年诸先生。在上海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各位尚未赶到。因聘书十五日才送出。秘书长是彭学沛（交通次长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临末了，参议会将结束，才来担任几天。

我想分几层来叙述叙述：

一、这个会无疑地是民主在抗战期间的萌芽（邹先生语）。从内容人物来看，几乎全是在野的，党外的。即为国民党的，或系素不接近中枢的，如马君武先生。这种精神，的确表见政府要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的意思。从这个会追上去，便是庐山谈话会。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阳国难会议，其命意和性质皆大致相同。

从国难初起的国难会议，直到今天的国民参政会，实是一脉下来，平时并没有这种集会，更未成立为机关。而由国难过来，则马上召集之，就充分证明其为这时所必需，翻过来，平时政府固不见得找

这些人来中央，而这些人在平时亦未见得愿意来。今天政府愿意大家来，大家亦愿意来，一面是政府开诚延纳，一面是大家竭诚拥护。团结在此，民主在此，统一在此，进步在此。气象光昌，三十年来所未有；谁说敌人不大有造于我！

二、任何一桩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无一段真意存于其间。国防参议会虽小，形式多不具备，而我感觉却还不错，似较今天的国民参政大会还好些。这就是初起时，意念较真。论人数虽后来增至廿五六人，而开会时总不过十余人，可谓甚小。人所以到的少，例如蒋百里先生胡适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国，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没来，周恩来后亦不到，黄炎培沈钧儒二公常往来上海，张耀曾、颜惠庆两位讫未入京，晏阳初先生和我亦是往来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谈话亲切，亦从容随便。这样倒使彼此少隔阂，而易沟通。开会时间亦多，多时每周至四次（当九国公约在北京开会之时，为听取国际消息）。有不少军事外交财政金融上较机密的事亦可知道一点，亦正为其人少之故。到后来参政大会上，几百人在座，政府便不肯拿出报告了。参政大会先是三个月一集会，后改半年一集会。政府报告都先作出文章，付印成册，数目字很详细，各部长朗诵一番。形式整齐，面意味却减多了。大会有议长，议事有规则，提案有手续，表决算人数，种种形式当然比较从前好看。开会时车马

云集，亦甚热闹，但按实来，却按不到一点东西。

邹先生书中，说国防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上的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亦未见过。这大致是事实。我们收到的聘函，原来就是密件（开首称密启者），所以没有向外发表名单。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然正为此之故，或以一言半语对政府有所启发，或往复斟问使我们得所了解。邹先生又说“代理主席汪精卫把大家意见口头转达政府当局，有时亦把当局意见口头转达给该会同人，如此而已”。此亦事实。然而比较后来参政会上文书印件传来递去，象煞有介事者，未必无用。我想中国政事一切落于“等因奉此”，正应当矫正。而见于有名的英国宪政，全靠习惯和精神，不假条文规定；似乎我们亦不要尽在条文上作功夫，而要培养起宪政的精神和习惯，才有希望呢！

三、国防参议会组织及职权的条文规定，亦许有的，我却未看见。我只记得第一天的会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以何为标准原则。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代主席汪精卫对于头一问题，大致回答说着重在野党派，社会人望，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选任。对于第二问题，则分三层。一层是政府认为时局严重无比，特请大家来共商国事，亟愿听取各方意见。——这就是

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层政府应付时局或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层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况以及如何应付的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现在想来，三层之中，实重在第三层。不止是政府主观要求在第三层，末后收到一点效用亦在第三层。

论到第一层，大家怀抱的意见，向政府建议的，军事外交等等自亦不少。而为众议所集中的，约有三四点。头一点要调整政府机构，使之合理化，简便化。因为五院各部会太庞大，不合战时需要。又加战时新机关层出，叠床架屋。行政效率不能增加，反而减少。曾慕韩先生创为“袖珍政府”之议，主张缩小组织，取其轻便，易于移动。此一要求，实是众议所同，□□□□□□□。大抵裁减人员容易，裁减机关较难；裁减小机关容易，裁减大机关较难。政府迁武汉后的改组，各部曾有裁并，五院就不行。

再一点，要发动民众。三一点，要成立民意机关，认为参议会不够。四一点，肃清贪污。直到我军退出上海，政府将要西迁，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和我九人尚联名提出这几点，恳切地面呈当局。

论到第二层，政府交议之件亦不少，最大的一案要数全国总动员计划大纲。此与后来到武

汉时，交议的节约计划大纲，同为洋洋大文。参议同人亦费不少心思去讨论，□□□□□，□□□□□□□□□□□□，□□□□□□□□。

论到第三层，政府确曾将军事外交各种情报，说给我们不少，使我们于大局情势恍然有所了解。一向局外人责备政府的心理，为之减少，而支持政府的情绪增加。举一个例来说：抗战前段，尤其初起之时，很多人殷切地希望苏联帮忙，亦极相信苏联一定帮忙，乃至期待出兵或外蒙出兵。在看不见苏联积极帮忙之时，就以为政府不肯接近苏联于是由责备而不谅解的心理很多流行在社会。但参议同人晓得事实不如此，便对政府没有不谅解，而且支持政府的作法。象沈老先生黄老先生都是在上海为多数人所信仰。他们的态度是支持政府的，便使反政府的空气不易起来。这种减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而沟通之的效用，怕是国防参议会收效的一点。

但前两层亦不是没有效用。例如：当时后方几个省政府主席，都空着，或本人留京，或旁人兼代，君劢先生提请政府注意，大局严重时不宜如此。政府于是就调动补充，或令本人回任了。又如关于农产工商的调整机构，在记忆中仿佛出于黄先生建议的。

四、参议同人总是不满意参议会这一机关。共产党方面总不肯到会，亦是缺憾。各方要求成立正

式民意机关者很多，当局亦表示接受，请大家提出方案来。闻当时收到的方案，就有七件之多。代主席汪精卫曾向我们述说，党内对这一问题的踌躇。他说有三点困难：一点是人数上困难，一点是产生方法的困难，还有一点是职权上困难。

何谓人数上困难呢？他说人数少了不象民意机关（参议同人即自觉人数少不足代表国民，没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几百人的会议，实不切眼前紧急状态中的需要，而且没有地方开会（当时我们在铁道部地下室开会，大本营亦在地下办公）。事实上即有困难。

何谓产生方法的困难呢？他说正式民意机关总要用选举方法产生出来。但要办选举却是一大事。户口不清，选民难计，地广人多，交通不便，今战事紧急，安得从容举办？而况从来的选举（他包括国民大会的选举说）都办不好，人人皆不满意，今仓促中更办不好。或者为战事的影响，根本办不成。

何谓职权上困难呢？他说自战事起来后，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委员长。若正式民意机关必应有最后决定之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一民意机关。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这是在南京的话，后来迁到武汉，卒成立国民

参政会。而由于这三点困难不易解决，只能勉强算一个准民意机关。

五、末了，说到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尽力，却无多。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我们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跑一次延安，并驻于徐州许久。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来听代主席委委宛宛谈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象学生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所尽力者，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八月十七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一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大公报所发表的（见前“八一三以前的文章”一节内）。那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就起来阻止我，不要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而外，政府各部长均在坐，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我的话，亦实在说早了些。但不知抗战四五年的今日，对于这个需要，这个主张可有人认识否！

八月十九日我奉蒋公命，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离京缺席很久，到十月初，沈钧儒先生在会上提一建议案，大致主张利用失学失业知

识分子（如留日学生回国的，华北各大学学生及其他）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下参议会再拟具体方案。于是促动我，为再度之献议。

那具体方案，是经秘书长彭学沛，邀集参议同人，会同各有关主管机关（例如大本营第六部，内政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业部合作司，卫生署等）拟定的。从我看去，于事实无益有损，不能附和。原案要点：

一、开首点明，此种工作系补助中央暨地方行政所不足，因为原有其负责机关的。

二、列举工作项目，内计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若干项。

三、工作团或称服务团由知识分子青年们组织起来，得请当地行政机关审核许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回于各处的。

四、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之。

此案若在负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如省政府，专员公署，县政府）看去，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事，不能随便付给这工作团去作；即宣传的事，指导改良的事亦都不愿他们来添麻烦乱手脚。在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亦断断无法

工作。又如农业改良等，亦断非平素无设备研究，可以行的。如其工作，亦只是儿戏般的工作。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他无益有损。

我认为凡事不作已，要作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识分子下乡，从事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出之，以点缀出之则不可。必要将他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难处，使他没得躲闪，心思力气都用出来，事情才办得好。这样，就必须建立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而改造现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听了我的话的人，多舌挢不下，觉得岂不牵动太大？谁都没有这个勇气。

适晏阳初先生亦为此事被促到京。我们二人即相约面见蒋公，陈述所见，那天恰好黄任之江问渔两先生亦有事见蒋公，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我们差不多。于是我们四人就一同来陈说。经我们一番陈说，又指摘当时动员工作的甚多缺点。蒋公很乐于接受，就指定我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咐在旁的张岳军先生协助进行。

我们四人奉命之后，曾为数度集议，一度访陈立夫部长。又承政府将关于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来参考。乃一面就动员说话，对于那些法令章则，条陈了十几条的意见。复一面就乡村说话，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请政府择行其

一。那时节，上海战事我军已退出大场，黄先生急欲回沪一视，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嘱我一人起草。我起草出来的时节，则我军已退出上海，政府正忙于西迁，草案虽经托岳军先生转呈，而在那时情况下，却无从谈起了。

# 五　访问延安

十一月十六日政府开始西迁，当晚有船先送参议员赴汉口。我因顾念山东事情，仍先回山东。又应李宗仁司令长官之邀到徐州。迟至十二月九日，乃到武汉。曾卧病旬日。病愈，即于新年（一九三八）一月一日飞西安。

本来退出南京时，各参议同人有奉命视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韩先生奉命视察云南之类），我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所以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先经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好，又经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遂于一月五日往延安。关于这一段访问经过，我择要分述于次：

## 访问延安的动机

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作：

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

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这里有两句话：

从进步达到平等；

以建设完成革命。

这是我的信念。不断地暴动与破坏，将只有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实在要不得。所以自从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国民党坚苦淬砺领导国人，共同抗战以来，当然是民族命运一大转机。我们欣喜之余，不能不考虑两个问题：

一：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

二：以同仇敌忾而得见国家统一，诚足欣幸；然为巩固此统一，似非国人有进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对于暴动破坏痛惜于衷者愈久，则对于第一个问题想求得解答愈切。于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从事乡村建设多年的我，无时不梦想国家统一，以便整个规划进行，觉得眼前抗敌的统一总不满足。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怀抱一些具体意见，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说，我访问延安的两件事，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一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 延 安 所 见

我于廿七年一月五日由西安往延安去，于廿五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星期。随行者有黎君邹君两位。车是军用大卡车，无蓬。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于公路规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

所谓陕甘宁边区者，闻其代主席张国焘（主席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廿一个县又半。人口是九十余万，而实只五十余万（张言如此）。即平均一县两万多人，岂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许多游记笔记，于那里生活情况，各有记述，亦不必详及。我只证言约近四年前的延安确是苦（后来亦许不同）。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

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学校似有六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如是等等。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自然其中卤莽灭裂，肤浅可笑者亦正不少。这是大胆创造时，所不能免，不足深怪。并且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注）

---

注　关于这些教育（或称训练），我本嘱随行的友人考察记录，不过材料不在手边，只好从略。但我为使上面的话不落空，为使大家深切予以注意起见，我特指出那学生生活的苦况。吃饭总是吃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象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脑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党部及司法机关，皆曾参观。边区政府亦分民政教建四厅。县政府则有两个：一个是边区所属的，一个是自省政府来的。法院院长为广西雷君，据谈他们的法律大半遵照国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还有一种露天开会的审判，最为特别（偶一行之）。监狱内亦有可记之处，惜记忆不清。

共党人物多半会见。唯军事领袖朱、彭、刘、贺、林诸位不在延安，未见到。又惜未多住些时，谋与乡民接近，藉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关于边区的民主政制，从条文及传说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乡长，都是选举出来的。并且各级都有议会。手边无材料可资叙述，暂亦不愿随便批评。虽然是一个要紧问题，却从略了。

## 中共转变问题

我们参观地方党部的时候，由郭君洪涛接谈。谈到民众运动，指出农民会从前是不许地主，不许富农参加的，现在都许可参加。延安城内从前只有市民会，没有商会，现在亦照外面一样有商会组织。总起来说，民众团体以前是阶级性的组织，现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运动亦改变以救国为号召，一致对外，不再向于内部作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转变。

我们参观地方政府的时候，由代主席张国焘接谈。他谈边区的民主政制甚详。指出现行政制与从前苏维埃不同之点，例如从前没有选举权的人现在都有选举权被选举之权。同时谈到土地革命之放弃，地主多已回来了。不过土地已经分配，不能收回他原有土地，而由旁处补还给他。

关于土地问题，张国焘毛泽东都表示今后的方针政策尚有待研究，并希望各党派共同研究。——这自是一种重要转变。

地方政府所作的事，不论大事小事，似乎都与从前苏维埃时代不同。参观曾有笔记，今不在手边。记得教育厅正在改编各种教材（小学用的，民众用的），亦拿出来给我们看。建设厅指导办理合作

社，因大环境改变（从前被封锁现在开放），政策改变，亦变更甚多。

从事情上所见，大致如上，从理论上，则对于中国前途，似抱一种三段的看法。他们都说：要在抗战中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当实现民主（第一段）；从实现民主，逐步前进中，就可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第二段）；从社会主义进一步到共产，亦许是我们子孙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两种责任或两大任务的说法：一种是现时实际任务，就是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一种是将来远大理想，就是完成共产主义。

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不可与其他党派合作的，他们将求着与大家合作；他们将争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着暴动和破坏。

我又曾提出几个问题，问他们。譬如我问：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呢？明白地说，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张闻天君答复我，他们原来与国民党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其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我又问：过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请一一分析言之。假若不能指出其客观因素，则从前错误，□□□□□□□□□□？□□□□

□□□□□□，□□□□□□□□□□□□□□□□？——这一追问，仓卒之间张君未能给我好的答复。

我又问：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假如说，不一定自操政权，然则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愿闻其详！张君对此的答复，大意是说他们将帮助国民党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权。如何完成共产革命，似未说清楚。

叙起来太长，我作个结论罢。大致所见事实，和谈话接触上，使我们相信中共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他们对中国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们说的两大任务，是切合于他们理论的，不是饰词。

但这只是结论的一面。还有一面，即其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

## 毛泽东的会谈

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

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他这种生活习惯，听说是在军中养成的。夜里面他将作战计划作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他便睡觉。傍晚起来，听取报告，又作计划入夜。明天大家作战，他又睡觉了。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作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毛先生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先生（昌济）又同时教授于哲学系，彼此相好。杨老先生住居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随他同住。我去看杨先生，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搭纸来，纸上已将

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

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我曾问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说，人家传我有肺病，医生检查过没有的，但我患神经衰弱。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俭素。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资。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

我和他的谈话，除交换意见者，另记于后外，兹选择几段，叙于此。

我问张闻天先生那两个问题，亦向毛先生问过。对于造成一九二七年后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他有答复。大致分别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对照言之。即如国际一面，在那时各帝国主义者虽彼此有矛盾，而同惧中国之赤化，却使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国共之分裂，此盖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来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而统一不起

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于中国之分裂，而行动适足以反迫成中国之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团结。上年（指廿五年）西南两广为要求抗日有所举动时，和双十二事变之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动，皆为最好例证。他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之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更加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这是一段。

对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问题，他先转问我：我们（他自指）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预政权。——大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这又是一段。

我又问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听说共产党朋友常作自我检讨，不知亦曾检讨及此否？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他笑着答我道：你且说一说看。我说据我所见，有两个对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而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来看，十年间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

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因其在政治上若适合时势需要的话，则配合起军事，应当早成功了。

一是抗战之前到现在（指谈话之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这其中并无别的原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线走对了。对照来看，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

我末了说：我们祝望中国共产党今后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毛君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 意见的交换

我迫切地要求统一，但我绝对不承认有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国人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得到国家统一。这一信念，被抗战前后的事实证明了。在抗战上中国表见了从来未有的统一。然而这是不是从一个武力中心向四外发展，征服全国的结果呢？谁都可以看见没有这事。反之，谁都看见是全国各方甘心情愿来拥护一个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来，各方的力量都贡献给国家），中央亦开诚接纳的结果。

但这个统一明明是外来的。只为暴敌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受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于对外，而国家内部统一了。这全为暴敌之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

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这如何可以作到呢？这并不难做到。只从本身"如何建设新中国"大题目上，能集中全国人意志而统一之，当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转变，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见中共在转变中，因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问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以下便是交换意见的大概。

我问他：以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问他：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他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作。

我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

这里：

> 一则必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植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吾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
>
> 二则抗战必求与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若我们自己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胸中无主，外交无成。我们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他对于我的话认为很对。

我于是提出我的主张，要确定国是国策。所谓国是国策，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面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他表示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

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

他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假若国民党或其他愿为此根本商讨，那他们共产党当然欢迎之至。

他又对我说：此时（一九三八年一月）他们正请得国民党同意，两党起草共同纲领。在武汉有八个人——国民党为陈立夫康泽等四人，共产党为陈绍禹周恩来等四人——正在蒋先生指导下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国是国策亦甚相近。假若由两党的扩而为全国的，由侧重眼前抗战的，进而包括建设新中国，便是了。你何不赶回武汉，去推动推动呢？

毛君屡次对我说，中国现在已是团结，但仍须求得进一步的团结。我便说，你想进一步的团结，除了我这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又问他，并问张闻天，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是不是？他们都答复是的，那样全国将可以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

关于党派问题，我从来认定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

中国问题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务。因此，“绝不相容”只是人们的错误，而非形势所必至；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不过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在当时我胸中尚未具体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谈为至止。

所谓意见的交换，除团结统一问题略记于上之外，大致还有两种：

一种是关于那时时局的。我在那时（一九三八年一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而说到当时各种问题的主张上，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事过境迁，记忆不全，记亦无味，从略。

再一种就是关于中国前途的了。我对于中国前途一向有我的见解主张。我要求确定国是国策，其意正在要认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着自己前途去走。而他们共产党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独具之历史眼光，当然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是有他们之见解主张的。我有一套，他们更有一套。所以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就在此。

关于这一问题，彼此所见就不同了。假如他们是“三段论”，那么，我便可说为“一段论”。他们的三段，前文曾提到过。就是：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于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我所见如何？我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

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前两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为我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又少却他们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论”了。——其实在我并无所谓“一段论”。

问题太大，话说起来太长，现在记不胜记。他们的书报刊物甚多，读者不难考证。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间流行却少（内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难）。今将旧文摘几句于此见意：

> 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见，或以为政治问题解决，而后产业得以发达，而后乃从容谈分配问题；或以为必由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于共产主义，而当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之建造。是或狃于欧州国家之往例，或误于俄国布尔塞维克之企图，而皆昧于彼我之异势，谬欲相袭者，曾何足以知此！

这是民国十八年为河南村治学院所写旨趣书中

的话。又后来《乡村建设纲领》第十八条有云：

> 吾人所见，中国政治得进于民主化，将有赖其经济生活之社会化，此与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于个人主义者迥异。经济上之社会化，有助于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复有助于经济上之社会化；如是辗转循环向前进，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经济上之社会主义与政治之民主主义，同时建设成功。

这些话均待另外详谈，才得明白。彼此对中国前途看法之不同，从何而来呢？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历史文化。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他相当承认我的话，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我与毛先生两人间的争论，到此为止。

# 六　国民参政会

我访问延安后于一月廿五日回抵西安，廿九日去开封。在西安开封均略作考察，以便复命参议会。二月二日到山东曹州与旧日山东同人会晤。二月四日到徐州，一面系应李德邻（宗仁）先生之约，一面亦系谋与鲁西鲁南同人恢复联络，鼓励抗敌。留于徐州者一个月之久（住北关农场内）。

三月三日回到武汉，访闻所谓八个人起草其共同纲领的事，已陷于停顿。蒋公曾一度热心混合全国为一党，旋亦作罢。所以我想求得进一步团结的事，那时不便谈。

四月曾往潢川，往长沙等处；五月曾往南阳镇平等处，六月曾入川往返于重庆成都。跑来跑去，无非为了抗战，第以其中事情叙起来太烦，均从省。现在只记一记七月的国民参政会。

在前叙国防参议会时，已论到国民参政会。因有前次提到的三点困难不易解决，人数时有增改，

产生不由选举，职权只备咨询。第一届人选发表，舆论尚表满意。第一次开会，各党派互相约定要会内保持一致，故团结精神很充分。其后，此种精神便一次不如一次。第一届延到廿九年底为止，第二届产生。二届人数又有增改（初公布增至二百二十人，临时又增多二十），但党外人数（其他党籍或无党籍者）则显著减少，所增多为党内人士。一个并无决定之权的机关，并不需在表决票数上竞争，这样增减宁有必要？而当初国防参议会务以党外者在野者为主的精神，遂不可见。

现在不欲作何评量，略述我在会内一点经过，以存客观事实。

我在第一次参政会上，提有一个建议案，三个询问案。那一个建议案是请政府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并于政府中设置常设机关，其原文录后：

（理由）中国自一九三〇、一九三一而后，农村急剧崩溃，除一九三六年以全国农产丰收，市价又不坏，稍得喘息外；问题之严重未解，而大战遽起。此时国家抗战，所需人力物力，既无不责之于乡村，乡村负担加重若干倍，而农产或以贸易停顿不得输出于外，或以运输困难而滞销于内，正苦无负担之力。此为农村战时最大问题之一。又地方制度（尤其省县以下），自清末以来日在纷更，迄未确立。

自治固不能谈，即官治亦且难言。加以数十年来受西洋影响，无论政治教育经济，皆使人才钱财集中都市。都市有拥挤充斥之患，而内地乡村空乏，几同一片荒原沙漠；即下级行政机构之不能充实健全自属当然。此时国家百事责之地方，地方一切归于乡村。乡村无力负担是一个问题；办理不善是第二个问题。类如兵役问题其最著者也。在上级政府嫌其质量两差；在中级（专员县长）已竭蹶万状；在乡村则扰乱痛苦直匪言可宣。不独痛苦，抑且前途危险之至！此为战时农村最大问题之二。国家抗战既依靠于农村，农村问题严重如此，岂容忽视！拟请行政院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集合了解下情之人详加讨论，亟筹整理补救之方。

会议后所以必须更有常设机关者，以一次整理未尽得宜，下情必须不断了解，此其一。农村问题，关涉许多方面，虽在政府各有职司其事者，而互相间联络不够，必须加以推动，使其常得商讨设计，而后分别执行，庶乎事业可举，此其二。

（办法）战时农村问题会议由行政院或军事委员会召集之，其组织及工作进行应注意下列各点：（下略）

我此一提案，所以录原文于此者，以见内容平

常，并未能替农民说话，而仍是为国家为政府设想，政府实不必害怕。果能实行，则上下之情得以稍通，乡村实际好处却不小。同时各部门各机关互得配合联络，一切事业才得进行起来，于工作效率关系亦大。原案经审查会修正（增加与会人员）通过，送经大会照案通过。秘书处咨送政府，经国防最高会议发交行政院核议。行政院又交经济部核复。经济部翁部长文灏何次长廉，私人请我商谈一度后，具复行政院认为事实可行。行政院又照样具复于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亦曾将经济部行政院的核议可行，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但除公文往来复去而外，事实上并无下文。——此会经廿七年到廿八年，又到廿九年，以至三十年（一九四一）的今天，还没有召集。

此外之三个询问案，第一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八条，有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之文，此诚当前首务。惟此中关系方面甚多，例如：农村金融系统之树立，农业技术之改进，农产之输出与流通，合作组织之普遍推行，以及农民教育，农村治安诸端，想在政府必有统筹之规划，切实之进行。规划者应请提交本会议决，进行者应请提交本会报告。

此案后经政府答复说，在经济部工作报告中，不另答复。

第二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廿五条，有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为抗战而动员之意。在各职业团体中，应以农会为最关重要，诚以民众动员大部分为农民之动员也。各地农会素来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只临时为应付选举而设。究应如何改善而充实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计，请答复。

此案当时经政府中的军委会政治部答复说，本部对于农会正在一面调查，一面计划改善，现尚无可报告。我于是在第二次参政会上，再提询问，事隔几个月，究竟调查所得如何，改善计划确实否，请答复。面这次忽然变了，由行政院经济部出来答复。说本部调查得全国农会共有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个，改善计划早经确定，并已实行云云。这桩事不知究竟应当归谁掌管？

第三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四条，有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之文，又风闻内政部于省县各级制度，亦曾有改订拟议。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

各省政府对于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办理行政人员训练外，并已涉及制度之变更。究竟此一问题，在中央正计划者如何，已实行者如何，请答复。

此案当经政府回复说，已有提案到会。会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内容涉及各省县制度，保甲制度，还有省县参议会问题。这是属于内政方面的，应归第三组审查会审查，我正负第三审查会召集人之责。当时经过颇有许多曲折，外间知者不多，我今亦不说的好。第二次在重庆开会，我又担任第三审查会召集人。我们审查内政部工作报告时，何部长键亲自出席审查，彼此面谈，又有出人意料者，我现在都不说。到廿八年冬有“新县制”之颁定，并有以廿九年为“新县制年”之说，是此一问题中一极重大改革，然而并没有经过参政会。

在第二次参政会内，我提有改善兵役一案，将来另记。当时正是廿七年十月广州武汉相继不守之后，大局严重，我特临时动议，开全体审查会，请政府当局出席切实检讨抗战工作。所谓全体审查会，是出席人数与大会同，面不作为大会，因为大会发言有限制，而审查会较容说话。那次，曾以末一天的半天功夫，由参政同人和政府负责诸公作了一次检讨。——这算比较重要的一事。

第三次会在廿八年二月，第四次会在廿八年九

月，我都未参加。因为那八个月功夫，我正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六省战地旅途中。

# 七　改善兵役运动

抗战工作不外分一个前方，一个后方。对于前方工作，我的朋友学生（特别是豫北和山东的朋友学生），原为有计划的努力，我间接地帮助他们作，其详另记。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后，我力辞驻会委员，即恐入川便与前方同人不易联络。自廿六年十二月到武汉，我即对人说：你们向南我向北，你们向西我向东。盖此心实不安于退居后方也。但后来到底入川了，与豫北山东相隔太远，消息阻断，对于前方既不能有所尽力，我即决定在西南大后方择一紧要问题而尽力。

在西南大后方说，当然以补充兵员，多多征集，好好训练为第一事。而兵役问题，恰办得不好，谈者莫不疾首蹙额。在乡村已痛苦不堪，而国家亦得不到好壮丁。我们从来作乡村工作的人，对此乡村最大痛苦不能坐视，不能躲闪，而为了抗战亦非给国家求得好兵员不可。于是我就留心兵役改

善的研究，思所以尽力之道。

这一研究不是书本上的事，一面要在乡村调查，汇集事实，一面要向主管方面寻求了解，除法令外并及办理实情。我在此两面皆有机缘可资进行，又恰得着朋友和社会大众帮忙。有一位朋友王寅生先生，他是“中国农村社”的，曾在武汉主持“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的座谈会，因而相熟。这次相遇于重庆。彼此谈起来，相约于此致力。我二人之外，又约了孔庚、吕超两位先生，借他们的资望地位（吕为川军前辈，现任国民政府参军长）好办事。四人出名发起兵役问题座谈会于重庆。其时社会上各方面正为兵役问题感受刺激，有此需要，不期而然地都踊跃参加，而兵役负责机关（包括上下级）亦时常派员出席说明。此一座谈会，不断举行，从廿七年九月一日续至一年以上，实为难得盛事。到廿八年十月又正式改组成立兵役实施协进会。可惜到廿九年（一九四〇）有人进谗言于最高当局，经蒋公召吕先生面谕解散了。（我于发起后五个月即有北方之行，一切成绩实王吕之功）。

先是廿七年六月间，我到成都，赶好省府召集十八个行政专员和保安副司令开会，就商议兵役问题，王主席缵绪要我出席指导。我那时于实际问题尚未调查清楚，无从有何指点，就只办理征兵几个大条件来说明其办不好之故。我说很粗浅的四大条件：甲，政令统一，事权统一；乙，秩序久定；

丙，地方制度健全，下层机构充实；丁，人口户籍清楚。今天就全国说，初见统一；就四川一省说，亦是初初统一。其政令的统一，事权的统一，以事实上未曾就绪，多谈不到，秩序久定一点，就全国说，好多地方难讲，就四川说，亦正难讲，若地方制度，则至清末以至现在三十余年纷更不已，未得确立；下层机构，更是人才钱财两俱缺乏，离着健全充实四字不知有几千里远。人口户籍一向虚伪造报，无可依据。四个基础条件没有，办不好是当然的。

自我留心研究兵役问题以后，方知道原来就未曾实行依法征兵。说是十一月一日起依法施政，尚未见诸事实。所以国家征兵法规是虚设的。政府所行的另有命令指示，而下层实际办理情形，却又与其上级政令所指示者多半不合。于是国家法制为一事，政府政令又为一事，实际办理者又为一事。所谓兵役一事，竟可析而为三。在此状态下，我们只有要求政令符合于法制，实际办理者符合于政令，还三为一。换言之，就是认真依法征兵。

我根据此意，拟成具体计划，于全省动员机构，兵役监察系统，出征军人家属协助委员会，出征军人家属联合会各有所建议。这些建议一面须得行政当局了解采用，一面须得地方有资望有信用的各级（省县乡）领袖热心出头赞助才行。那时就四川说，省政府兼军管区司令的王主席缵绪自为正负

责人，而在他之上代表中央直接指挥他的则为一军委会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关于兵役一事，重庆行营实居主脑地位，倒不是军政部直接来指挥军管区。王主席一面，我在六月间已和他谈过此事（见前），决继续访他谈谈。然而最要紧的，还不在政府，而在地方。恰好在四川地方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张表方先生（澜），又与我相好。至于四川教育界上熟人亦甚多，而且教育界素来明通，政府和地方两面肯积极作，教育界大家帮忙，是不成问题的。

九月末到十月初，张表方先生已被我说动，愿意为此一大问题努力。我们就偕同访重庆行营张主任岳军先生商量。张主任正为兵役办不好发愁，闻言十分欣喜。对于三方面配合的原则极承认，对于表方先生肯帮忙如获至宝。马上即从人的方面费用方面，分别筹计有着。赶好王主席自蓉来渝，又一同商谈极洽。十月七日张（为监誓）王（为就职）同飞成都，便邀了表方先生同我一齐去。双十节省府全体宣誓就职后，即按照预定步骤，第一步先改组省动员机构。表方先生而外，邵（从恩）尹（昌龄）卢（廷栋）诸公皆参加。改组成立的一天，岳军先生并亲自出席指导。当时气象极好。

当时气象甚好，而不料卒作不通。

（被检扣一段）

张邵诸老先生消极，我一个外省人无所用其力，就自动退下阵来；——退下政治斗争的阵来。

四川的事从此罢手。但我仍将改善兵役的意见办法贡献于参政会。当时参政会同人注意此问题者正多其人，曾借江翊云先生（庸）家聚会来交换意见，交我起草提出，是为第二次参政会上的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提出后交付审查，结果又是我自己作的审查报告（因为深夜审查，被指定的委员多不到）。此案经大会通过，咨送国防最高会议，交下行政院军委会办理。原案附录后面，备读者参考。

西南大后方的工作重要在兵役；兵役问题尽不上力，我即决定再赴前方了。廿八年二月出川北行，行抵西安时，参政会开第三次会。我虽未出席，仍有“办理兵役亟应改善各点分别提出建议案”之提出（托朋友提出）。其内容是从各地访察得许多事实问题，分别指出建议改善。我的改善兵役运动到此为止。

（建议案略）

# 八　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

我在巡视华北华东起行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叙述在这里。此即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之提出。这是廿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事。大约在十一月间张君劢先生于《再生》杂志发表一文，题为《一封公开给毛泽东先生的信》。内容是毛先生在其中共六次全会上的报告，说到国共长期合作的话，张先生则进一步要求国家统一。仿佛毛先生有“从中央军到八路军，从国民政府到边区政府”的话，张先生以为何必如此排列对峙，痛快地成了个一军事系统，一个政府系统，岂非国家之福。此文发出以后，各方均极注意，而党派问题遂为一时所热烈讨论。我的主张之提出，即有感于时论纷纭，不觉引起我的宿怀。

当时系用《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为题，写好之后寄大公报发表，而在新闻检查方面被扣。那时刘伯闵先生主持检查事，特枉步来看我，解释此

事。我又请刘先生介绍我，访叶楚伧先生（当时的宣传部长）面谈一度。据刘先生叶先生表示都颇同情我的主张，原可发表。其所以阻我发表的理由，是恐引起各方讨论之后，文章愈写愈多，不能促问题之解决，转增不愉快的情绪。他们说：党派现状固不令人满意，但如无好转的把握，有恶化的可能时，仍以少谈为好。于是就没有发刊。只有手稿两份，分送各党派领导人看一看。

今将当时原文大意，分段略述于下：

**开首说**，此为抗战建国中最大问题之一，或且为最难问题之一。但我们不要在紧张的情绪下，急谋办法，而应当先静下心来作一些研究。因为解决的途径，是必须在问题头绪，从头理清楚以后，才发现的。例如从清末中国革命同盟会，政闻社，和资政院时代一些政团，以致民国初年许多党派的演变，中间毁党造党，要党不要党（民五国会第一次恢复时），那议些论，都要清理一番。更且是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累次改组，并与共产党一再分合的经过，要用心察考。这样作了之后，必可发见其中一些道理，为我们今日宝贵的教训。

历史的研究而外，更须作理论的探讨。我们要问：这些政党是那里来的？他基于何种必要而存生？中国政党他的任务是什么？假定我

们说不要他，行不行？……诸如此类。

**次段讲**：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是讨论党派的社会基础（或背景）问题。

我平素认定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所有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这一套观念都适用不上。大致说，其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阶级分化不著；乃至职业的联结，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亦每为家族乡土关系之所掩。虽然近百年大交通以后，受世界影响，渐渐变质，已非原来的社会；而象日本那样追步西洋，工商业发达，有新兴阶级形成者，在我亦以卅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所以阶级势力不是形成中国党派的因素；中国党派缺乏其一定之阶级基础。然而家族乡土关系能形成政党吗？当然又不能。中国亦并没有什么“地方性的党派”。

说到宗教，中国虽有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几大宗教。但并没有从宗教不同，而凝成几大势力，表见于政治场上。说到种性部族，虽有汉满蒙回藏之五族，亦未曾在政治上因而划分为几方面。

总起来说，所有这些社会的分野——阶级，职业，地方，宗教，种姓部族等——原为外国党派所由形成者，在中国或分不清楚，或联结不固，或虽分得清，联得起，而未尝构成政治上斗争的问题，形成政治上竞争的势力。

**三段讲**：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这将讨论到中国应有些什么运动，亦就是中国党派所要负的那些任务。

我平素认定中国问题是外面引发的，而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此其一。我又认定中国问题有其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其对内完成社会改造第之二面；此其二。

所谓中国问题不是自发的，正由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假若世界不交通，中国仍为中国，则我们不能想象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发生。满清皇帝亦可以倒，倒之者将又是一明太祖而已。所以我常说中国问题富有其外面性。

中国问题虽具有外面性，然而说到问题之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积极求得本身之进步，为文化之补充改造（包含政治改造经济改造），俾一新中国建设成功，方为问题解决。断断不是徒以排除外面迫害为问题之解决的。外面迫害之排除，有时为建设新中国之前提；但假使自身无整顿之进步亦无从去排除外面迫害。两面相关，不可强分先后。

**四段讲**：假如上面所分析认识的不错，则恐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倒不免有些错误了。

因为照上面所说中国国情论断，外国政党

的两种方式都不适合的；而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却总想要在这里面走上一条路去。所谓两种方式：

一种是两党以至多党分立，彼此承认而互相竞争政权的方式。这在一般谓宪政国家的政党，大约都是这样。过去中国曾为此模仿，乃至现在亦还有人想走这条路。

一种是一党独操国权，不容许他党并立的方式。如苏联和德意等国家，均属此例。这亦是中国人看见了，很想走的一条路。以苏联而论，共产党原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在他们社会上的基础，是很分明确实的。为了渡达于阶级消灭，而实行其阶级专政，故不能不排斥其他。德意虽标榜民族立场，不从阶级说话；然其以一种阶级势力为中心，而压服其余，亦初无二致。

社会形势散漫的中国，只能合拢为一，却无法排他而立。合拢为一，可以对外抗战。合拢为一，可以建设新中国。排他便不能抗战，排他便不能建国。

总起来说，在中国国情之下，尤其在当前抗战建国大任务之下，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是不对的。

**五段讲：**中国政党应走的路。

上面说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是不对，

好象使人无所适从，其实不然。这中间是有一条路走的，即要从联合求统一。从联合求统一，一面既免多党意志不能集中之弊，一面又无主一而排他之弊。这名曰“二重组织”。即各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之联合体为第二重组织。

总起来说，这种方式既非多党制，亦非一党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上有一。这种方式既非有分无合，亦非合而不分；乃是合中有分，分而后合。为了切合中国社会形势，适应中国问题需要，非此不可。

此处说各党联合，是一简便粗略的说法。仔细讲，我是主张一种“综合制”其具体方案另详。

**六段讲：**以二重组织扣合当前事实来讲，我以为中国国民党为第二重组织，即是党上之党，而以国民党外之各党派，和国民党内之各派系。为第一重组织，即各小单位。

此其理有三点可说：

第一、按道理而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原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之最高指导原则。

第二、事实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或得他党之接受拥护，或得他党表示意见相合，在国内大致已不生异议。

第三、国民党素来包罗甚广，内部早有许

多不同（倾左倾右）之理论主张门户派系，亦应当痛痛快快表露出来，不必勉强作一个单位。

叶楚伧先生看来我的文章，一面劝我不发表，一面说他很同意的，似指此一段。这与中国共产党提议以国民党为民族联盟，各党派都加入，而仍各保持其独立性者，亦甚近似。但共产党既不是抄袭我的，我亦不是抄袭他的。在枝节上彼此尚亦有出入，更且各有各的本源。

**七段讲**：实行这一方式，所必具的两大条件。

要实行这二重组织的新方式，有其在前的一大条件，即是国是国策确定，有其在后的一大条件，即是政权治权划开。

要确定国是国策的话，前已讲过。假若没有去确定国是国策，就来改组成功二重组织。那徒有表面而已，骨子里未得意志集中，什么都是假的，必不能久。所以开诚交换意见，收得意志集中之效，是全国党派改组的前提。在国家为国是国策，在各党派为共同纲领。纲领为行动之指针；既有共同纲领，行动上即一致同趋，此为改组二重组织的理由。所有夙昔排他性的、对立性的各党，至此乃转变为同在国策下服务，又且协力配合工作的团体。

所谓政权治权划开，就是全国性的大国民党，代表国民行使政权，而国民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治权。两面不能相混。譬如上面所说都是政党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党的事，就只是这些事，不要插手于政府。政府必须不着党派颜色，而应为无色透明体。凡政党中人而服务于政府者，都要声明脱离其原来党派关系。军队和警察，都是国家所有，而为政府行使治权的工具，与党派无关。——这是最必要的一点。

**八段讲**：这一特殊方式的正确性，可以从过去得些证明。

这一方式，实是一特殊方式，他处所未见。但于中国政党问题则是正确的。此正确性，自然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但从过去看，亦可得些证明。过去的中国党派在空间上没有很大分别，而时间上的分别大。或者再清楚地说，中国的党派在空间上彼此名为两党的，其分别还不如在时间上前后名为一党的分别之大。——这是可注意的一特殊情形。请问：一个国民党在北伐前和在北伐后的分开，是不是大过北伐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又一个共产党在抗战前和在抗战后的分别，是不是大过抗战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岂但国共两党而已，其他正多类此。辛亥革命，并非一党之

力，亦非几多革命派之力，而是原来不同党派，合起干成的。恢复共和亦是各党派一齐来的。

在平时，中国问题仅止于刺激中国人发生救国运动；至于如何救国，则从各自社会背景而异其见解主张，意志趋向不能统一。抑此种不相背反（同欲救国），而又不一致之志趋，最表见散漫微差性。此种在宽泛遥远目的下，为其一种方法手段（如何救国）之志趋，最表见流动不定性。全不似从阶级问题发出的趋向简单明切，一贯不移。历来意志趋向不得统一，多误于此。只在问题逼紧时，可表见一致趋向。问题一松弛，马上又分散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抓住此番一致抗战的机会，组织起来，不让他再分散去。不过要因其不同，而综合之；不要抹杀其不同，而混合之。

这就是所谓从过去可以证明这方式的正确性。

# 九　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当我于兵役改善不得尽力，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不得发表时，我感觉留在西南大后方没有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成行。经过八个月功夫，到十月廿三日返回重庆。此中见闻甚多，有些不便发表的。而且日记手册以遭敌人追击，全行失落，仅凭记忆亦甚有限。下面分为几层，叙述大概而已。

## 此行目的

我到华北去，是因为我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我同一般朋友所作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荷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我们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过去的成

功失败，此处不叙。单说国军退出豫鲁以后，我们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八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南阳镇平。因此抗战初期，即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敌。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陈部长（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该部第三政治大队，开赴豫鲁战地工作。廿七年九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入鲁。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是促使我去华北的一原因。

说到敌后的工作，我素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在战前就想象到一旦中日作战之后，会要有很多地方我军撤退，敌军未到，因为在空间上敌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会要有许多地方，我行政机关已撤，而敌人御用机关未立，因为在时间上也来不及的。在这许多地方，乡下人顶需要知识分子领导或帮忙。而此时的乡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为平素我们工作时，虽处处为农民打算，而以我们趋新，他

们守旧，我们多所兴举，他们懒得动，我们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们好似是被统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对立的样子，实为工作中一大苦闷。今天敌人（或扰害地方的人）压迫来，我们和乡下人要共同应付环境，便从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非团结组织无以应付环境，乡下人将自然走上团体生活之路。凡此皆敌人之赐，要赶紧利用，这是我们想去华北的一种心理。

还有，我对于敌后工作，早在抗战前就认识其重要。我曾说过："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如何容易恢复处着想。——但所有这些功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见《乡村建设理论》第四四一页）。当我大军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象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更到了今日，敌人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是他能利用吗？还是我们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数人才到华北华东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但我到敌后去，却非有什么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我在徐州所写"抗战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在抚慰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我们在抗战中的

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在从事研究工作——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 往返所经路线

二月一日随行人员黄秘书艮庸，王参谋靖波，王医官福溢等乘军委会卡车先出发，约于西安相会。二月二日我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适西安有敌机来袭，改飞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一游兰州，看见兰州几个朋友。

抵西安后，晤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先生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一面亦问之第八路军办事处，并托其电知前方将领，如遇我经过时请为照料。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之戴君孙君等，承见告他们所常走之原武阳武一路，今被敌人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停滞不能走。于是我就先访阎百川先生于宜川之秋林镇，其事另记。访阎归来，赴洛阳晤卫俊如（立煌）先生。卫公极殷勤代筹，又坚劝莫忙，候机会东行。

最后决定，乘于孝侯（学忠）总司令入鲁之便，随他同行。于是赶赴皖北阜阳（颍州），与之

相会。沿途经漯河周家口，黄河泛滥区域，乘小轮入皖。但我抵阜阳，于公已先行。幸其王参谋长静轩初自陕之白河来，因又为同行之约。不意行抵蒙城，则前行之于军已被敌人截击，三团人损失半数，由津浦铁路东又退回铁路西。所有我们想于宿州车站南冲过津浦路之计划，不能不重行考虑。

王参谋长改变计划，不向东而向北。我亦改变计划，不随大军而行。随大军而行，当然可得到保护，但亦就成了敌人的目标，不一定平安的。我与随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至涡阳，派人通知永城（属豫东）书案店（一乡镇）新四军彭司令雪枫，请其代为布置路线，并觅响导，轻装前进。于是经永城入萧县（属苏北），在砀山境越过陇海铁路。转经丰县沛县而到山东之单县。所有这些地方县城都在敌手，我们都是昼伏夜行。越过铁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敌军侦知袭击。幸得八路军彭明治部，派队千余人来接，得以脱险。

单县居山东西南边角，我们即经历鲁西南各县（旧曹州属）渡黄河而北，至濮县范县朝城一带（此是范专员筑先领导抗敌之地带）。转而向东，经寿张东平宁阳等，在津浦路南驿车站之南冲过铁路，向鲁南去。这次过铁路，亦是靠八路军一一五师王参谋处长秉章率队护送。

当时山东省政府沈主席在鲁南沂水县之东里店，于总司令则在上高湖，八路纵队司令部则在蒙

阴王庄。我们一部分同人编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队亦驻于附近。我们奔赴鲁南，意在与各方会见。不意正会见的几天，敌人举行他所谓鲁南大扫荡，从四面八方攻进来（军事上所谓分进合击），于军方师长叔洪（范）竟以阵亡。从此我们辗转于山谷之间，度其游而不击的生活约近一个月。最后转至费县境，稍得休息，便由鲁南返回鲁西。

这次系从泰安附近越过铁路。到达鲁西时，亦正在敌人所谓鲁西扫荡之后，情形完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前后在山东境内共历四个月，于八月廿三离鲁西之濮县而入河北省之濮阳。此地为丁专员树本领导抗敌之根据地，一切情形又自不同，后面略记。承丁君派人送我们经滑县浚县，在汤阴境越过平汉铁路，转至林县；——这些又都是河南地方。

在此豫北一带，原有我们朋友同学从事抗敌工作，多在林县会见。由林县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壶关陵川晋城等县，这是所谓晋东南，我军与敌人迭次大战之地。当时得在朱军长怀冰，庞总司令炳勋，两军中各盘桓数日。随又转出太行山，到河南济源孟县等处。从孟县渡河回抵洛阳，恰是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一天。

总计此行，经过有皖，苏，鲁，冀，豫，晋，六个省份。半属华东，半属华北。经过之处，都是战地，凡有我军政长官者，必会面。只有经过陵川时，却没有看见朱德总司令，因为事后才晓得他在

那里。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军队同行护送。这种可以穿军装；或穿长衫都可以。并可以骑马代步。又一种是自己少数人轻装走。这便须改服乡村的短衣，只可骑驴，不宜骑马（骑马则目标大），最好步行。无论那一种，都须好的响导。正确的情报，为起行前所必须；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变路线。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总有九十八次）。因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没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经兵灾破坏了。

## 各战地情形不同

从秋林镇回西安转洛阳，不久即登上巡历战地之长途。每承朋友见问，战地情形如何？我辄张口难答，因各地情形不一，不能举一例余。故我想莫若就以各地情形不同，各时情形不同之两点，提出来说，倒是使人了解战地情形一好办法。

先说各地不同之一点。例如我所见的皖北各县和苏北各县相较，有一大不同处。在皖北完全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势力，行政专员郭造勋拒绝其入境。而在苏北丰沛萧砀则清一色都是八路武力。

皖北各县虽经敌人重大破坏，各县城内房屋存者不及半数，但行政权已恢复。专员郭君原广西军

队中一团长，阜阳县长亦为广西人王和，一切行政有广西作风。举办各种训练（如保甲训练等）皆采用广西教材。蒙城涡阳两县长则是本地人。因为李司令长官宗仁，是采取用本地人的政策，大体上说，这里情形要算不错。郭专员之拒绝新四军入境，他说：你们是为抗敌而来，此地敌人已退，如或有上级命令，我亦遵照。二者俱无，所以拒绝。言之有理，对方亦即不来。

苏北当时情形最奇妙。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彭效骞，砀山县县长窦雷岩，都是各本县人士。——此即李长官的政策。他们或奉委于失地之前（如冯），或奉委于失地之后（其余三人），却都是奉命于省政府（当时在淮阴），而且除冯外皆隶国民党籍。然而他们所凭藉的武力，竟可说清一色的八路势力。据闻当地失陷之后，董等三人自淮阴奉委，只身潜踪回乡。全以乡里自卫的意义，得到乡人拥护，而恢复其政权。所谓八路的武力，一半指彭明治部（号苏鲁豫支队），是外边开进来的；还有一半是本地发动成立的。四个县长（冯在内）的队伍各有数千人不等，当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属八路军系统。却从发动，掖助，以至领导皆出于八路。甚而系统，亦有分不清的了。他们时常不断与敌人应战，既无其他大军，非靠八路不可。倒颇能为国共合作表现一好例。

可惜皖北苏北情形，皆不长久。我离皖北，敌人随即从商邱，下皖北；新四军当然亦即进来，局面大变。我离苏北后，国共合作的好例旋即破坏。凡此又可说明各时情形不同之一点。

苏北与鲁南，与鲁西南皆相接境。但鲁南情形不同于苏北，亦与鲁西南不相同。鲁南是中央大军（于学忠部，缪征流部，沈鸿烈部）与八路军（张经武山东纵队，陈光一一五师）都有的。论政权，除敌伪政权外，皆属于省政府，当时尚无八路自建政权之事。沂水，临沂，莒县，蒙阴等数县亦在我方手中。省政府在东里店已有半年以上之安稳，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常开盛大宴会。于沈缪所驻相隔多不过百余里，少者数十里。我赶到东里店的一天，主席，厅长，委员，专员，总司令，军长，师长等，都聚会一处，雍容雅谈。此不仅为敌后各战地所无，抑以现在的鲁南回想那时，亦将有唐虞三代不可复得之感。（现在缪已变动。于沈仍在鲁南，但情形大不同了）。

大半年安居无扰的省政府，和高度繁荣的小乡镇，我将赶到几天就被敌机炸完。因为敌人一面从四外分进合击（见前），一面从顶上来轰炸。省政府亦只有实行游击，多数人员均行解散。所谓各时情形不同，此又一证明。还有我前叙由鲁南返回鲁西，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亦证明此意。

试再以鲁西与冀南比较。鲁西前以聊城为中

心，是范故专员筑先领导抗敌地带。冀南以濮阳为中心，是丁专员树本领导抗敌地带。两地接壤，风土相似；范丁二公又都是守土未退的专员，以抗敌齐名。而以我经过时所见，却完全不同。我经过时，范公已殉国成仁。虽有其参谋长继任，部下多分散。有的投八路，有的改编省保安旅。而多数扰民极凶（见后）。丁专员所部极整齐，实力有两万人。人数少于范部，而魄力雄厚过之。因范公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都从收编散兵游匪而来，致有三十几个司令之多。范公在时，尚能于扰民中抗敌；范公故后，只扰民不复抗敌。丁君则先任濮阳县长两年，得当地人曹君（黄埔军校毕业）之助，从训练干部，到自己成军。其结果当然大不同。地方秩序极佳，人民虽亦非常苦（负担太重），而却是有条有理的苦。

丁氏在抗敌工作上，有两点极有名的表见：一是改变地形。平原地带，敌军汽车骑兵运动迅速，最无法应付。于是将所有道路全掘成沟，宽五尺，深七尺；即以沟为路。此使敌骑敌车皆发生极大困难。我经过时，虽毁于大雨，仍然大致可见。又一是空室清野，古语坚壁清野，今我壁不能坚。敌人将至，则城内人民悉行撤退，一物亦不留。敌人到时，因无从井取水之具，以致饮水不得。于是敌人到濮阳两日自去。我经过时，敌人退去不过一个月之事也。——但现在的濮阳，一切皆非了。

河北省大致均在八路军势力范围，只有丁氏当时独立一隅；到廿九年亦站不住了。据我们所知各地方抗敌之初，各党派多不分彼此；后来便分裂不相容。又保持中立，不落一偏的想头为多数人所有。但结果都不能保持。丁氏在冀南，亦其一例。就整个抗敌大前提来说，这都是削弱自己力量，极可痛惜的事。

豫北情形复杂（有八路军，有反正的伪军，有两面奉迎的军队，有中央军），不如冀南。豫北和晋东南接连，为战争要地，中央军朱怀冰部庞炳勋部皆在此。我们经历各处，都只看见游击战，没有看见激烈的大战争。而到这里却是大战地带。敌我几万人开火，伤兵一下来就是一两千，住满了好几个乡村。其规模之大，情况之烈，闻之令人精神奋扬。例如晋城就是我到时收复不久的。敌占我夺，夺而复占，往复已多次。每次皆拼好多兵力，好多时间。其时庞军于收复晋城之后，又围攻壶关，范汉杰军则正攻陵川，我住庞军中，时时闻战报。而将过去不久的，庞军拦车镇一战，最为老百姓所艳称。沿路数百里，传说不绝。

论到地方情形，晋豫又自不同。晋省先有其多年以来的村政，后有公道团牺盟会的民众组织，迥非外间所能比。中央驻军不问地方事，有事问县长说话。而乡间的民众训练，我却见有八路番号臂章的人，喊口令。民众与军队的配合，在山西有的地

方达于极好之境，但似亦不多见。

总之，各地情形不同，又每每变化极快，是谈战地所首先要知道的。

## 总括的三句话

若将巡历各战地后的见闻，总括来说，则我尝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先说老百姓真苦。这个苦完全是从抗战来的，与平时无可比照。其苦况深重，亦完全不是局外人所能想象。举例言之，老百姓向来是受惯欺压的，然而大致上是受一面欺压。若不同的两面来，已难应付，何况今天竟不知有几多方面。敌我是不同的两面，敌之外又有伪，□□□□□□□□□□。其他复杂尚多。或此来彼去，或同时俱来，而都是拿老百姓出气。而且有苦，没处可诉。恐怕自古及今，谁都没有受过这个罪，乃至亦没有人梦想到有这样罪受。

穷凶的破坏，有意的骚扰，不说。只以法令来说，我方不许农产资敌，游击队遇见推车送粮食棉花向城镇车站的，就可没收。而敌方则高价收买，强制征取。我不许用伪钞，而敌不许用法币。谁的话都是圣旨一般，而圣旨却从八面而来。

似乎人类的恶性，都在这种特殊机会中，发作

出来。敌人对我之破坏且置不说，只以我们自己人的骚扰言之。这里有一明证。廿八年四月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正副主任李树春廖安邦，曾发出一告各部队官长书，就是以队伍扰害太甚，为民请命的。内容说："各部队冒领给养（给养皆向老百姓摊派）者有之，栽赃勒罚者有之，诬良为汉奸者有之，假公以泄私忿者有之，甚至奸淫掳掠残杀无辜者有之，……须知军纪不良，若起民众反感，去年半角店之惨剧，可为殷鉴。……屡闻各地民众有不堪驻军骚扰，竟至央求敌人派队扫荡，或被逼为虎作伥情事，每念及此，痛心万分。……望为民众留一线生机。"原文由鲁西大时代报（报在荷泽城内出版，行辕予津贴）载出，我曾摘取电中央报告。李为民政厅长，廖为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而所谓各部队者皆是省保安旅，县保安团之类，明明是其上司长官，却不能管；不得已以哀词劝告出之。□□□

## （被检一段）

不讲骚扰，单讲加于老百姓负担重，亦就不了。寿张一县，人口不过廿余万，而驻军一时有冯寿彭部，齐自修部，于耀川部，刘耀亭部，还有省府行辕的三营，县保安队三中队，各区常备队等。所有这许多队伍，都向地方索给养。只齐部每天即要一万七千斤粮食，菜钱在外。试问，这如何得了。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我沿途曾看见旱灾、虫灾、水灾三种。而在前（廿七年）在后（廿九年），据所闻亦都是灾情很重的。我所见春夏是干旱，而夏末秋初则大水。我初去时，于五月尾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槽完全干的（半因黄河改道），没有一滴水，我们步行河底而过。回来时，于八月尾仍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水满槽，却非船莫渡了。

水灾最惨重的，我所见的是豫北。豫北的东部，有卫河；豫北的西部，有沁水；都是汪洋千里。这其中，还有人为的因素。我军掘沁水，以冲道清铁路敌军；敌军则于其上游，相反方向掘了冲我们。彼此对冲，天灾人祸合一，老百姓却无处容身了。当地行政专员潘善斋，告诉我有五个县城：沁阳、博爱、获嘉、武陟、新乡，全在水中泡着。灾民不知有几多万，无处可逃。想渡过黄河南岸来觅食，而以军事关系又不许人渡河。

我记得有一次，随八路军同行，在泰安境内的山村中，全村的粮食不足我们一饱，只有煮稀粥分食。又一次夜行军至天明，饥渴非常，乞食于老百姓，不问内容，先行吞咽。细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饼，加以树叶煮成粥。这在我们，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望此望不到啊！

据现在所知，敌人狠毒的破坏，远较我经过那时加重；而两年来内部斗争使局面恶化，亦远过于

彼时，游击区域同胞们的苦痛，怕是倾若干泪和血亦诉不尽，任何一枝笔任何一张口亦形容不尽。人世间的奇恶绝惨，到此怕才算齐备。虽今日全世界都在兵连祸结，苦痛的不只一个中国；然而情节复杂，刻骨入髓，则怕那里亦不能比。但不知经此一番奇苦深痛，其最终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句话，所谓敌人之势已衰，事实可征者甚多。最显著不同于开战初期的，是士无斗志。战事初期，敌兵绝无缴械投降之事，虽战至一兵一卒，乃至包围遭擒，亦斗到底。现在不然，将枪一抛，高举双手的很多了。大约素质已不同，初时是现役兵正精壮刚强，现在则或是十八岁的孩子，或是三四十岁迫近中年。沿途我们都遇见俘虏，在我军中；亦曾与之谈话（多半笔谈），而知其情形。又敌军厌战反战，随处皆有其例，举不胜举。再则敌伪内部腐化，驻防游击区的为尤甚。因彼此争权夺军，而致下属不服长官命令，军纪无法维持者有之。以华制华之计不能成功，关系其前途为尤大。盖敌人没有深怀以用人，没有大量以容人，而忌刻轻薄，中国人不能与久处。伪军反正者愈多，彼猜忌愈甚。或不发枪械，或不发子弹（皆临时再发），或种种监视提防，激起伪军投诚反正者愈多。所以几年来，伪军总量上没有加，只有减，没有稳固，只有不安。——至少山东河南是如此。

第三句话，所谓党派问题尖锐严重，似亦无烦

多说。大要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绝裂，方自谓可于此尽些力。那里晓得，第三者是不见容于两方的。而且问题是整个的，不能于局部解决。简直一句话不能说。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所以忙着回来想根本办法。两年来所得消息，愈演愈烈，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我到山东时已有之），多少事不必述，只“无所不用其极”一句话，可以包括。问题严重，无以复加，又非当时之比了。

## 一幕惊险剧

关心我们朋友学生抗敌工作，而想加以抚慰鼓励，是我赴华北视察目的之一，前曾经说过。所以这里临末还须交代一下。这就要叙到一幕惊险剧了。

我们的第三政治大队，除第五支队留于豫北工作外，其余由大队长秦亦文君率领开入鲁境。因奉部令归省政府直接指挥，所以大队部即住东里店附近。如前所叙，当我到达东里店，与各方会见的几天（六月一日至六日），便遭敌人围攻。我与秦君等即彼此相失，互寻不见。久之又久，忽然得讯，秦君率部驻于蒙阴的北岱崮，距离我们隐藏之地往

北约百余里。于是我偕随行诸友，往北去就他。

那里晓得，秦部五百余人，还有省府其他人员相随，目标过大，又留驻该地达十日之久，已被敌人侦知，派兵三路进击。我往北去就他，我的背后正有敌兵亦同走一路向北前进。我到达该处，秦部已得谍报，敌人拂晓进攻，急须转徙以避之。所以不及多休息，傍晚天黑齐队向西而行。行前，秦君指定秘书公竹川君并警卫队六十名专卫护我，遇必要时，我得另自走。

当天黑齐队时，天已落雨。愈走而雨愈大，山路愈滑。又崎岖坑谷，漆黑无光（用光火恐为敌见），出手不辨五指。前后彼此牵衣而行，不许交言，古所谓衔枚而进。脚下高底深浅，亦不得知。两次有人滑坠涧谷，不知其性命如何。如是走一通夜，雨落一通夜，衣裤淋漓，难于移步，寒透肌骨，既饥且疲。走到天明，举目看看，方知只走出五六里路（人多亦为行慢之一因）。

此时雨落更大，前面有一小村庄，名“对经峪”。大家皆渴求休息。而村小不能容，秦君先请我及随带警备队进村。他们大队再前进不远，进另一小村庄名“石人坡”的去休息。我们进村，入老百姓家，全不见一人，而屋内衣物食具却未携去，极可惊诧。试问通宵大雨，老百姓为何不在？既出走，为何衣物食具全在？显见得，其为临时惊慌逃去，此地不远必有敌人。我们实在应当马上走开，

不应休息。却为饥寒所困，不免耽搁。正在解衣拧干雨水之际，耳边枪声大作，知道不好。我本来骑马，幸未解鞍，赶紧上马向东而逃。——因枪声在西面。

原来敌人在近处一山头，看见我们队伍进村。而我们则以大雨迷濛，人马疲困，却未见他。所以他立刻下山，将石人坡包围，四面架起机关枪。大队人马，有的冲出，有的阵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内，被敌纵火焚毙。事后，我曾派黄君公君等返回调查，掩埋死者，抚慰伤者（隐于老百姓家），得知其详。

就在敌人包围石人坡之时，给我机会逃走。我策马仰登一山头，一个完全没有路径的山头。山颇高，到山顶便入云端，敌人不能见。于是一时逃过了。然而雨仍大，且山高，风又大，不能久停。慢慢寻路下山，见有两三人家，便去觅食烤火。将在解衣烘烤，和进食之际，随员报告敌人即至。不得已又出来，隐身于草树茂密之处。举目向远处望去，果见有两路队伍，循两山岭而来。一路在前的，为中国队伍；有我们的大队，亦有其他军队。一路在后面的，则为敌兵。看看走近，知非隐身草树所能解决，适见老百姓向一山谷逃避，我亦随之。末后，藏在一大山洞内。

洞内先有人在，老弱妇孺为多。我和随行者共六人，入洞时，老百姓指示我们隐于最后，并以我

们行装易被认出，解衣衣我，以资掩蔽。此时两军即已开火，枪声，大炮声，最后并有飞机助战，正正在我们的山上面。洞内屏息静听，自晨至午，自午至黄昏。黄昏后，枪声渐稀，入夜全停。此时老百姓出面劝我们，离洞他逃。我们始亦愿去，暗中摸索面出。无奈，两军并未撤离一步，警戒甚严。哨兵于黑暗中有所见，即射击，我们没法可走，只得仍折回洞内。

我们折回洞内，老百姓极不愿意。他们说天明战事完了，敌人必然来洞搜索。我们身上皆佩短枪，不是开火，就是被擒，一定连累他们。但我们实无处可去。大家无言，昏昏入睡。天尚未明，睁目看时，老百姓已多不知所往。天明，则除我六人外，洞内没有人了。此时战事又作，激烈如昨。洞内无人，便于移动，可以偷望对面山头敌阵。旗帜、敌军官、望远镜、指挥刀、历历在目。过午枪声渐稀，望见敌兵三五自山头下，不久竟沿路转来洞边，大皮靴声音直从洞口过去。当时同人皆扣枪待放，他如果向洞内望一望，我们便拼了。这是最险的一刹那。

午后约三时顷，战事停。我们出洞来看，两山两军皆已撤退。大家放心，而肚内饥不可耐，差不多两天没吃饭了。只好将洞内老百姓遗留的筐篮锅盆，一一翻检，寻些食物。我们正在大嚼，老百姓却回来了。我们脸上甚不好意思，老百姓倒笑语相

慰，并各取出饮食相饷。但他们仍不敢引我们到家，日落时，领我们到二十里外另一个洞去住。

险剧既过，不必接续述下。第三政治大队经此两役，损失大半（秘书主任、秘书、会计被俘身死，其余不计），残部迳返鲁西。因为原留有第二支队在鲁西，合起来仍有三百人之数。支持到上年（廿九年）年尾，亦不能存在。我自己，离洞以后，六十名警卫队已寻不见。幸好公秘书竹川相随，他是蒙阴本地人。蒙阴公姓甚多，有"蒙阴县、公一半"之谣。于是我六人随着他，投止于公姓家。从第一个公家，到第二个公家，再到第三个公家，……如是一路从蒙阴北境走出蒙阴南境。他送我到较平安地带，即返回家去。却不料不久竟为八路军所错杀，弃尸无头。

## 此行劳而无功

总论此行，劳苦是劳苦了，危险亦危险了，却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当初北行的用意五点，多半未作到。第一点，亲自考察游击区的事实，是否与自己揣想者相合。当然考察了一些，并且知道与自己揣想者不尽相合。这尚不算全无结果。第二点，会晤旧同人同学，抚慰而鼓励之。当然会晤了不少人，而以匆匆来去，不得安住于一地，所以不能召

集聚会。因此未得会晤者甚多。又且一部分主力（第三政治大队），即于此时送掉，未达加强抗敌力量的目的。第三点，沿途宣讲国际国内情势，以坚定沦陷区的人心，略收好果。因为我北行之际，正汪精卫投降之时，颇有人以为中国无法支持。经一番讲说，并经我指出大军转至敌后的计划（此计划定于南岳会议，廿八年上半年正在实行），国际增加援助的情形，人心莫不欢悦。所谓八个月中，急促奔跑之时多，从容巡视之时少，因而宣讲的机会有限。第四点，作研究功夫，匆忙中当然说不上。至多得到一点亲身经验，为研究之资而已。第五点，所谓调和各方，其事之无能为力，前已言之矣。至多不过亲见许多事实，更促我努力团结而已。在那里实在没有讲一句话。

## 旅途杂感

八个月的旅途中，见闻不少，感想亦多。及今回忆，犹存其什之一二，记之于后。

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譬如上文所叙，为了抗战他们所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游击队（所谓省保安队等亦在内）随地筹给养，以至象我们过路的军政人员沿途需要招待，并不以为是格外需索，或不愿意负担。他们

简直承认，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问题。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是图挽救。这一点，他们全明白。

老百姓是再好没有的好百姓；只是政府官员军队游击队此一党彼一派对不起老百姓！这是随时随地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点。

第二个感想，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作，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的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作。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岂不仍是依旧。我们平素主张乡村建设，就是有计划地用社会教育普遍推进建设工作，求得社会平均发展（反对欧美都市畸形发展）。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这一要求更强。

再明白点说，从这感想中，我们更要反对内

战，和一切妨碍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事。同时，我们亦反对无方针无计划的建设，蹈资本主义的复辙，人力财力奔向工商业去，而使广大乡村落后。从这感想中，更加强我们平素主张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自己不行，敌人之势已衰，前已叙过。且以山东而论，合计分布各处的敌军，全省亦不过两万余人。以山东地方之大，两万人安得为强？何况其已呈衰势呢？然此已呈衰的两万人，却居然能霸占山东，而且据点扩充到很多。全省情势，我不愿明说。只以去年十二月我所得确报，一个滕县境内就有十九个据点。滕县从前在我们行政上，亦不过分十个区，设十个区公所。他现在竟加一倍。每一据点，总有几个敌兵，有时，少到两三个。如此零散，应当不难解决，而乃受制于他。这完全证明不是他力强，而是我们太不行了。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说起来，只有惭愤。

过去的不说了。今后既要准备反攻，必须调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强各战地政治工作，启发民众抗敌力量。如其不然，恐无翻身之日！

第四个感想，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却并不现成。因为这政治问题后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譬如上面说，对于敌人势衰力弱见出于中国人太不行；此不行是政治问题，有老文化为其背景。又如前叙游击

区老百姓苦痛深刻，此深刻苦痛出于敌人所加于我者，不如中国人自己造成者多。这亦是政治问题；亦有老文化为其背景。

# 十　统一建国同志会

华北华东之行，如前所叙于九一八前一天返抵洛阳，即可算结束。在洛阳晤卫司令长官（立煌）谈两度之后，即到西安。在西安晤蒋主席（鼎文）谈话，并托八路军办事处发电其前方将领，致谢沿途照料。十月三日由西安飞成都。

我到成都这一天，赶巧是蒋公以自兼四川主席，飞成都准备就职的一天。我因亦留成都，就便晋谒。双十节后的一天，承约便饭，就将战地经历大致报告。又特将山东敌情，省政府情形，八路军情形分别报告。蒋公于如何处置山东事，颇有指示。此时谈话已甚长，党派问题尚未及提出，请示时日再度奉谒。蒋公约于回渝再谈。

我回四川的意思，原以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推想大后方必然迫切要求解决，是我努力贡献意见的机会。所以准备分向三方面洽谈：一是国民党方面，二是共产党方面，三是第三者方面。所谓第三

者方面，意指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我自己亦属于第三者，平素所往还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最先洽谈者亦在此。此时在成都的有黄炎培，晏阳初，李璜诸先生，于是连续聚会有所谈商。

我大致报告我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其中包括山东问题及河北问题，未经叙出于本文者），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黄晏李诸先生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觅朋友商量进行。

十月廿三日我飞返重庆。此时蒋公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方，不获见面。而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如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于参政会开罢，尚未离渝。廿六日晚间访晤于曾家岩五十号，上述诸位全在座同谈。

我谈话，先从战地见闻谈起。所有八路军如何行动不对，以及我的学生如何被他们杀害，皆爽直说出。秦（邦宪）先生一面听我谈，一面笔之于纸。但他们诸位对于这些事不甚表示意见。其意似谓你既历历有见有闻，而我们见闻不及，又无其他报告，无从判断其是非。既不能否认，亦不便遽皆承认。我接着就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进而提出我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大要见前第八节：解决党派问题

的我见），特别置重于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所有这许多话，秦先生亦全记下来。然后由陈秦二位先开口作答，以次及于林吴董诸老。他们答复我的话，大致是说：你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结论都和我们的结论颇相合。至于军队统一国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来同志在廿五年双十二时节，且曾对外说出过这个话。不过事实上，必要国民党同样办理，我们方可照办。——这一方面的表示，就是如此。

在重庆的朋友，那时正忙于宪政运动。因九月间刚将宪政案通过于参政会，政府原答应于双十节作一宣布，而届时未实行，谓将候十一月初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之决议。所以在野党派为促成宪政，无任其久延，吃紧努力。

我于那次参政会是没有出席的。那时我方在豫北太行山麓，朱怀冰军长的军部中，略听到消息而已。好在会罢不久，我即到渝，于当时提案讨论通过各情形尚能闻知大概。据我所知，当时各方提案最初动机，□□□□□□，而争求各党派合法地位，俾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乃从这一问题，转到早施宪政。恰好此时，汪精卫组织伪政府，以施行宪政为号召，遂以间接促动此提案之通过。论时机实不成熟。

照我个人所见，应以团结统一为急。即如各党派□□□□（我亦在其中），我认为亦宜从团结统

一中得其解除。而且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不能从宪政得之（料定宪政不会实现）。在大家亦并未忘了统一。大家意思求宪政即是求统一，未尝有二。我则认为要从统一到宪政，而不能从宪政到统一，所以我对于宪政运动不如对于统一运动之热心。统一运动入手处，在先谋第三者之联合，我专志于此，宪政运动便没有参加。

好在大家朋友并不怪我的偏执。而且对于第三者之联合，早有此意，不待我发动，已在洽商中。经彼此聚议好多次之后，一面确定这一组织的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一面通过本会信约十二条文。原文照录于次：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

一、吾人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二、吾人以最纯洁的心情，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

三、吾人认定：中国今后唯需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

四、吾人相信：中国今后需为有方针有计划之建设。此建设包括新政治，新经济乃至整个新社会文化建设而言，且彼此间须为有机的

配合。

五、吾人承认今日较之以前已进于统一；但为对外抗战，对内建设，吾人要求为更进一步之统一。今日之统一，非出于武力，而为国人抗日要求之一致所形成。今后仍应本此方向以求之；务于国人之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求得国家之统一。

六、吾人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

七、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国是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八、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并主张切实整军、以充实国防实力。

九、吾人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并严格反对一切内战。

十、吾人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为其最低条件。

十一、吾人主张现役军人宜专心国防，一般事务官吏宜尽瘁职务，在学青年宜笃志学业，均不宜令其参与政党活动。

十二、吾人主张遵重思想学术之自由。

（此十二条宜与后来民主政团同盟纲

领十条对勘，而参求其异同所在）

此十二条文，最初起草的有章乃器左舜生诸先生。左先生并负汇集各方意见之责。我于其中，亦参加一些意见，并于末后与沈钧儒先生左先生等共负审查之责。经大家通过后，即作定。

这一组织，口头说明（文字上不便规定）是中间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当然不请他参加，但间或有国民党籍，而实际另属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张申府先生等，则在内。又参加的非必代表一党一派，无党无派的个人，如张表方先生（澜），光明甫先生（昇）等各位，亦都参加。又参加的，固以参政员居多数，而非参政员的亦正有其人，如章乃器先生便是。以党派而论，则凡在参政会中有人的，全在内。不过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罗文干三先生参加，而张君劢先生却没有在内。

组织确定，为免滋误会起见，同人咸主以本会信约十二条，托王世杰张岳军两先生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个人代表面陈一切。黄先生将文件手交王张二公，请其代约谒见日期。隔多日，蒋公约去见面时，则黄先生已因公赴泸州，只得我一个人去见。

我见蒋公时，张岳军王世杰两先生皆陪座。我说明本会成立动机，是受党派问题刺激，而以求大

局好转自任。蒋先生屡次要我们说公道话，而不知道我们说话甚难。我们说一句话批评到政府，则被人指为接近共产党或站在某一边了。我们说一句话指摘到共产党，又被人指为接近政府，或为国民党利用，仿佛我们就没有我们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为立场，这是非常痛苦的。这样将全国人逼成两面相对，于大局不好。于大局不利的，即于政府不利。我们联合起来，就是在形成第三者的立场。我公既以说公道话相期勉，先要给我们说公道话的地位，那就是许可我们有此一联合组织。

蒋先生没有留难即表示谅许，大约是先经研究决定了。只问我，参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至数数，数到沈老先生和邹韬奋先生时，□□□□□□□□□□□□□□□□□□□□！我答，以我所知他们两位并没有成见的；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面，还不如约在里面。蒋公点头，亦以为然。谈话大致即此为止。这是廿八年十一月廿九日。

我出蒋邸，王世杰先生以车送我回青年会。在车中，他问我道：你们这是一政党了。我答不是。这是为了当前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问题有分裂内战的危险，我们誓本国民立场，坚决反对；“统一建国”的标题正此而来。现在参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间，还有不少距离，须得慢慢增进彼此间的了解。纵有人想组党，现在亦说不上。在我个人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多党制是合理。说得激烈一

点，我反对欧美式的宪政。王先生于匆促间听不明白我的话，他误会我反对中国行宪政。他竟转问我道：你是否认为中国永不须要宪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开倒车的人罢！

十二月间会中同人拟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编，曾集资若干，并指定各人撰稿。后来却没有出版，其情不详，因那时我离渝了。转过年来，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断聚会。临近参政会开会之前，到的人亦多，聚会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属我起草。我草出后，大家讨论。意见互有出入。最后仍作为我个人提案，愿联署者联署，此事另记于后。

参政会开罢，同人多离去。接着到了五月大轰炸期，在重庆更不能住。同人几有失去联系之势，幸而周士观先生（宁夏参政员）寓舍宜于避空袭，他不离渝，乃公推他照料会务。每次同人入渝，与他接头，于必要时通知开会。

八路军新四军问题，由来已久，而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九月十九日）促其紧张。皓电以前，我们为关心大局，每于开会时，约中共驻渝代表秦邦宪先生出席，请他报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与政府交涉的情形（当时一切交涉皆由秦与何）。政府方面亦间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给我们。后来秦先生回陕北，周恩来先生则来渝，亦当被约预会。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了愿意我

们清楚前方军队情形，屡以各色新绘地图拿给我们看。所以由两方面的问题，不知不觉形成第三者地位的重要。虽然这一个会很可怜的，并无甚势力。然而除了这一个会之外，更向哪里寻得第三者？

问题愈到后来愈紧，转过年来一月初间，就发生皖南新四军事件。接着就有中共的抗议，面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于此。当然不能坐视大局之僵持，于是就有本年二三月间奔走的一段经过。其事见前第一节，可不再叙。

说二三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有以团体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会为前身，组成份子还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国会一派朋友，（再则多了一位张君劢先生）。至于其组织加强，纲领有异，自应于时势需要而来，此处不叙。

# 十一　一九四〇年四月间的一个提案

统一建国同志会同人，于廿九年（一九四〇年）四月初开的参政会，原商量作共同提案。将当前大问题，分作一二三几个，由同人分别担任起草提案。然后请大家讨论，集中思虑，修正完善，提出于大会。我担任的，即是关于当时党派问题的提案。不过我草出之后，大家讨论，在措词上，在办法上，意见互有出入，不能归一。遂改由我个人提出，同人随意联署。

此案标题，为《请釐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由此案，就在参政会中产生一"特种委员会"来负（关于此事的）审查及建议的责任。虽然后来，并无收到什么结果，但总算有此一事。现在大略叙一叙。

于此，先要谈一谈国共问题。国共问题始于河北，山西，次及于山东，江北，江南。冲突事件早非一日，而政府提出来说，则始终于廿九年一二月间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何参谋总长应钦的报告。我写此提案，即根据报告来说话。我的意见和主张，则根据我平素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我的认识可分为三层言之。

一、问题为自然演成，不必追问谁负其责。好多人一开口，就喜问两方面闹起来，究竟谁不好。这是最糊涂的说话。要知两方面原来都不是立宪国家的普通政党，彼此可以互相承认其存在。而实在是各自以革命建国自任的革命党，其不相容性，本于先天。此其一。过去不久，明明有十年苦斗，虽则一时罢手，彼此初未释然。此其二。明乎此，则其势不能免，不能怪责那一方，已甚明白。何况，政治军事文武斗争分不开，地面如此广，人如此多，亦无从追究谁先起意，谁先动手。事实上，总是相激相宕，不知不觉演成，此其三。还有第四点，就是当两方关系好转时，未及将彼此关系釐定清楚。譬如，政事上陕北边区，军事上第十八集团军，其于国家建制几成一谜。匆忙抗战，留下许多问题未解决，其引启纠纷，是自然的了。

二、国民对于这一问题，应抱持严正态度。上面的话，对于当事双方谁亦不责备，好象很取巧。好象作中间调停人，要如此说话才行。其实我是反对这种态度的。中国国民不应当将此事看作邻舍吵架一样，站在旁边来调停。这是家里的事，是切身的事，要持严正干涉态度。对于双方有不对处，都

应当责备。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和平解决。要知道陷身问题中的两方，谁都不能解决这问题。问题的解决，必将关系切身利害而身又不在问题中的大多数国民。正当的解决，亦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必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得之。

所以我那提案上说，事非一枝一节之事，于一枝一节究问是非曲直，实属无益。又说，问题之解决，应从整定党派关系入手，以求得较今日更进一步之团结（意指党派综合为一）。而以解决问题的责任，责望于参政会。原文有云：

> 窃念执政之国民党，于抗战起后，既招致党外在野人士，始而为国防参议会，继而为国民参政会，原期团结共商国事。今双方行动，虽不起于参政会内，须知亦并不在会外。国民党方面，蒋总裁固明明本会之议长也。共产党方面为首负责人毛君泽东，固明明吾参政同人也。双方不协，是本会尚未能发挥团结作用有以致之也。设今于此问题不加解决，而听其扩大，则参政会应职其咎。吾同人举不得辞其责而亦大亏负执政之国民党之初心也。

至于原案提议的办法，计有三点；一是电促毛参政员等迅速出席（按毛君从未出席，而其余几位

当时亦未到）；二是组织特种委员会研究解决方案；三是特种委员会由议长指定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之。

其实在我早知问题解决非易，并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会内会外造成强烈不许内战的舆论空气，俾军事行动收敛一下，而寻求合理解决途径。其次，则希望在大会电促之下，毛先生果然来渝一行，情势或有转移，为问题解决开其端。但后来事实上均未作到。

我当时是先提一询问案，后提此建议案。询问案于开会第一天即行送出。大意即根据参谋总长在驻会委员会上之报告，而询问政府在眼前曾否严切制止双方行动，以及如何为根本消弭之道。及至此建议案撰写好，觅同人联署时，许多人怕惹是非，不敢签名。只有几个熟人，如黄炎培，冷遹，江恒源，张君劢，罗文干，胡石青，左舜生，张申府，晏阳初诸公帮忙，和几位老先生如张一麐，钟荣光，胡元倓，张澜，光昇诸公热心此案之提出而签名。黄先生老成练达，他劝我不要贸然提出，应先请示议长蒋公，至少亦应先向王秘书长（世杰）说明之。我没有那样周到，又加联署人凑足二十，大会提案将近截止，来不及请示说明，就径直送出了。

在询问案送何部长答复之时，大约我已被人注意而怀疑。及至此案提出，□□□□□□□□□□

□□□□□□□，□□□□□□□。执政党的参政员始而要打消此案，后来改提强调军纪军令的对案。最后由王秘书长面请蒋议长指示，蒋公一面有亲笔手谕，□□□□□□□□□□□□□□□□□□□□□审查会召集人适为黄炎培先生。王秘书长约黄先生商谈后，即将手谕二纸（一纸写不完，遂有二纸），请黄先生转给我看，并托他与我商量一切。

蒋公手谕原文此时自记不全。大意是，此为军令军纪问题而非党派问题，军令军纪是不能有讨论余地的，然而参政同人若愿意加以研究，亦未始不可。最后则政府自有权衡。黄先生与我商量，说当局既认为可以通过，则通过无问题；为避免会场上无谓争吵起见，最好省略各种手续。□□□□□□□□□□，□□□□于是在审查会上，黄先生主席，第一省略宣读（照例秘书宣读全案原文）；第二省略说明（照例由原提案人加以口头说明）。然后主席又说，原提案用意甚好，所谓组织特种委员会一事似亦可行，可否勿庸多讨论。大家表示赞成，举手通过。陶参政员百川发言，原提议特种委员会三人至五人，似乎太少；人选既请议长指定，则人数亦不妨由议长决定之，不必限制。又大会没有几日，此委员会工作似不必限于大会期内，即在会后仍可进行报告请示于议长。大家亦无异议，而通过。

审查会完毕，送到大会上。蒋公亲自主席，仍

照前省略各种手续。只由秘书长宣读审查意见，议长问大家赞成者举手；大家举手，通过。于是一个大案，不到两分钟，便办妥。事情不算不顺利，而我想造成舆论空气的初意则达不到。还有电促毛参政员泽东出席一层，则审查会以至大会皆没有提。

末后，特种委员会经议长指定十一人组织成立。共产党方面由秦邦宪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有许孝炎李中襄等几位；居于中间的则为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几位（记不全）。而由张副议长伯苓和黄先生为正副召集人，自行定期召集开会。

据闻开过两三次会，在会上两方说话甚多，却并无一点争吵，而且每次都有结论。——这是黄先生告诉我的。临末一次会，秦参政员报告他与何部长交涉大致妥协，计有三条：

一、共党处置办法，以彼此公函往复取消之。

二、陕甘宁边区定为十八县，由中央指定之；其隶属关系大约将隶属于行政院。

三、军队编制为三军六师、三补充团、三保安团、三支队；共约二十三万人之数。

如是该会议决如次：

一、地方政制及其职权，必须经中央正式订定公布，以举统一之实。此事并望中央从速解决办理。

二、各地民众运动应遵守抗战建国纲领，并服从政府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办法应一律撤消，以收团结之效。

三、关于货币，希望中央就地方需要予以相当数量之供给；同时取消局部施行之通货，以免紊乱币制。

四、经济抗战应由政府命令各方严切执行，绝不使敌货输入流通

五、右之决议，由召集人面陈议长；本会休会，这样特种委员会就结束了。

# 十二　总结全文

以上共分十一节，将我个人自抗战以来的事自述一遍。第十一节，上年四月间的一提案，若再叙下去便是第一节，本年二三月间的一段经过。首尾如环之相扣，所有前后情节，乃至日期顺序，都可在如全文中寻清楚。现在临了特地说几句话，作一总结。

我努力的是什么？大约看了全文的自然明白，无待赘言。现在要说的，就是凡我在抗战中努力的事，其实都是抗战前一向所努力的。再则，就是将来抗战完了后，我要努力的事仍不外此。

先讲抗战前我一向努力的事。我努力的是乡村建设，人人皆知。乡村建设的内容，不外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总而言之，就是发动民众。抗战中的发动民众，是在以民众配合军队，以后方配合前方；总而言之，是为了抗战。抗战前的发动民众，是在启发民众力量，作根本建设工夫，向着新经济新文化新政治而前进；总而言之，是为了

建国。然而抗战前，虽侧重根本建国工作，同时早就准备抗战；此为上文所曾叙及者。抗战中，虽以对外抗战为主，同时亦正离不开根本建国工作。所以前后并没有大差异。

在南京我起草了《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而未能作；在四川我拟了改善兵役种种计划和建议，而未能作。——这大都是为后方设想的。在徐州小驻时，曾为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写一册抗敌工作指南，亦没有发生多大效果；则是为前方或后方设想的。其起首一段，将抗战前工作抗战中工作性质无异，联系不分，指示甚明，摘录如此，以备参考。

乡村工作，在平时其目标为建设新社会，完成中国革命。但在今日，则应转移其目标于抗敌；于抗战之中，进行新社会之建设。此为总目标。在此总目标下，则以敌人征服我者有四大步骤，从而对抗，亦有四项目标。兹分别指点如次：

一、敌人对我第一步计划为军事的占领。故抗敌工作第一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军事目的。在国军作战地区，则发动民众武力，组织游击队，与正规军相配合，相策应，并担负谍报，响导等工作，以求保卫乡土。在敌人已经占领地区，虽不得正规军配合

策应，亦应相机为破坏敌人，牵制敌人，妨碍敌人种种工作。大之可以部分收复失地，小之使敌人不得遂行占领。

二、敌人对我第二步计划为政治的统治。故抗敌工作第二目标，应为对抗敌人及其傀儡政权（如维持会，或伪县长等），使不能达到其政治目的。在敌人傀儡政权势力所及之地区，例如铁路沿线，或公路沿线之城镇等，应有秘密组织，消极抵抗，乃至进而予伪政权以种种破坏打击。在敌人未成立傀儡政权之地区，或虽已成立而其势不能及之地区，应斟酌情形，或形成某种方式之地方自卫自治力量，或树立代表民众之临时政权。总求安定社会秩序，俾农业得如常生产，农民得如常生活，消极的可以不接受敌人统治，积极的能为游击队作根据地。

三、敌人对我第三步计划为经济的榨取。故抗敌工作第三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经济目的。此要在使乡村社会趋向团结组织，依其组织的力量，解决经济生活上种种问题（如缺乏煤油，便商量着设油坊，缺乏辅币，便商量着存积粮食，以粮食为标准，发行辅币），达到乡村自给自足的企图，而使敌人不得遂行其种种计划（不能收买农产，不能行使伪钞，不能推销敌货，不能布置经济侵略机关）。

四、敌人对我第四步计划为灭亡我民族文化。故抗敌工作第四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亡我之最后目的。此要在激发民族意识，认识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服膺勿失。凡其一切毁灭我文化之所为（如提倡日语日俗，改订教科书等事），均严切拒绝之，抵制之。

然抗敌之中，仍须不忘原初建设新社会之目标，要使上列各项工作同时更具有建设新社会之意义。例如：在政治工作中，启发民众政治意识，养成其组织能力，引导其政治生活趋向民主化；在经济工作中，促进农民合作，养成农民适应环境之自主能力，使经济重心转移于乡村；经济生活趋向于社会化；在军事工作文化工作中，树立坚强的有形无形之国防基础等等皆是。

抗战不能不靠民众抗战；建国不能不靠民众建国；总之，都要发动民众。然而中国民众在乡村；民众工作就是乡村工作。乡村工作是我一向的本行本业。

# 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

（一九五七年九月编次）

在抗日战争之第二年（一九三九年）春初，愚由四川大后方偕友五六人到前线皖、苏、豫、鲁、冀、晋各省，出于敌后游击区域者约八阅月。此行缘起及其后果，往时在香港光明报发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长篇中曾叙及之，小标题为《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但所叙只首尾概略而已，于其历程未能详也。愚当时无日记。随行诸友有作日记者，如李健三所作则毁于鲁南遭遇敌人之时，独黄艮庸一简略手册幸存至今。因约同艮庸以此手册为根据，彼此追忆往事，略加排叙如次，题曰：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

当时随行人员计有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建三、翟茂林、张荫平诸君。其中前五人皆豫鲁乡村工作之同人或同学，相从甚久，唯荫平一人系到洛阳后临时邀其参加。又福溢入鲁不久即潜赴济南工作，于后半旅程未同行。而由鲁南返川途程中却又增一董泮清同学一路随行到川。

**一九三九年一月卅一日** 艮庸等先我起程，乘军委会所派大卡车离渝，当晚宿内江；二月一日抵成都。

**二月二日** 我乘飞机由渝到成都，与艮庸等相会。

**二月三日** 艮庸等乘车离成都，过绵阳小停，当夜宿梓潼。

**二月四日** 艮庸等车过剑门关抵广元。军委会派车至此为止，候西北公路局派车来接始能北去。五日在广元候车。

**二月六日** 艮庸等乘车由广元抵汉中。

**二月七日** 艮庸等乘车过大散关抵宝鸡。

**二月八日** 艮庸等换乘火车到西安，住花园饭店。九日留西安候我到来。

**二月十日** 我乘飞机到西安，同住花园饭店。我原九日从成都起飞，飞至中途得悉西安在敌机轰炸中，不能降落；乃转至兰州降落，故次日始飞抵西安。从十日至十七日皆留于西安，与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八路军办事处林、伍（伯渠、云浦）各位先生商洽如何渡河入鲁。

**二月十七日** 偕艮庸起行赴宜川。盖以各方接洽一时尚无入晋之方便，而适遇阎百川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方闻，即与其约定访问阎氏，藉先了解晋中战况。其时阎驻秋林镇，秋林镇在宜川之东，黄河边上。是日车抵咸阳发生故障，只得留宿，晤咸阳县长邵履均（旧识）。

**二月十八日** 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

**二月十九日** 抵宜川城（第二战区兵站在此）。

**二月二十日** 车过黄龙山，荒无人烟，薄暮抵秋林镇，当晚晤阎。廿一日留秋林续谈大局（参看《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中所叙）。

**二月廿二日** 离秋林返宜川。廿三日留宜川候车。廿四日有军委会叶参谋（叶楚伧之子）叶南陪同苏联顾问二人到达，约定明日附其车同行返西安。

**二月廿五日** 离宜川抵中部县留宿。次日廿六抵西安。

**二月廿七日** 晤西安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商谈去战地视察事。从廿七日至下月二日之前均留止西安。在此期间内一夕胡宗南、郑宝珊憩相偕来访。

**三月二日** 晚八时偕同人乘火车离西安去洛阳。深夜过潼关，敌人隔黄河岸打炮（所以必在黑夜通过者以此）。

**三月三日** 早抵洛阳，住入旅馆。午后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晚间卫派其蒋副官长来言，河北丁专员树本今早已渡河去，必须另候渡河机会。从三日至十八日均留止洛阳，在此期间曾一游关帝陵、龙门、伊阙。

**三月十八日** 偕同人离洛阳行抵襄城。因于学忠被任苏鲁游击总司令，卫长官主张我随其一路入鲁。此时闻于在皖北阜阳，特往就之。

**三月廿日** 经叶县、偃城到漯河。此处为黄河泛滥区，有民船通周家口，当晚下船宿。

**三月廿一日** 早由漯河开船，夜泊邓城。

**三月廿二日** 下午二时到周家口，有王成章（济宁专区工作同人）来接。王在当地驻军任队长。

**三月廿三日** 搭小汽轮往阜阳，夜泊界首。在轮舟中为同人分析敌我情势。

**三月廿四日** 下午六时船抵阜阳，入城则于孝侯已先行，留有张旅长招待我等。从廿四日至廿九日之前均留止阜阳，等候于之参谋长王静轩由陕南率队至此，再同行入鲁。阜阳被黄河水灾，且曾经敌人焚炸惨重。（阜阳旧称颍州府）

**三月廿九日** 偕同人随于部五十一军王参谋长及其部队离阜阳往蒙城，意在宿州车站南越过津浦铁路而东。是夜宿插花庙。

**三月卅一日** 行抵蒙城城外“四里吴家”宿营。此时得悉五十一军先头部队在宿州站南穿越铁路

者，遭敌军截击损失甚重。王参谋长部队改计向北，而不东越铁路。愚亦变计轻装前进，不随大队同行。于是彼此分手。

**四月二日** 移往城内县政府之财委会。蒙城亦经陷敌，城内民房破坏惨重，城内房屋约仅存十之一。四月七日前均留止于此。

**四月七日** 派靖波、蔺平往涡阳转永城（属豫东）书案店（市镇名），与新四军彭雪枫司令接洽，希望其能引导入鲁。

**四月八日** 偕同人离蒙城往涡阳，当晚到达，住城内财委会（马玉昆旧宅）。

**四月十日** 同人离涡阳往永城书案店晤彭司令及副司令吴芝圃，承其招待留止三日。

**四月十三日** 起行，随新四军滕团往李士林（地名），彭司令以一白马赠我代步。当晚在李口（地名）休息，候至夜一时乃以急行军越过公路。

**四月十四日** 住李士林李家（此似属苏北萧县境）。

**四月十七日** 离李士林行二十里至王白楼（萧县境）止宿。

**四月廿一日** 由王白楼行四十里至王寨，当晚移住郝楼。砀山县长窦雪岩原为邹平乡村工作同人，是日亦赶来相接。原邹平同学许锡璐在萧县工作亦来晤。凡此下所云县长者皆潜伏敌后之我方游击县长也。

**四月廿二日** 萧县县长彭笑千（效寿）约谈并晚

饭。八时起行，除雪岩带队同行外，并有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派兵两连护送。因有敌情，当晚绕道复回王白楼。到达时已将天晓，小憩即北行十里至张庄休息。

**四月廿三日** 傍晚起行，六时许经过小山，夜二时由黄口车站之西渡桥附近越过陇海铁路，一夜之间以行军姿态行九十里。

**四月廿四日** 晨六时行抵黄河故道，八时住于毛李庄（属砀山县）。当时即有敌人追踪而至，计有敌汽车四辆及步兵八十餘，先与雪岩所带县队接触。恰好彭明治所部苏鲁豫支队派来将与护送我的第四大队交接任务之第一大队，由胡大队长率领昨夜已先到，驻于高寨。既发现敌人来袭，胡大队长即接我从毛李庄移住高寨中，同时会合第四大队及砀山县队将敌包围，相持竟日。日暮后由第一大队护送我等离高寨向单县（属山东）进发，一夜行七十里，疲甚。雪岩仍随同一路。

**四月廿五日** 晨五时行抵单县之侯楼，住刘藜照（此人为邹平训练部同学）家中。村中驻军有军马甚多。

**四月廿七日** 下午北行十五里至中兴集，住邹平研究部同学王梅村家。丰县县长董玉珏赶来相见。雪岩伴送至此为止（由此回砀山）。

以上为由川入鲁之行程。

由此以下为入鲁而后之行程。

**四月廿八日** 晚六时由胡大队长派骑兵护送至大谢庄，单县县长王椿元来迎接（王为邹平县人）。

**四月廿九日** 刘耀庭（原为土匪，此时任游击队司令）徐国杰（省府所派人员）来见。晚六时由刘派队送至城武。夜二时到达城郊，有史县长及新编保安旅旅长朱世勤（原亦土匪出身，人甚好，其后抗敌战死）来迎接，宿县政府内。

**五月二日** 早由朱旅长派队护送赴定陶，行至中途适遇定陶县派骑兵来接。先曾误以为敌人，后乃省觉。午刻抵定陶，住县政府。

**五月三日** 第三政治大队（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当时在军委会政治部指导下所编成）同人张勋仁由鄄城来接，并由定陶县队护送至菏泽，住第六中学分院。

**五月四日** 我应邀在民众剧院讲演。此行沿途每为人分析抗战形势作动员工作，先后讲话次数甚多，然开大会对群众作讲演则自此始。第三政治大队同人宋乐颜（鲁西支队长）由鄄城乘汽车来接。

**五月六日** 同乐颜坐车到鄄城，与同人裴雪峰等（原邹平同人留鲁抗敌者）会晤。留止五日，大会小会多次，不一一记。

**五月十一日** 濮县县长张子馀及研究部同学王湘岑

来接，即相偕到濮县，雪峰亦送至濮县而后返。

**五月十二日** 偕同人由濮县起行往范县，中途遇聊城专署派汽车来接，正午抵范县晤王金祥专员及张孟龙同学，详询故专员范公筑先在聊城抗敌殉国事。按：一九三六年聊城专区推广乡校训练民众时，范公引我同人赵玉波为秘书主任，同学张潜（孟龙）为秘书，抗战初期声威甚著。其后聊城陷敌，范公、玉波等皆死难。王金祥原为其参谋长，即继任专员，与孟龙退守范县。

**五月十三日** 在范县，鲁西行署李树春主任派汽车来接。

**五月十四日** 离范，经过寿张县小停（似有一中学在此），进至张秋镇（鲁西行署驻此）会晤李主任（兼民政厅长）。此时据报有敌情。十五日派靖波往杨桥与东进支队（八路军）联络。

**五月十六日** 晨离张秋镇往杨桥，住东进支队杨勇团部。适值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此（闻在某处与敌作战七昼夜之久疲极来此就睡），曾出相见。

**五月十七日** 经杨团派人护送我等晚六时离杨桥往汶上县之葵林，夜行军至翌晨到达。

**五月十八日** 下午三时出发，六时经金口过运河，

夜十二时抵东阿县之位里（地名）。

**五月十九日** 晨离位里往钟无盐村（东阿属），近午到达，与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会晤。

**五月廿日** 深夜一时随一一五师王参谋处长秉章所率队伍离无盐村，次早八时抵钢城坝（宁阳县属）。

**五月廿一日** 下午四时离钢城坝行廿余里至刘伶墓村（属宁阳）。

**五月廿二日** 下午四时离刘伶墓，经王家峪，深夜在南驿车站附近之第十五号桥横越津浦铁路。因当地伪保长两面应付，为我侦探敌情，并为我们放哨引路，故得平安渡过。随抵老庄休息。

**五月廿三日** 下午三时离老庄行卅里至泗水县之杨家桥止宿。

**五月廿五日** （廿四日之后半夜）三时离杨家桥，天明后八时到泰安县属之管家峪止宿。据回忆此地粮食极度困难，几乎难于觅食。

**五月廿七日** 离管家峪经白马关往蒙阴县城，晚七时到达。

**五月廿八日** 天雨，留蒙阴休息。

**五月廿九日** 午前十时离蒙阴往刘官庄会晤五十一军一一四师方叔洪师长（范）并参加其前任师长阵亡之追悼会。当日下午方师长派骑兵护送经旧庄至坦埠。途遇临沂专区工作同人张里元

专员靳子钦秘书及曾在邹平受训之陆昇训同学（此时为八路军方面一游击队的团长）等来迎。晚宿陆昇训团部内。

**五月卅日** 早六时离坦埠往王庄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天主教旧教堂），沿途见有欢迎标语张贴及欢迎的群众迎来，欢迎于学忠总司令及愚两人。于系应省主席沈鸿烈邀往东里店省政府，路经王庄，适与我有一段同路，同时到达。当即会晤纵队指挥员张经武同志及政委郭洪涛同志（张先于一九三六年相识，郭先于一九三八年相识）。于未多停即离去。我留参加群众大会讲话，并午饭，然后去东里店。从东里店来迎者有省政府人员及第三政治大队同人秦亦文等多人。彼此相遇于途。护送我之骑兵以及我等既均乘马，陆昇训等亦乘马，而来迎人员亦多骑马。马多而山路崎岖狭窄，掉转拥挤时我右足踝被擦伤。晚七时抵东里店，住入政治大队办事处。

**五月卅一日** 午前沈派其秘书长雷法章先来看我，午后沈于又偕来看我，邀同赴群众欢迎大会。沈于及我各讲话。晚七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从青岛运来之啤酒汽水，绝不似身处山村之中，更鲜坚苦抗敌之意。

**六月一日** 偕艮庸等到水北（地名）第三政治大队总队部，与同人同学等相会。连续留止于此，

在朝会上讲话及开会座谈等。足伤转益恶化，浮肿痛楚，步履维艰。

**六月四日** 偕艮庸等回东里店，住于东安（地名）之省府招待处。晚间沈约谈话便饭，且留宿。次日乃回东安休息。

**六月六日** 同人及同学公竹川、曹锡侯、李树圃、王伯平等多人（多半在政治大队工作）来谈。

**六月七日** 伯平忽来报告云得鲁北支队信息，队长李星三同学因接受伪军某部诈降被杀害。按：第三政治大队之下共分鲁北、鲁南、鲁东、鲁西及豫北五个支队。星三在研究部同学中，愚夙认为最可有为之人，不意其遭遇如此，伤痛之极。

是日午前十时左右有敌机十五架自北飞来轰炸东里店，伤亡三百余人，公私房屋大都焚毁，所存无几。按：东里店原为一普通农村，自沈设省府于此，从未遭敌袭，日趋繁荣恍若城市，久已乐而忘忧。此次敌人大举扫荡，当上空投弹之时早已四面包围。国民党政府在山东全省的一政治中心于一日之间即遭毁灭。同时，于之总司令部（在上高湖）八路军之指挥部（王庄）各相距六十里、四十里不等，亦为其扫荡目标，均不能不各自转移矣。

**六月八日早** 沈派人送信云，省府避敌他迁，嘱我亦自行转移。并派步兵约一班人来照料护送。

先两日李澄之校长邀我为其中学讲话，已应诺；至此愚仍依约往坡里——中学所在地，而不知局面固已大变。近午，行至金星头，即遇省府某某厅处机关人员及第三政治大队同人秦亦文等，各不期而会。其目的地或不一，其为求转移避敌则一。愚等小憩继续前进，黄昏至坡里。入庄不见一人，只见有八路军方面游击队一小队正在庄外集合。询知中学师生已全体转移至东南山岭上；离庄不远已发见敌人，庄内万不可住。因即于暮色苍茫中登山觅晤李校长。同时会见亓养斋、范明枢两老先生（年各八旬以上）以及其他许多人，皆在山中避敌，地名西昌峪。大家皆劝我换装隐蔽，不宜骑马。而我足伤未愈，勉强能骑马，实不能步行。当时求其他代步不可得，乃倒转一方凳用两木杠抬之如二人肩舆。是晚不过假寐片刻，于午夜一时偕同人等继续转移。

六月九日　天明行至小王庄，此处原有八路军方面一部分人员已不知所往。又东行六里至马斗峪略事休息，复行至王庄附近，闻番张经武之山东纵队亦已全部他去。遂折东北行，追踪省府秘书处于周家上庄，在附近赵家高塔小停。嘱艮庸往访雷秘书长，适雷对省府人员正在给资遣散俾各自隐蔽，不获接谈。嘱靖波访晤五十一军方叔洪师长，询取情报及转移路线。靖波回

报云方师辎重太多，情况不佳（其后方师长果遇敌阵亡），乃决计不随任何其他大队伍同行。

**六月十日** 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遂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南趋奔。沿途与省府财厅等机关相遇，各皆狼狈不堪。（此时即将沈前所派给我等之一班人归还给省府）幸有保安二旅及五十一军与敌相持，我等乃得以安全退却。十时余行抵东郭庄庄外树林下，与八路方面一工作团（非战员）相会，随后五十一军军部亦到。靖波、艮庸分别与工作团负责同志张天民、五十一军江副官长等洽商行止。初闻牟军长中珩即将到来，而候之不至。中午遂同工作团移往山官庄（有大众报匡亚明社长来会见），正休息间回首望见东郭庄方向却已开火。似敌人追踪牟军长而来也。休息至夜半起行（与工作团偕行），登摩天岭，往西越过公路时已天明。

**六月十一日** 晨六时抵孙家官庄休息，庄前竟树起日本旗。正午行抵沂水之虎岩庄，工作团商请庄长供给粮。但庄民虑被敌人发见，嘱我等在庄外山沟内休息进食（红薯加豆粟煮粥，五百余人分食）。晚七时起行约八里至上岩峪宿。是日不时有敌机在上空侦察。

**六月十二日** 晨六时离上岩峪移至附近之许家峪山窝隐蔽，入夜数百人皆露宿（如是者多日）。幸在夏季，不畏冷。据闻敌情已较缓和，战事移至东里店之东北方面。

**六月十三日** 留许家峪休息，冯韬同志介绍邵德峰先生来谈，劝我以变姓名暂时隐匿之计。晚六七时东北方向廿里许发现火光。

**六月十四日** 留许家峪，有苏鲁总部之便衣探兵二人被八路军误捕，因悉于总司令即隐驻在南之水牛里。嘱艮庸往访得晤，并即止宿。

**六月十五日** 晨间艮庸返许家峪报告。愚即偕艮庸健三同去水牛里访于，谈战况并商我返川之计。当晚宿于总部。

**六月十六日** 午间仍返许家峪，有沂水县孔县长派县府李主任及于鉴泉同学来致慰问意。

**六月十七日** 留许家峪，传莱芜、泰安、淄川、博山各县有为我方收复之讯，但连日上空仍见敌人飞机往来。

**六月十八日** 派董泮清同学往坡里、水北等处与八路方面觅取联络，并探第三政治大队消息。晚间，八路工作团与我等分手移住夫子峪（后来知其遭遇敌人）。我等拟明日迁南墙峪，故留许家峪未动。

**六月十九日** 早五时离许家峪，七时抵南墙峪，借居民家，不再露宿。此间有山东纵队之干部学

校及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师生共约六百人，留止已五六日。会见鲁艺校长王绍洛、干校副主任许宗林。嘱艮庸赴田家峪西南之偏连峪访沂水县长孔庆铭，又嘱靖波往访于总部，各于当晚转来。夜半落雨。

**六月二十日** 落雨讫晨未停，连绵以至午后仍阴沉，大慰农情。因苦旱已久也。下午四时泮清回，知第三政治大队住岱崮，并带来秦亦文信，劝我前往同住。

**六月廿一日** （旧历端阳），晨五时起行往岱崮。才西北行七里许，忽闻曾家疃方面有敌兵发见，即停止前进。继而传来枪炮声，遂折回南墙峪，隐于山沟内。复移至西墙峪。夜晚九时离西墙峪，越西岭至王家庵子，经上峪、下李庄，由佛庄过公路（夜三时五十分遁过）北行。

**六月二十二日** 晨十时抵坡里。从昨晚起行至此，共约百里之路。陆昇谊同学任八路特务团团长，其团部今驻此。患难之后见面倍觉亲切。随继续前进至公庄休息。下午五时亦文特来相迎，即偕住岱崮与同人同学会见甚欢。其时已昏夜，落雨。

**六月廿三日** 午间得谍报敌人分从东方及南方两路而来。盖第三大队驻此已逾一周，复有省府厅处零散人员日渐纷集于此，遂形成目标。亦文

当即传知整装准备出发，适张里元靳子钦亦率所部来会。彼此策商行止，经决定里元等向北走，我等西行。临行，亦文分嘱公竹川（懋淇）同学随我身边照料，秦弘同学率武装一小队为我任警卫。下午四时离岱崮到茶叶坪暂停息，续于昏暗细雨中行进。雨落愈大，昏暗愈甚，出手不辨五指，山路崎岖坎坷而油滑。两次闻人墮落沟涧，似人太多，队太长，竟不暇顾。愚虽骑马，而夹在人众行列，举步迟缓有类蜗牛，通夜行不过五里。

**六月廿四日** 黎明，雨不稍停，衣履湿透，饥疲且冷。行抵对经峪一小村，亦文让我先入休息，彼则率大队更前进至石人坡休息。我等入村不见一人，而讶其衣被柴粮俱在。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缓，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此时太得马力。为免遭敌人跟踪，嘱靖波游清率同秦弘武装队另行活动，而我与良庸竹川等五六人寻路下山隐藏。初隐于后山窝一郑姓人家（有老人胸悬十字、知为天主教徒），方得喘息，忽又告警。出门见有挟衣裹粮扶老携弱者即随之行，至山脚入岩洞内隐蔽。洞内几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两军往返冲

夺，或远或近，近者如在头顶。约从午后二时起始，七时后其声乃渐疏渐停。洞内人众整日屏息静听，待至黑夜枪声全停息，即劝我等赶紧他徙（徙往神仙洞）。我等亦不愿累及老百姓，但出洞于黑暗中爬行未远，知敌我两方哨兵警戒甚严，无法通过，只得仍退回原洞内过夜。

**六月廿五日** 夜来人众先后各自离去，皆不知其所往。天明，洞内只余我等六人（艮庸、竹川、健三、茂林、蔺平与我）。约早七时许敌我两方复开火。此时洞内空无他人，可以走动向外瞭望，对面山头敌人旗帜、军官等皆在目中。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枪声稀少，敌旗撤走。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紧张既过，陡然思食，盖不进食已两日矣。遂就群众所遗筐篮检觅食物，而群众亦陆续回洞收取所遗，不觉相对失笑。据云，敌人曾巡搜至郑家，见我马，谓必有游击队在此。郑妇诡称从邻村延医所用，而敌察见鞍下系有小提包（内有洗漱刮须各用具）非乡村所习见，恕鞭之甚重。以是虽庆更生，而我等却无处可以安身。经商定由郑西堂（老人之子）引至北岱崮，露宿于山上大石隙间，雨后大风彻夜，寒冷不能入寐。

**六月廿六日** 经竹川之侄公培光介绍移住西小峪，住于庄长郭子升之叔父家。竹川即为蒙阴当地人，其族姓在蒙阴甚著（谚云蒙阴县、公一半）后此转移多得公姓之助。午后二时枪炮声又从西北方传来，出户向山沟隐蔽，适与泮清、秦弘相遇。然彼二人竟与靖波相失。

**六月廿七日** 上午仍远闻枪炮声。有第三政治大队宣传队孟队长及大队所雇之挑夫多人从石人坡逃回来，备言日前遭敌人包围情况，大队人员伤亡甚多。嘱竹川、培光往十字涧探听消息，晚八时返，决定即夜一时出发。出发前，幸得靖波来会。

**六月廿八日** 由公培光引路于早八时行抵姚里坪，计程十二里。路经十字涧曾与新编第四师二团相遇。十时离姚里坪，午后二时行抵姚峪。原拟往上东门公懋法（竹川族弟）家，途中闻其附近谢子（庄名）有敌人。改而西行至此。进庄借宿，竟不期而遇之。盖懋法亦以避敌来此也。

**六月廿九日** 竹川弟兄引我至附近道士海（地名）隐蔽，谓此间稍可休息两日。艮庸等则仍留姚庄。

**六月卅日** 嘱艮庸、竹川、泮清三人往石人坡，为第三政治大队办理善后。抵石人坡南山时，闻北方有炮声，一路侦察前进。虽满目荒凉而山

巅尚见一二牧童，村内仍闻驴鸣。遇乡民一人请其导访孙明孝庄长，获悉有负伤之我队官长士兵王仲全等三人留村养伤，当往探视慰问，并各留给养伤费用。适有本队孙医官德芳由邻村来视，因偕往当日战地巡视，残迹凄凉，殊不忍睹。总计阵亡廿五人，横尸山间及道左，多数已为土掩盖，间有露半身者面目模糊不可辨。乃各就原地加工累石围之，不使暴露。并共同相度得一可作公墓之处，备将来再行改葬。午后三时与孙医官等作别而归，比抵姚峪已入夜。

**七月一日** 愚暂不动，嘱良庸等先行探路。午后二时由竹川弟兄引导离姚峪，行经大山坡，晚到潘家上峪，投宿刘景亮家。刘与公氏弟兄相熟，招待甚热心。唯此地接近公路，离旧寨只四、五里，本日敢经旧寨往坦埠，此间曾一度虚惊。

**七月二日** 良庸派人返姚峪，迎我离道士海，黄昏抵刘处，夜间为鸡虱所苦。靖波等五人则另住东山寺内。

**七月三日** 早四时半起床原拟与竹川随刘景亮往东高道，但丝贩急于赶路，不及相待，只得另觅响导而行。九时半抵东高道，小休息。十二时抵西高道，晤庄长公毓甫及公氏族人公召根、公佩良等，承其招待甚好。是日行五十里。

**七月四日** 夜来一时半离西高道，西南行过泰石公路，遇雨仙人桥休息。天明后继续行进，雨仍不止，遂留曹家庄进食。近午拟移住西南里许之郭家庄。曹庄与郭庄之间隔一条小河，艮庸、茂林先到郭庄时，河水方过膝，半句钟后即不能涉渡。候至下午水渐退，始全移住郭庄公懋全家。

**七月五日** 嘱靖波、泮清往鲁家庄访鲁迪哲，并往太平集访晤东进支队王秉璋参谋长。晚八时泮清回，报告接洽已妥，东进支队允护送我等赴鲁西，作回川之计。

**七月六日** 九时移住鲁家庄。初意在此小留数日，后知附近各庄国军云集，恐不日将有战争，仍以迁地为妥。遂径往投东进支队部（对河南太平集属泰安境），会晤王参谋长及卢、张两科长、备承招待。下午七时半参加其“七七”两周年纪念会，被邀讲话。从对经峪遇敌以来，久在蒙阴县境内盘旋，至此已出蒙阴境。竹川由鲁庄折回坦埠，不再相送。

**七月七日** 偕靖波同晤王参谋长商量西行。据云铁路以西战事颇紧，须稍待数日然后动身。八日、九日均留住未动。

**七月十日** 离太平集，移住马家峪。

**七月十一日** 住马家峪，有邹平研究院同学张锡传来见。张家居峡圩，相去不甚远，属费县境。

**七月十二日** 遇病痢，张锡传同学迎我移至其家休养，而同人仍留原处。连日茂林、健三均病，盖精神紧张劳顿之后，天复时晴时雨，夜眠无被盖，固易致病耳。十三日、十四日各在原处休息。

**七月十五日** 泮清来张家看我，即日返去。

**七月十六日** 晨三时马家峪部队曾作紧急集合演习，艮庸等均参加。泮清再度来张家看我。

**七月十七日** 健三、茂林各病愈，来张家看我，随即返去。

**七月十八日** 艮庸、靖波、泮清偕来看我，当日返去。

**七月十九日** 夜来闻远处有枪炮声，后知是八路军围攻放城国民党秦启荣部某一游击队。但延至今日未得解决。

**七月廿日** 落雨，旱象得解，秋收有望。

**七月廿一日** 早起赴马家峪视艮庸等诸同人，十一时返张家。下午从张家移回马家峪，准备明日出发西行。——原奉通知明日出发，深夜十一时忽通知即刻出发，后知系此间哨兵与五十一军便衣队误会，仍照行原订计划。

**七月廿二日** 今日为旧历六月六日，鲁南风俗以瓜果祀天。下午四时由马家峪出发往丁家庄（太平集对河泰安境），与干部学生会合。六时离丁庄，经管家峪、万家峪，夜十时抵东石莱。

游击第八支队马保山司令派李文轩同志招待我等住小学校内。

**七月廿三日** 晨出南门小河盥洗，两岸柳丛疏落，山色青翠，河水莹澈，风景极佳。下午七时后出发，因有伤兵四十余同行，卫生队屡屡失伍，行至天明始达尧山（计约四十里）。

**七月廿四日** 晨五时到达尧山，再行廿余里至老庄休息。下午七时半离老庄西行，取道南驿车站之南急行军越过津浦铁路，时在午夜十二时半。过铁道后，抵王家庄小憩，复行十二里至小宁家庄宿营。是日约行七十里。此次与干部学生西行，张队长云山为领队，行军极细心，我等得其照料甚周到。

**七月廿五日** 本日原拟休息一天，下午得东进支队司令部消息，昨住之宁家庄今到敌人，似追踪而来者，乃决定西移，俾与六支队或总部接近。晚七时半出发，西北行渡沙河，十二时将抵汪家城宫闻有敌情，即停上不进。张队长率干部学生返张楼宿营，然后我等再进入汪家城宫，由汪庄长招待住汪氏宗祠内，时已天明。

**七月廿六日** 在汪家城宫休息，愚宿于一富户炮楼内，略得睡眠。下午有六支队独立团武团长来谈：敌大军从西方东移，现在东、西、北三方面均发现敌人。为避免被包围，劝我等速离去。同人商量分散隐蔽之计。夜十一时张云山

队长来迎，移住张家城宫（距张楼二里）住宿。

**七月廿七日** 中夜二时许张队长来，面称六支队司令部派马继孔参谋长来接，嘱即准备出发。同时张本人奉命率学生移住六支队司令部，即夜与我等作别。晨四时半出发，通过公路时亦系急行军。八时半抵刘家庄休息。下午五时离刘庄，行十二里抵时神庙（东平州境）宿营。

**七月廿八日** 晨有政三大队同人张勋仁等十人来见。彼等在石人坡走散后，最近从六支司令部得闻我之消息也。彼等将先我迳赴鲁西。此时艮庸往马子峪会晤马参谋长商谈派人到济南带信与福溢，并派健三往大峰山候晤福溢。午后三时六支队张北华司令派解参谋导员来接。五时半乘马往上套里六支司令部与政委董君毅、参谋长于会川晤谈。

**七月廿九日** 午前张北华司令来会。东平四区区长尹鼎新、副区长张仲义同来。据云今日已得消息，前第三政治大队走散人员曾会集在泰安境者百余人已越过铁路西行矣。晚七时应邀参加六支政治部召开之座谈会。

**七月卅日** 下午五时应尹区长邀，饭于其区署，董政委亦在座。曾谈及六支队成立经过。

**七月卅一日** 艮庸赴下套里集。晚八时愚应邀参加六支队政治部之座谈会。会后宿区署。

**八月一日** 肥城同学徐建勋来见。下午应陈山镇赵镇长邀饭，饭后参加六支座谈会。

**八月二日** 应邀参加六支之座谈会，晚宿上套里。

**八月三日** 健三出大峰山归来，闻福溢已经开封回川矣。晚八时六支司令部为我等开欢送会。

**八月四日** 午间暴雨约十五分钟，农田得此稍解干旱。原定今明两日起程西行，以敌情有变化，故未动身。闲中为同人讲佛法大意。

**八月五日** 闻敌在东阿增兵，东进支队司令部电报仍未通，行期有待。续讲佛法。

**八月六日** 仍留上套里，续谈佛法。

**八月七日** 蕭政委君毅来通知，梁山司令部已有回电，可以出发。午前十一时起行，廿里至后屯休息。晚八时后，北行至上庄宿营。是日护送系由东汶支队刘营长所派一连，领队为副营长曹志尚同学。

**八月八日** 早四时半出发，经尧陵寺，八时半抵石河王庄休息。十时半偕同人至马林庄东平县政府，会晤王县长春元。下午六时离马林，行十五里至茶棚上船入东平湖，夜行。翌晨抵二度泊。今日立秋，湖中夜渡颇冷。马林南五里许有梁林，为宋梁灏故里。

**八月九日** 留二度泊休息。游击司令冯寿彭派其政治部王庄任来见。落雨，同人留船中，愚移住一庄长家。十月仍留候东进支队消息。

**八月十一日** 下午三时由上蔡同来之东支卫生部谷部长来访，谓探明东支司令部仍住梁山西南三里之张坊。四时半离二渡泊，曹营长派队廿名送我等往张坊，约行卅余里，八时后到达。当与罗荣桓政委、陈光师长会晤，并承苏孝顺秘书长招待一切。

**八月十二日** 偕同人登梁山游览。梁山寨共七十余庄村，张坊庄后即梁庄。午后据报敌人汽车廿余辆由郓城向梁山出动。不久果即发现其来袭，同人随队伍出村登山隐蔽。四时，敌于发炮后退至独山固守，我等亦转至后集宿营（距张坊三里）。敌我相距七八里。敌在独山及前集放火，前集民房被烧毁甚多。

**八月十三日** 初闻敌于昨夜通回城内，十时始知其复来。且另有一股汽车卅余辆从寿张开来夹攻于我。同人随司令部直属队向东北穿行高粱地至湖边，涉水入湖，经张家庄至胡家楼休息。闻敌人又放火焚后集民居。

**八月十四日** 留胡家楼。随在我军中有俘获之日寇六人，皆加善待而教育之。愚及良庸闲中与之作笔谈。其一名佐藤猛夫，东京人，帝大医科毕业，原在东京同爱医院服务，今任军医官，本年五月来中国。又其一名三桥长吉，千叶县人，一等兵，廿五岁，人甚老实。二人谈话均极厌战。其他四人皆未满廿岁，情态可悯。

晚饭后散步湖滨，值夕阳西下，湖水泛紫红色，与暮山远村相掩映，景色瞬息变幻，一幅绝好天然画图，至不易描摹。不禁使人益叹息于战争之错误与人类之愚蠢。

**八月十五日** 留胡家楼，拂晓湖边迭有枪声。据闻敌人分几路进攻梁山，曾有一小部来至湖边窥探，被我击退。据我记忆：胡家楼所处位置有似半岛，湖水环之。在我等入住之前，既有司令部直属一部分无战斗力人员隐蔽其间。高级指挥员疲劳之余，有时亦休息于此。此日适值陈光师长在休息，当其得报敌军分路来攻，立即警觉此间可能遭敌袭击而无应敌之力。当下携同警卫员一人乘马涉水绕至敌人来路之后，隐伏高粱丛中，发枪向敌射击。来敌乃不敢前进，一幕惨剧于是得免。

**八月十六日** 晨四时半起床，五时用膳，登小艇东驶至西柳村，下午六时仍回胡楼。据我记忆：当时缺乏粮食，生活艰苦之极。所云用膳，其实只有水煮南瓜一味，无所谓饭无所谓菜也。

**八月十七日** 晨八时离胡楼行十二里至正海，晤陈光师长商定由杨勇旅部派队送我等至六团，然后再经冀鲁豫支队送我等南行。当即转张坊洽晤杨勇。下午四时出发，便衣六名护送，夜二时抵彭庄，值天雨，遂留宿。计自晨至夜行约百里，人疲马乏，以麦杆藉地而睡。是日原定往

箕山访问我鲁西支队消息，并往东进支队六团团部而未果。彭庄距箕山尚有卅余里也。

**八月十八日** 晨五时离彭庄行六里至刘口。适有敌车从村旁西驶，乡民一时惊避，旋即复定。早食后，以敌在西方，改道南行至陈坡——北大同学陈亚三家。亚三之叔宝山先生招待甚殷，并为派人放哨警戒。据当地孟庆余先生云宋乐颜、裴雪峰等（第三政治大队鲁西支队长等同人）在田家铺。

**八月十九日** 晨二时半起床，四时离陈坡，九时行抵凤凰集进食，闻西北有炮声。十一时左右行抵王崮堆东四里余之某庄略休息复行。途中与东支六团乔参谋相遇，闻敌车到城北四里处，王崮堆居民为之逃避一空。乃由孟庆余先生作响导西南行趋田家铺，下午四时许到达，与乐颜、雪峰、道一各人见面。乐颜见我，喜极而哭。道一（赵德庆，第三政治大队豫北支队长）由豫北来迎我，上月廿九日既到此，久候不得我确息，正拟此日返豫而竟得相逢，亦大喜。雪峰所率领之濮县教导队百余人，以有敌情正拟转移而未行，见面后不久敌车三辆已到前庄，即相偕移至长庄住宿。是日孟老先生年逾六旬伴行七十里，其情可感。

以上为辗转于鲁西鲁南之行程。

以下为由鲁返川经过冀南、豫北、晋东南之行程。

**八月廿日** 夜来乐颜雪峰来会商我留游击区之意义不大，决定即经豫北返大后方，致力于国内团结工作以巩固抗敌之根本。晨三时半起行离长庄，四时半抵张桥张子仁同学家。道一（以下皆有道一随行）往临濮集黄河渡口接洽渡河事宜，下午六时由张桥渡河，有濮县县政府派乔科长来接，宿张村。

**八月廿一日** 晨五时半出发，行十二里至王庄休息，有省保安司令部廖参谋长安邦来会（多谈两党武装磨擦事）。下午二时行抵濮县，住民教馆内。乐颜、雪峰及史景法同学又从鄄城赶来再度会面作别。

**八月廿二日** 留濮县，中午邹平、济宁受训同学之在濮者多人集会招待午饭。从鲁南遭遇敌人以来，同人身上服装不整久矣，至此乃各购制服更换备用。

**八月廿三日** 晨同人同学集合照像后，出发西行，十八里至柳下屯休息，已入河北省濮阳县境。下午三时抵陈庄，冀南丁专员树本驻军于此。当承其来晤，谈约两小时。丁与范公筑先同为北方抗日有名之专员，此时拥有实力两万余人，

惜其个人英雄思想浓厚。是日计行七十里。（按：我在光明报自述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文中，曾谈及冀南抗敌有“改变地形”“空室清野”两项工作，可参看。）

**八月廿四日** 曹参谋长陪同乘马入濮阳城。两马竞走，当我马将超越时，曹马向后踢，伤我右足，幸不太重。城北有（孔门）子路墓；宋史所谓澶渊之盟亦在此地。下午五时当地各界人士为我举行群众欢迎大会，丁主持，愚讲话。晚宿县府。

**八月廿五日** 晨七时由城返陈庄，路经东门外医院访视龚柏龄。下午二时应丁邀为其军官讲习班讲话。

**八月廿六日** 留陈庄，丁专员来谈。谈及各方与八路军磨擦情形，颇觉可虑。

**八月廿七日** 留陈庄，接豫北朱怀冰电报，促我即起程西返，并表示负责护送渡河到洛阳。

**八月廿八日** 十时离陈庄入城，下午五时应邀在县府讲演。准备明日离此入豫。

**八月廿九日** 晨五时半出发，行四十五里至牡丹衡午饭。此地属豫省滑县境，道一与当地赵区长相熟，一切甚方便。因茂林失道，即留宿以候之。晚间滑县县长夏熙绩来见。夜半茂林始到。

**八月卅日** 晨四时半出发，行廿五里至善堂镇休

息。沿途积水泥泞，为卫河泛滥所致。九时半离善堂，行十五里至安化镇，乘船赴屯子。船从村庄穿行，禾稼淹没殆尽。过安化后，即入浚县境。卫河决口，滑浚两县被灾至重。闻灾区西至新乡县境云。夜十一时抵屯子集，浚县县府驻此，县长李君来晤。

**八月卅一日** 下午四时半离屯子，六时半至山角。从道一之意，访天门会首领杨贯一，不遇；由黄旗会首领王某招待，小休息复行。路经某庄，仍有人从楼上向我等放枪示威。深夜抵平汉铁路浚县车站之南一里许休息，等候铁路西扈全禄司令派人来接。夜半后，随来接之人越过铁路，至扈屯。再承其派人送至许家沟，时已四时，天黎明矣。

**九月一日** 留许家沟休息。此地仍属浚县，位于县之西北角。过铁路十里即抵达太行山余脉。淇水从西北来入卫河。此村靠山傍河，自成形势。连日沿途所见，水灾而外，虫灾亦重，至此均稍减。

**九月二日** 早五时乘驴出发，行廿余里至汤阴县之博梁山休息，汤阴县政府现驻此。下午一时半行抵盘石头，住于九十七军补充团团部。

**九月三日** 晨八时半出发，行卅五里至林县东姚镇，承当地吕区长宪文招待。

**九月四日** 晨六时出发，行三十里至小店，承朱怀

冰军长派郭副官来接。下午一时半抵合涧，止宿。林县张县长，河南第三专署吴专员明浚，中国青年先锋团团长徐靖远先后来会。晚八时河南同学常泰和从辉县赶来相见。

**九月五日** 晨五时半召集第三政治大队豫北支队一部工作人员谈话。七时半应邀在第三专区联合中学讲话。八时半出发，西南行七十里抵山西省之壶陵水，已在下午四时，即止宿。途中有细雨，山峻路险而滑，时虞倾跌。过羊盘岭即达壶岭（先到东壶岭，又行一里许抵西壶岭，又名壶陵水），属壶关县境。

**九月六日** 落雨自晨至午后不止。下午三时雨势渐停，出发后即天晴，远近各山云雾瀚塞变幻，景致奇妙。五时半抵柳泉，有新五军（忆似孙殿英部）驻此，将民房占尽，乃北行五里至鹅子掌止宿。

**九月七日** 晨五时出发，行二十里至浙水进食后，又行四十余里子午后五时半抵陵川县城，住南关外。城内居民全部迁徙，荒凉满目，盖所谓“空室清野”政策也。晚间陵川张县长来会面。

**九月八日** 晨六时出发，以驴代步，西南行六十余里至冯山镇，九十七军骑兵连驻此，乃以马易驴。黄昏抵南庄（似是晋城县境），新廿四师兵站站长佟大亚招待留宿。

**九月九日** 晨六时出发，西南行越岭十五里至下川，九十七军军部胡参谋长舜生来接，住白玉坡。闻胡谈，知英法已对德宣战。

**九月十日** 晨十时应邀在九十七军军部讲演，托军部代发重庆电报四件。

**九月十一日** 下午二时乘骡离下川，西行廿五里至北寨，住第四十军庞炳勋军部，晚间晤庞，谈至夜深。沿途颇闻人称道庞军在拦车镇之战绩。

**九月十二日** 原拟继续西行，庞军长挽留为其干部学员讲话，推迟一日。晋城县张县长来见。

**九月十三日** 晨五时半乘骡出发，行五十里抵晋城午饭。山路运输骡最宜，此间兵站所畜不下二千匹，因即用以送我等出太行山。饭后又南行四十里，于下午五时半抵犁川镇止宿。

**九月十四日** 晨六时出发，行四十里，约十时半抵堆金洼（河南济源县境，距浏口一里许）进食。十二时复南行下山。值大雨后又有小雨，山势陡险，时或沿沟涧为道，涧水急流于乱石之间，非涉不能过。仰视左右石崖绝壁高矗接天，行人如步于井底。如是行卅里始出山，达山口镇。复转西行，沿山又十里至五龙口。渡沁河又四里，抵河头村。时已入夜，衣履尽湿，烘烤更换，比就睡已近夜半。

**九月十五日** 上午因雨未出发，午后二时南行廿五

里抵天祥止宿。

**九月十六日** 晨五时半离天祥，八时半抵双龙潭早饭。饭后又前行七里抵西杨村，会晤朱怀冰军长。朱招待午饭。晚嘱艮庸访朱之副官长洽商渡河事。

**九月十七日** 晨嘱豫北支队之赵道一常泰和等六人往谒朱军长谈豫北地方抗敌工作问题。八时半起身往白坡黄河岸候渡。十时左右廉副师长代交涉之船到，乃登舟渡河。约一点余钟抵铁谢上岸，雇车前往大杨树。路经汉光武陵，下车小盘桓，复前行至沟上午饭。饭后又行，下午四时半抵大杨树。再步行十里抵洛阳，住古香巷中国大旅社，已近七时矣。适在“九一八”第八周年之前夕结束此行，是则诏我虽身离前线而义不容稍息于抗敌也。

手自変ナ

# 赴香港创办
# 民盟机关刊物
# 《光明报》前后

1940年12月24日我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等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当时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抗日战争初期那种全国团结抗日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国民党的控制与镇压也日益严重，人们的民主权利也已名存实亡。国民党在其提出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人选名单中极力排斥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记得陶行知、胡景伊等就是这次被取消了参政员资格，而由国民党塞进了更多的吃闲饭的国民党员。1941年1月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形势更加恶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为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公开破裂，积极奔走于两党之间的同时，加快了民盟的组织建立工作，希望民盟能早一日建成，使它能尽快在促进国内团结中发挥作用。民盟的政治纲领、组织章则及常委、主席等负责人等都是这时商定的，创办民盟的报纸也是这时确定的。记得有一次在张君劢的住处相会。张住在其胞弟张嘉璈（当时国民党交通部长）家中。张君劢首先说，只有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讲我们要讲

的话。大家对此当然都有同感，遂决定去海外建立民盟自己的言论机关，并推我负责。

为筹备民盟的机关刊物，我于1941年3月底离开重庆。就在我动身之前不久，邹韬奋不堪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巧妙地甩掉特务的长期钉梢，逃离重庆。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弄不到去香港的机票，只得乘长途汽车先去桂林，再做打算。汽车途经第一站是距重庆九十公里的綦江。车刚停稳，旅客正准备下车略事休息，有个人打开车门上车问道："梁漱溟参政员在车上吗？"我答："我就是。"来人就说："请下车到我们那里喝喝茶。"我便回答说："时间有限，不下去了。"但他却坚持"请"我去"喝茶"，我才明白过来。为了他们稽查站向重庆的上级特务机关请示，于是全车被扣在綦江过夜。当我提着小皮箱在车站附近找投宿的旅馆时，看见墙上有一张大布告，布告后具名"张轸"，职衔是"警备司令部分区司令部、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张轸是河南人，过去经过河南友人介绍。见过面。我在一个小孩的指引下找到了这个训练处，见到了张轸。我问张："稽查站你指挥得了吗？"张答："指挥不了"。当夜我就留宿在他的办公室。夜间闲谈，与他谈起征兵抓壮丁的事，因为所谓"补充兵"就管的是此事。张说："惨得很，壮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枪毙。为了防止逃跑，睡觉时将壮丁的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张说着竟为之落

泪。我问他，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张说："当然我向何应钦说过。他听后摆摆手，或摇摇头，不了了之。"次日汽车被放行，我终于经贵阳到了桂林。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是早相识的朋友。广西大学在桂林郊外约六十里的良丰，是个大花园，景色宜人，我就住在那里，并应雷的邀请讲学约两个月，讲的内容就是后来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一部分。桂林短暂停留后，准备去目的地香港，可我买不到机票。我找当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任潮（济深），由李的秘书（也是李的表侄）黎民任打电话向航空公司担保为我购机票，公司说要请示重庆方面。后来我终于买到一张机票。在5月20日只身一人飞往香港，开始了筹办民盟机关报的工作。到港时李沛文（李济深先生长子，解放后曾任华南农学院院长）自己驾车到机场来接，我即先暂住于李家。后又迁往许地山先生（作家"落花生"；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处。在我借住许家期间，一夜许先生突因急症故去，我又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处。经过三四次的迁移之后，终于租得一座楼房中的一层充报社社址，我才迁入报社，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处。为了减少开支，报社用房力求节省，记得我的住房也只能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折叠床。

在重庆公推我代表民盟赴港办报时，曾商定张君劢、罗隆基二人随后也将到港协助，但他们始终

未来。黄炎培（当时任抗战公债筹募委员会的秘书长）原说去南洋募捐途经香港时与我相会，不料我到香港之日他恰好离港飞回重庆。关于筹办报纸的事宜，我只得会同当时在港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商讨办理，如曾慕韩（即曾琦、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民宪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甘介侯（桂系）等人。在筹办过程中，还与当时在港的左翼人士有接触，如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等，他们都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在离重庆之前到曾家岩，我将去香港办报的事告诉周恩来，并问他驻港的中共代表是谁的时候告诉我的。在临创刊之前，有人又劝我出面宴请各有关方面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记得被邀请的人中有茅盾、夏衍、金仲华等人。

我只身去香港，没有带一个人，办报的班子是到港后才筹组的。8月接到在重庆的民盟同仁的信，决定由我任《光明报》报社社长，经理则由我推荐萨空了担任。其余的编辑人员等，多靠金仲华介绍。记得新闻版负责的是羊枣（笔名），后来听说他在福州为国民党杀害。总编辑是喻颂华，他原在上海《申报》工作过。大家说班子里尽我左翼的怕外界有看法，喻颂华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找来的。经过大约三个多月的筹备，1941年9月18日《光明报》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报纸取名《光明报》，与

范长江有关。这里可以说一下。一天范见我，与我提起当时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后改名民社党）在香港出版的《国家社会报》，范说报贩售报的时候，常常喊叫其他许多报名，而《国家社会报》往往被略去，因为这个名字不易上口，叫出来也不响亮。后来我们二人共同议论，就取名为《光明报》。

民盟要创办一个自己的机关报，经济上困难不小。在最初筹备时，只有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四人，各拿出国币一万元，我自己出六千。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不值钱，大约是四元才换一张港纸（元）。后来反蒋的四川刘文辉和云南龙云（通过缪云台先生）支持民盟，又赞助了几万元。但开办之初，用钱的地方很多，注册要交押金，请律师也要钱，还要付印刷纸张费等，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紧张得很。当时范长江在香港，负责中共报纸《华商报》，见了我就问："怎么还不出版呀？"我说："你还看不出来！"不久，他来找我说："有南洋侨领愿资助你们办报，只要你写个收据就行"。我说："这还不容易"。随后他送来四千港币。待《光明报》创刊之后，经费仍感拮据，遂决定由我亲自去新嘉坡一带向华侨募款。为了此行，我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带需穿着的白色西服。谁知一上船就碰见了国社党的徐傅霖。徐见我也搭船，首先问我：你去南洋干什么？待我说明以后，他就表示：民盟包括国社党，我们二人同去募

捐，捐助者肯定将捐款只给你，而不会给我；你去了，我就募不到了。所以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徐态度之强硬，实出乎我的意料。徐是民国初年的老国会议员，年龄又比我大许多，我只好让步。款没有募着，还报废了一张花上百元港币买来的头等舱船票。不料日本不久即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很快沦入日军之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不然我也会滞留在南洋一带了。

报社经济如此困难，青年党曾慕韩（琦）还要往报社里安插青年党的人，实在令人气愤。本来报社任萨空了为经理，萨很有才干，社内工作在他掌管之下早已走上轨道，而曾忽然又“推荐”青年党的陆光荣当副经理。因为萨已胜任，无须添人，况且添人又要增加开支，我拒不接受。于是曾陆二人邀我去茶楼谈判，再三要挟。曾最后竟说：“你如此坚持，拒不接受，我们便不再是盟友。我将以敌人来对待你！”平日貌似文雅的曾某，竟如此凶恶，实在可叹！

民盟在香港办报，国民党当然不高兴，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来阻挠和破坏。早在报纸正在筹办时期，国民党就派了他们的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由重庆赶到香港，与港当局接头，企图阻止我们创办这个报纸。但他晚了一步，因为待他赶到时，我们已办完注册手续，交纳了四千元港币的押金，并请好

了法律顾问，已算是合法报刊，不能任意取缔了。可是由于刘的活动，港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仍对我们的工作多方刁难。为了避免或减少麻烦，在报纸创刊之前大家劝说我，应当先去拜访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并要我购买些礼品送去，表示希望给予关照。这种迹近行贿的事，我从未干过，可是为了办报，我还是十分勉强地去见了这位负责人。此人姓刘，着长袍马褂。这在流行西装革履的香港是不多见的。东西送了，话也说了，可是在九月十八日《光明报》创刊的第一天发刊词上他就给开了“天窗”。于是我又去找到他交涉。他说：“这是奉命行事”，因为上面有交待。他还说：你们报上的文章如果发表在《大公报》上，可以不删，可是登在你们《光明报》上，就不能不删。”报纸大样天天要送检，开“天窗”成了家常便饭，许多文章被删节得文句不通，无法读下去。我写的连载在报上的长文《我努力的是什么》，也删节得不成样子。

民盟虽早在报纸创刊的1941年初，即在重庆成立，但始终不曾公开。《光明报》在香港创刊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向国内外公开宣布民盟的成立，并公布民盟的政治纲领。而民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在见报之前如送检，肯定不能通过，所以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如何才能见报，成了一大难题。大家议论再三，想不出什么办法。幸好后来

萨空了出了一个好主意：将宣言和纲领放在刊有报头那一版的广告栏内刊出；因为按规定，报纸广告栏大样是无须送检的，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躲过送检被扣这一关。后来即按萨的主意办理，同时通知印刷厂增加印数，出售时又特别减收报费，尽力扩大这一期的发行量。1941年10月10日这一天，刊登着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的《光明报》终于在香港街头各处公开出售，与广大的读者见面了。香港当局见此情况，当然免不了大吃一惊，立刻派来由英籍警官率领的警务人员来到报社查询。我们就出示广告账目本，上面填写着早已编造好的要求刊登广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广告费用等，表明宣言和纲领确是按广告见报的，而有关刊登广告的手续又是完备的，使他们抓不住任何把柄。后来他们按照账本上写的姓名地址去查找那要求刊登广告的人，当然是什么也找不到。

《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后，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首先是旅港的参政员王云五、成舍我两人秉承国民党意旨，邀我与他们同去重庆参加参政会，为我拒绝。后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李与吴稚辉、蔡元培、张静江都是中山先生的朋友，为国民党四大元老），当时住九龙半岛酒店，也写信劝我去重庆。信中说："介公之于先生，一如先生之于介公，并无恶意。"并通知我机票已由吴铁城的弟弟备好。对此我再次辞谢。最后国民

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让他出马。一天由杜月笙出面，请我一个人去“吃茶”，地点是“高楼司大”茶楼的雅座。杜一见我，首先讲了许多恭维话，说什么我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许多人都表示赞同，等等。然后话题一转，说：“重庆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去重庆，有什么主张尽可以与蒋先生当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吗？”他还说：“我们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我回答说：“用不着去了，因为除了报上已发表的，我没有什么另外的主张，更何况民盟总部在重庆有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在，如果要当面谈，他们可以代表民盟”。杜遭拒绝后不死心，后来又请我吃过一次茶，当然还是让他碰了钉子。

国民党干涉破坏当然为我们制造了许多困难，但更令人苦恼的还是来自内部的分歧和阻挠。民盟的政治纲领早在重庆时即由我执笔写好，并经大家修改同意，但在距报纸创刊出版前一个多月，黄炎培即托人由重庆带来密函并抄件，主要意见是为避免使国民党感到刺激，十二条纲领中有四条暂不发表。这四条内容包括反对由国库负担国民党费用，反对特务机关等。其实这种将纲领分先后两部分发表的意见，黄早在重庆时就提出过，后来大家取得非到适当时机不发表的谅解，这个分歧遂被暂时搁置起来。现在又提出这四条暂不发表，不过是旧事重

提罢了。为了消除分歧，按预定时间（指1941年10月10日）发表政治纲领，经过在港的民盟成员多次讨论，和与在重庆的民盟成员多次信函往返，终于决定由我根据原来的十二条，另起草一个十条纲领。这个十条经重庆民盟成员同意，一字不改，而在港的徐梦岩、周鲸文等坚持删去第四条“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执行”，而在第二条“结束党治”下，增加“仍委托国民党执政”等字样。结果大家议论纷纷，最后终于修改为“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后来在报上发表的政治纲领就是这样产生的。至于民盟成立宣言的发表方式，早在起草宣言之前就出现了分歧。参加筹备报纸的曾慕韩首先提出发表时不具名的主张。而后被推选为主席的黄炎培又提出要为他个人参加民盟保守秘密的要求；而姓名保密也只能是不具名。我则以为民盟的成立宣言及政治纲领的发表，都应由民盟的负责人具名，以示郑重，并取信于国内外。有人提议改由参加民盟的各党派具名，而职教社又反对；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因黄是职教社的负责人，有了职教社的名字，也就等于他具名了。于是我又提出以“民盟驻港代表梁漱溟”名义，或解除我的报社社长再发表，均不得同意。而青年党的曾慕韩以不具名发表的意见未谈妥为理由，拒不执笔起草宣言。因为原确定的同时发表宣言和纲领的日期临近，我不得不连夜赶写宣言，经大家讨论通过。

最后在万般无奈中，只得服从不具名发表的意见，在报上刊登了这两个民盟的重要文件。

由于不具名发表，孙科首先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在香港发表公开谈话，攻击民盟，说民盟是“第五纵队”，是破坏抗日等等。而不具名发表的最大不利是不能取信于国外，以获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为补救计，后由陈友仁（中山先生秘书，曾任国民党政府外长）和陈翰笙二位向国外记者说明和保证，并由他们将宣言、纲领译为英文，才得由这些记者将民盟的成立宣言和纲领等转发国外。

1941年底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2月8日日军开始由九龙方面进攻香港，同时对香港炮击轰炸。《光明报》自同年9月18日创刊后不足三个月，至此被迫停刊。报纸无法办下去，工作人员只得遣散。我也多次转移住处，以免发生意外。12月25日，日军终于全部占领香港。在香港沦入日军之手的初期，盗匪蜂起，日军也趁机作恶，社会秩序无法维持。此时为了安全，我又与萨空了、张云川、黄璞三人躲入西环的一所小学，住在三楼的一间空房里。住入这里以后，我们尽量深居简出，白天各自读书，夜间停电，不能看书，几个人就在一起闲谈个人经历的种种往事。有一天我有事外出，走在中环路距香港大学不远处，遇见陆荣光。两人正边走边谈时，两楼之间忽然冲出一人，眼部以下蒙着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对我，要我交出身上财物来。

当我从衣袋中取钱包时，陆趁机逃离，向上坡方向飞跑，而此时正巧有一辆警车自上往下驶来。陆于是边跑边大喊“robber！robber！”（土匪）。匪徒眼见警车向我们开来，急忙逃走，竟不及接我手中给他的钱包。此后不久，范长江、萨空了问我是否打算于此时离开香港，我说当然想走，便约定与陈此生、范长江夫妇等同行。1942年1月10日黎明前，我身着中式夹裤夹袄，离开所住的小学校，由黄瑛送我到香港仔约定的一个僻静处，登上预先租定的一条小渔船，趁在破晓前的黑暗中，躲过日军的检查和封锁，悄悄地离开了香港。由香港回到内地所经历的艰险和一些感受，在我回到桂林以后不久，曾写过一篇文章，有较详细的记述，这里就不再说了。

（1985年培宽整理）

#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于桂林）

# 一 离 港

我已于1月26日到达梧州，现在可以将从香港脱险的经过告诉你们。

香港战事于12月25日结束，我同几个朋友隐蔽在西盘一间小学的教室里，且觇日军动静如何，准备走出香港。但急切间得不到什么好办法，直至1月10日始得离港北来。

这是起身头一天方决定底。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们，说是有一只小帆船明天开往澳门，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或可避免查问。船费每人港币六十元，此友已预定五个人的位子。我们当下付过钱，约定次日天明于某处见面，有人领我们下船，并嘱咐我们改换装束，少带行李。

我们同行朋友计五人：陈君、陆军、范君夫妇和我。五人皆改成工人或小商贩的装束，自携行李（都是小件底），随着引路人，自中环急步，向香港仔下船。这是一段约二十华里的路程，在久不走路的我，竟感到异常吃力，周身是汗，两脚生痛，

走到末了，一跛一拐，几乎不能再走。路上还承友人相助，代携行李，方勉强到达。不过还好底，是我气不喘，心不慌。

船甚小，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二尺，却有三挂帆。我真没想到这样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驶出时，从海面看见有被凿沉的轮舰十数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这小船怕亦驶出不得呢？

## 二　到澳门

船行全赖风帆之力。风若不顺，或无风，那便走不动。所以一时风力好，则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时无风，便人心沉闷，都说今天到不了澳门。大体上那一天早晚都有风底，但不十分顺风，所以晕船底人颇多。而中间亦有一段没风的沉闷期。同行友人或则呕吐，或则眩晕难支，频频服止呕药。只有我一个人不感觉什么，一切如常。范君等皆以为讶。

在途中曾遇有敌机盘旋而过，又有敌艇自远驶来，好似追我们底。船上水手和客人均慌起来，各自将珍贵财物掩藏。实则始终没有碰到敌人，或伪军土匪。我们一路无事，于夜晚十时，便在澳门登陆。

澳门政权属于葡萄牙，而此时则全在敌军控制

之下。我们登岸入旅馆，便见很多说日本话的朝鲜人。且传说敌军将接收澳门的警察权。我们到澳门还希望有轮船去广州湾，但轮船皆被敌人扣住不许开。有一次日本领事签字许开了，而他们海军方面又不许，到底不得开。我们因旅馆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承澳门朋友冯柯两先生帮忙，移居到一间空房内，慢慢设法离澳。

此时澳门已甚恐慌。粮食来源不足。米、盐、油、糖，四项皆政府公卖，非有居民证不能买。（所以我们皆靠冯祝万先生送来米吃。）各商家皆预备结束，市民多半要走。而香港跑来澳门的人亦一天比一天多，都是要再走底。这样多的人要走，而可走的路却不多。第一是没有轮船，只有渔船或使帆的小货船；而海上多盗，谁亦不敢走。只有循石岐向内地走的一法。那却要经过敌人几道检查，才得通过。首先要在澳门的敌人机关缴相片，领取通行证、良民证，手续甚繁。澳门市民多走此路。香港来的人走此路者亦不少。我们几个朋友则不愿办这些手续，亦不愿经过沿路检查，只得另想办法。

最后想到办法，还是小船飘海，直奔自由中国的都斛（属台山县）。此路因海上多盗，无人敢走。但我们则因有友人介绍得识海上豪杰吴发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称“吴发仔”的便是。他的势力范围在三灶岛横琴岛，大小榄一带等处。抗战以来，敌人要夺取三灶岛为空军根据地，他便与敌人抗

拒，苦战多次，曾受政府收编，担任游击工作。因他本人即是三灶岛上底人，家族亲故皆在岛上。岛上居民共一万二三千人，全被敌人屠杀赶走，失去生活依据。所以他与敌人是永不妥协底。直到现在，还有几千义民跟随他在澳门附近荒岛野山上砍柴为生，我们皆曾眼见。至于他们的抗日战绩，前一二年的香港澳门报纸亦不少揭载底。此番他知道我们是文化界的人要返国，他愿护送我们到都斛。同时托我们将他抗日的赤诚，部队的苦况，义民的流离，向政府代为申诉，请求设法接济和救济。

## 三　再度飘海

在17日的下午，吴发仔派人引我们乘渡船先到路环。——这是距澳门不远的一个地方。三灶岛的义民逃难在此底便不少。而吴的部下实际亦都是他们的族中子弟，他们都称呼他“发叔”。部队并没省政府发的饷项，要靠护航为生。就是将内地所需货物如汽油棉纱等包运到都斛，收些护运之费。这种生意每个月只有阴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内能作。因为这十天没有月亮，在漆黑底夜间才得避免被敌人发现。白天和月光下都是不方便底。1月17日这天正好是阴历12月初一，就乘他们运棉纱的便船送我们走。

黄昏时候，吃完晚饭，大家下船，船共五只，虽有大有小，亦差不甚多。记得我乘的一只，约六尺宽，三丈长，无篷，一挂帆而已。原说我们五人分乘五船。因为船太窄小，而使船的人一船却有八九个，还不时往来行动。所以只能在满载底棉纱包上面近舵之一端，侧身卧一客人，再多，便不免妨碍使船。后来因为范太太觉得黑夜孤身一人害怕，许他们夫妇同船。我及陈陆二君则各人一船。已经分别开行了，忽然陆君一船向我船赶来。说是他们发觉我不能粤语，怕途中万一有事不好应付，特地要我与善粤语的陈君同一船。迁换既定，扬帆各去，昏暗中彼此皆看不见了。

此夜风向甚顺，我们仰卧着看天上星斗，船在静静中如箭一般的驶去。不意后半夜风向忽变，风浪甚大，小船颠荡欲覆。浪水直泼向船内，溅入鼻口；衣服尽湿更不待说了。好在船行多在群岛之间，所以不久便依泊于一小荒岛上。候至天明日出，将衣服曝在太阳下，人亦烧柴取暖。船上带有米粮菜蔬，但遍觅岛上无淡水可得，只好用海水煮饭。我素有耐饥本领，啜一小碗而已。饭罢，就仰卧沙滩之上，阳光之下。除海潮声外，寂无所闻。直待到天色昏暗，方又扬帆而去。——此为18日事。

船行顺利，是夜便到都斛。但还不是都斛市镇，是其海口，地名东濬口。耳闻隔船语声，知范君夫

妇已先到。彼此问讯，知他的船在途中，被劫两次。棉花劫去数十包，幸无它失。而其余三只同来的船，竟不见来到。候至天明，总无消息，为陆君悬心不已。

## 四　由都斛到台山城

我们船到东溶口之时，岸上的警察派出所便有警察持手电筒上船来查问。我们直以从香港逃出告之。他回派出所后，他们的警察长非要我们上岸问话不可。而从船到岸还有几十丈必须涉水而过。正在后半夜极其寒冷，又仅有星光，不辨脚下深浅。跣足涉水，真有些为难，我们向他商量，请至天明再问话不迟。他执意不允，大声威吓起来。我身边恰尚有名片，就托范陈二君辛苦上岸，对警察长说明。

经说明后，他态度倒还好。天明就招待我们上岸洗脸饮茶，用电话向镇上喊来轿子，送我们到镇上。大约他已报告上峰，而得到指示了。

在镇上饮茶时，棉纱货主亦由镇上来东溶口收取他的货物。乃知吴发包运他的纱货共有十六只小船之多，先后分三批开行。第一批六只船，第二批五只船，第三批又五只。——就是我们搭乘底这一次。第一批有五船失踪，只到一只，亦被劫光。第二

批五只船都不见到。第三批到了我同范君两船，余三只未到。总算起，共失去十三条船；到达底仅只三船而已！如此看来，我们此行真太危险了。而到达的三船，一船被劫精光，一船被劫两次，其得安全无事者独我与陈君一船，真又太幸运了！

原来当17日晚，船已开行，我与陆君忽又换船之时，我心中早为之一动：莫非我这船要出危险吗！因为从来的经验，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只有在我来到之前，或离去之后方发生。这种事例太多了。二十八年（1939）我在敌后游击区出没之时，最为清楚显明。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迁离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取走之一天，黄家被匪劫。亦有一串事例可举。这样就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所以当忽然换船之时，我不免心中一动了。那晓得它果然出事呢！

照此情形，我们只有函託吴发仔于寻到他的船时，设法营救陆君。我们久候于都斛亦属无益，19日宿一夜，20日就赴台山县城。

赴台山，我和范夫人各乘一轿，范陈二君各骑一单车（脚踏车）尾。车轿都是警察所代雇底。警官甄君招待甚周，并设酒饭在他所内款待我们。因为我的名字一传到都斛，就被当地几个旧日广州第一中学的学生朱元凯、朱灵均、李元五等晓得

了，马上来欢迎我。而警察所朱所长正是他们一家弟兄。所以可以说一入国境，便遇到熟人了（我于民国十七年任第一中学校长）。

朱等立刻写信告知台山城内的同学陈炳贤。陈任县政府粮政科长，他又报告给县长陈灿章。所以我们一到城内，陈同学和陈县长又都来欢迎了。陈县长是我的朋友刘裁甫先生的学生。十七年(1928)我在广州时，他任民政厅秘书，曾经见过面的。于是随着当地的新闻记者和县党部书记长都来看我。他们皆以为我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最早的一人。——此是1月20日的事。

## 五　经过三埠

照我们的路线，到台山后，应经三埠去开平肇庆。所以20日宿一晚，21日晚发电报给重庆后，即决定去三埠。电报是打给国民参政会的。其文曰：

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蒋、张、左暨王秘书长钧鉴：顷已从香港脱险返回，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梁漱溟祃。

可喜底是当我们起身赴三埠时，陆君忽然赶到台山，直入我们旅馆中。问他所遭遇的事，知道被

赤溪方面的海盗掳去。吴发的十三条船皆被集中在一处，货物和旅客一同在那里。船货要交七万五千元才可以领回。旅客则每人要交港币一千元保护费才可出来。陆君本与其它客人同一待遇。后来因为他颇知江湖人物心理，几番说话居然说动他们，将掠去的衣物还他，且派船送他一人登陆。他赶至都斛，经警察所的指示，又通电话于县政府，所以就寻得我们了。于是原来同行五人，又复会齐出发。

经一程旱路，一程水路，21日下午我们到了三埠。“三埠”原是三个埠头：长沙、荻海、新昌。这好象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一样。市面繁盛，有广东第一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此。先得知专员是旧日相熟底李磊夫先生，一到便送名片通知他。他立刻来看我，欢然道故。次日又约请彭指挥林生和一些军政长官以及中央、中国、中农三银行经理为我设宴。并且派一个队长带了弟兄，于宴罢护送我们一行去肇庆。

此地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吴尚势君，在席上向我谈他是广州第一中学的老教员，虽然他入一中是霍校长请去底，我早离开。然而我在一中的措施，已奠定好底基础，养成好底学风。他们后来底人，从我遗留下的规模和同学口碑之间，虽未谋一面，却完全清楚我的为人了。——不料随处都遇到对我有好感底人呢！

## 六　经开平到肇庆

22日午后起身，当晚抵开平县城。县政府陈科长伟宗先迓于中途，林县长开远又到旅馆来看我们。据他说亦是十七年在广州会过面底。他随你们姨父伍庸伯先生作过事，所以常听伍先生说起我。——那么又算是一个熟人了。

23日黎明，县政府雇来五乘轿，林县长又亲来送行，当晚宿田村。次日继续前进，午后二时便到新桥，在新桥换小船傍晚就到肇庆了。

肇庆是府名，县名高要。此处为广东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在地，专员为王仁宇先生。他收到李专员磊夫的电报，又经护送我们的队长通知他，所以当下便同他夫人来看我们。我以为这王专员是不认识底生客了，那里晓得我虽不认得他，他却又熟习我呢！

原来广州西村有两间学校，一是第一中学，一是工业专科（后改工厂）。王先生曾主持工校的事，因为同处西郊，一中的校况学风他很清楚。几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心目中。最近他任连县县长三年，刚从连县调任此地专员不久。在连县时，王夫人和你们大姨（伍庸伯夫人）往来亲密底很。王夫人对我说，虽未会面，早从象片上认识了我和你们

两兄弟，并且还看见恕儿寄给大姨母的绘画和木刻呢！

王专员告诉我，伍先生领导之游击队的根据地就在三水县境内，而三水和高要是接境底。可惜我与同行诸友要赶路，不及去访看他老而益壮底伍先生了。

是晚（24日晚），我们宿肇庆大旅店。次日天明王专员和他的夫人又来旅店，引我们出城去避空袭。这天明避空袭是肇庆近月以来的规矩。全城人都走出城外，过午才回城。王专员就在城外一书院旧址办公。我们便在他办公室休息和吃早饭。他夫妇又引我们游公园、游郊外、树林，再吃午饭。傍晚又送我上船去梧州。——此为25日事。

## 七　搭船上梧州

25日傍晚，王专员夫妇和一位管理西江航政底唐姓军官亲自送我上船。这是以前航行广州的拖渡大船。船老板表示客气，将特舱位让给我们，而且坚持不收船价。

我们一路上船轿车脚等费，以及宿食等项，大都有人招待，或特别客气相让，所以从澳门冯祝万先生借得国币一千元，又代换五百元，共不过一千五百元，五个人用到此地尚余大半。因此李专员、

彭指挥、王专员先后赠我路费，皆没有再接受。实在沿途承受朋友们的好意已经很多了。

王唐诸公道别去后，船快要开，忽然在我铺位旁边坐了刚上来底一位客人，短装如工商界人，以帽压额，虽在灯影恍惚之下，我却已看出是久柄广东政权，威名赫赫的陈济棠。我们在港皆确知他陷在港没得出来。而在澳门以及沿路皆听说他被敌人拉去广州。并传说已到南京出任军委会副委员长。他能脱险回内地，不独他个人之幸，亦是国家之福。我忙指给身边底陈君看，低声问他是不是陈济棠。陈君看了，亦说象他。但我和陈济棠原相熟底，此时我看他，他却不打招呼。我不看他时，他又偷眼看我。这明明是他无疑了。不过他既不愿人知，自不便和他答话。

入夜，他又迁了舱位，不再看见。次日上午船上帐房来向我说“陈老总”相请。果然是他，请我去谈话。他说：昨夜原已看见你，现在梧州快到了，再无问题，我们可以谈谈罢。据谈，他因未得乘飞机出港，即于战事中改装隐蔽。战事休止，1月12日离港到大澳，虽家人部属亦不知。从大澳经朋友护送走中山顺德新会鹤山高明各县的乡间，不经过任何埠口而达肇庆底。由肇来梧之前，却已托人致电梧州梁专员朝玑，请其派船迎接。

不一时，果见梁专员乘了电船来接。他便邀请我和陈君等同上电船，很迅速地到了梧州码头。梁

专员招待我们在司令部内休息用饭，并马上打电话报告桂林李主任（济深）黄主席（旭初）。他自己亦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明一时尚不来桂林。我亦就便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我不久可以到桂林。

陈公（指济棠）确乎有病，从形容上完全可以看出。他自己说“百病俱发”，虽言之或许太过，但不休息不调养不行了。他摆脱政务（他是中央党部常委兼农林部长），决计去茂名（广东高州）静养，我认为是一明智之举。当晚（26日晚）他留于梧州，而我们询悉有开上水的船，即托梁专员代订船位，饭后上船赶程西进了。

## 八　脱险后感想

以上所述，到1月26日梧州事为止，是在贵县朴园休息期间写记下底。本来脱离港澳已算脱险。说得宽一点，则说到广东接近敌人的区域，如肇庆（距敌七十华里，仍不时打炮，）便可。到梧州就无险可言，故梧州以后不必详叙。

梧州以后，大略言之：27日晚抵桂平，即刻换船；28日下午抵贵县。以同行友人陈君是贵县人，即借他亲戚家的朴园小住数日，此时同行他友均已分手。2月3日同陈君搭汽车到宾阳，4日到柳州，当晚搭湘桂铁路夜车，5日天明就到桂林了。

这一段路同样地亦到处得朋友帮忙，招待，欢送，不要我自己费一点事。

至此再无可述，要述我自己的感想给你们。

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了！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那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走东江一路的人最多，被劫亦最苦）。我不独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带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第二个感想便是：到处得朋友帮忙，人人都对我太好。譬如遗弃的衣物偏有人同我带来，不是一例吗？如上所述，从头到尾的经过，不全是这种例证吗？同我在香港的只有张先生（云川）是你们熟习底。其余多数你们都不认得，即在我亦是新交。离港前夕，张先生以未得同行照料我，颇不放心。我即说：你尽放心，天下人识与不识都会帮忙我的。尽我身边，一无家人，二无亲戚，三无故旧，却以人人对我好的原故，正与家人亲故同处无二，此番脱险更加证明了我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便是尽一分心，收一分效果。这是从我和广州第一中学的关系而发生底感想。一中

学生多是两广人，在两广每每遇到人便谈及我在一中的一段事。（最近又遇到坪石中大农学院一位赵教授，他开口便说：你到坪石来，我们那边一中同学甚多，他们会欢迎你底。）好象我和一中有很深很久的关系一样。其实我任一中校长只半年而已。不过，我却曾为一中尽了一番心。我于十七年（1928）7月接任校长，那时的一中腐败不堪。但亦难怪。因为从十五年（1926）6月起，两年内更换了七个校长，平均每任不过三个月多点。我接任后，逐渐整顿，在12月提出全部改造方案，转年（十八年）实行，到实行时，我便离粤了，但全盘教职员则一个不动，由黄先生（艮庸）继任校长以代我。一切事情都是黄先生、张先生（俶知）、徐先生（铭鸿）主持。自十七年经十八年，十九年一直维持到二十年夏秋间，这一般朋友才离开。改造方案（原文见《漱溟卅后文录》，商务出版）得以执行，而且稳定下去。所以便能建立根基，遗留于后来。然而就我自己讲，实不曾用许多心血精力于其间。不能不令我叹息，尽一分心，居然亦收一分效果了。

## 九　处险境中我的心理

最后要说我处险境中的心理。我不只是一个从

外面遭遇来说，最安然无事的人；同时亦是从内心来说，最坦然无事的人。外面得安全，固是幸福，自家心境坦然，乃是更大底幸福。——试问一个人尽外面幸得安全，而他心境常是忧急恐慌底，其幸福又有几何呢？

二十八年（1939）我去华北华东各战地，出入于敌后者八个月，随行诸友如黄先生（艮庸）等无不说我胆子大。因为不论当前情势如何险恶，我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旁人都有慌张的时候，我总没有慌过。此番在香港炮火中，以至冒险出港，凡与我同处的朋友亦无不看见的。所以同行范君等，一路上就禁不住称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若无其事”这一句话，我记得他不知说了几次呢！

范君叹我“若无其事”，亦是兼指我身体好，修养好，耐得辛苦忧劳。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并不强的人。不过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当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而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

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试分别解说一下。

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作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你们年纪虽小，亦可看出。我栖栖皇皇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而晓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我自己。

又假如我虽用心在大问题上，而并无所得，自信不及，那亦就没有何等关系。但我自有知识以来（约十四岁后），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至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这成熟的果实是：

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

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前者必待《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写定完成，乃为尽了我的任务。后者虽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我努力的什么》（最近在香港发表）三书出版，已见大意，仍有待发挥和奔走努力，以求其实现。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一般朋友在港，时刻感到生命的受威胁。不独为炮火无情，更怕敌人搜捕抗日分子。所以我们偷渡出来，到达澳门旅馆的一夜，同行友人都色然而喜，相庆更生。然我只报以微笑，口里却答不出话来。因为我心中泰然，虽疑虑的阴影亦不起，故亦无欢喜可言也。又我身上的名片，始终未曾毁弃，到都斛时，随手便取出应用。正为我绝不虑到遭遇敌人搜查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何谓天命？孟子说的明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事都不是谁要他如此，而事实推移（时间的），机缘凑合（空间的），不期而然。察机缘之凑合，来自四面八方；寻事实之推移，更渊源远

至无穷。这其间没有偶然，没有乱碰，于是就说作“天命”。而事之关系重大者，其推移似尤难得恰好，机缘尤难凑拢，一旦或成或毁，就格外说他是天命而非偶然了。

我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包涵有两层意思。头一层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假如我是一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从推移凑合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没有中变了）。——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再一层是：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的意思。前一层偏乎人的要求（主观），未必合于天的事实（客观）。事实结果如何，谁亦不能包办得来。万一推移凑合者不在此，而别有在。那末，便是天命活该大局解决民族复兴再延迟下去，中国文化孔孟之学再晦塞下去。我亦无法，只接受命运就是了。或者我完全看错了。民族复兴，并不延宕，文化阐明，别有其人。那怪我自己糊涂，亦无所怨。——这一意思是宾，是对前一自信的让步而来。

总之，我把我的安危一付之于天，不为过分的计虑（自力所不及，而偏斤斤计虑即为过分）。我尽我分，（例如尽力设法离险）其余则尽他去，

心中自尔坦然。在此中（在坦然任天之中），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极明且强，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

我处险境中的心理，大致如是。若看了不甚了解，待他日长进，再去理会。

后记：此文原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指《处险境中我的心理》一段）。但既然被友人拿去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亦不须再阅。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

# 寄两儿的两封信

# 信之一

宽想两儿：

日前寄你们一信，内附南京田先生信，计应先此到达。宽1月29日来信，内附青岛、广州两信阅悉。兹先答复宽前次及此次所提问题，然后再谈其他琐事。

宽前问我为何认他求学已上了道。不错的，对你确已放心了，不再有什么担忧的。其所以使我如此者，自然是你给我很多印象都很好，非只一时一次，亦不可能一次一次来说。总括言之，不外两点：一、你确能关心到大众到社会，萌芽了为大众服务之愿力，而从不作个人出路之打算。这就是第一让我放心处。许多青年为个人出路发愁，一身私欲得不到满足，整天怨天尤人、骂世，这种人最无出路，最无办法。你本非度量豁达之人，而且心里常放不开，然而你却能把自己一个人出路问题放开了，仿佛不值得忧虑，而时时流露为大众服务心

愿。只这一步放开，你的生命力便具一种开展气象而活了，前途一切自然都有办法了。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你个人出路亦早在其中，都有办法了，毫不成问题。）二、你确能反省到自身，回顾到自家短处偏处，而非两眼只向外张望之人，这就是让我更加放心处。许多青年最大短处便是心思不向内转，纵有才气，甚至才气纵横，亦白费，有什么毛病无法救，其前途亦难有成就。反之，若能向自家身心上理会，时时回头照顾，即有毛病，易得纠正，最能自己寻路走，不必替他担忧了，而由其脚步稳妥，大小必有成就，可断言也。

培恕可惜在这两点上都差，（他虽有热情，但一日十二时中其要求似是为他自己的要求多，）我对他便放心不下。更可惜他的才气你没有，若以恕之才而学得这两点长处，那便不可限量了。

宽此次问：学问与作事是否为两条路，及你应当走那条路，好象有很大踌躇，实则不必。平常熊先生（熊协先生——编者注）教育青年，总令其于学问事功二者自择其一。择取之后，或再令细择某学某事，这自然很有道理，亦是一种教法。但我却不如此。假如你留心看《我的自学小史》，看《朝话》，应可觉察到此，我根本不从这里入手。

但我是经过想走事功一路那阶段的。此在自学小史内已叙及。因祖父痛心中国之积弱，认为文人所误，所以最看重能作事之人，极有颜李学派之意

味，自小便教我们练习作事。因此我曾一时期看轻学问，尤看轻文学哲学以为无用。其后经朋友矫正（见自学小史），破此陋见，乃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当出世之要求强，则趋于佛法，不知不觉转入哲学，固非有意于研究哲学也。当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而解决社会问题之要求强，则四方奔走（革命、乡村运动、抗战、团结）不知不觉涉足政治界，亦非有意于事功。及今闭户著书，只是四十年来思索体验，于中国旧日社会及今后出路，确有所见，若不写出，则死不瞑目，非有所谓学术贡献也。说老实话，我作学问的工具和热忱都缺乏，我尝自笑我的学问是误打误撞出来的，非有心求得之者。

你自无须循着我的路子走，但回头认取自己最真切的要求，而以他作出发点，则是应该的。这还是我春夏间写信给恕和你，说要发愿的话。愿即要求，要求即痛痒，痛痒只有自己知道。抓住一点（一个问题）而努力，求学在此处求，作事在此处作，就对了。因为现在任何一事没有不在学术研究之内的。作学问固当研究他，即作事亦要先研究他才行。举例来说，假如你最真切的要求是替大众解决生计问题，而又认为合作社为最有效之路，即你即应先研究合作，而致力于合作运动。合作研究是学，合作运动是事。没有充分之学术研究，恐怕事情作不好，而在从事之中，亦可能于学理或技术有发

明贡献。即事即学，即学即事，不必太分别他而固执一偏。又如你重视心理卫生这门学问，而发愿谋学此学与中国古人学问之沟通，那自然是作学问了。而其实亦还是一种运动，尤其是要有一种实际功夫，从自己而推广到社会众人，亦未尝不是事功。我以为末后成就是在学问抑在事功，不必预做计较，而自己一生力气愿用在那处（那个题目上）却须认定才好。

以我看你，似是偏于作事一路，即如你来信不说“事功”，而说“从事实际，服务群众，”这就宜于作事之证。说事功，不免有“建功立业”之意，而有此意念在胸，倒未必能建功立业；倒是以“从事实际，服务群众”为心，可能有些功业说不定。总之，你为大众服务作事之心甚诚，随处可见，即此就宜于做事。但究竟作什么事还不知，俟你有所认定之后，当然要先从求此项学问入手，嗣则要一边做，一边研究，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终身如此努力不已。至于成就在事抑在学，似可不管，既有无成就，亦可不管，昔人云：“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也。

我在做事上说，至今无成就。乡村建设虽是我的心愿，能否及身见其端绪，不敢说也。你的路子似于民众教育乡村运动为近，假如我所未实现者，而成于你之手，则古人所谓“继志述事”，那真是再好没有了。不过你可有你的志愿，我亦不以此责

望于你也。

恕不忙去粤，试就道宗同住，在北大旁听半年，再说。

以二百万（指国民党“法币”。当时通货膨胀，法币票额多以“万”计——编者）送四舅母为小晋学费，事属可行。但二舅零用送一些没有？或在二百万中分划一小部分亦可。

父手字　二月八日

忠、璐同阅此信。璐来川否，速决勿延误。

（宽恕两弟：师谕阅后请转小宗一读。陈亚附）

# 信之二

前寄恕儿信，希望他取出陶先生（陶行知先生——编者注）纪念册一厚本来看，并嘱他不要忘记是陶先生的学生。他来信总没有答复，昨日曾就恕来信批答。大意要他自觉自决，计应在此信前收到。本来我对你们说话，总不外要你们自省自决，甚少具体指出你们应该如何做，现在我从这一面说一些。

我觉得发愿是根本，前寄恕信似已提及，陶先生可敬处，只是有愿力，他真是有愿力，旁人均说不上了。你们若有一种心愿发出来，则一切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心愿要出于感触亲切，在自己感触亲切之问题上为大众而发愿，奋不顾身，不顾一己力气单薄，只将大众问题一力承担起来、放在自己肩膀上，心中念念只此一事，则凡百问题都成小问题，都不成问题，都不费力而解决。一则因为相形之下，其他问题自然小了，一则因为解决问题之智慧与勇气却不知不觉大了，就在这一面缩小一面长大

之情势下，再无什么事纠缠你，使你困于碎屑，使你犹豫忧闷，你自然而然，从内里生出力量来，象是培恕学画不学画，入新闻专科不入新闻专科，象是培宽如何求学，改系不改系等等问题，将无困难重压之感，并且把事情看得很活。

所谓自己感触亲切之问题，举例言之。如武训感触于自己没受教育，看见大多数人受不到教育，而发愿之类；如陶先生决心改造教育，普及教育，把偌大问题，放在自己肩上，一心干去，不问成就；又如道宗学政治，不知其出发点是什么，假如他感触到中国几十年内战内乱不息，老百姓之苦不堪言状，总解决不了，总无出头之日，而奋然下大决心，要弄明白，中国之乱到底为什么乱？为什么政治不能走一条路去？我一定要弄明白它，我一定要把中国之乱解决它，使全国人享受到安居乐业，那么，他就是发愿了。

此时只见问题，不见其他，专心致志，坐卧不离。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眼光放远，而起脚不妨自近处起脚，胸怀胆量放大，而做事亦不忽略碎细、心里绝不焦急。但心思亦不旁骛，于是在学习上自然滴滴归根，一切见闻知识都归到这里，不知不觉系统化、深邃化。此时学问亦绝不再是书本上学问，而自然是自家的心得了。

我想你们的问题都应该从这里求解决，不要支

支节节，不要左思右想，只有自己真发愿之一天，才是真有了自己的一天。此寄宽恕两儿，念之念之。

父手字

五月十二日

此一九四六年春间（经复核以上两信实写于一九四八年，时在重庆北碚——编者）写寄宽恕两儿书信两通，于今检视盖不觉忽忽二十六年矣。计其时愚适以参预国内和谈，先（二月）则在重庆，后（五月）则在南京，两儿则在北京谋升学中，多有书信往来。此两信寄出后即不复省忆，不意其乃为儿辈所保存，全国解放后愚来京，家于小铜井旧居，儿辈或求学或工作均不随我同住。但各有一部分书物存放家中。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小将来抄家，一切书物（连同儿辈之件）无存。比及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迭经领导上为我查寻，前后有所发还者三次。顾书籍衣物什九不复可得，而此两信竟杂于乱纸堆中检得之，非所意料矣。审阅之后似觉可存，因付装裱。窃谓二十六年来国势升进变化最大，要以全国人思想暨作风之变化为其根本力量所在。方我写此信时，犹是国民党的天下，凡后来盛倡之毛泽东思想尚未有闻，而信内思想倾向隐然若不相悖，是可以自慰者。若加校核，信内述熊先生教育青年

必当于学问事功二者择一，未免意图个人成名成家，良非无产阶级思想。然我未曾取之。其有不符合者独在称引及武训之一点乎？是固由于我夙乏阶级观点。我之言发愿，原本佛家而来。人或不知，必须自白之。

一九七二年三月漱溟识于装裱后

**附注：**

信内有陈亚、子温附加字迹。子温者侯生思恭，先从学亚三，后则俱从我于邹平。抗日战争既起，随同我入川，成立勉仁中学于北碚，两人同任教其间。而陈之子道宗与培宽、培恕则皆为中学学生。方宽恕在北京、道宗亦同在，故尔附字云云。亚三自北大哲学系以来，从我数十年，讫于一九六五年而身故。子温乃更早二十年故于北碚。言念亡友，不禁怃然若有所失。

八十健叟漱溟再识

# 再访延安

1938年1月初我曾去延安访问。那时抗日战争刚爆发不过半年。1946年6月，这时抗日战争已结束将近一年，我又一次访问延安。

先要说明此次去延安的动机。那是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开过后，我宣称不参加将要组织的联合政府，为求得中共方面的谅解，而去访问的。

旧政协会议自1946年1月10日开始，至30日闭幕，按照协议来说，应该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然后依宪法选举总统，步入正常政轨。闭幕前夕共方周恩来代表将自重庆返延安请示然后签字，特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交换意见。此时我预先写好给毛主席一封信，即交托周公带去，表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从事思想言论工作，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许。毛主席手答一信，经周公带回面交于我，略谓参加政府与从事言论工作不相妨碍。周公面语尤见严厉。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敞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他还说：如果知道信里是这个内容，他就不会将信带去延安

了。而我一面在报上先后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文表衷怀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要知道，当时旧政协所通过的将实行的宪政是出于张君劢巧妙设计，为国民党所同意，为共产党所同意，为民盟内外各小党派所同意，唯独我一人却认为其不可能行于中国。此宪政是以美国政制为蓝本，而形式格局上袭取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美国政制原是我少时在清末所梦寐以求者，入民国后即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具见1931年发表的《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时节各方都同意之下，我一人无法持异议，只有闷在心里。但要我随众参加实施其事，又岂可能。在缺乏眼光的各方面去实行宪政的时候，我个人要退出现实政治，站在批评立场，发抒夙怀意见，自属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主席他们倾吐此中曲折。

彼时重庆延安之间的来往全赖美国军用飞机。美军人员即有驻北平（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者，亦且有两人驻延安。因此在交通上就多所借助于他们。我便是经周公代为安排成行。记得同行的全是中国人，先到北平，次日乃换飞机去延安，同机有肖克将军等共方人员。飞抵延安时毛主席在场接待。我随他一车至枣林他的住所休息用饭。据闻毛主席方在病假养息中，刘少奇被称为代主席，似乎例行公事一付于刘。我为增进共方朋友对我的了

解，在我倾吐积怀时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主席允为约集十人听我谈。后来会谈座中记得有任弼时，其它识或不识，现在不尽记忆。

我陈说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主张分两段说。先就彼时政协所协议的宪政，申论其必将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年三年，或许一年就失败。——附带说：毛主席却仍然亲口对我说，他准备搬家到苏北清江浦；他将住在清江浦，而遇中央政府（指组成之联合政府）开会时去南京一行，似乎假定宪政能施行一时。——大局到两党合作的宪政失败而别寻出路之时，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当然不到那时，不必考虑。

关于学英美式宪政必将失败的话，今可不多谈。我预备的方案隐约有一个前提，就是蒋介石的死，或他失势下台。话不好明说，而当时竟被任弼时觉察出来，问我："你是说要待蒋介石死了吗？"我点点头。此公聪明，在建国后不久便故去，真是可惜！

继续谈我预备的是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党垄断之局，亦非多党互竞，而是多党的合作。而蒋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敌。蒋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国仍然名亡实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当时我固未料中共一方能以兵力驱除之，竟尔奠定人民民主专政之局如今日者。我当时只就常情常识申说我怀抱的见解主张。

我的主张根据我对中国当前问题的认识，而当前的中国情况则基于过去中国社会本质上（组织结构上）有所不同于世界他方。这原是八年前我第一次到延安曾和毛主席往复辩论两个通宵未得解决的老问题。那时他说我太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忽略中国社会仍然有其一般性；我则反责他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过于偏重从一般性来看中国。实际上我此时要陈说的主张，仍就是八年前曾经提出的那一建议。不过今天所见更逼真，筹思更加成熟了。

八年前那一建议就是要国内各方面（主要是两大党）从当时的团结抗敌前进一步，而确订合作建国之大计。其入手即在“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两大问题上交换意见，互相磋商，订定国是国策。此事如有成果，其第二步便是由一向分立对抗的各党派转化的协力合作建国的一个党派综合组织。

政治上的奔走活动必然产生党派，党派的组成客观一面是各有其社会基础（例如阶级性、地域性、行业性或其他），主观一面是各有其主张要求。然而大前提更看中国人面对的是什么问题。问题来自外抑或在内？国家危亡是其第一问题，所以救国运动是其存在于实质上的共同点。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应当彼此合作，不应该互相仇视。但国家危亡有其内因，改造社会本身又属必要。从而每每

彼此立场不同，又落于分立乃至对抗。抹杀其不同是不好的，亦是不可能的。这就客观上决定在合作中莫强为混同，应当有合有分，顾不说联合而说综合者，所重在合也。

彼此协力合作来对外或较易，协力合作来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岂易言哉！如我筹思，要综合各党派成立一个组织体，以负起救国建国任务，是必切实注意循行如下各原则：

一、各党派在订定国是国策时交换意见，应只就每一具体的现实问题说话，避免涉及各自夙怀根本思想信念。即是：各方原不免各自有其哲学思想或主义信念为其当前意见主张之所本，却应避免谈及。

二、彼此交换意见应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即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彼此间的分异原易突出，却应各自保留之，而只就如何解决，或如何应付此当前问题的方法政策上，求得其归一为止。

三、各党派在建国的远大目标上殆莫不倾向社会主义，纵然所谓社会主义者，彼此非定一致从同，仍不妨订定下来。盖既为远景，固非现时所必争。

四、在头一次国是国策订定之后，随时就当前问题不断地赓续进行商谈修订，只要各方同意，不须拘执旧章。

以上所叙非我当场发言原词，却是我筹思很久

的要义。

继此而申说的便是党派综合体不负行政之责，而居于监督政府执行政策的地位。我于此窃取了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之说。政权在民，党派综合体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国人民立场执掌政权者，而以治权付之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即通俗所称政府则忠实于政策之贯彻实施（在实施中如有意见可随时反映给党派综合体）。如此两下分开是万分必要的，是党派综合体自身恒保持在一致立场上所必要的一大前提。否则将导致党派间的闹意见而动摇根本。

当时座间毛朱二公颇用心听我发言，毛公无表示，朱公当听到我末后的话时，忽曰："此或三十年后的事吧！"此外无人置一词。

次日毛主席又约集其同志数人与我会谈，其时因有蒋方不尊重协议之宪草而多所改动之讯，毛主席说："他（指蒋）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个！"关于改动宪草事盖出于政协国民党首席代表孙科等备受其党内诟责，孙同政协国民党代表邵力子二人向周恩来代表再三恳求修改。周公商之张君劢在三大问题上分别作如下之让步：（一）国民代表大会从无形（指全国公民投票）复归有形；（二）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得对行政院为不信任投票，改为对总统负责，并删去立法院的不信任投票；（三）各省得制订省宪

改为制定省自治法规。如此重大问题在各方取得协议后岂得再改动？然而在野方面却居然向国民党退让了。中央通讯社高兴地大肆宣扬。延安方面吃惊不小，急电促周公回来作报告。其报告和讨论的会，我一个党外人未便参加，即于次晨飞回重庆了。

这次再访延安，除了谈话，还下乡参观南泥湾等地，同时为了候周公自重庆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协政治协议的改动情况，在那里前后逗留了十天之久。第一次去延安，未曾见到刘少奇同志，好象当时他在前方。第二次去见到了。还记得他和彭德怀二位的住处与我的临时住处相邻，我还去回访过他们。陈绍禹（王明）也曾来过我的住处，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别后一场大病初愈。陈作为共产党在参政会的代表之一，重庆会内会外我们常可碰见。在这次访问中，朱德同志还向我提起当年他德国留学后途经莫斯科回北京，曾想访问我而未成的事；想访我是由于他在德国留学时的朋友孙炳文烈士的建议，而孙是1912年我在《民国报》工作时的该报总编辑。现在我名字中的“漱溟”二字，就是他从我那时笔名“瘦民”的谐音，首次改为“漱溟”二字，题写在我的扇面上的。孙炳文兄的夫人任维坤（人称“妈妈同志”，孙泱和孙维世之母；孙泱与孙维世兄妹均死于“文革”中），这次访问中也见到了。任维坤也是当年在《民国报》的同事，她是报社中三个女编辑人员之一。

# 再忆初访延安

1938年初我第一次访问延安的经过，见闻和收获，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第五节《访问延安》里，已有较详尽的记述。因为事隔将近半个世纪和年老记忆力衰退，关于此次访问的种种情况早已记忆不清。但有几件事，在经历了数十年之后，至今仍留有较深的印象，值得补记于后。

## 互不相让的争论

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又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已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我对他说，我过去有一个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谈起认识老中国，他当然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我就说，老中国社会与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形的阶级。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之

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对抗，老中国不明不强；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因而不是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对如何流转相通，我又举了许多例证来加以说明。当然他也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他的论点。可是谁也不曾说服谁。到末后，他就这样来结束这场争论：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他社会相似的一般性。我当即回答道：一个人都有他的一般性(例如他是个成年人)，你只说他是个成年人，没有点出他的特殊性（例如他是个学问家)，就等于没有说一样。所以你如果不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就等于没有说一样了。

彼此之间的争论，以各已依旧坚持自己的见解而结束。

争论激烈，观点绝然相反，又各不相让，不动气似不可能。但我们的争论自始至终确实如此。由此可见他的气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后，似彼此心气相通，毫无隔阂之感，而且心里觉得有一种满舒畅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心情，退出他的住室。这时室外东方天色微明，已是方将破晓的时刻。

## “走的是改良之路”

为了求得他对我的观点主张的了解，去延安时

我特地携去了我写的几个小册子，还有几十万言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奉求毛主席指教。在看过我的书的次日，毛公出示他阅读时所作的许多条摘录。这些摘录是用秃笔横书在粗纸上的。他指着说，这些见解不无是处，例如不搞上层表面文章"宪政运动"等，又例如改造社会从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也是对的，等等。然后他又说：梁先生！你是个宣传家哩。我迟疑未晓其义。于是他说：凡是想要以其道易天下者便是一位宣传家。

看了我的著作以后，当然他也给予了许多批评。这些批评的话则不曾用毛笔书写在纸上，而是口述的。据我记忆，批评的话大意是说我的主张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不彻底；走的是改良之路，而非革命之路，等等。

## "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

在延安前后共盘桓了十八天，参观了许多地方，短叙长谈又用去了不少时间，访问终于结束了。我又将自延安返回西安，再转往其它地方。在临别时，毛主席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后来我找来读了，觉得是好，虽然有些地方我不完全懂。待解放后，我才知道过去虽然读了不少马列的著作，但很

不够。后来多读了一些，理解得也更多了一些了，便感到自己早年著述中对共产党的理论多有批评或斥责是错误的。现在再将这类批评斥责的语句翻检出来看，于是有所省悟，因而在其中一处批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 此文写于1930年，其时吾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语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过。
>
> 一九六五年五月梁漱溟识

多读一些马列的书，还使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衷心的敬佩，特别是佩服他们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它与美国的欧文和法国的傅立叶不同，高明的多。欧文和傅立叶都倾慕社会主义，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向往社会主义，可是马恩是指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自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规律，这与仅是主观上倾慕向往理想的社会大不相同。

（培宽整理）

# 纪念蔡元培先生

——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一九四二年三月）

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属为纪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余个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民五年，即1916年），清室复辟运动（民六年，1917年），此覆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

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作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钜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象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

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

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1917），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七八月三期，后来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此论之作盖兴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那时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渡美舟中作，发表于《东方杂志》），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士钊）。适章先生奔走倒袁离沪，为蒋竹庄先生（维乔）所得，付《东方杂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继，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由海外返国，我以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读到蔡先生的《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蔡先生为阁员，见过几面）。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那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

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锳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的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锳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暴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住，其祥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难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廿六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近中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到北大时，实只廿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

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它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本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到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掉换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十二（1923）及十三年（1924）上半年，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此固一时一时风气不同。然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

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作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尝说的一句话："是真虎，必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距余之离开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而余亦寝寝五十之年矣。自顾尚无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窃不敢妄自菲薄，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

之成果焉。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因纪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励。

**附记**

此文写于民国卅一年，即1942年；一九七〇年忽于乱纸堆中发现吾手稿原迹，计经廿有八年矣。既审视其不无可存，则重为抄录一通，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

文中说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极广博之兴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试举其一。尔时（约在1927年）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广济寺，任人听讲，蔡先生时出掌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拨冗偕友几次往听。其实张先生信佛虽笃，却不通唯识，其错解可笑，愚著《唯识述义》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

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曾及1923年——1924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习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注：同学中有彭基相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夙示反对。）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讵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8日记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11月8日又记

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廿四岁，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唯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而泛及于其它系科。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麐则理科，如黄艮庸则

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何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星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识

# 纪念梁启超先生

（一九四三年一月）

今天为梁任公（启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张旭光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去年漱自香港返桂，尝应友人嘱写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辞。纪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复自道其知遇之感。今为此文，大致亦同。

## 一、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从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网罗，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

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却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象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即1913年；民国六年，即1917年，两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1919，1920）后，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因此，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

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此正任公之特异处。

《陈伯庄通讯》
（《思想与时代》，第十三期）

这是很对的。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象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

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 二、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纪念前贤，亦许应当专表彰他的功德。无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说一说。

清季政治上有排满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符合。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自然当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独尸其咎。却是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时，有奋起倒袁之举。在倒袁运动上，先生尽了最大力量。假如说创建民国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这次再造共和，却不得不让他的一派居首功了。当日事实自有史家载之史乘，兹不多述。这是任公先生的政治活动对于国家第一度伟大不磨之贡献。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丧，袁倒后先生治丧持服，未得出而秉政。于是种下了民国六年（1917）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这里面还夹着一段反对康（有为）张（勋）复辟。信有如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对于国家的贡献。

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末学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 三、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于先生二十岁。当他二十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岁创刊《新民丛报》亦还不行。直待我十五岁，好象《新民丛报》已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约五六百万字以上），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十八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文集》，而原报殆不可得。那其中还有旁人许多文章和新闻时事等记载，约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无多，我读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却同深向往。民国五年（1916）曾因范静生（源廉）先生介绍而拜见蔡先生。但对任公先生则未曾求见。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国九年（1920），任公渐渐知道我。一日

忽承他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民国十四年（1925）我编印先父遗书既成，送他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我写信特指出这段话，请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注：任公先生此一回信附后）。

十八年（1929）春上，我在广州闻任公先生逝世之讯，心中好大难过。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访（先生著作关于佛教者恒以初稿，见示征问意见），而我未有以报。第一，他奔走国事数十年，所以求中国之问题之解决者甚切，而于民族出路何在，还认不清。第二，他自谓服膺儒家，亦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而实没有弄明白。我于此两大问题渐渐若有所窥，亟思以一点心得当面请正。岂料先生竟作古人，更无从见面谈心，只有抱恨无穷而已。今为此文，虽时间又过去十多年，还是不胜其追怀与感念！

附：任公先生十四年答漱溟信

漱溟宗兄惠鉴：读报知　巨川先生遗文已哀辑

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情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原注：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澈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即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忙。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覆奉谢，不宣万一。启超再拜。十月一日。

# 我的努力与反省

## 一　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处理

去年十二月大公报和进步日报邀请好多位先生开的批判改良主义思想座谈会，其发言讨论经刊布在报纸的，我都看过了。我个人的情形和发言的几位先生不相同。因此我现在所讲的话亦就不同。他们都是留洋学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求过学，而且差不多全是学社会科学的，所以他们就多从改良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前后发生的来历如何，类别如何，这面来说。我既没有去过欧美，又不是什么社会科学家，但我曾从事于一种社会运动，我将直接了当来讲我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讲外国的书本上的那些。

前写《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一文（在以下还要提到此文时简称《前文》），曾说我从不相信自己是改良主义，总不喜欢旁人向我宣传革命。当真的，假如不是今天有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我始终会认定我走的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之路，始终不会发觉自己是改良主义。在今天勘对起来，我之为改良主义，已无可否认，这实在是自己当初所不

料。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呢？这并不出于理论上的浮浅错误，而是有着其思想根源的。本文即在此分析检讨。

在理论认识上我对于下列三点都是很清楚的：

> 第一点，我确认社会非有其本质的变革，如从中古封建社会变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或从资本主义社会变到社会主义社会那样，就算不得革命。
>
> 第二点，我确认要完成如上所说的革命，非变更政权不可。那也就是说，非使政权——国家权力掌握在革命一方面不可。
>
> 第三点，我确认要使国家权力转移到革命一方来，大致非经过暴动流血武力斗争不可。总起来说：如其不是这样，就难免于改良主义，特别是第一第二两点最要紧。第三点其可能有的例外机会亦甚少。

以上说的这些，可信都没有错；论起来是不致于把改良误为革命的。譬如我对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早料到它不达成社会主义不止，多年来便提出“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两句口号。这显然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而有合于第一点。同时在问题如何解决上，我亦始终没有那种“教育救国”一类思想，而是强调第一必要

解决当前政治问题。这在第二点上就没有错。在第三点上，我不走武力夺取政权之路，却非自认为是其少数可能的例外。我乃是自始认定中国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因而中国革命应当别论的。

我的错误，实错在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

中国问题本有其特殊之处。例如下列三点我至今不放弃原有的意见：

（一）中国问题的历史背景特殊——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二）中国问题的文化背景特殊——秦汉后的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的，它没有构成阶级统治，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其所以没有革命正由于此）；（三）近百年世界大交通后乃引发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的，而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末一点正是从前两点而来。

我这"中国特殊论"似不为今天思想所许。然而我自己还不曾发觉其错误。——这或者尚有待于朋友们的帮助。据我自己检查得错误，亦即本文所要论说的，乃在我从这一特殊论的根柢上，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下列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处理：

（一）我判断中国在一九一一年后，为了完成中国革命所需要解决的政权问题，不再是政权属谁的问题，如象一般要使政权归于某一

革命阶级那样。其问题乃在政权分裂、单弱、不固定；换言之，亦就是没有统一稳定的国权。只需有了统一稳定的国权，就能完成中国革命。——这一判断今天看来完全似是而非。

（二）由于以上的判断，我虽极强调解决当前政治问题为第一必要，却全然无意取得政权，而把功夫用在力求如何使散漫的中国社会联成一体，有其明朗的一大要求可见，以为树立国权之本。过去我所作的乡村建设运动，以至抗战中和胜利后所有为国事的一切奔走活动，都是作这个功夫。——这一处理当然又似是而非。

唯其似是而非，所以不革命而自以为革命。同时，对于始终不忘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虽同情它，却不同意于其路线，常抱着一个容纳共产党而修正共产党的想法。我就是这样执迷不悟了好多年。

以上的话似太抽象，必须把我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那一些具体的东西择要排列出来，而后读者才晓得其所指；这将是本文进行的第一步骤。其次便要把我所以这样判断问题和这样处理问题的由来说出；这将是本文进行的第二步骤。第二步骤只不过扼要叙出其似是而非之“是”的一面，还必须分析其似是而非之“非”的一面，并寻出其思想根源，才算到题。这将是本文进行的第三步骤。

以下就按这三个步骤进行。

## 二　抗战前的言论和行动。

第一步，从我过去的言论和行动举出实例，以见我对中国革命问题是怎样判断和怎样处理的。

例如旧著《乡村建设理论》第三〇八页上说：

> 中国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崩溃，而其苦闷之焦点则著见于政治问题之没法解决；假定于政治问题的如何解决没有成竹在胸，而谈其他的，都是白费。

又如旧著《答乡村建设批判》第十三页上说：

> 既然要对外求得民族的解放，对内完成社会的改造，那就必得建立能尽这任务的政权，那是没有疑问的。

其他类此之例多不胜举。这就见出象列宁所说革命基本上是政权问题的话，我们何尝不懂得。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以解决政权问题，从来不说他们不该这样做，而只是说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达不到目的。例如《乡村建设理论》第四四一页，讲到解决土地问题时，原文有这样话：

> 至于共产党的作法呢，倒亦痛快，只是于

大局无补。——他们若建得起政权来就有补。

又如旧著《乡村建设理论提纲》第十四条第二款：

> 中国社会一向散漫流动，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现在仍未形成阶级，即便倡导斗争，亦斗争不出结果来；结果乃指一新政权的建立。

再看提纲第十六条第二款：

> 依通例，应以社会改造运动的团体（革命党）掌握政权，施行建设，完成社会改造，中国亦不能外此；但以中国革命本质的不同，社会形势有异，所以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随之而两样。

这就点出我是在中国特殊论的根柢上，否定了一般革命之路，而另自提出中国所应走的路线。其一破一立、一取一舍之理容待第二步再讲，这里只为这一路线举证如次：

旧著《答乡村建设批判》把这一路线说得最分明，因其从头至尾都是对照着一般革命之路——分化而斗争之路来说的。但仍不外根据原先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来。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上半部——认识中国问题之部，就是分析论证中国问题苦闷的焦点在"政治上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此

即其第五段的大标题)。而在原书下半部——解决中国问题之部，讲到政治问题的解决时就阐明这里没有“政权属彼或政权属我”（此即其第三节的小标题）问题，只要统一稳定的国权建立起来就对了。

如我在《乡村建设理论》所讲，中国政治问题须要分两步解决。树立统一稳定的国权是为头一步。有此统一稳定的国权即可进行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建设一个政治上达成民主主义，经济上达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必须到建国完成，方为政治问题的完全解决，是为第二步。从开头到末尾说作两步，却全靠一个乡村建设运动贯彻于其间。乡建运动实是建国运动；它为自己创造出它在政治上所需的前提条件——统一稳定的国权——于先，又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建设而推进政治的民主化，以至奠立完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于后。

若问乡建运动似不外致力于社会何以竟能收效于政治，则旧著《乡村建设理论》具有解说，而“理论提纲”第十七条至卅九条尤为揭示简明。这里不加叙录。

正因我认定要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必须致力于社会，而不能乞灵于政治，所以在抗战以前那许多年，我都是投身社会运动，先后同朋友们创办了“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出版《村治》和《乡村建设》等定期刊物。为了联合各处乡村运动的团体或机关，我们有“中国乡村

建设学会”之组织，同时并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此外我又随同一些朋友发起而参加了“中国社会教育社”：那是联系一切民众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从侧面推进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团体。

过去我的言论和行动大致可分为抗战前、抗战后两大段落；以上就是抗战前一段的一个大概，以下转入抗战期间以及胜利后来说。

## 三　抗战起后的言论和行动

说到此处，想起一九四一年我在香港创办《光明报》，写有《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恰就是叙述我从抗战起所有的言论主张、奔走活动，从创刊日起长篇连载五十余日，那倒是现成材料，可惜现在难于检觅。（注）这里只能追忆其要略。

对照着抗战前多致力于社会来说，抗战后我在政治上的奔走活动为多。然而其一切用心却依然是从战前一贯下来的。《乡村建设理论》曾有谈到准备抗战的几句话：

> 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尤其要紧的是在调整内部关系，以树立应付（国际）

注：此文现已觅得，并辑入本书。

环境的根本。（原书第四四一页）

这就是后来一切言论行动的张本。所谓“不容易毁”和“被毁亦容易恢复”，指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培养成民族抗敌活力而言。所谓“树立应付环境的根本”指要有统一全国以对外的国家权力而言。这一下一上的两面，相资为用，缺一不可。在战前说，虽多致力于社会（下面），而我眼光所注实在上面（政治）；在开战后说，我虽多为团结统一（上面）奔走，而用意恰在下面（民众总动员）。所谓“我努力的是什么”，即指努力在这相关的两面。自始至终没有离开一步。其事实经过大略数一数如次：

说战后仍须回溯到战前。由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华北紧张（日寇所谓华北五省三市自治运动），山东的乡村工作便转入备战阶段。计划着分期分区训练民众，组织民众，而以集中训练八校师范生下乡担任其事。此工作于三六年一月开始，临到战争起来，却失败了，后有检讨。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夕（五月间），我在成都以《我们如何抗敌》为题作讲演，其内容即在号召知识分子尽力于战时民众动员工作。“八·一三”上海开火前夕，我又发表一长文，题目和内容与前大致相类而计划加详，列举了十四要点，连载于八月十一、十二两天上海《大公报》。其后曾合并印成小册子发布。八月十七夜间，南京政府在中山陵园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的参议

会上，我主张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从事民众动员工作，因而建议改造教育制度。当时胡适、傅斯年不耐烦听，竟阻止我发言，几乎不得尽其辞。十月某日我与晏阳初一同见蒋，指阵民众动员的不够，并称道中共在晋北如何发动民众，颇触蒋怒。移时黄炎培、江问渔两位亦来，又一同陈说。蒋遂嘱托我四人起草具体计划。计划末后是由我负责草成交去。但一面因上海失守，京沪沿线动摇，当局无心及此；更一面因陈立夫长大本营第六部，主管民众组织之事，根本不肯让党外人插手。——这是最主要的障碍。

我的心愿在这一面既不得遂，三八年一月一日即由武汉飞西安转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当时我提议要确定国是国策——把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两大问题同时有所确定——以解决党派问题。毛主席告诉我两大党在武汉正有八个人起草共同纲领，劝我回武汉进行。但我挂念山东（属第五战区）的事情，且与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有约，没有去武汉而去徐州。在徐州住一个月，与散失的山东同人设法联系，并检讨自己的失败而写了《敬告山东工作同人同学书》付印一小册。三月初回到武汉，则蒋介石正为曾想浑全国为一党，遭中共拒绝而恼怒；我解决党派问题的提议又提不出。

此时民众动员工作由于国民党猜忌排外，包而

不办，其问题表见在前方后方是极其严重的。他且不谈，只一个后方征兵问题就不了。征兵变成胡乱拉兵，其景象真是惨极、凶恶之极。我在四川感受刺激，于是再度努力，缩小范围奔走于地方当局、地方人士、地方教育界三方面，想帮助他们把四川征兵事情搞好。我主张这三方面要配合起来，建立系统机构，而以最大注意贯彻到乡村。三方面都乐意接受，并于人事安排、经费筹措都有些准备。十月七日张群（西南行营主任）王缵绪（四川主席）张澜（地方人士）和我四人同飞成都进行其事。没想到只开了一次动员会议，就有人（张云伏黄埔系）公然叫嚣不许外人僭窃领导。会后邵（从恩）张（澜）诸老顿形消极，我一个外省人更无能为力。经过这次又碰钉子后，使我认清了党派问题是一切事情的总障碍。此后用力的方向所以转移到要求团结统一上，实决定于此。

是年十二月我根据自己一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面参以在延安所得印象，提出一个根本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其内容主张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召集全国各方面会商，确定国是国策（相当于共同纲领）。

第二步：建立党派综合体（略同于毛主席所提议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各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的那种组织形式），

为国是国策之赓续不断地补充或修改。

第三步：政权治权划分开；党派综合体代表国民行使政权，而以治权属之政府。政府是代表国家的；国家唯一绝对，政府不能含有党派性。它要忠实于国是国策之执行，不得有一毫出入（我因戏称为“无色透明体”），对党派综合体负责。（附注：分别政权治权是孙中山先生学说之一，而我借用之）。

文章写成交给重庆大公报发表，在送审时被检扣，由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伧和刘百闵当面退还我。他们说我用意甚好，但若发表必招致争论而使党派关系更恶化，反于我初意不合。我无法，只能以我手稿请各方朋友如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李璜等几位先生阅看阅看而已。

当初从南京退守武汉时，我早向人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向西，我要往东，你向南来，我要往北去。如今在后方既无可尽力，我便想到前方去。况三七年那时有一部分八校师范生训练处的同人同学约八百余人，携带枪枝粮款从济宁退入河南，在镇平集中受训后，经向当时政府取得名义，已于三八年秋整队开拔渡河返鲁抗敌，我亦有去照看之必要。于是我一面请求蒋的军事委员会转知前方战区，一面亦托秦博古先生请中共中央转知八路军和新四军，沿途给我方便和照顾。我即于三九年二月

二日成行。当出发之时，未尝没有留于前方抗敌之意。不想到了前方正赶上敌人大扫荡，又逢着“磨擦”开始，踯躅于鲁南山区，辛苦备尝而一筹莫展。同时看到党派关系恶化如此，抗战前途已受威胁，推想各方必然要求解决党派问题，可能就是到了问题解决的时机；所以马上又回转后方。计一往一返共经历了豫东、皖北、苏北、鲁西、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各敌后游击区域，末后于“九一八”回抵洛阳，双十节回抵成都，为时共八个月。此行除增加一些见闻外，可算劳而无功。

## 四　抗战中期到胜利之前的言论和行动

我到达成都和重庆，得悉党派关系恶化在大后方亦同样严重。不过在前方所表见者是武装冲突，大后方却是单方面——执政党方面对党外的压迫箝制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朋友一见面便诉苦，我亦以所看到的抗战危机相告。在问题的如何应付如何解决上，他们一般意见又与我相左。他们便是希望施行英美式的宪政，希望可以多党互竞并存。将将不久开过一次“国民参政会”，便已通过了早施宪政的决议，并且成立“宪政期成会”，容纳各方面讨论“五五宪草”。我到重庆时，重庆满街上都在开会座谈宪政，非常热闹。他们邀请我，我一概谢不参加。我知道这是一场空欢喜，国民党决不会践言。

何况即令当真实行，亦非中国之福呢！我只认定我的路线，作我的团结统一运动。

我分向三方面进行我的运动。所谓三方面就是两大党及其以外之第三方面。记得似是十月廿五日，访问中共方面，会见了陈绍禹、秦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五位先生，从我在前方的见闻说起，说到问题的严重，说到我的意见主张。当我说话时，博古先生就随时伏案作笔录。末后由陈绍禹先生作答，吴、林、董诸老亦各有答语。其详非现在所能记意。只记得在我讲到问题严重时，我就说了一句“军队非统一于国家不可”的话，陈先生马上要回答，我请他莫忙，且容我把话说完。末了我分三步解决问题的话讲清楚了，然后说出军队警察应该是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治权执行国策的工具。此时陈先生表示，你的方案是可以考虑的。后来又说，军队属于国家是可以的，只要国民党实行，我们就照办。诸老所表示，亦都是对我勉励的话。谈话从晚间开始，至夜深人静才分手。

在我访问国民党方面时，主要是同张群的谈话。谈话时间亦达两小时以上，我的三步解决论亦都向他说了。我指摘当时的宪政运动为“文不对题”，他最表赞成。当我强调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时，他转问我：你向共产党谈过没有？他们如何表示？我说：他们表示国民党实行，共产党就照办。张拍手笑说：他们深知国民党不会实行，

所以不必从他们口里来拒绝你的提议，而只须说一句“要看国民党便尽够了。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象我（张自称）这样一个地道军人而从不想抓军队，是绝无仅有的。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命给你？你真是书呆子！”这一席话对我真如同冷水浇背。

我亦晓得要有实力才解决得了问题，但我不相信只有军队是实力。我相信我能代表广大人民要求，便是实力。我要把同我一样要求的人结合起来。所以我的运动原以第三方面——一些小党派和在野闻人——为第一对象。经我在成都重庆两地奔走联络之结果，就酝酿出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来。我说明：在当前危机下，所有两大党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务，就是不许内战起来妨碍抗战。然而零零散散谁亦不配说来完成这任务。只有我们大家彼此合拢来，而以广大社会为后盾；那么，这个力量却不小的。所以当时这个会把两大党以外的所有派系和人物差不多都包涵在内了。为了能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存在，先把会内大家通过的十二条纲领送给张群、王世杰请转蒋，并要求见蒋。原初公推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人见蒋的，后因黄先生去泸州，临时只我一个人去。当时谈话，今不须记；总之，结果算是通过了，可以公开存在。王世杰当时曾问我：这是否一政党？我答：不是的，今天不需要在

既成政党外再添多一个竞争单位。这只是为了求得全国团结，推动两大党合作而形成的一个推动力。

这是三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的事。转过年来（一九四〇），参政会又开会，把宪政期成会所研究出来的“五五宪草修正案”打消，期成会无形结束，那些热心宪政的朋友才冷下来。然而统一建国同志会亦不起劲。当时前方军队火併情形严重，何应钦向参政会作过报告。我据以提出“解决党派问题求得进一步团结建议案”，同志会的参政员即未得全体联署。国民党参政员对我的提案，初时很震动，声言不给通过。但蒋介石却很巧妙，亲笔写了一张字条给我，大意说这是军纪问题，本不能加以讨论的，但你们要讨论亦可以。同时嘱王世杰通知我，提案可以修正通过，希望我不必发言，以免引起争论。其实我原案很简单的，只强调问题应在参政会内解决，建议组织一特种委员会负责蒐集问题研究方案。案子不声不响通过，特种委员会亦成立（却不给我参加），却不发生一点作用。似只开过一次会，听取了秦邦宪先生与何应钦交涉的报告而已。

统一建国同志会并未正式成立组织机构，似半为当时重庆遭受敌机轰炸所影响。那一半自然就是大家不起劲。秋末轰炸期过后，常用一种聚餐方式座谈座谈。皖南事变前夕，聚会较多。四一年一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严重抗议，中共参政员宣言非把问题解决将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的同人出而

奔走调解。就在这期间，又酝酿了“民主政团同盟”。

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是这样的：四〇年十二月廿四日早晨我展看报纸，有新的一届参政员名单揭晓，名额扩充，反而把原来为数极少的党外（国民党外）人士更减少几个。例如章伯钧、陶知行、沈钧儒等几位先生都被排除。所增加的都是他们党内的人。这样引起我对国民党一种非常大的悲观。因参政会本来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党外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偏偏连这一点作用都不留，而给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国民党的没出息可算到家了。大难当前，大局靠什么人来支撑呢？气闷之余，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却巧黄炎培左舜生两位亦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黄老兴奋地站起来说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在互相敦勉的气氛中，君劢即提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他主张先要秘密进行组织并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所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我们一致赞成他的意见，后来事情就是按照这样做的。

关于奔走调停之事值得一说的，就是并不出以和事老的姿态。我们是站在国民立场向两党提出要求。要军队今后脱离党派关系而属于国家，并且要监督执行其事。这是一点。再一点是要检查和督促

那公布已久的抗战建国纲领的实行。为了这两桩事，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包涵各方面的人）来负责。其条文全是由我起草的，并承同人推我和沈老（钧儒）两人征求中共方面的意见。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二公看了条文，表示愿电延安请示。假如双方都同意了，他们就可出席参政会。对于国民党，则公推张（澜）黄（炎培）诸老见蒋，征问意见。蒋的表示竟是满口应承完全同意。其后此事终于不协，其间颇有曲折，这里不叙（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诸同人俱已辞谢调停之任，我自己还声明要一个人单独奔走到底）。

民盟组织的秘密进行，就夹杂在那些为新四军事件而奔走的许多聚会之间。但一同奔走的人并不全予闻民盟之事。统一建国同志会虽可算是民盟的前身，但当时却不是把整个同志会转变成民盟。例如以沈老（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的朋友原在同志会，而此时尚留于盟外。这是因为救国会那时有“中共外围”之称，而民盟的产生却不愿被人看作是出于中共所策动。奔走调停始于二月廿二日，终于三月廿七日；而此时民盟秘密筹备工作亦大致停当。我即于廿九日离渝去香港，为民盟创办言论机关——那就是后来的《光明报》。我离渝前夕，曾密访周恩来先生接头，愿与他们在香港的人取得联系。（注：周答他们驻港代表是廖承志）

我是经过桂林停留一时期才到香港的。在桂林

会见李任潮（济深）李重毅（任仁）两位先生，并得到他们的协助，于五月廿日到香港。“九一八”创刊《光明报》，双十节揭出了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宣言系我属草，送经内地同人核定，一字未改。纲领原所固有，亦经我润饰而内地同人核定的；不过其中第四条经在港同人改动过。这文件很足代表我那时的思想和主张。特别是宣言，读者不难看出纯粹是从要求团结统一出发。

十二月廿五日香港被日寇占领后，承范长江、陈此生等几位朋友相邀结伴逃出香港，四二年一月回抵桂林。

在桂林不觉一住三年（一九四二——四四）。三年总没有闲着，不断同一些朋友在如何改造政局以利抗战上有所策划。特别是末后（一九四四——四五）日寇侵湘入桂，大局形势危急，我们亦愈积极。其间常常在一起，作为主要的几个人，就是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各位。他们并未加入民盟组织，起初亦未建立“民革”（转移到八步后，乃始商定别立民革，以便广收国民党的同志）不过在政治上既有共同要求，亦就不分彼此。民盟同人不多，亦以时聚会；救国会此时亦已正式参加在内；但总起来说，发展不大。重庆、昆明以及湘粤各地同志都不断来往联系。乃至西北象杜斌丞先生等亦曾来桂，共策进行。此时我们与美国人亦有关系来往。因为此时的美国人急切对抗日寇，

深深气愤蒋介石的腐败自私，多所贻误。象史迪威、高斯（美大使）以至驻桂领事林华德等，对于一切想抗日能抗日的中国人都愿帮助的。我们亦曾设想如何在沿海一带配合美军登陆；不过后来尽成虚话。

几乎我们天天在搞，却始终（始于桂林终于八步，首尾约四年）亦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这里亦就无可说。不过有两件事可以征见我的行动方向，不妨说一说。一件事是在一九四二年秋冬间（或者四二年的春间，记不甚清），张云川先生从重庆到桂，传递周恩来先生的一封密信给我，劝我去苏北或任何靠近他们的其他地区，建立乡村建设的或民盟的据点，他们愿帮助我创开一个局面来。这不止是中共方面的意思，民盟同志亦如此希望我。我当时差不多没有什么考虑，就坚决地辞拒了。因我内心上觉得我不能靠近那一边。靠近那一边，就要失去或削减我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合适的。又一件事是在四三年秋初，国民党蒋介石在国内国外压逼之下，重弹宪政老调，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各方面都参加故称协进），自为会长，连电邀我去重庆。重庆民盟同志亦愿意我去。我同样没有什么考虑就坚决地辞拒了他。因我想我在桂林尚且不能作什么，到重庆将更不能动。我以一封长信作回答（信寄邵秘书长力子先生转呈）。信中吐露了我多年来不亟亟于宪政的意思。然后说：宪政虽不急，

而民主精神却为眼前所切需。因为没有民主精神，则团结不可能。宪政恒有其形式条件，故有待于筹备；民主精神是用不着筹备的，只要你实践就是了。今天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在实践不在说空话。

当桂林危急，旧统治濒于瓦解之时，我们曾策划就两广湖南三省相交接的一个地方，展开战时民众动员工作，同时亦就树立对内政治革新的旗帜，号召改造全国政局。这个地方就是广西贺县属的八步，那里有一个行政专员公署可资凭藉。记得四四年十月中旬我同陈此生两人自昭平而东，爬过接米岭一个大高山而到八步，借住临江中学，过着自己烧饭的生活。时局多变，头绪纷杂，盘桓进退其间约近一年（截至获闻胜利之讯）。尽算是苦心孤诣，卒于一事无成。遗留到今天的只一本印行的《战时动员与民主政治》讲演小册（当时在中学分五次讲完的），自己检视几乎掉泪。除了可以证明从头到尾《我努力的是什么》之外，其他什么都说不上。

## 五　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的言论和行动

就在八步获闻胜利之讯的时候，亦获闻毛主席应邀到渝之讯。我心里想，国难已纾，团结在望，过去所为劳攘者今可小休。今后问题要在如何建

国。建国不徒政治经济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认识老中国即莫知所以建设新中国。顾年来务以团结各方为急，未遑对各方自申其所见。今后愿离开现实政治稍远一步，而潜心以深追此一大事。我自己这一决定，在离桂返渝之时，特致函李任仁先生言之。因为他是我年来在现实政治上一同尽力的朋友，所以向他告别。

路经广州才晓得国内大局未容乐观，到了重庆，更知其问题严重。于是不能不从朋友之后，再尽力于反内战运动以至参加了一九四六年的旧政协会议。（在会议分组中，我拒不参加宪草小组而独参加军事小组，一心要为整军问题尽力，还是梦想军队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会议快要成功，我托周恩来先生于其返延安（一月廿七日）之便带一封信给毛主席，申明我年来在现实政治上的努力可告一结束，今后将转而致力于言论思想工作。会议闭幕（一月卅一日）的晚宴上，我又把写好的《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出示在座各方朋友，并面托胡政之先生在大公报发表。其后在大公报又续有《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一文发表，申其未尽之意。

毛主席有一回信由恩来先生带转给我，大意说：行动与言论二者不是不可得而兼的，为什么我要结束了行动而后开始言论？表示不赞成和督勉之意。我的话原是有所指。当时政治协商既已取得协议，随着就要组织各方参加的新政府。所谓我的努

力可告结束，意指国内团结实现了，用不着我再努力，我不拟参加政府。这是一面。同时另一面，我觉得在大局前途上正需要我作一新的努力。因当时各方所同意的那种宪政制度，我根本认为不合中国需要。——这意思在我后来所写《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中曾吐露一些。——我深恨时人思想不出西欧或苏联窠臼。过去为了团结，我一直有许多话闷在肚子里没有说。现在我却要说话了。我要批评到各方面，亦要批评到盟内（盟内各小党派全是梦想宪政）。对于当前政治制度问题，我要提出我的具体主张。所谓致力于言论，意正指此。这显然是以身不在政府为方便的。

恩来先生对我之不参加政府亦表示不能同意。我为了在行动上取得中共朋友的谅解，更且把自己怀抱吐露一些，所以三月十一日访问延安。在延安住了十天。有一次毛主席邀了他们党内要人共约十位，一同谈了一整天。我说明了我对当时政协所拟订的宪政制度的看法。我承认它有眼前一时的必要；但认为它不会适用多久。我肯定地说它最多不出三年必将改弦更张。然后，我提出我的主张来——那就是我在前说过的分三步骤解决党派问题，建立全国党派综合体。我并说：这一主张，只是说在这里，留备将来要改弦更张时一种参考；现在不须要给我若何答复。关于我不参加政府一层虽未多谈，而有此一行，是不难邀谅解的。

我此时的打算是想创办一研究机构，从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上认识老中国的功夫。但时局旋即恶化，没有容我抽身出来，更且把我拖入。四月中旬马歇尔从美国回到重庆，致意民盟希望协助其调停东北长春之争。恰值国民党中央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各政党的中央亦应随之迁京。正有许多事情待办，而民盟秘书长一职却虚悬无人者已经很久。盟内朋友早就要我担任，我一直坚拒不应（周新民先生最清楚），至此终于应承了三个月。我计算三个月或者大局可以归于和平，那时我再作我的事。

岂料不只三个月不行，六个月亦还是不行。从五月初到十月底整六个月，除一度去昆明调查李闻案外，都在京沪间为和谈尽力。（我那时勇于自任的经过情形，这里不叙；四九年夏曾写有《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一事》一文载于大公报，可供参考）。但当我看清楚无可为力的时候，我就拔脚走开了。——我辞脱民盟秘书长，远去重庆北碚，闭户著书。

从四六年十一月到四九年十二月重庆解放，我都住在北碚。《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即于此时写成。这三年正是解放战争期间，许多旧日熟人不加入反动派政府，即归到革命队伍，唯我坚决守定过去一贯的立场和作风，只作缓和斗争的事，反对斗争的事，而不参加斗争。其间言论行动较有关系的，略说于此：

四七年一月一日为重庆大公报写《政治的根本

在文化》一文，最足代表我那时的意思。我一生总在择我认为当时最要紧、最有意义的事去做。一切行动都从这一权衡上而决定。我当时不参加斗争而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积极之义在此。

又三月一日为《观察》杂志写《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最足代表我在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上一向的见解。结末一句话："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道出了我的心事。

五月廿日出席南京的末次参政会呼吁和平。这是应北京、上海、成都各方朋友之约而去的，亦是我三年中唯一离开北碚的一次。六月一日国民党特务在各地方大举捕人，重庆民盟被捕的同人甚多。二日我飞回营救，百般奔走无效。直至四九年三月在国民党要和平的空气中，才得保释出十几个青年来。

八九月间反动政府要解散民盟的前夕，张东荪先生从北京写信给我，说民盟是你辛苦创成，你要赶快去南京上海设法维护。其实我的心理恰相反。民盟在我只看作是一个推动全国合作的推动力（见前），此外没有意义。当时两党大战之时，既不能尽其政治任务，亦难发展自己组织，恰且伏有内部分裂的危机。它最好暂入于休眠状态；一旦时局需要它了，再出来还是完整的。但民盟自己却无法宣布休眠；现在反动政府来代我们宣布，岂不甚好。

我一面以此意答复东荪先生，一面更以此意奉告于上海张（澜）黄（炎培）诸老。到反动政府命令发布，我投函重庆大公报表示的意思亦是这样。同时声明我从此不在组织中了。

四八年除夕我在重庆特园得大公报王文彬先生电话，以蒋介石下野、大局急转直下的消息见告，并问我对时局要不要发表意见。我马上写了一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预备发表。却不料第二天——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只发一要和平的文告，并未下野，时局发展似尚有待。我就把文章交给王先生，留待时机到了再行发出。

我此时却赶忙写两封信：一致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转诸同人；一致中共中央毛周诸公。适有盟友何迺仁先生八日飞沪即托其带去。两封信有一共同点，就是勉励诸先生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声明自己决定三年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其不同者，对民盟则请许我离盟；对中共则请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协的号召。还另有《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的信》刊于大公报，同样声明那一原则，从而谢绝了朋友们希望我出来奔走和平的事。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

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知道国民党是不行了，今后唯一强大势力将在共产党。过去我祈求全国合作，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说话，今后将须对共产党说话。共产党是不好说话的。说话不对他的意，就

可以被看作是敌人。而一经遭到敌视，虽有善言亦难邀好的考虑。只有明白摆出来：我止于说话而不继之以行动，止于是个人而无组织为后盾。那么（没有力量）不足重视，亦或不引起敌视；他就可能放平了心来听我的话，对我的话才听得入。这便是我的一番用心。同时，我知道我此时的言论主张在盟内未必全同意。要我受拘束于组织而不得自由发言，我不甘心；使组织因我而受到破坏，尤非道义所许。所以最好是赤裸裸一个人，披沥此心以与国人相见。

一月廿日蒋介石让位于李宗仁，当日《大公报》便刊出来我那篇文章。原文开头一句便是："我写此文，意在说明两点：第一，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文内把过去中共一再让步而蒋再三压逼的事实历历数出，指证其罪完全在蒋。然后结束说：

> 这样可祛除一切国方所加于共方之诬蔑，和不明真相者对中共之误会。在一切诬蔑和误会祛除之后，各方就可无顾虑地与中共开诚相见，共谋和平。这是我希望于国人一面的。另一面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本其过去委曲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这是更要紧的一面。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势力依然未倒，尤其是在杨森统治下的重庆；文章刊出太早，家人亲故皆为我危。却幸亦无事。

李宗仁登台，亟亟请人奔走和平，对我亦一电再电三电之不已。我回答说，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早曾有声明在先，恕我难应命。

不久毛主席提出谈判的八条件，其中第一条战犯问题最使南京感觉为难。反动的行政院长孙科公然表示这一条不能接受。有好些渴盼和平的小市民亦想着不谈战犯问题或易达成和议。我于是写《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一文，反对不痛不痒、不清不白，而要讲明是非以正视听。我要求一切国民党之在高位者表示负责精神先行引咎下野，听候国人裁判。同时写《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切劝不要以武力求统一，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两文在二月十三日同一天的大公报发表，作为向两方面说话。

我那时的发言亦就至此为止了。以后的时间都在静候解放中。

以上数说了我在抗战期间以及胜利后一段的言论和行动之一个大概。本文第一步骤——把我过去所有的言论和行动择要列举出来——至此算是完了。

## 六　说明如此判断和处理的由来

从以上那些具体事例不难看出，多少年来不论战前战后我都有其始终一贯不移之处。这就是：（一）我总要发动民众，以民众力量来抗战，来建国；（二）我总要从团结上求统一，树立国家权力以为抗战建国的总司令部。

由今天看来，发动民众自然是对的，却究竟我亦还没有对。这留待第三步作检讨，此时不讲。现在本文第二步骤所要进行的，就是为“我总要从团结上求统一”这点说明其由来。读者看了以上那些具体事例，对于本文开首说的，我对中国革命中的政权问题有其特殊判断和处理——判断它不是政权属谁问题而是能不能统一稳定问题；问题是在树立统一的国权，而其功夫则要在促成各方的团结合作，有代表全社会的一大要求明朗可见——尽许略知其所指，但尚不明白其理由根据。譬如我总要团结各方，全无敌我之分，在今天看自然是不对的；然而当初我却自有深信不疑者在。当初我何所根据而深信自己的对呢？这就是现在所要说明的。

我的根据在本文开首亦说过了，那就是我的“中国特殊论”。中国特殊论并不单从其过去历史文化的认识上而建立；主要还在我亲身多年感性的认

识上。而且正是从当前感性的认识追溯上去，才得有那些历史文化的认识。既从今以追古，又由古而达今，事事与外国相比较，纵横往复之后，特殊论乃建立起来。

所谓我亲身多年感性的认识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中国人不爱国，缺乏国家意识而身家念重。这是从少年时起，就印入心中的印象。从这里慢慢积累，慢慢发展，以至末后认识到中国人四大缺乏：缺乏公共观念（缺乏国家观念在内），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这四点《中国文化要义》第四章讲解甚详）。而一切缺乏总归于集团生活之缺乏。缺乏集团生活是其负面；其正面则中国人总是生活在家庭家族之中。自己在中国社会里长大起来，几十年耳闻目睹直接感受的材料，数说不尽；中国特殊论的根据第一在此。第二便是自入民国以后，一直不曾见过统一的局面。统一起来成一个国家，只是四九年全国解放后的事。在这中间虽偶尔亦有过统一；但今天统一，明天不统一；表面统一，骨子里不统一；仍然不能算数。我说到统一每缀稳定二字，那原是不可少的。截至四九年我五十七岁，一生倒有大半生（卅八年之久）为国家不统一所苦。这一纠缠不解的苦痛怎叫我不深思其故。当我古今中外纵横往复研究下来，就发见中国的特殊：

它（中国）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面兼国

家，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的（见光明报前文）。这正是顺着缺乏集团生活下来的结果。《中国文化要义》全部书都无非阐明这一点。中国近四十年不统一之故，即在认识了中国的特殊之后而完全了然。同时亦看出其问题如何解决的途径。这些后面即将谈到。

我从来不曾为读书而读书，为求学而求学；读书求学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实践。读者于此可见其一斑。正为如此，所以我生平行动恒一贯不移，有其线路可寻，而思想见解植根亲切，经过许多甘苦得来非易，舍之亦不易。不是不肯舍弃，乃是新材料不足或思索功夫不到的时候，就打不破夙有思想见解而出现另一个新的。

闲话不谈，仍归到本题。现在要说明中国不属一般国家类型那几句话怎样讲，又怎样从而产生了我对中国革命问题那些判断和处理。

简单扼要来说：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因为除原始共产外，社会上一直不能没有剥削，亦即内部一直存在着矛盾。然而社会若没有秩序，则社会经济生活不能进行；所以如何把秩序与剥削结合起来，涵矛盾于秩序之中，依秩序以行剥削，便为事实所必要。事实上那就是少不得要有武力强制于其间了。况且秩序的维持不单是内部的事，对外尤其要紧；对外防御侵扰更少不得武力。国家不是别的，正是以武力为后盾对外对内维持秩序的那盘机

器。机器是要人来掌握运用的。那么，谁来掌握运用呢？自然不待言，就是那剥削阶级了。剥削阶级例必为统治阶级，国家名义及国家权力都属于它，至少在骨子里必然如此。

我说中国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即指中国自秦汉后好象是阶级统治的一个例外。有职业而无阶级，是社会而非国家，乃人类未来远景；过去中国不足语此，却憧憬乎此。剥削虽存在，但阶级却以化为职业而散；同时，社会关系一切形著于伦理，又隐蔽了矛盾。因之社会秩序寄于礼俗而不是依靠法律，消极相安就代替了积极统治。武力在此似乎是备而不用的，准备亦就不足。国家便这样融解消化在社会里面了。假若国家可比作是立体的，社会便是平面的；那么，中国恰似隐立体于平面之中，二者浑沦莫辨。又国家是有对抗性的，社会则没有；中国人自来知有天下（茫无边界）不知有国家，正为其以社会涵容了国家之故。追寻上去，其根原仍在家族生活的偏胜，集团生活的缺乏。各家族相处只算是社会，而国家恰是集团生活最强有力的那一种。——以上这些话句都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有其解释，这里不及多谈。

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之理既明，则一般革命恒不免暴动流血，武力斗争，一定要把旧阶级手中的国家权力转移到新阶级方面来亦即明白。以资本主义的剥削代替封建制度的剥削那种革命尚且如

此，何况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将是消灭剥削的，如何却不须武力斗争夺取政权？究竟在中国特殊论中，我从那一点而得此论断呢？

## 七　问题在武力缺乏其主体

这仍然要从我直接经验的中国当前事实说起，而后上溯于其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从过去三四十年的生活中，使我认识到中国的事情有两点特殊：

第一，中国三四十年来所深苦的分裂和内战，若以外国相对照，便知其大有不同。在外国亦每有分裂之事，象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出来，即其一近例。外国亦有内战，例如美国即曾有过南北战争。但他们的分裂或战争都是基于其社会方面的要求，有着深厚的背景（民族的夙怨、宗教的不合、政治的不平、经济的矛盾等等）在。而我们呢，却不过是此一政府（或此一军阀）彼一政府（或彼一军阀）间的冲突罢了，于社会毫不相干。我亲眼看见从前内战时，全国各省教育会的联合会还照常举行；从社会一面看，全国之间是无隔阂可言的。原来此一大社会尽管其人口之众多、地面之宽广直等于全欧洲，而且山川亦不是无阻，语音亦不是无殊，却是全国人如一大家庭，在情意上完全相通而不隔。历数三四十年来所苦的那些分裂和内战，没

有那一次是问题发生在社会的。所以我可以说：把军阀政府除外去，中国国家原是统一的。——不统一的只不过浮在上面而无根的所谓“政府”就是了。请问：这是不是外国所没有的事情呢？外国所没有的事情，却是中国一直存在着几十年的事情，能说不特殊吗？

第二，在没有完的分裂和内战不断破坏下，使此广大社会陷入一种绝望境地，实非一般社会之所恒有。是一个国家必有其秩序；是秩序就有保全。其故即在一个统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两面彼此对立，而又互相依存，成为一个结构。这一面亦少不得那一面，如何能不留余地地毁灭它呢？有保全即有生息长养。人类尽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那超经济的凶狠残酷剥削下，而社会还是发展起来，并没有绝望，就为此。但中国这时不然了！它不是两面，面仿佛是三面或多面。此一政府彼一政府形成对立，被统治的社会便成了第三者。在彼此对立中，各以应付对方为急，那往往是顾不得第三者的。无秩序的破坏代替了有秩序的剥削，此广大社会乃落于纯被牺牲地位而无可救，特别是乡村破坏最惨。对于乡村常是说：“今天可讲不起了（挖战壕、炮火烧杀、征粮征夫），明天必不如是”。但到明天依然是一今天。战争是常，不战是暂，或说是战争的休息，再战的预备。为备战而竞争着购械增兵，以致养兵之

多甲于全世界，却非讲国防。兵多而益乱，战乱相寻，讫无了期。假若爽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各干各事，倒亦不会这样纠缠在战争中。无奈此广大社会早已同化融合为一大单位而不可分（假如要分，几不知从何分起）。分又分不开，合又合不拢，长期地自相砍杀，日趋毁灭；这岂复是一个社会的常态？试问谁又曾在世界旁处见过这种事例？

这两点特殊，第二当然是从第一来的；第一则殆为其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之所决定。秦汉以来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的，到一九一一年后却真的走向革命——真的要变革此历久不变的老社会；社会结构正在一天一天崩溃解体，固有之统一不可规复，而一个新的统一正未易得。其中最基本问题乃在武力缺乏其主体。这个道理暂不忙道破，我们接续看过去若干年的事实。

如我在《光明日报》前文所说：

> 三十年来中国已成了一种争夺之局，而够不上说是剥削的局面。它不是有一不平等的秩序，而是早没有秩序了。

说争夺，不止于说军阀争夺政权、争夺地盘及其相因而至的那许多权利争夺，更且指遍地都是的那些争夺。我于此最好作两个引证。一个是民国十九年天津《大公报》社论的一段话：

（上略）一切支配于军权之下，而非支配于法律。上自中央，下至一县一村，其代表统治权者唯是枪杆；枪杆所至，权力随之。一切职业中之一切人民随时随地皆是自枪杆上讨生活。枪杆许其存则存，要其亡则亡。四万万人对于其生命财产事业言论思想皆无权，而唯听命于枪杆。（中略）此十九年来国民普遍享受之事实，无须详为说明者也。

一九三〇年十月卅一日天津《大公报》

另一个是那时河南朋友传诵的几句谑词：

兵败为匪，匪抚为兵，兵匪相因，名异而实同；匪为无名之兵，兵实奉谕之匪。（兵匪到了完全无法分别的地步亦是那时河南实情）

可惜许多具体情况此处仍不暇谈。当时的政府一般是让乡村自由组织武装自卫的。它明白承认它维持不了社会秩序。兵匪而外，所以还有红枪会。红枪会起自乡村，不止防匪而且抗兵（陕军奉军都被红枪会缴过械）。但其后亦很多胡闹乱来而为祸于人民。因此在各种武装力量之中，究竟谁是维持秩序间接以行其剥削的，谁是破坏秩序而直接争夺的，已经无可分别。我所说的遍地争夺之局，正指此。

十八年我同朋友们创办“河南村治学院”于辉县百泉。十九年开学，正赶上过旧历年，频传匪警，同人夜间皆不敢解衣入睡。远近乡村爆竹声与枪声相杂，入耳莫辨。当时我们的心愿正不妨说是在创造一种有政治思想领导的红枪会。而末后（十九年冬）我们学院的枪枝却被当地李县长带兵包围缴去。象这些事实亦可有助于读者对情况的了解罢。

## 八　深感无秩序之苦

说到这里就寻到了我和中国共产党所以分路走的分歧点。我在前文中曾点出一句要紧话：“我正以无秩序为苦，而共产党却就苦其有秩序”。他们如何苦其有秩序且待第三步再讲，我所苦的无秩序便是上面说的这样。我即从上面这样无秩序而纯被牺牲的社会情形断定中国革命对象已不存在。何以言之呢？

革命必有其对象；主要对象通常应当是经济上已经完成其历史任务而要没落的那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构成通常有文武两面。文的一面就是宗教、道德、礼俗、法律这些；其中是有些道理能说服人的。但单是靠道理说服还不够，必须有武力为后盾而强制以行。两面合起来，便成功一种统治。最要紧是武力必须要集中统一。不要说头绪多了不

行，就是有两个头亦要乱的。乱了便不成秩序。那些宗教、道德、礼俗、法律等等，虽不免头绪多，却亦要大体上配合一致。这种配合一致，在武力的集中统一之下，是自然会做到的。如其还不能十分配合一致，好在还有最后取决的地方，那就是掌有武力的国家权力机构。只要武力集中统一就不会乱。武力的集中统一，是有秩序之本，亦是构成国家之本。

现在中国——一九一一年后的中国显明地正苦于武力分散而无法集中统一，并不是存在着一强固统治力有待我们推翻。苦在没有秩序让人们得以安居乐业；几乎有秩序就好，不管它是什么秩序（平等不平等，合理不合理）。因为能从争夺进而为剥削，能从破坏进而为剥削，那已经很好很好。革命对象——强固统治下的社会秩序——不患其有而正患其无。

不但武力分散而不统一，同时其文的一面亦配合不上。号称维持社会秩序的政府却已经失去人们的信仰尊重，不足以服人。照例革命对象代表旧理想标准，而革命党则代表新的。总之是：统治方面若不在旧宗教、旧道德、旧礼俗、旧法律上有其地位，即必有其新依据才行。然而中国自一九一一年代表旧理想标准的王朝倒了，这以后南北东西各政府有的自命为代表新理想标准而难邀较久之公认，或根本未得公认；有的甚至于自己就不承认其合

理。譬如社会一般人诅咒军阀祸国殃民，而军阀自己亦通电高唱“废督裁兵”。不唯旁人否认它，它自己亦否认它。这就证明它初不依于一种秩序而存立。

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为指证军阀不是革命对象，曾说：

> 中国今日正是旧秩序破坏了，新秩序未能建立，过渡期间一混乱状态。军阀即此混乱状态中之一物，其与土匪只有大小之差，并无性质之殊（土匪扩大即为军阀，军阀零落即为土匪）。他并不依靠任何秩序而存在（如贵族依靠封建制度、资本家依靠资本制度）；而任何秩序（约法、党章）乃均因它之存在而破坏失效，而不得安立。它的存在实超于任何法律制度之前。它可以否认他自己的合理，承认他自己是社会一危害物，而于它之存在依然无伤。（中略）为中国革命对象的中国社会旧秩序早随满洲皇帝之倒而不存；此不成秩序之大小军阀固革命的产物，非革命对象矣。它唯以无新秩序起来替代，故暂时消极存在耳。它不劳再否认，因它并没有被承认；它不劳再推翻，因它并没有建立。

革命对象基本上已不存在，无论从任何一面——武

一面文一面——皆可鉴定无疑。那么，就要追问：这世界少有的痛苦不解之局究从何来，又如何才得解除？

回答这问题仍可分从文武两面来说，虽然根本上是一桩事。

若问武力为什么总是分散而统一不起来呢？这其实在前面讲到中国分裂和内战的特殊，早伏有解答了，不必外寻。这就是：武力从其自身面分散，不象外国是基于其社会一定背景要求面分。后者武力是有其主体的，而前者则没有。武力原是一工具；工具必有其主体。有主体的武力不会出毛病；武力而缺乏主体一定成问题。试以外国的事情作譬喻。过去爱尔兰人以武力抗英；英人以武力压服之。这些都是有主体的武力。他们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是英人制胜，那叛军就消灭，仍然是一个国家面不分；一种是爱人得胜，那英人就退走，分为两个国家。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两个国家也好，在其国家内部武力总是统一的，没有问题。而中国现在呢，在这早已同化融合为一大民族单位面不可分的社会，其武力却分散而不可合。武力与社会完全脱节，社会掌握不了武力，听它横行，莫可奈何。它不能为社会用，转为社会害。社会本是用它来对外对内维持秩序的，却不料现在破坏秩序的正是它。何以竟落到这地步呢？没有别的，只是武力寻不到主体一个问题而已。武力寻不到主体，就不

能统于一处。武力不能统于一处，就要分散到几处。分散就必定对立冲突而为祸于社会。这不是很简单明白的吗？

## 九　武力主体在一九一一年前和在其后

于是就要研究：（一）一般说，作为武力主体的是什么？（二）以往历史上中国的统一，是以什么作为其武力的主体？（三）一九一一年后亦不是没有短暂的统一，其时武力主体是不是有呢？

我可以回答：（一）一般说，作为武力主体的即是那剥削兼统治阶级。但剥削被剥削、统治被统治要两面合起来才成一个国家；当其彼此互相依存，有共同利害之时——只在此时——作为武力主体的亦就是整个国家了。（二）以往历史上中国是以皇室朝廷一姓一家为其武力主体的。武力虽主要为夺天下及维持皇祚而用，但这与社会的安危治乱亦有时为一事而不可分；那么，当这时候作为武力主体的亦就不仅在一姓一家了。（三）一九一一年后每一度短暂的统一，必在人心有所趋向，此广大社会若有其一大要求明朗可见之时；那么，当这时候武力就算是有其主体的了。

要说明以上的话，就根追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了。我不能把《中国文化要义》全搬出来讲，只

能扼举其要点大意。中国与外国、特殊与一般之所以分，就在家族生活对集团生活这一点。家族生活、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而且亦分不开。但其后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有异乎一般之走向集团生活。这是什么原故呢？那我只能粗说其关键在宗教问题上。举西洋作对照：西洋在宗法社会的宗教之后有基督教，而中国当宗法社会之际却有“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这就是两方文化所由分。从此，他们便惯熟于对抗斗争的集团生活，而我们则长久是散漫和平的家族生活。表见在中国人之间者，好处是不隔阂，短处是不团结。西洋人反此，其好处是能团结，短处是多隔阂。濡染于中国文化的人口达四万万以上，完全同化融合为一大民族单位而不可分，并且在过去宁为一社会，不类一国家。但同样人口在欧洲就不知要分成多少国家多少民族而合不拢，而且其一国之内往往还有许多分野（阶级的、宗教的、民族的、地域的、等等），此疆彼界，隐然敌国。若问周孔教化有何巧妙竟然产生这样不同结果呢？那就是把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广发挥，应用到政治、经济、教学各方面，纳一切关系于伦理，以伦理组织社会，使社会家庭化。

由于以上所说两方的不同，当势不可免地经济上要有剥削、政治上要有统治那种时代，则此一矛盾形势，在西洋就演为阶级对立。——阶级出于集团，这是必须记取的。而在中国呢，它就化整为零，

变固定为流动，有如我所称“职业分途”。整个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其唯一固定者只皇帝一家。阶级对立之势未成，武力主体无可归落，只有落到他身上。然而他（皇室）实非一适当的主体。

一般说，武力因战争而有，战争必出于集团对集团之间。各集团掌握各自武力；武力天然被掌握于各自集团。没有集团根本不会有武力；岂有武力而待寻问其主体的？所以武力主体这一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原不发生。然而一般之所以如是，乃为一般是符合于孟德斯鸠一句话的。孟德斯鸠曾说：“争之与群（集团）乃同时并见之二物”（见严译《法意》）。这句话是极言有集团就有斗争，有斗争就有集团，二者莫能分先后。但一般虽莫分其先后，在中国却似乎有先后可分。那就是在散漫而缺乏集团的中国人，往往可以见出它是因斗争而临时结合为集团的。象历史上那些农民暴动往往假借宗教迷信以求团结，还要用“赤眉”“黄巾”作出识别，而仍然不免被认为“乌合之众”，即其例证。还有可注意的一种情形，就是这里（中国）往往是以一二人物为中心而形成集团。团体在后，领袖在先；领袖为本，团体为末。不同乎一般是在集团内推出其领袖；领袖在后，团体在先；团体为本，领袖为末。例如楚汉之争，其问题只在项羽刘邦两人之间，并不是楚集团与汉集团一定不相容。所以韩信就可以在两边跑来跑去。又如诸葛亮一家兄弟三人分仕于

三国；亦正为三国不是三个固定集团，其间本没有什么沟界分别。从前有“攀龙附凤”一句话，正说明这类集团的由来。一旦相与竞争的敌对集团失败散伙而天下大定，这集团亦解消于无形。所谓天下就是无数家族藉伦理联锁以成之社会大海。当初的集团只是从海中起的几点凝结，末后又冰消于海。此时不以武力主体属之一姓一家则无可归落，而以一姓一家为武力主体又嫌其过狭。

我们知道主体与工具是必须两相称的。若不相称，宁可主体大而工具小，万不能主体小而工具大。譬若以幼小人而操大刀，那便不成一种力量，反是一种累赘妨碍了。中国既是这么出奇的大国，要统治这么大国家，其武力该当多么庞大？而顾以一姓一家为之主，岂非太不相称！前说不适当指此。

然而自然（自然界的自然）是不会给自己出难题的。一个问题有来路便有去路。要知中国之所以拓大出奇，是有其来由的；那就是自始缺乏集团性，不习于对抗斗争而以伦理组织社会，许多邻邦外族乃不知不觉先后同化融合进来。“宁为一社会，不类一国家”（语见前）正是其得力处。武力于此固难得其适当之主体，但它（社会秩序）原可不倚重于武力。如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照例在天下大定之后即必“偃武修文”。我在前曾说“消极相安代替了积极统治，武力备而不用，准备

亦不足”；雷海宗教授尝论中国文化为“无兵的文化”；都是为此而发。这样它就自然解决了主体工具不相称的问题。

二千年历史虽然可以这样敷衍过去，到一九一一年后则势不能再以武力主体属之一姓一家。同时政治上的消极无为主义亦为国际环境所不许。对外对内既非加强武力不可，而增大起来的武力却缺乏主体来掌握它。于是它便失掉其工具性，变成了为存在而存在，为发展而发展。卅余年军阀之局由此造成。军阀就是一指挥官领着一大批军队，占据一地盘而吃饭。为军队而要指挥官，为指挥官而要军队。既有指挥官又有军队，那就要地盘。有机会更扩大地盘而发展军队。扩大地盘是为了发展军队；发展军队是为了扩大地盘。完全无目的无主宰，只供一些野心家任意利用，合纵连横忽彼忽此，忽敌忽友，陷全国于分裂混乱之深渊而不得出。“不晓事的人还在作武力统一的迷梦，其实武力统一中国不难，倒难在谁来统一武力呢”？（语见旧著《乡村建设理论》第三四一页）。

## 十　深刻地认识无秩序

说至此，暂不忙讲如何形成一武力主体以求问题之解决。——这要留待以后说到我对问题的处理

再讲。在这里还要把我对问题的认识作一总结。总结是往深处讲，往文化方面讲。

往深处讲，我认为中国自一九一一年后社会的无秩序已陷于一种恶性循环。这恶性循环便是无秩序与无阶级两面迭互为因果；试看它是这样的：

（一）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缺乏固定成形之阶级，乃至于较为固定的一姓一家亦不复存在，莫可为武力作主体而国家遂不能统一稳定。

（二）国家不统一，对外不能应付国际的侵略（特别是经济侵略），甚且导致了侵略；对内则法律制度无效，社会无秩序，不能保障人的生命财产，一切农工商业（特别是工商业）的经营就不能顺遂发展，甚且时时遭受摧残破坏；于是近代资产阶级（这是从历史看中国应该兴起的阶级）就培养不出来。

（三）资产阶级既培养不出来，武力仍然缺乏其主体，国家就无从而统一，社会还是无秩序。

（四）无秩序就不能养成阶级，阶级不成功，终归还是无秩序。

追究上去，端在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贫富贵贱上下升沉不定流转相通）这一根本点。而这一点恰就是中国文化特殊之具体表现。因此一定要从文化上了解无秩序的由来问题才真得其解。

在前讲过有这两句话：

> 社会秩序的构成有文武两面。文的一面就是宗教、道德、礼俗、法律这些；其中是有些道理能说服人的。但单是靠道理说服还不够，必须有武力为后盾而强制以行。

作为一种秩序之核心的，必在其“有些道理能说服人的”那方面。而我们所谓文化呢，亦即在此。占人类绝大部分的虽是那些为人生而服务的方法、手段、工具、技术等等；但居中心而为之主的则是表现了人生目的、人生规范的这一些。这些大抵从人生一点最基本取舍出发而有其相联带的种种价值判断，藉着宗教、道德、礼俗、法律各种形式而分别表现出来。凡不同文化，皆因其在这里有所不同；若其他方法、工具等不同，是不足算的。秩序的改造、文化的变革亦都在基本改变了其价值标准而不在其他。

我常说过去中国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那亦就是说它的社会秩序尽有时失效而不久仍必规复，二千余年从无根本之变革。问它何以能如此？一句话说：其秩序存于道理说服者多，而恃乎武力强制者少。何以见得呢？它自古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而道德存于个人，礼俗起自社会，象西洋中古教会、近代国家那样以一绝大

权威临于个人、临于社会者，中国是没有的。宗教、道德、礼俗、法律四者虽莫不有道理说服人。然而宗教不离祸福，法律赖于赏罚，皆不免对人施以威胁利诱，其于以理服人殆有所不足。比较上说，中国以理，西洋以力，两方文化的分别远从散漫和平的家族生活与对抗斗争的集团生活之相异而来，近则以阶级对抗形势的构成与否为断。

因此中国在一九一一年以前，其文化并不相当于西洋封建之世而远为深厚——在人心中深有其根。当清末西洋近代潮流进来，固说服了一些人，引发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而革命的结果却并不能把中国社会象从封建解放出来那样转入到近代资本社会。所谓"基本改变了其价值标准"那句话是完全谈不到的，不过是新旧两种价值标准混乱矛盾之局。这就是陷于无秩序的根本所在。

不料正在新旧矛盾纠缠不解之际，又有第三种文化进来。这就是一向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潮流暴发出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响到全世界，亦输入到中国。在中国就有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就有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及其以后的革命。这对于近代潮流（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说，虽然二者原是同出于习为集团生活的欧洲人，却在社会人生上一切价值判断又大大相反。于是矛盾之外更增矛盾，混乱之中又加混乱。不苦于没有道理说服人，而苦于说服人的道理太多。

于是武力不能归一之外，道理又不能归一。假如道理归一，大约可能使武力归一的，假如武力归一，亦很可能使道理归一。反转说，武力是多头的就能破坏了道理归一；道理不一则武力归一恐怕亦难。现在正是后一种极严重情形，在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上，我又称之为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必须把无秩序问题了解到此，才算真了解。

第十一节

## 十一　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

一切革命要不外推翻旧秩序而建造新秩序。当我对一九一一——一九二七年后的中国作如上（无秩序）了解，并看到它天天自己毁灭之时，唯一急迫心情就是要求建造新秩序，而坚决地激烈地反对内战，反对一切破坏行动。我过去之反共完全在此。至于建造社会主义的新秩序，那原是我的要求，并无不同意向。

要遏止自己毁灭而走向建设，特别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前途目标的建设，其关键全在统一稳定的国权之树立。怎样树立呢？如其再摹仿外国建立阶级统治之局，那就太不认识中国问题的特殊，而且有些企图早已经失败（详见后），不足考虑。唯一适合于中国的道路就是从阶级之缺乏径直渡达于无

阶级之社会，而断断不是其他。这一条路首先从民国初建以来历次短暂的统一，在我直接经验中给我很大暗示。

譬如推翻满清时全国第一度统一之建立，就是人心趋向共和，全国纷纷响应，四面八方——清室亦在内——合拢来的结果，而不是从革命一方发展拓大统治了全国。再如推翻袁氏帝制恢复共和那一度全国统一，亦是差不多一样；一句话说，都是决于人心之向背而不是用兵的结果。到国民革命军北伐那一次，算是用兵稍多。然而从广东只出来三万多枝枪却削平了几个大军阀十余倍兵力，仍不出"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那句老话。末后以张学良易帜而完成统一，与前两次还是如出一辙。而最后明效大验莫过于抗日初起时全国所表见的空前高度统一，对内一毫没有用兵，而全国之兵却莫不为它用。当在徐州与日寇会战时，云南兵、广西兵、四川兵（这些都是从来不统一的）、东北兵、地方兵、中央兵、国民党的兵、共产党的兵……什么兵都来了。各式各样的装备和符号参差不齐，却统一于抗日一个目标。多少年来武力失掉其工具性，至此竟一朝而恢复。所有这许多事例都暗示我们要抓住全国人心趋向——此广大社会一共同要求以求统一，不是吗？

大凡问题解决的窍要就藏在问题里面，不必远求。真能了解问题，自能解决问题。在前我们不是

已看出中国所有的分裂内战不同于外国有的分裂内战吗？既然知其不同，那我们就自有其统一之道，不必摹仿外国。天下事情短处翻过来即是长处，这边走不通就掉转走那边。外国一般是求统一于上的，我们今天却须求统一于下。何谓求统一于上？在此疆彼界隐然敌国的社会中，以一方强越势力压倒其余而统治之，尽管社会依然不免有其分野对立而国家却是统一的；这就是统一于上。何谓求统一于下？在“好处是不隔阂、短处是不团结”（语见前），形势散漫而情意颇若相通的社会中，发见其亲切实际的共同要求，从而联系之以成一体，使一向浮在上面的分裂若有所归而势无可分，国家于是统一；这就是求统一于下。

历次从人心趋向的一致而有了全国统一的局面，却总未能把统一贯彻稳固下去，这是因为过去有缺点：第一，历次意志集中总偏在负面而不是正面。象排满、倒袁、铲除军阀、抗日，这一切都是负面消极性的；其正面积极要求却不具体明确。一旦消极目的得达，立刻就不能一致。须是一个正面的、经常性的、合于大众亲切实际的要求就好了。第二，人心虽一时从同，而人仍然是散漫的，所以不中用。须是随即把它联系起来，成一代表广大社会的组织就好了。

然而要做到以上这两层却亦有待机缘时会之到来，无法强求。我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旁

的，正是看准了这种时机到来而努力奔赴的全国统一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大率起于一九二五年以后而盛于一九三七年以前。它是从四面八方不同地区、不同动机或立场，从事于不同业务或工作，不期而渐渐汇合为一流的一大运动。正为乡村人口、农业生产是此社会最大之事实，要想提高文化，唤起民众，复苏经济、改革政治，总不能舍此而别求其致力处、入手处。这是当那些大而无当、高不落实或缺乏建设性的救国运动　革命运动过去之后，自然转入一种近乎改良的运动。这种运动从表面上看，在东西各国差不多都有，然而实质上不同。试以日本为对照就知道。一九三六年春我曾到日本去考察其农村复兴工作。原来他们农村经济之受到破坏，即在一九二九年后的那次世界经济大恐慌。其农村工作即始于那次破坏后才制订的五年计划。我到东京刚刚在他们所谓“二·二六”事件之后不久。“二·二六”事件和“五·一五”事件（刺杀首相犬养毅）都是从其社会内部矛盾暴发出来的革命式的政变暴动。资本主义的经济盖不止存在着劳资两阶级的矛盾，更造成工商业与农业、都市与乡村、生产者与消费者……种种矛盾。两次事件就是陆军军人代表农民反抗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一种行动。其复兴农村的一切工作，外表上与我们乡村建设绝相似，而处处比我们见出有办法，有成绩。但我们却效法不

来。何以故？他们政治有系统（议会有种种立法而中央以至地方行政机构为之执行），经济有系统（例如金融系统、全国合作社系统等等），教育有系统（从学术研究、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互相配合作起事来效率自高。试问在分裂内战又一切落后的中国何从得此好条件？然而却要知道，他们救济农村的一大力量不是别的，正是控制其农村的力量，亦就是起初破坏其农村的力量。这正表见资本主义国家内矛盾的两面又互相依存。他们的农村工作尽有效率，却无前途，总不过是改良而已。要想达到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它还要经过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才行。中国却不然，正为其没有那一大系统力量来救济农村，亦就没有一大力量阻碍着此广大农村自求其前途。乡村建设只是近乎改良（甚至有人亦自认是改良），而实则其使命乃在完成中国革命的。

中国革命始于一九一一年，本意在模仿着做一个近代国家（如日本一样），却不料自此就不成一个国家。外不能应付国际侵略，内不能维持一般秩序，资本主义工业之路走不上去，经济的落后一直未改，工商百业仍依托农业，都市仍然依托于乡村，一旦农村崩溃，全国不了。一九三〇年后救济农村的呼声不发于乡村而发于都市，首先说话的正是上海金融界（中国银行年终报告）。一九三三年后每年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开会，一经号召，人们

即从东西南北各地自动集合而来。到会的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有，假使你不先知道为什么事开会，而要想从到会人身上发见它是一种什么会议直不可能。因为人太复杂了。于此可见它是亲切地关系到全社会各方面的实际生活问题，不同于某些运动只对于一方面或一部分人亲切，偏而不全。更要紧的还不在此——不仅在当前一时代表着全社会广大要求。更要紧的乃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那种强大的矛盾这里没有构成——矛盾亦有而是分散零碎的，并没有构成一大矛盾而不可解——尽可以容我们从一种有方针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调整社会关系而达成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社会经济整个崩溃的中国，今天需要从国际经济侵略下翻身起来面向着社会主义迈进；但要翻身不是件容易事，要从经济建设而完成社会改造更不是容易事，都必须看出有其客观可能的一条方针路线才行。然而乡村建设呢，却正是这一条通路。空间上代表着广大要求，时间上又有其远大前程，当此运动广泛展开于全国而成立其一大联合组织的时候，散漫的中国社会不是就联系为一体了吗！

一切政权（国权）原是为社会经济而服务的，经济的出路果真在此，则政治的出路无不在此。当此一大社会从乡建运动而统一起来，武力就有了主体。但千万莫忘记“统一于下”那个原则，乡建运动的联合体或其任何组织都必须守定在野立场而不

要直接当国秉政。

须知统一于下所不同于统一于上的，就在使社会始终保持于一个立场上。要使社会保持于一个立场而不分，那就必须把政府与社会分开。不然的话，社会自身就要分，这是一定的。因为社会原涵有矛盾在——至少那个剥削问题免不了。对于矛盾只有两种安排：（一）偏于一方的强力统治；（二）从彼此理性求其协调以至末后矛盾完全消除。这两种安排不容你自己选择，而一视乎国际国内形势为决定。一般国家都是第一种安排而中国则做不到，可无待多说。却由于国内一大矛盾之势未成，就有了第二种安排之可能，再由于国际侵略压迫严重早掩盖了内部问题，乃更加决定。从乎这内外形势不能不作第二种安排了，而为涵有矛盾的这个社会恒常保持于一个立场却大大不易。此时最要紧的就是必从理性求协调而万不能用强力。然而此时对外对内少了武力如何能立国。那唯有以政府统率武力代表国家对外对内，不要与代表社会的乡建运动组织牵连混合。如其乡建团体自己来组织政府，那便根本破坏了求统一于下的原则，而搞乱了这种安排。本来显然隔阂对立的两方面在中国很少有，如其说有，那就是在政府与社会两相对之间。乡建运动当其在野向下扎根，把散漫社会打通一气，可使政府为之低首；一旦自己登台，却将失脱社会根基，并陷自身于纠纷，亦就失去一切作用，而葬送了革命

前途。

乡建运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才对呢？如《乡建理论提纲》第四十六条所说，那就是要以全同乡建运动联合组织的中枢为知觉和用思想的机关，而以政府为行动机关。但不必从法律上取得此种地位，而要在其能从事实上代表此大社会的痛痒要求，并能集中人才以学术头脑规划前途，给政府施政作指针，即不患无其地位。

## 十二　始终自以为是

叙说至此，读者可看出这种主张真算特殊，一般革命中的政权问题到此完全变了。它虽仍然需要一个服从于革命的政权来完成革命，却已经不再是变更政权、夺取政权那些事了。它是把原来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又经革命推翻了秩序更不成其为国家的，设法形成一个国家——还是不属一般国家类型——让它有革命政权树立起来，俾得进行建设，完成革命，以达于最后是社会而非国家那一步。此时我看：南京的国民党是在我右边的；它倡言建设而无方针，简直不晓得它要往那里去，不说背叛革命，亦是忘记革命。江西的共产党是在我左边的；它倒始终没有忘记革命，而盲目破坏，有害无益。若其昧于认识中国问题，则两党所犯之病相同。只有我

从历史文化认出了中国革命唯一正确之路。

后来抗战既起，乡建运动不得如预想那样发展开，又见两党各具势力不容轻视，经过一番考虑，稍稍变化了我的主张。这就是后来我主张的“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党派综合体”、“政权治权划分开”那三个步骤所构成之一套方案，在前已有叙述。因我考虑到：两党原来都是想解决中国问题的，却由认识问题不足，而今天他们自身依我看倒成了问题等待人助其来解决。我应该引他们回到解决问题的路上，仍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力量。这是一面。再一面，乡村建设之路果为他们所接受，正用不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发展；如不为他们所同意，那自身想发展亦将受到阻难。所以无论如何要打通他们的思想才行。这其中第一步确定国是国策，意在使全国意志集中于一建国目标，包涵有对外如何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如何完成社会改造两大方面，而以后者为主，希望把乡村建设采纳进去。第二步建立全国党派综合体，其作用就相当于全国乡建运动的联合体。第三步政权治权划分开，即本于乡建联合体要守定在野“求统一于下”那个意思而来。所有变化只在外表，根本意思实未尝变。

这一方案在我第一次到延安时，虽胸中尚未十分成熟，却已提出向毛主席请教过。第二次到延安，更向十位先生陈述了一遍（见前）。对周恩来先生则是在重庆谈的。我说党派综合体不要直接当

国秉政，而参加政府的人一定要脱党，他们似乎怪讶不解。好象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党派综合体两层在意思上都还可以接近，只第三层不行（毛、朱、周三公皆露此意）。而其实从这方案说，第三层寓有我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窍要在内，正是其最要紧所在。政府与社会如不分开，社会统一不能巩固，便一切都完了。

为什么彼此意思不接头呢？共产党的老话："要站稳阶级立场"，"要分清敌我"；而我却要把全社会统一于一个立场，一定要"从团结求统一"，"只有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中国才有救"。彼此路道正好相反。可以说国内过去有本有源彻头彻尾反对共产党以武装斗争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我算一个。我有一套"既从今以追古又由古而达今，事事与外国相比较，纵横往复"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作根据，我认定他们把中国问题当作一般革命来搞是错了。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我写《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反对以武力求统一，还在说：

> （上略）……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我前说"以武力求统一只有更迟延中国的统一"其意正在此。这千真万确的真理，我却不愿它再作一度事实证明。——但你们竟然要再来一度，我亦只有长叹一声！

从这几句话不但看出我的自信，还看出自信是在这一点上。

本文第二步骤——说明我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和处理所自以为是的由来——至此约可结束。

## 十三　倒底是无秩序还是有秩序

在《光明日报》前文上，我曾说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就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面奠立起来。同时其另一面，当然就是我所深信不疑者完全落空。这使我不能不好好反省究竟错在那里。既须寻出所以错的根本点，且要分别勘正那些从而发生出来的错误。以下就进入本文第三步骤。

在前已点出我和中国共产党所以分路走的分岐点，即在“我正以无秩序为苦而共产党却就苦其有秩序”（语见前文）。把这问题弄清楚，错误的根本自见。上文充分发挥“无秩序”之说正为下文检讨要翻案作准备。

我们在上文费了许多话来讲“无秩序”，那“无秩序”真是铁案如山，谁还能否认呢？读者试回头看一看，我想一百人未必有一个人能否认罢！谁晓

得就象我所见兵匪如麻混乱到顶的那种地方，若让毛主席来看还是有秩序，而且统治依然很强。试取出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照着来想一想，便可恍然有悟。原来我之深苦无秩序，还是从一般有产者立场出发。虽说已经成了争夺之局而剥削之局似乎被打破；但财产私有仍是公认的制度；剥削一般还是有效，强霸争夺究竟难邀赞许；这就是有秩序。这种秩序的破坏，威胁不到无产者，不是他们之所苦。他们之所苦，象那篇报告中所说绅权、族权、神权、男权的四大威权，则因我既不是贫雇农，又没有生长于乡村宗族间，又不是女人，一切横暴压迫未曾受过，在我意识中就不能清楚深刻。身受其苦的人，大概若有一物横梗在胸，念念不忘；而在我心中却若有若无。所以封建统治从毛主席看去几乎原封未动，而我则倡文“革命对象已不存在”（见前）。假若当那时我亦在湖南，我将是对农民运动喊说“糟得很”的人，而不会如毛主席亲切地感觉“好得很”。

何以说这些问题在我心目中若有若无呢？这值得仔细说一说。首先应当从其中重要的绅权说起。

绅权这一项诚如那篇报告中所说：“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比较还不留心，只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虽各地情形不同，然问题总是有的。我既号称作乡村运动，原从很早用过很多心思在这个问题上；那么，我对此问

题究竟如何判断和处理的呢？民国十九年我主编《村治》月刊时，有一篇《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的长文，最可代表我的意思。此文曾收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由中华书局印行。其中虽大致从反对当时所谓地方自治说起，却可见出我对绅权的看法：

> （上略）举办地方自治岂独增加农民负担，更其凶猛可怕者是助成土豪劣绅的权威。（中略）我们试想想看：
>
> 第一，本自容易受欺压的乡民；
>
> 第二，将他们划归一个区域，而安置一个与地方官府相衔接的（自治）机关；
>
> 第三，此机关时时向他们发号施令，督迫他们如此如彼；
>
> 第四，此机关可以向他们强制地加捐派款；
>
> 第五，此机关可以检举他们某些罪名（例如烟赌等）而处罚他们；
>
> 第六，此机关或且拥有武力——保卫团。
>
> 这简直是为土豪劣绅造机会，让他正式取得法律上地位，老百姓更没法说话罢了。不独给他法律上地位，并给他开出许多可假借的名色路道来，又且资他以实力（保卫团）。

接着我又论到“人民自卫”这题目亦可怕的。因为枪枝武器多出于地主有钱的人，而统制指挥又操于

他们之手，地主绅士一二人的尊严威猛由是遂以建立；怎能保他不滥用权威呢？多数乡民怎能免于受欺压被鱼肉呢？原文还这样说：

> 我们并不是说作“团董”的没有好人，这是事实自要如此。何况今日的社会是什么社会，我们试想想看：
>
> 第一，今人欲望比前高许多，而生活的艰难及风气的丕变更使人歆慕金钱势力；
>
> 第二，频年的变乱使人变得险诈狠毒，残忍胆大；
>
> 第三，社会旧秩序（法律制度礼俗教条等）已失，而新秩序未立；于此际也，多数谨愿者莫知所凭循，最易受欺，而少数奸猾乃大得其乘机取巧纵肆横行之便。
>
> 在这种运会形势之下，（中略）再加上“地方自治”“人民自卫”适以完成其为人民之蠹贼，一方之小霸王而已。然而今之提倡自治自卫者似绝未留意到此，究竟是智虑短浅呢，还是毫无心肝！

问题是这样提出了，将如何处理呢？过去两千年消极不扰为治，让老百姓去度散漫和平的生活，那是不可能规复的了。模仿西洋的旧民主制度我亦不赞成。原文于摘引当时自治法规那些乡民大会、区民

大会、乡监察委员会、区监察委员及人民的直接罢免权等等规定后，便说：

> （上略）求效于组织制度之间，对于声威所在实力所在的豪绅，欲以白纸写黑字振起农民数千年散漫积弱之势而胜之，实不免妄想。然而在这种互相牵掣抵制之下，一个人独霸之局诚亦不易成功；演为地方上几个人分结徒党明争暗斗之局，大概是一定的。因为一地方不见得就只一个人有钱、有势、有资望、有胆智；长于此，绌于彼，高矮不齐而各不相下的总有几个人。这几个人始亦未必彼此作对。然而从这制度之所安排布置，其不引之促之于结党分派构怨成仇又何待？在立法者所自谓为防杜土豪劣绅的妙方，不过换一换局面。而此种搗乱打架之局比之个人独霸之局，究竟那个好些又谁能说呢？

原文接着说，多数政治是无疑问的必要，但昧于民族固有精神必致酿乱。自一九一一年来，因“民主共和”的好名堂已是将国家闹得天翻地覆。然而偏僻乡曲兵匪不到，犹或可以安生过活，或兵去匪过之后亦可抽空过活。假若“地方自治”“人民自卫”普遍地举办起来，必将闹得无一处无一时得安生，其为祸之周匝深刻又将十倍于前！

似这样，过去老路子是回不去，近代西洋新路子我又拒绝模仿，我主张什么呢？当然更无旁的，只有我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的主张，虽不能说是起于要解决绅权问题，但想从乡村培养出中国的民主政治来，则是我最初动机（下一篇文章将叙述到）。象这样的动机，绅权问题自然在考虑之内。所谓“若有若无”，此即其“若有”一面。

何以又说“若无”呢？那就是不作为革命对象来认识它。这从上所引原文和未引的全文语气间不难看出；而看我全部理论就更清楚。照我的理论，秦以后中国封建制度虽不是完全解除，却变化得非常之大。我承认它有时逆转于封建，但若顺着中国文化走，则理性发挥甚高，过着消极相安的伦理生活，尽不免有些封建形迹，早无封建实质的。可恶的绅权（还有其他类似东西）我只设想它是逆转于封建时有的，不是在一切时固定有的。所以在上所引原文及其全文语气，都露出问题原来不大（如果不是没有的话），而在“这种运会形势之下”却大了，特别若是随便举办“地方自治”“人民自卫”将更大。

再明确地说一句：现在遇到的这些恶势力——绅权及其他——其性质是封建的，但主要是由于消极性的老文化旧秩序已失、积极性的新文化新秩序未成而出现，不是传统一直留存下来的。它本身是无秩序的产物，愈无秩序它愈发展，愈作一些不能

成功新秩序的新号召新办法它愈发展，而不是任何（封建的或资产的）秩序。只须赶快建造新秩序——其道则在乡村建设——就好了，用不着当它作革命对象来实行革命。——这岂不是“若无”了吗？

其次再讲族权，神权，男权这三个问题。

旧著《乡村建设理论》曾指出某些宗教迷信和中国人子女若为其亲长所属有，妇人若为其夫所属有，那种人对人的隶属关系，自是宗法社会、封建社会的遗迹，较之近代西洋不免保有一些未进步的形态（见原书第六二页）。我承认所有这三权是封建，这就是“若有若无”的“若有”一面。然而我同时说明中国之所以数千年长保此落后形迹者，正为其理性开发太早——文化成熟太早，不可误以为真幼稚。从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中国文化要义》前后三十年都在作此阐明（至今没有改变），因此它就不同于一般。从一般说，这三权往往结合于封建实力（武力统治）而不可分，要革命时一起革命，其必出于暴力破坏势不可免。而这里似用不着，尤其在经过一九一一年革命更用不着。在这里，要待积极性的新文化新秩序之一步一步建造（产业发达、科学发达、教育发达等等）它随着同时就自然解决的。对它亦可说须要革命，但不过习俗观念须要改造的那种革命。——于是从“若有”，又转为“若无”。

过去我从不肯说反封建这句话。虽亦说要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但只从经济上了解其意义，不从反封建出发。我认为“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其组织能力，是农民得以抬头作主的唯一途径”；“农民地位须要增进提高而不是翻身”。（《乡建理论》第二八三页——四百页）。对于封建性极重的某些习俗亦知道要改革，而在邹平所最用力作的亦不过反早婚（族权）、反缠足（男权）一类功夫而已。至于不知不觉还作了许多助长封建势力的事情，将留待下一篇文章再作检讨。总之，我对于中国旧日社会的封建性的认识远为不够，直到解放后到了鲁南，到了川东乃大有所省觉（见前文）。这是由于我的出身和生活环境从没有尝过那些封建统治压迫之苦，而倒有一些知识思想会分析问题，亦就不免曲解了问题。

“所有的人每一个无不有他的阶级烙印”；“一切问题所争总不外乎彼此立场不同”，这些话我今天才相信。过去不是无所闻，却不相信，不肯从这里去注意反省，终于被自己的阶级出身和环境所限制、所决定而不自觉。中国社会是不是缺乏阶级，自一九一一年后是不是没有秩序，本都可以从两面来看，而且几十年中亦何能一概面论。但我总是从其一面——缺乏或没有——来强调，总不免一概而论，正为自己没有站在革命的阶级立场之故。以上借着毛主席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对

照，揭发出其思想根源。本文开首说的：我之落归改良主义不出于浮浅错误而是有其思想根源，至此点明。

以下继续说明我根据“无秩序”这一判断来处理中国政治问题，如何不能不使革命落空。

## 十四　就为不懂矛盾论所以一无是处

我写至此处，《人民日报》刊出了毛主席的《矛盾论》一篇著作。看了之后第一个感想是自己过去就失败在没有把矛盾法则弄清楚。现在看了还是有许多处若明若昧，但有一点则明白无疑：毛主席掌握了这部矛盾论乃是他领导革命成功之本；而我在中国革命政权问题上分析错误、处理错误，正为搞不通矛盾论。读者试回看本文第二步骤讲中国必“求统一于下”那许多话，还有光明日报前文讲我反对暴力斗争那许多话，不正是从形势分合、内（阶级）外（国家）矛盾来分析判断、来规划处理吗？等待几时矛盾论学习好再把其间错误一一检查出来，现在只能粗说一说（仍不知对与不对）。

“没有秩序”这一判断，决定了我对走一般革命之路的否定，亦决定了我必要作特殊处理。其错误亦要分从这两面反复检讨才更明白。

一般革命之路——暴力斗争在我何以要反对

呢？如《光明日报》前文所说：有两面才好斗，亦自然要斗；斗亦能斗出结果来。结果指一面压倒一面而革命政权树立。缺乏对立的两面不能斗；斗就要陷于乱斗，就要混战一场而没有结果。又何以见出没有两面呢？如前文所说：阶级问题要紧在剥削被剥削，而剥削却必在一种秩序下行之；有秩序便有两面，否则，不成两面。所谓不成两面，意指没有构成阶级统治之两面。一般革命不外是这两面中被统治的一面翻上来把那一面压下去，以新阶级代旧阶级而居统治地位。这种新陈代谢的社会发展，在历史上只见其改朝换代的中国原是没有的。不成两面是早就不成两面，不自一九一一年始。不过一九一一年后乃更加甚；在前是散，其后更加上乱。在散而且乱之中你怎么能斗出结果来呢？所以我认为此路不通。

我们先来检讨这一面。

说一九一一年前中国早就缺乏阶级，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说呢？我想是可以说的。"缺乏"乃比较相对之词，以表阶级在这里较之在西洋或一般是有差异的。在这里存在着剥削乃至亦免不了统治；就是说：一般有的矛盾这里亦有。然而其形势分散，上下流转相通，阶级好象没有固定成形，在矛盾上难道不较之一般有差异吗？说是可以说，但我一向片面强调缺乏阶级，而不从其虽缺乏亦还是有那一面来看，这就不合于辩证法了。

成不成两面，在一九一一年前和在一九一一年后应当分别来看：一九一一年前，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都不是固定的，唯一固定者只皇帝一家，因有“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之说。说不成两面，意正指此。当其有大暴动起来，虽推翻一代王朝却无法作到一面翻上来一面压下去，亦正为此。然既有矛盾，就有两方；况其不固定亦只是相对的不固定。所以当大暴动起来，诚不免陷于混战乱斗，而当其有秩序之时终还有两面可说。必强调一九一一年前早不成两面，仍属片面看事情，不合辩证法。一九一一年后秩序破坏，军阀彼此对立混战，被统治的老百姓转落于第三者地位而纯被牺牲，确乎不成两面。然而在前已经指出：财产私有仍是公认的制度，剥削一般仍是有效，强霸争夺究竟难邀赞许，则秩序亦还是有的。此时从全国来说，虽不成其为两面；在一军阀政权地方内，难道说不是两面？片面强调无秩序、强调不成两面，总都是不合于辩证法。

有没有秩序，成不成两面，这些都不须空泛着谈它，而要从其斗得出结果斗不出结果，亦就是一革命政权能不能树立来研究。——这是最要紧的。

当我们要革命时——要解决矛盾时，就不能把各种矛盾同等平列来看。譬如军阀彼此间虽有矛盾，其矛盾却与革命无关。而我竟因其一时祸害的严重而看重它，不但把它与阶级矛盾平列而说为三

面或多面，并且援为“阶级分野不够重要、没有力量”之证（见《光明日报》前文）。这就大错而特错。这是为我自己根本没有站在革命立场。如前所说，我是从有产者立场出发了。尽管小有产者在社会上数量绝大（毛主席所谓“两头小中间大”），并且私有制度亦还有一段前途，在当前应当求其稳定。然面在一个以反剥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理想要求的我，如何却代表了有产者，岂非笑话！关于立场检讨仍留待另一篇文；这里主要指出的是其轻重倒置，实为不能解决问题之本。

假如自己站在一定的革命立场，那就是自己站在矛盾中的一面面要求如何解决其问题，则对于左右前后牵联着的许多其他矛盾，视乎形势发展，自能权其轻重，分别主从，知所先后，而联其所当联，攻其所当攻，暂时不管的搁开不管，将始终只有两面而不会乱。所谓“散”，所谓“乱”，所谓“混战一场、乱斗起来”，都不过是我把许多矛盾同等平列乃至轻重倒置、胸中无主之表现，在马列主义的革命党人是不会的。既然始终只有敌我两面而不会乱，则不断随着世界大势之发展而努力之结果，迟早总有一天这面翻过来面树立了革命政权。何能无结果呢？

在《光明日报》前文我曾说：“我现在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有些读者看了不

解，以为“既然缺乏阶级了，如何还能以阶级观点把握它”？其实正该如此。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是一个革命者应当始终不放弃的。却遇到缺乏阶级的社会，依然可以承认其事实；仅承认其有所缺乏，并不曾轻忽其阶级本质。要必在不否认其缺乏阶级之中而把握其多少有阶级一面，然后才有办法能解决社会问题。我想唯物辩证似乎应当如是。过去我追求中国的特殊，在“缺乏阶级”的强调中竟致忘记了立场，抛弃了观点，把矛盾法则根本不要；革命在我不成空谈，成什么呢？

一错误，无往而不错误。就在我片面强调“缺乏阶级”“不成两面”之时又忽忘其可能有发展变化，于是象山东乡村社会在抗日伪、抗蒋美的十余年中所引起之阶级分化以至惨酷斗争（详见前文），便不曾料到。这种把事情看成静止的，大大不合于辩证法。而且我一向强调“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见前）的话，何以却不早注意世界正从阶级立场分为两大阵营而决斗的形势，而中国亦就要被扯向两边去呢？这种孤立起来看事情，又是大大错误。

中国共产党或许于中国缺乏阶级那一面有些认识不足；然而不要紧，他却正好把握了其有阶级一面。他把握了这一面，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立志走向反剥削的远大前程。这对于“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全局说，自己立脚地方，岂不失之狭小？同时对于这样经济落后的社会说要反剥削又宁不失之过

早？然而一切不要紧。他立脚地方确实的很，而放眼世界来看又并不狭小。剥削虽不能一步登天而废除，但从我们不能再走向资本主义来说，则方针路线又不可不早为明确。这一个“确实”、一个“明确”就是最好不过的事。近从一角落，远到全世界，在他眼中早把一切人们分作两边去。

“分作两边去”这只是在自己眼中如此，还没有真成事实。不但没有成为事实，而且事实上恰是应该分到这边来的没有分过来，应该分出去的没有分出去。——这例如大都市的产业工人还没参加革命，手工业者还在闹“同行是冤家”，店员与老板相依，农民分散而不集中，甚至佃雇农与地主亦复相安，多数知识分子各行其是，在一种彷徨或游离状态中，……如此等等说之不尽。然则怎样造成事实呢？特别是怎样团结成自己这一面呢？敌人那一面倒不必管它，自己这一面团结不成，则翻上来压下去的话即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假如以上是说共产党在认识上如何与我不同，这就说到彼此行动上的不同。

共产党的成功是成功于其行动的。他的行动就是武装斗争四个大字。只是从武装斗争以后，那“分作两边去”的事实才当真造成。——一步一步地婉转曲折地经过长时期而造成。说明白一点儿：这才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统一战线。从造成自己（党）这一面的开始，就有军队和政权随着而

来。一分的开始就有一分的军队和政权，最后便是极其强大的军队和全国范围的革命联合政权之建立。一切成就基于武装斗争；没有武装斗争没有一切。

然而武装斗争不为别的，乃是为要破坏推翻一种强固统治的秩序；这在我不是“不患其有而正患其无”（见上）吗？前说“我正以无秩序为苦而共产党却就苦其有秩序”是彼此分路走的分歧点，正为此。在解决中国问题上彼此一成一败，他走了活路我走了死路，全由这里分。

他单是武装斗争就成了吗？那完全不是的。单是武装斗争——单是暴动，可能没有破坏到对方而先消灭了自己。因为他不是从现成对立对抗的两面而斗争，乃是要在斗争中逐渐地分开两面，团结成自己。所以单是武装斗争完全不够，而要在斗争前、斗争中、斗争后，都善于掌握运用矛盾论。掌握好矛盾论，才能在散漫凌乱的社会中得其条理，把变化复杂的环境应付裕如——如前所说联其所当联，攻其所当攻，暂时不管的搁开不管——而使自己一天一天由小变大、转弱为强。末后，这面翻上来那面压下去的事情居然出现在中国，开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其全部学问要都在此。

读者试再参看《光明报》前文说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如何养成那一段，则于一般革命之路所以在中国终得走通不难明白；而我过去否定它的不对，可无待多说了。

## 十五　这才晓得原来我没有革命

更从另一面——我对中国问题的特殊处理那一面再检讨看看。

我所谓特殊处理自是对一般革命之路而言，究竟其不同处何在呢？那不外革命是讲斗争的，而我则讲联合。用上面的熟语来说：革命就是“这面翻上来那面压下去”；特殊处理则在“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要“翻上来”，必须武装斗争；要“统一于下”，全在把握社会人心一共同趋向。如今看来我错在那里呢？很简单，我不该片面强调联合。把“联合”与“斗争”对立起来，以为二者不能相容。这在矛盾论上就根本是不通。联合是可以讲的，却要在斗争中讲就对了；特殊处理是应该有的，但离开一般面作特殊处理那就错了。

特殊处理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假如说中国已是某一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者说中国已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都有一强大矛盾简单明切构成在我们眼前，谁还说什么特殊处理。恰为它不是如此，而是在几个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我们对帝国主义矛盾之外，帝国主义者彼此间还矛盾着；同时国内四分五裂，统治与被统治矛盾之外，统治者彼此间更有矛盾。实则其矛盾重叠、分散、零

碎、复杂还不止此，此不过其大端。于是我的注意就被吸引到为祸最烈的连续内战（无秩序）上。这是几方面（有枪阶级彼此之间、有枪无枪之间）矛盾的集中尖锐表现，却掩盖了寻常有秩序的剥削被剥削那种矛盾。当我迫切要求国权统一稳定之时，虽主观自觉地是在要求有方针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却不自觉地早把社会生产上剥削被剥削那种矛盾——社会最基本重要的矛盾转而看轻，自己恍若置身矛盾之外来处理矛盾，而实际却是从有产者立场出发了。这便是我离开一般革命之路而走向特殊处理的开头一步。

同时，结合着我一向对于老中国社会构造特殊的认识，我很快看出中国这种分裂内战与外国所有的分裂内战殊不相同，它并不代表社会什么一定势力分野，它完全是没有根的。这恰是数千年同化融合而无可分的一大民族单位，经两度革命后老社会构造崩解而一新社会构造未成的现象。当兹民族危难之时，为了共同对外御侮对内建国，苟得其联合团结之道自不难从社会意志统一而实现国权的统一。特殊处理的结论就这样作成。其间有许多设想未见得完全不对：譬如我策划在经济建设中要增进社会关系、调整社会关系而避免矛盾之加深，从阶级之缺乏(矛盾不大)径直渡达于阶级之消灭（矛盾消灭）；譬如我要把国家政权建立在一种联合团结的基础上。然而毕竟不能不落空。因为就在自己恍若

置身矛盾之外而实际却从有产者出发那一瞬间，在自己便从此失去革命立场，遇事便从此不能实事求是。亦可以说：从此便成了革命的外行人，以空想代革命。象调整社会关系是要站在革命立场去调整的；没有站在革命立场，还靠什么去调整？调整社会关系亦要实事求是才能调整；不能实事求是，又何能调整？讲联合团结亦复如是。没有站在革命立场，又靠什么去联合？没有立场联合起来又算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又何能联合成功？……前途一切落空是注定了的。

过去我自己没有一定立场，殊不自觉。现在看起来很是明白。象上文叙我在桂林时拒绝朋友们劝我去某些地区（靠近八路军地区）建立乡村建设的或民盟的据点，我怕靠近了一边便要削弱我为大局奔走说话的力量，就是一显明例子。“差不多没有什么考虑就拒绝”（见上文），正为其一向心理态度如此，这种“两边都不靠”的心理，影响我的行动不小。念念在“照顾大局”，自以为“用心甚苦”。不但辛苦而且忙碌。象《光明日报》前文所说，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确乎亦都是事实。辛辛苦苦，忙忙碌碌，革命早已落空还自以为革命。为什么自信是革命呢？因我坚决否定西欧宪政之路而要求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廿多年向着远大目标努力，从来没有满足于改良呀！

我要联合，不要斗争；其结果，斗争固然没有，联合亦不成功。自己没有一定立场，天天在联合人家，如何能中用呢？最后发现联合的事却全被毛主席作了。这就是他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是尽量联合可能联合起来的人而扩大自己，孤立敌人。共产党今天的成功，与其说是得力于斗争，不如说得力与联合。因为中国的事情原非联合不可啊！

起初我判断中国不能以阶级为武力主体，实有见于国民党模仿布尔塞维克之失败（我有《中国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一文，见旧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九三一年中华书局出版）。国民党十三年改组，请俄国顾问，师法俄国，要从建党而建军、建国，所以在军队里设党代表，设政治部，如是种种。然其结果，军队还是落在个人（蒋李阎冯……）手中，并没有掌握于党。其故即在党的阶级基础不明，甚至拒绝以一定阶级作基础，尺度放宽到无所不包而党乃不能不散。党不成其为党，于是个人就超于党之上，只见个人不见党了。然其所以失败，须知不全由于其人之糊涂，而是因为要迁就中国社会具体事实所不得不然。共产党不嫌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那样少，作为阶级基础看似太狭窄，而标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党，一切组织纪律无不从严认真，论党倒是成一个党，其如党太小而中国太大何？宽是失败

了，严亦岂能成功！——我误以为既严起来，将无往而不斗。却不料毛主席领导共产党严其基础而宽其运用，又遇到日寇入侵，从对内转而对外，有扩大联合必要。于是从斗争而有联合，有联合又有斗争，联合发展了斗争，斗争推进了联合。粗着说大概是：以斗争始，以联合终（联合政权奠立）；语其微妙则联合始终离不了斗争（批评自我批评）。这然后才晓得不懂辩证法矛盾论是不行的！

现在我颇领会唯物辩证法就是指导我们实事求是。不懂辩证法而在作事中果能一步一步实事求是地走去，亦自然于辩证法有合。不能实事求是，便不会合于辩证法。我片面地要联合而不要斗争，回想起来明明是不切于事实的空论，不能以不懂辩证法自解。何以作空论而且长久安于空论？一句话：没有真革命！

奇怪的是：我最恨中国人散漫无组织，怀抱着要为中国人养成团体生活的志愿四十年于兹（邹平工作即以培养乡村组织为第一义是其例），而临末了自己今天却是不在任何团体组织的一个人。何以会如此？其近因自是为了要大圈而不要小圈——为了要团结全国而声明自己“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见上文）。根本原因则在没有敌我分别，正如前说“恍若置身矛盾之外”而来观察矛盾、处理矛盾。就当我在民盟时，周旋于盟内与周旋于盟外几乎无甚不同。民盟原是一联合体，盟内

盟外都是我要联合的对象；不过这（盟内各方面）是我联合之始，那（盟外两大党）将是联合之终。民盟如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如是（读者试回看上文自明），就连我过去的乡村建设学会、乡村工作讨论会亦无一不是联合性质。在我眼中看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从其待我联合而言则不是我，从我要联合他而言则不是敌。他们彼此有矛盾，而我则不在矛盾之内。假如说我一生作了一个梦，那就是“联合之梦”。作梦时是一个人，梦醒时还是一个人。

我恰是走了一步不能发展的路，所以走了廿多年还等于没有走。而中国共产党呢，他正是走的逐步发展之路，卅年间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卒于统一全国。并且我现在相信他今后还能从人心上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如我之所祈求的那样，不止于以武力统一而已。他与我这一分别从何处开始的呢？他从阶级立场出发，不断地作斗争；而我则没有一定立场，不要斗争。

社会生产上剥削被剥削那种阶级矛盾是看轻不得的。在时间上这是人类历史转变发展的线索所在，在空间上则能从这里串联到任何角落，而为全世界两大阵营所由分的关键。共产党把握这一点，纵横无不可通，是其所以有前途无尽发展的根本。而我却只从表面看问题不能深入（我倒以为共产党专学外国不能深入），为一时严重的其他矛盾所吸引，转而轻视了基本重要的这一点；断了线索，抓

不到关键，自然就打不开路子，创不出局面。

具体地来说，我所看轻者就是地主与农民间的问题。我认为至少是对于中国多数乡村此时应把它看成整个的，而不要分化斗争于乡村之内。乡村内部虽不是没有问题，然面乡村外面问题——整个乡村遭破坏——更严重。身体生命财产的自由在都市居民比较还有一点，乡村已绝对无可言者。乡村居民的苦痛表现中国问题的灼点。况地主绅士此时皆已避离乡村，所余居民间纵有问题要留待后一步解决。——我总期望土地问题要容乡村运动建立起统一国权后再来解决。（以上详见乡建理论第二八〇、三三三、四四一各页）。

就由于在这问题上轻轻滑过，我虽然说过这样的话：

> 如何得从痛痒亲切处，条达出来多数人内心的要求而贯串统一之，是中国的生死问题。得着这个法，便起死回生；得不着这个法，便只有等死。
>
> （见《乡建理论》第三五五页）

但这话却等于为毛主席和共产党人说了，而不是为自己说的。他们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一起，抓住农民的痛痒而发动之，就结合成功革命力量。我自己呢，竟落得“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号

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是一九三六年邹平乡村工作同人自作检讨的两大问题，见《乡建理论》附录。）正为避免斗争就抓不住痛痒；不痛不痒地作功夫，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一向我在建国问题上，在抗日作战上，倒是都相信非发动民众不可，并且自己亦这样做。但总是不能深入。其故即在没有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站在一起，不是革命阶级立场，而是主张知识分子下乡领导农民、组织农民，是在做教育功夫。上文（第六节起首）曾说“由今看来，发动民众自是对的，却究竟我亦还没有对”；又在光明日报前文曾说我最佩服共产党的群众运动，“领导与群众结合得那样好”；当然全是这一个问题。

我常自以为与任何人都不隔阂，其结果却是与任何人亦没有打通，临末落得自己一个人即其事实证验。共产党不惜与敌人作斗争，有时真是激烈怕人，然却能针针见血，直透人心，卒得与人打成一片。上文所以说“现在我相信他今后还能从人心上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不止于以武力统一全国而已”，正在此。

我常觉得在两度革命后，社会人生的一切价值标准不能统一，“不苦于没有道理说服人而苦于说服人的道理太多”（上文第十节）。其实这正为自己没有站在革命的阶级立场之故。从乎革命立场好

恶分明，一切是非取舍不定自定。“无秩序”的话，仍不过自己没有一定立场，革命要求不强，信心不足的表见。这样自己本身先发不出力量来，又何能结合有力量的人？于是便归于无所不联合之路，其结果则是任谁亦联合不到。

如上文所说，我以武力分散而不能集中统一为苦，因而要形成此社会一广大联合为武力作主体。其实这仍然由于自己没有站在革命的阶级立场之故。站定革命立场的人将不看武力是分散的，更不以武力分散为苦。因为他正要求把武力转属于自己，他看武力总不外掌握在新旧不同各剥削阶级手中，虽分散而不分散，并且分散了更好，让他们彼此冲突更好。——共产党武力之创造成功正利用了统治阶级的分裂内战这机会。

我虽以武力分散为苦，却正亦利用这机会而发起并发展了乡村运动。当抗战起后，由于大局形势的推移而全国武力逐渐分归两大党的时候，我原来想从乡村运动形成此大社会一联合体的计划势将落空。于是改以党派的联合代替乡村运动的联合。而所谓党派呢，自以两大党为主要；两大党都是拥有武力的，这就不是社会的联合而是政府的联合了。于是发生要把武力交出来的问题，和要把政权治权划分开的主张。我满以为利用两大武力相持不决的形势，和国内国际都不容许再有内战的强大要求，将逼使两党非走我的道路不可。我在重庆旧政协军

事小组上激昂急迫的神情，邵力子先生曾看见；我在南京和谈时格外卖力的那些事情，则民盟内外都晓得。其实全是糊涂！阶级的矛盾不会让武力老在分散状态，而卒必致归向两方面去；以阶级矛盾为背景基础的两方武力亦绝无交出来而合一的可能；相持不决亦不过表面一时的，而新生力量不可战胜，腐旧势力定归没落；所有这些道理我在当时都看不出，信不及。——直到解放前夕还信不及。

总结一句：毛主席实事求是，从斗争求联合的联合政权今天成功了；我那种主观主义要联合不要斗争的联合政权本出于空想，今天自然落空。事实既经证明，历史作出定论，三十年自以为革命的我，临到末来还只有承认是改良。

经过反省，我认识到：无疑地吃亏在我不懂矛盾论。然而为什么不懂矛盾论呢？对于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接触不到，难道只是聪明不够的一个问题吗？其所以粗粗领会到一点阶级矛盾社会发展之理便用来论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而不能深追而深通其义，用以解决中国问题，根本为我不象毛主席那样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立场，我没有那副伟大的感情和决心。毛主席之能深通马列主义全从其革命实践中得来；如上文所检讨我没有真革命，自无意乎深追，亦无从而深通。还是立场问题决定了一切。

一九五二．五．五

# 跋　　语

此文最大缺点即在今天批判自己的话还没有自己讲明过去如何用心思的话多。属文之时未尝不一再删节，而删节下来犹且如是，可见胸中求为人知之念多于其自惭自悔之念。惭悔之心不切，检讨文是不可能写好的。

六月五日激溟记

# 附　录

# 梁漱溟先生访问记

任 华　　驰 方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

——老子

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幢高楼里，住着一位老人。他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傲雪凌霜，坚如古松。从组织京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写印《社会主义粹言》至今，笔墨春秋垂七十五年。毕生讲学，门生三千，著作等身。晚年身处逆境，犹在寂寥中完成新著《人心与人生》。他就是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

我们去拜访时，他正在为重印《中国文化要义》写一篇新序。从他庄重的神态中使人感觉到：这瘦小的躯体，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威严的双眸，透露着深邃的智慧。

他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梁老先生今年高龄九十四岁。在多难华夏的这个多难世纪里，苦难总常伴着哲人。梁老先生说："行云流水，不足挂齿。"经我们请求，他平静地讲述了他的曲折的、启人深思的往事……

## "我和毛泽东本来是老朋友"

话题自然从毛泽东的那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开始。

梁先生说："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早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他双唇紧闭，似乎不屑一提。好奇心驱使我们：一定要"打碎沙锅问到底"。他才淡淡地说：

"我和毛泽东本来是老朋友。相互间比较熟悉，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要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

话匣子打开了，梁先生的回忆把我们引回了遥远的十九世纪末叶。原来他与毛泽东同庚，都生于一八九三年，即清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巳。生肖都属蛇，梁比毛早出生七十天。

早年在北京大学，两人一度同事。一个在图书馆工作，一个在哲学系任教。梁在课前课后总要到

图书馆盘桓一会，便自然地相识了。此外，两人之间还有一段历史渊源。

梁氏故家虽然世居广西，咸丰年间，有的到了北京，有的在湖南定居。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奎就是生于湘潭，在湖南省的学务处做事，而与杨怀中是莫逆之交。梁焕奎保荐杨怀中留日，还一同东渡日本。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均，则是杨怀中的学生。辛亥革命以后，梁焕奎住在北京缨子胡同梁漱溟家中。杨怀中从长沙到北京，在北大任教，与梁焕奎时相过从。自此便有通家之好。交谊更笃。毛泽东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到北京，最初住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怀中家。经杨怀中介绍而与梁焕奎相识。后来，毛泽东创议的湖南“驱张（敬尧）运动”，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毛泽东深知梁焕奎的籍贯是湘潭，在北大又了解梁漱溟的籍贯是桂林，一家兄弟为何有两个省籍？这个疑团，搁了二十年才算解开。

一九三八年一月，日寇步步进逼，国难深重。梁漱溟为了民族救亡大计，先见蒋介石，后访毛泽东。经西安到达延安。毛泽东看见老朋友来临，非常高兴。开口就问：“你究竟是广西人？还是湖南人？”

梁漱溟答以“原籍广西桂林”。毛泽东“刨根寻底”地追问：“那为什么你的老兄，又自称和我同乡呢？”

梁漱溟便把曾祖和曾叔祖或因出仕、或因避乱

而离开桂林的原委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请梁漱溟到自己的窑洞里晤谈，有点象“酒逢知已”，在半个月中竟长谈了八次。有两次谈得欲罢不能，竟通宵达旦。当他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请梁漱溟提意见。梁说：“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毛说，不行，这是客套话，非要梁提出批评不可。梁漱溟考虑了一下，便直率地对毛泽东个人提出了希望：“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

毛泽东点头微笑，相约再见。有此渊源，所以毛泽东后来常公开宣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当然，在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上，毛梁二人显然不同。但在早期，不少地方却异中有同。例如：写《〈伦理学原理〉批语》时的毛泽东与写《究元决疑论》时的梁漱溟，彼此的思想方法颇为近似。最有趣的是，在“求学”和“办学”等问题上，两人之间，甚至包括胡适之，也有一致的地方。

当时，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与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马叙伦的《老庄哲学》并驾齐驱。在老北大的同学中，流传着一个“哲学对台”的有趣故事：

有一天，在北京大学同时同地的楼上楼下，胡适之与梁漱溟分别在两间教室里讲课。胡主张用西方文化代替东方文化；梁认为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人类的出路所在。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同学们好奇，不免向老师发出疑问。于是，胡适之议论梁漱溟道：

“他连电影院都没进过去，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一样？”

梁漱溟在回答同学的质疑时，顺口讲了这样一句：

“胡博士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

这则轶事，见于约四十年前出版的《子曰》丛刊，作者是胡适之的学生。事隔多年，梁老已记不清楚。但他分明记得：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杨怀中先生病故，在法源寺开追悼会。他借宿北长街九十九号一所喇嘛庙里，到北大时还见过几面。当时毛泽东在北京给友人写信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毛泽东还想“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这似乎是历史的绝妙讽刺，毛泽东“实行共产的生活”而创办“自修大学”，其校名原来出诸胡适之的建议。

当年在“求学”和“办学”问题上，梁漱溟主

张“自学”，胡适之“非”难“留学”，毛泽东开办“自修大学”。三者之间，确有不少共同之处。“弹指一挥”，三十年过去，大陆上发动“批判胡适之”和“批判梁漱溟”的两项运动，这是当初的“哲学对台”者所始料不及的。

## 究竟为何批判梁漱溟？

梁老先生想了一下，微微一笑，说道：“此事说来话长，前因要从一九四六年讲起……”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政协会议虽然还在进行，但“宪法草案”、“国民大会”、“军事整编”、“施政纲领”、“政府组织”等五个小组所协商的问题已有眉目，差不多可以取得协议，和平建国有望。当天晚上，周恩来到重庆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他说廿七日要飞延安报告，取得中共中央同意后，回来即可签字。他表示：政协取得协议，马上就改组政府，大家得一同努力。

梁漱溟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身负重任。他已给毛泽东写好一封信，托周恩来带去延安。信内大意是说明：和平有望，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可告一段落，今后愿致力于思想言论工作，要离开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请予谅解。

一月三十日周恩来从延安回来，带来毛泽东的复信，对梁想离开现实政治的意思表示不同意。认

为：言论与行动不是“不可得而兼”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

周恩来也说：“你的信，我当时未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

但梁漱溟很固执，写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在政协闭幕那天的宴会上，交给周恩来和现犹健在的张岳军阅看，末后给胡政之在二月一日《大公报》发表。他表示：为了发抒自己的见解，只有离现实政治远一些，才好说话。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了。

梁漱溟的行动，毛泽东很难谅解。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他躲在虚幻的桃花源——北碚，讲述和写定了《中国文化要义》。许多朋友北上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他有点置身事外，不问不闻……。在此期间，他又写了《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和《敬告中国共产党》，发表在《大公报》上，对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以示“中立”和“公正”。——这就是一九五三年受到“批判”的前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各方的朋友说：今天梁漱溟先生没有来，很遗憾。不久，毛泽东也想起了这位老朋友，邀他到北京。

梁漱溟初到北京，毛泽东尚滞留在莫斯科。他对周恩来说："有些问题还要观察一下。"周恩来表示同意，认为"梁先生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毛泽东从苏联归来，梁漱溟和他重逢于北京火车站。毛泽东见到他，很高兴，当场与梁漱溟约定：找一个时间好好谈谈……。接着，几次邀他去中南海。

有一次傍晚，邀至颐年堂，林伯渠也在座。交谈到晚餐时分，服务员来问：是不是开饭？

毛泽东挥挥手，连说：开饭、开饭！

梁漱溟连说："我是吃素的，请随便来两样蔬菜吧！"

毛泽东谐谑地说：不！不是两样，统统要素菜，我们今天吃饭是"统一战线"、素食主义……。

毛泽东请梁漱溟在新政府中任职，梁漱溟固执己见，说"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而敬辞不受。

后来，毛泽东批评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即肇源于此。

一九五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梁漱溟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说，"过去认为共产党

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言下之意，是说知识分子入了党、农民入了党，是否也存在思想改造的问题。——周恩来表示，“梁漱溟先生这话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许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也要改造。

两年后，讨论“总路线”，请了一百多人参加。梁漱溟和张治中、侯德榜一齐坐在长沙发上。梁漱溟联系自己的一些见闻，提意见，要求对农民行仁政。他说：“希望共产党进了城市不要忘掉农民。有些农民的干部不好，把持乡村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搞不好，肚子吃不饱，农民没有信心，大批涌进城市当小工，每天可挣一元钱。他们在北京露宿，街头煮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把他们遣送回去，他们明天又来。工人有工会可靠，农民的农会却靠不住。有人说‘工农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希望对农民行仁政，要体恤农民……。”

讨论告一段落时，毛泽东来了，大家请他讲话。讲话中间，毛泽东不指名的批了一下梁漱溟。大意是：有人提出行仁政，讲这个话的人大概是孔孟之徒吧！至于说工农之间有九天九地之差，是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

三十年后，梁漱溟先生说：“我感到很遗憾。

当时如果听过算了，不去计较，也没有点我的名，就没有事了。我不服，也沉不住气，就写信给他。信中提出：你所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

次日，怀仁堂有京剧招待会，演出《梁红玉抗金兵》。周恩来请梁漱溟观剧，安排他与毛泽东坐得比较近。对于梁的信，毛泽东一字不提。梁漱溟又忍不住了，戏也看不下，和毛泽东解释，请他收回这个话。毛泽东生气了，就说不收回。梁漱溟还要提意见，周恩来连忙相劝，要大家先看戏。

过了几天，在一次正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要求毛泽东收回他的话，说：“要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就进一步批判了梁漱溟。这就是那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份量很重，令人震惊。当场，陈铭枢就问道：“梁的问题是什么性质？”毛泽东表示：是人民内部矛盾。接着，学术界对梁漱溟展开全面批判。不过，当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访华时，周恩来仍邀请梁漱溟参加宴会。

此事距今已三十三年。梁漱溟先生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

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象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 “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谈到文化大革命，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版、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当时，梁漱溟住在德胜门的积水潭小铜井一号 附近还有城墙。梁家正面叫豁口，不远处是“一二三中学”。最早来“造反”的，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梁老先生说：“都是一群孩子。”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这些红卫兵来敲门。梁先生赶紧去开门，小将们蜂涌冲入。

不容分说，大家就动手：开箱、倒柜、翻抽屉、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小铜井搞得不亦乐乎，梁氏三代的藏书、明清名家法绘、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等文物古籍，院子里烧了好几天。梁漱溟说：“这些东西，是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当了三代京官陆续购买的。有些珍

本古籍，对我们用处不大；我向来反对附庸风雅，对名人书画也不感兴趣。如果真是‘革命’需要，那你们就处理吧。不过，我对这种处理方法是不同意的。最可惜的，是两部洋装书：《辞源》和《辞海》。这是我一个四川的学生借给我的，不能烧。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他们不听，硬把两部书丢进火海。因为布面精装，一时烧不着，就捞起来边撕边烧……。当时我心里很不愉快，因为我将失信于学生，无法把原物归还原主了，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没有意见。为什么连我学生的两部普通书也不肯放过呢？……”

红卫兵的头领看到梁家正房装有电话，就说：“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梁家的日常用具丢了出来。红卫兵又把梁漱溟拉出去游街、批判斗争。

游斗回来，梁漱溟被关在小铜井南房的小屋中，不准自由行动。

老人被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家也砸了，书也烧了，游街也游了，批斗也斗了，最后造反派拿来一叠白纸，“勒令”梁漱溟写“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

梁漱溟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感慨万千。萦绕他的脑际的，是这样的信念：“书籍烧毁了，

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南小屋，凭着记忆，七十三岁的梁漱溟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

白天，在狂热的噪音声中，他写作不辍；夜晚，在暗蚊的不断侵扰中，他依然写作不辍；红卫兵把他揪出去批斗，回来时满身大汗，家人拿毛巾替他擦汗，他回到南小屋继续写作。《儒佛异同论》进度每天一千多字，写了个把月，终于完篇，全文四万多字。意犹未尽，接着又动手写《东方学术概观》。

此时，黑云压城，从海上刮来了所谓“一月风暴”。他仰望云天，忧虑重重，深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心。但是，他相信：“纵然是‘泰山颓、梁木坏、哲人萎’，我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将千秋万代，与世永存！”

##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是夏历重阳节。梁漱溟在寂寥中度过了他的八十诞辰。同年十月底，江青鼓动的“批林批孔”，捎带批判梁漱溟。江青在一次大会上还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

梁漱溟先生说：“那时，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名。我

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听了文件，读了报，觉得都是一个调子，就是对孔子全盘否定，把林彪的罪恶归罪于孔孟之道。当时我只能‘腹非’，不能‘明言’。因为这又是一场政治运动，我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决定保持沉默。”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压力逼得他非开口不可，而一开口，便引起了一场新的风波。

梁漱溟沉默了一个多月，但会上会下，逼他一定要表态。君子坦荡，无所畏惧。他就在同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会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协调若一。我们来自四面八方，要协调就要求同存异。……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和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年过八旬的梁漱溟当然清楚，此时此地，他再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在某些与会者的软硬兼施下，他连“不能公开”的堑壕也告陷落。在无路可退的情势下，只好公开见解。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高龄八十一岁的梁漱溟衣冠整洁、拿着皮包，就象当年在

北京大学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样，斯斯文文地走进了“政协会议室”。他打开皮包，取出里面的讲稿、参考书和笔记本，整齐地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庄严地站起来，和课堂上的教师一样，就《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题，有声有色地讲了两个半天。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

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在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量。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整个讲话分：“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伦理情谊”、“社会家庭化国家天下化”、“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孔子反独断的理性主义”、“传统文化消极失败的一面”、“中西文化之长短得失”、“开明无执与仁厚有容”、“何以欧洲分裂而中国浑融”等十段。

梁漱溟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然后肯定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他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

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明确表示：“我的观点，是与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的。”这就是对江青之流全盘否定孔子的答复。

针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编的所谓《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文件”，梁漱溟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他公开表示：“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这番言论的后果，便由“批林批孔”发展到“批梁”。从一九七四年三月至九月，“批判梁漱溟”的运动搞了整整七个月，大小批判会一百余次。赠予他的新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和“孔孟之道的卫道士”。

在三月十一日的会议上，他表示“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从此以后，历时半年，每会必到，态度是：沉默！

“批梁”运动打算九月底告一段落。作为结束前的高潮，政协开了次总结性的集中批梁大会，批判会的主持人奉命一再追问梁漱溟对批判的感想。梁漱溟在九月二十三日的座谈会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十一月十八日，梁漱溟还写了《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再次重申了“不可夺志”的明确立场。

有人要梁漱溟对这两句话作出解释。梁漱溟在会议上侃侃而谈：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是这个‘志’却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他的‘志’。”

## “无我为大，有本不穷”

梁漱溟先生说：他的性情与脾气，和他的父亲（梁济先生）颇多相似之处。他说：“先父天资不高，我自己亦甚笨。当我十七岁时，先父曾字我曰‘肖吾’。——以‘肖吾’为名，‘肖吾’者乃小我也。”他有两句赠友和自箴的话，就是“无我为大，有本不穷。”这其实也是他的人格和道德的写照。

最近，梁先生写了一幅座右铭，铭曰：“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他对自己的早年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久已感觉不满，最近还说：“其中实有重大错失，此番乃加以改正。”在五十年前，他曾发愿写《人心与人生》，正式撰写开始于一九六〇年，成书三

分之一而突遇浩劫，资料尽失，被迫辍笔。经历“批孔”逆流以后，乃发奋著述，于一九七五年全书卒告完成，自费交学林出版社代理出版。

最近，他又编定了两部书：一是《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是《东西学术概观》。梁漱溟先生曾云：“当全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他在中国文化讲习班上就作了这样的展望：“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特殊贡献，可是也有严重的缺点。在解决人生第一个问题——人类在自然界求生存的问题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大大落后了。这不是因为中国人走得慢，而是因为中国人把心思用在人伦问题上了。但中国人的互以对方为重、‘礼让为国’，是未来世界的前途，它必将取代‘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思想。……世界的前途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原载香港《良友》画报，1986年8月号）

# 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汪东林

1986年《群言》月刊第二、三期，连载了梁漱溟老先生的一篇长文，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梁漱溟作为一名对儒家学说研究有素的学者，对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其言其行其人，自有独到的看法。本文只是想从梁漱溟长文篇末的撰写时间说起，援引笔者亲身经历而掌握的资料，将梁漱溟在哄闹一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言行，作一简略的回顾。

梁漱溟长文篇末注明：“1974年6月25日改写稿，1974年11月8日立冬撰写完成不发表。”留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梁漱溟写作这篇长文的时间，正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狂风恶浪之时。但读者并不清

楚，梁文是出于对当时“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满而悄悄写于书斋，藏于秘室，还是在会上公开发表其基本观点，遭到长时间的“批驳”而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写下这篇长文为证呢？本文将用事实对此作出答复。但由于这桩公案历时一年（1973年11月至1974年11月），所谓“批林批孔又批梁”的批判会每周三、四次，小则一、二十人，大则一、二百人，梁先生本人的言论也由孔子而林彪，旁及刘少奇、彭德怀等人，这就使我这篇文章不得不写得稍长一些，请读者们细心阅读，其中不乏发人深省之处。

## 一　梁漱溟发表长篇讲话之前

1973年10月底，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的“批林批孔”闹剧开场。经历了八年动乱的中国老百姓，再一次被卷进了不明真相的政治闹剧之中。当时刚刚恢复“学习”权利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不足二百人，他们也不得不“表态”“拥护”，发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还生硬地把孔孟之道往林彪战车上绑。梁漱溟先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学习组也就成了重点组。为什么？第一，梁是谁都知道的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素有研究的学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贯尊孔”派。第二，梁这人颇有些与众不

同，向来是有话便直言无隐而不顾及其他。从当时某些居领导地位的人看，有种估计：一是梁表态支持“批孔”，话不在多，从一个老“尊孔”派变为新“批孔”派，是有“宣传”价值的；二是反对“批孔”，那就拿梁这个老“反面教员”作靶子，也无碍大局。从当时与梁一样参加“批林批孔”学习的多数人看，违心之言说多了不是滋味，听多了也感到腻味，便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注视着梁漱溟，但愿他能一如既往地直言而“唱唱反调”，给某些有权势的人增加点麻烦。这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梁漱溟，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听录音，贴大字报，立刻证实了这个消息。于是梁漱溟的举动就更引人注目了。

但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他所在的学习组有二十余人都“表态”了，都表示“拥护”这个运动，唯他始终一言不发，持续了一个多月。但沉默也是一种态度，同样是不允许的。粉碎“四人帮”后，梁先生曾对人说：“那时候，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名，我脑子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是咋回事。我只是认真地读报，听文件。都是同一个调门的，同一个‘立论’——那就是对孔子百分之百的否定，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我对这一高超的‘立论’不能苟同，心里一直的摇头。但我认识到

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既弄不清来龙去脉，还是静观为好。不料保持沉默也不成，逼得我非开口不可，而后引出了一段周折。”在当时的学习会上，当许多人都“表”了“态”而梁漱溟依旧保持沉默的时候，便有人发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有人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在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溟梁漱听罢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碰见他呢。我怀疑他文章所说的是否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严厉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只是笑了一笑，当场没有再说什么。又过了几天，即1973年12月14日，梁漱溟才在学习会上说：

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

“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对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会上马上有人说话：“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梁漱溟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主持会议的人立即答复：“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退路没有了，梁漱溟答应作准备。

1974年2月22日，梁漱溟先生登台开讲。为什么叫“登台开讲”？有这样一个细节：梁漱溟发言的那天，衣冠整洁，皮包装得鼓鼓的，里面是讲稿、参考书、笔记本，一件件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站起来发言。由于他已是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是学习组最年长者之一，主持的人请他坐下讲，他摆摆手，就象在大学课堂里正式开课一样，慢条斯理、

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第二天，消息传开，其他学习组就有人悄悄说："梁漱溟开讲了，半天没讲完。"2月25日，梁漱溟又继续讲了一个半天。

## 二　梁漱溟长篇发言要点补遗

梁漱溟先生长达两个半天的发言，总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由于是即席讲演，许多话乃讲稿提纲上所没有，即使1985年《群言》杂志连载的文章，也未能全部包括。笔者现根据当时的纪录和梁漱溟的手稿，就其结论性的要点作些补充。

梁漱溟在学习会上说：

>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任，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
>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有过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着什么样的位

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缺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说中国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枝节问题。

有人说毛主席一直是批孔反孔，但我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他不止一次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研究和总结，批判地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象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毛主席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少，所以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看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而今从儒家书籍（主要是《四书》）中引出许多话，看它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这种分析、批判，不无道理，但亦不能简单化，把学术研究

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学术上怎么讲是另外一回事，但从政治影响看总是不好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话当然与今天不合，要唾弃的。又如中庸之道，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不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只作普通的政治角度的分析，则把中庸之道看成折中、调和，它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迟迟不进步，因此说中庸之道不合适。我理解今天的批判，就是从政治上说话，而并非是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要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就麻烦了，这也不是今天搞运动的意思。

正当江青一手制造的“批林批孔”运动闹剧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梁漱溟在学习会上发表了上述针锋相对的观点，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这既是批判梁漱溟大字报的标题，也是大小批判会常用的口号。当然，还有老账新账一块算，梁漱溟是长期负债户，他的老账是算不清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大小批判会形式的“文攻”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在梁漱溟自己，是早已有思想准备的。至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多数人呢，大家心照不宣，这本是一场有领导的“运动”，不免又是人人在小组会上“表态”，并推举代表上大会去作批判发言，大家热闹一番。听的，说的，大家都无可

奈何地在这场闹剧中扮演着角色，一会儿是演员，一会儿是观众。相比之下，当观众在台下一坐，当然较安稳些，上台演戏就困难得多，起码总得读一遍满纸违心话的发言稿吧。正因为这样，所以有民主党派学习组曾发生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愿意上大会读批梁发言稿的事，最后只得由领导做工作，指定了发言人。当时所谓批判会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 三　梁漱溟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在作了上述长篇发言之后，得到的第一步反应是由他所在的学习组集中火力对他进行批判。由于"批林批孔"是连在一起的，自然就涉及对待"批林"的态度问题。众口追问，不表态是不成的。一开始，梁漱溟也只是露了一个头，他说：

> 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怕会产生新的麻烦，能暂且容我不说更好。

用当时的话说，梁漱溟的这段话是"故技重演"。已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把话倒出来

是难过关的。梁漱溟随后终于在众人追问之下吐出真言，把要说的话断断续续公之于众。主要论点为：一是林彪没有路线，批林就是批他不是人，是个鬼！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现将梁漱溟当时的发言要点摘录于后，这是《群言》的长文中所没有的。

梁漱溟说：

我的批林，与众说不大一样。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所谓政治路线，应该有公开拿得出来的主张，如刘少奇的主张就很多，不管怎么错误，但他敢于说出来，公开提出，并自信是对的，这才够得上路线。而林彪的路线是什么呢？不但我看不出，回答不上来，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他公开说的全部是假话，用假话骗取信任，是说假话的第一能手！谁能找出林彪的公开主张呢？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有是有一点，比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是他拿出来的，但仍然是个幌子，是假话。他自己想作主席，故意说必须让毛主席当主席。这还是不敢见人，不能见人的黑话。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也是藏着的事，不敢见人，见不得人，这算什么路线？无路线可言！如果林彪直接对毛主席讲，要设国家主席，你不当，我来当，才象一个光明男子！那也还算是一种主张，一种路线。现在这样算什么，能算什么路线！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他的一些“理论”、方法、手段，都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的真意是想自己当

主席，而自己又不公开说。林彪是个阴谋家，他没有人格。所以事发后毛主席告诫大家：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林彪破坏毛主席正确路线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在中共党内发生了一场第十次路线斗争。但林彪本身我认为不存在什么路线，够不上路线。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称得上是路线。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而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这样。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政策、路线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但他们都有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是明明白白有路线，够得上路线的。说林彪有什么路线，那是抬高了他。

我不能说屈心话，不能象林彪那样，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要两面派，没有比林彪装得更象。《语录》是他编的，在没有敗露之前，似乎马列主义没有比他学得更好。林彪欺骗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受害于孔子！

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比较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是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

正是个人，但林彪身敗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言论，对梁漱溟的批判，由一、二十人的小组会上升为一、二百人的大会，时间持续到1974年底。

## 四、梁漱溟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自1974年2月20日梁漱溟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小组会对他批判的火力十分猛烈。梁漱溟希望这次批判不要拖得太长久，于是不几日便检查自己。无奈他思想实际并未搞通，又不想说假话应付过关，结果是越说毛病越多，批判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新内容；特别是对待“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一直闹到白热化的程度。

我仍然采用摘录梁漱溟当时言论的办法，用事实作出答复。

3月8日，即在梁漱溟长篇发言十余天之后，梁漱溟便在会上说：

最近我竟大胆狂妄地放言高论起来，我原说文章写出后亦不公开拿出来。“仍不公开”的话说了多次，就是怕公开出来不合适。第一怕文章内容上的学术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的政治运动，文不切题；第二更怕有碍

于当前的政治运动。没料到不拿出来的东西，竟然拿出了其中一部分，很有碍的一部分。自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这错误不怪自己怪谁？又犯了老毛病，个人英雄主义，好胜，逞强。错误是我的错误，罪过是我的罪过，一切我应担当。……

梁漱溟继续说：

……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委员说了不要再称我什么"梁老"、"梁先生"……快人快语，痛快人说痛快话。有声有色，会上的气氛才象个样儿。所以上次临散会时，他话没讲完，主持会的于老（树德）说下次接着讲，我也即站起来应声说"下次再讲吧！"我心里此时没有我，只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任务，可惜我不能经常这样无我——如果我那样高明，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错误了。

3月11日，梁漱溟又在会上说：

我的长篇发言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错误是严重的。本学习组同人对我的一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申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就是了。

从三月以后，梁漱溟真的不申说了，但坚持每

会必到，洗耳恭听。只是其间在众人追问对待批判林彪的态度时，梁漱溟才讲了本文在第三段摘录的那些话。

不料9月23日，当这场历时半年多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征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时，梁漱溟却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使在座的人哑然，转而群情激愤，不可抑制。11月18日，梁漱溟曾手书《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 从三月而四月，而五月、六月、七月，大抵均在学习批孔，实际上无非对我的批判斗争，此不细述。先则每周四次会，后减为三次。八月份因天热，又减了一次。在此时期，本小组而外，各学习组均对我进行背靠背批判。顿先宣布9月将召开五个学习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此会于9月19日、20日、21日连续开会，先后发言者十四人，均从批林批孔入手，集中批判我。最后一次大会宣布，月内各组可就大会批判发言自行座谈两次。在本组9月23日会上，召集人曾征问我对几次大会有何感想，我答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的最后答复，震惊了各组同人。当时的主持者勒令梁漱溟作出解释。

梁漱溟解释说：

>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

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的这段解释，更使在座的同人哑然、木然。我想，即使在今天也不必多作解释的解释，还是留着原话，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吧！

原载《团结报》，1986年
762、763、764期

# 梁漱溟年谱简编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

生于北京。翌年中日甲午之战。

**1898年**（五岁）

开始读书。是年光绪变法维新。

**1899年**（六岁）

入兼习英文之“中西小学堂”

**1900年**（七岁）

因“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辍学。

**1901年**（八岁）

庚子变后，维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于是又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学习。

**1902年**（九岁）

改入彭翼仲先生主办之“蒙养学堂”，学习至次年。

**1904年**（十一岁）

由亲友各家合请一家庭教师，在家中不习四书五经，而读小学课本。

1905年（十二岁）

入“江苏小学堂”学习。

1906年（十三岁）

考入“顺天中学堂”，学习国文、英文及数理化各科。　因同学甄元熙介绍，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911年（十八岁）

中学（时改称“顺天高等学堂”，程度同大学预科）毕业。　读张健译日人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神髓》有感而作《社会主义粹言》，自己油印数十份。　辛亥革命。

1912年（十九岁）

参加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在支部主办之天津《民国报》（社长甄元熙，总编孙炳文烈士）任编辑及外勤记者。

1916年（廿三岁）

袁世凯“帝制”失败，恢复民国法统。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部秘书。　有感于名记者黄远生之死，而作《究元决疑论》发挥佛家出世思想。文章发表于《东方杂志》后，以此求教于方任北大校长之蔡元培先生，因而被邀往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廿四岁）

正式到北大哲学系任课，至1924年止，前后七年。是年游湘，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因而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自费印发千册散发，呼吁制止南北军阀内战。

1919年（廿六岁）

开始与熊十力先生相交往。　《印度哲学概论》出版。

1920年（廿七岁）

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　在北大添讲佛家唯识学。《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　梁启超、蒋方震诸先生由林志钧（宰平）先生引导来访谈。

1921年（廿八岁）

介绍熊十力先生来北大讲授佛家唯识学。

1922年（廿九岁）

与李大钊先生倡议裁兵；蒋方震先生草出“裁兵计划。”　在蔡先生家讨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并签名。

1923年（三十岁）

陈铭枢先生北来相访。

1924年（卅一岁）

辞去北大教学工作，赴山东主持曹州高中及重华书院，并筹办曲阜大学。

1925年（卅二岁）

因时局变化回北京，与熊十力先生住十刹海东

煤厂私人讲学。　是年为北伐前夕，南方革命空气高涨。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三位来信，以革命大义相责勉，促速南下，而此时对中国大局之出路正处于疑闷中。

**1927年**（卅四岁）

应李济深等三位之邀赴广州。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为广东省政府委员，辞未就职。

**1928年**（卅五岁）

在广州，认为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入手，因而作《乡治十讲》。筹办乡治讲习所。

**1929年**（卅六岁）

离广州，至上海昆山、南京晓庄、河北定县及山西乡村考察乡村工作。后因广州政局变化，不再南返。经王鸿一先生介绍，与筹办河南村治学院之梁仲华、彭翼廷等相识，并受聘为该院教务长。同时接办北京《村治》月刊。

**1930年**（卅七岁）

因蒋阎冯中原大战，村治学院开办未满周年即结束。

**1931年**（卅八岁）

梁仲华等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联系，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仲华任院长。内设训练部和研究部，任研究部主任。邹平县划为乡建实验区。

1932年（卅九岁）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村治论文集）出版。　仍兼任《村治》月刊主编。

1933年（四十岁）

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召开，作《山东乡建院工作报告》。报告中说：“顾今日中国之乱，系由近百年来，遭遇另一种不同文化，……所引发其自身传统文化之一大激变。夙昔社会之组织构造，节节崩溃，……；此时而言求治，非从根底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所适用之一种组织构造不可。……所谓村治或乡村建设者，意在新组织构造必从乡村建其根基。”① 又划荷泽县为实验区。

1934年（四十一岁）

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河北定县召开。　增划山东济宁专区等十四县为实验区。　《乡村建设论文集》出版。

1935年（四十二岁）

与梁仲华、孙廉泉等，推动山东省政府拟定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1936—1938），以应付日本入侵，实行自卫作准备。　是年日人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华北局势紧张。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会议在无锡召开。

1936年（四十三岁）

应邀赴广州讲学，途经上海访蒋方震先生。蒋先生谈日本大举入侵将不在远，而我方之应付策略应植基山东山西之农村。

1937年（四十四岁）

“七七事变”，日本入侵我国。应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参加会议。自认为这是参与上层政治活动的开端。　　因战火延及山东，山东乡村建研究院建院七年（1931—1937）之后结束，部分人员撤往河南。

1938年（四十五岁）

为全国团结抗战，一月初自武汉赴延安，访问毛泽东主席。　　国防会议参议会改组，扩大为国民参政会，被选为参政员。自此任参议员至该会结束时（1947）止。　　在四川创办南充民众教育馆。

1939年（四十六岁）

二月自重庆，经西安、洛阳，去游击区巡视，历经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前后八个月。亲见国共摩擦，深惧内战爆发，妨碍抗敌。返回大后方成都、重庆，得悉党派关系恶化同样严重，于是与国共及第三方面分别商讨如何避免内战，并与第三方面人士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四十七岁）

年底，“皖南事变”前夕与黄炎培、左舜生、

张君劢共四人商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盖认为第三方面任务重大，非加强组织不可。　　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四十八岁）

一月发生“皖南事变”。因不能坐视国内分裂之发展，与民盟同人奔走于国共双方。为摆脱国民党政府之钳制压迫，被派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自任社长。在报上发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及民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敌，报纸停刊。

1942年（四十九岁）

年初自香港脱险，至桂林。　　着手撰写《中国文化要义》。写出《我的自学小史》前十一节发表。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发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　　年末，张云川自重庆带来周恩来先生密信，劝往苏北或其邻近地区建立乡建或民盟据点。因感在苏北缺乏自己开展工作的基础，辞拒未去。

1943年（五十岁）

写《答政府见召书》，寄邵力子。信中说：“……其在大后方，则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寖至无所不用其极。人不入党，几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绝难宣之于笔口。”“如漱溟者正同处此境地，而身受其苦

之一人。”信中最后说：“政府诚有取于民主精神，政府自实践之，何用许多人来筹备。”因此，“实施宪政，非所愿闻；践行民主，宁待筹备。”②拒赴重庆。

**1944年**（五十一岁）

发表《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漱溟最近文录》出版。日军八月进犯桂林，避难于贺县八步。同陈此生兄“过着自己烧饭的生活。”此时曾为“策划两广湖南三省交接处展开战时民众动员工作和树立对内政治革新旗帜，号召改造全国政局而奔走”，“尽算是苦心孤诣，卒于一事无成。”

**1945年**（五十二岁）

日本战败投降。以为“敌国外患既然没有，内部问题亦可望解决”。因此“用不着我再为现实政治努力”。“我要回到文化工作岗位。及至行抵广州，乃悉国内形势未容乐观。”③为参加重庆政协，年底由粤飞渝。　《梁漱溟教育论文集》出版。

**1946年**（五十三岁）

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重庆政协。会后以为“今幸内战停止，协商告成，中国有步入坦途之望”。“但时局旋即恶化，没有容我抽出身来，更且把我拖入。”四月接任民盟秘书长，“从五月初到十月底，整六个月，除一度去昆

明调查李闻案外，都在京沪间为和谈尽力，但当我看清楚无可为力的时候，我就拔脚走开了。”③于是辞去秘书长，远去重庆北碚，闭户著书，撰写《中国文化要义》。

1947年（五十四岁）

在《观察》杂志发表《树立信用，力求合作》。文中说：“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我对于民族前途，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远大理想，除掉这远大理想，便没有我。而他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②

1948年（五十五岁）

年末，写成《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备发表。文中指出：“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②于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

1949年（五十六岁）

《中国文化要义》出版。书中“自序”说：“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底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现在《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指《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编者注）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④《梁漱溟先生近年言

论集》出版。　　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解放军将渡江。　发表《过去内战责任在谁》、《敬告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同时写信致“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转诸同人”和“中共中央毛周诸公”，“勉励诸先生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声明自己决定三年之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对民盟则许我离盟；对中共则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协的号召。”关于脱离民盟原因说：“我知道我此时言论主张在盟内未必全同意。要我受拘束于组织而不得自由发言，我不甘心；使组织因我而受到破坏，尤非道义所许，……。”⑧

**1950年**（五十七岁）

由重庆北碚来北京。三月十二日应毛主席邀请晚饭谈话。“主席问我是否可以参加政府，我答自己愿在政府外效力。我希望设一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主席当时未置可否”，而以去参观新老解放区相劝。于是赴山东、河南、平原及东北六省参观，历时近半年。

**1951年**（五十八岁）

任全国政协委员。　　赴四川合川县云门乡参加土改。

**1952年**（五十九岁）

写出《我的努力与反省》一长文，回顾多年从

事社会活动的经过，并试作检讨。

1955年（六十二岁）

再次撰写《人心与人生》自序。

1965年（七十二岁）

在早年所作《悼王鸿一先生》一文后批注："此文写于1930年，其时吾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语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过。"

1966年（七十三岁）

《人心与人生》写出前七章，因"突遇文化大革命运动，以自己所储备之资料及参考书尽失而辍笔。"　"抄家"未逾月，"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撰写《儒佛异同论》"。

1974年（八十一岁）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改写完毕。文中说："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随后写出《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

1975年（八十二岁）

七月初《人心与人生》撰写完毕。在此书中后记中说："书虽告成，自己实不满意。"又说："竟尔勇于尝试论述""自己不能胜任的学术上根本性大问题——人心与人生"，是因为"第一，年方十六七之时对人生不胜其怀疑烦闷，倾慕出世，寻究佛法。由此而逐渐于人

生有其通达认识，不囿于世俗之见，转而能为之说明一切，”“第二，……当今人类前途正需要一种展望之际，……”。⑤　　改写《东方学术概观》一文。

**1980年**（八十七岁）

被推为政协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1984年**（九十一岁）

《人心与人生》一书出版。

注：

①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1933）。

② 《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

③ 《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

④ 《中国文化要义》（1949）。

⑤ 《人心与人生》（1984）。